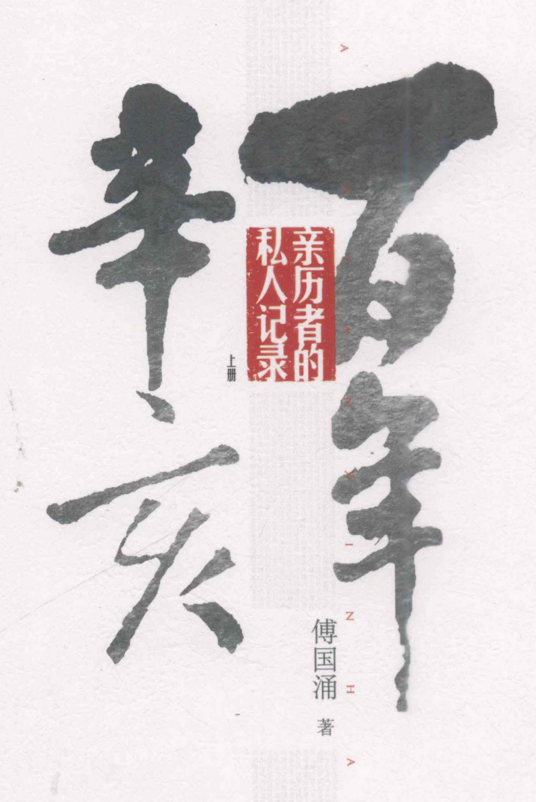


傅国涌 著

東方出版社



长期以来，我们熟悉的辛亥革命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述，而本书采用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口述、回忆录等史料，它们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政治倾向，既有那桐、荣庆、绍英、徐世昌、许宝蘅、汪荣宝、郑孝胥、恽毓鼎、叶昌炽等官员的日记，也有叶圣陶、吴宓、徐志摩、陆澹安等学生的日记，还有宗方小太郎、内田顾一、计约翰等外国人的日记，另有大量英、日、法等国外交人员的书信，通过这些私人记录，本书重现了有关辛亥革命的许多史实，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全新的解读，让我们得以进一步靠近现场，看到一幅幅更真实的历史图景，在平静的叙事中感受那个大变革时代的呼吸，重新认识那场改写历史的革命。

ISBN 978-7-5060-4197-3



定价：38.00元

百年家族

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上册

傅国涌 著

東方出版社

策划编辑：姚　恋
责任编辑：张　旭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上册 / 傅国涌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ISBN 978-7-5060-4197-3

Ⅰ.①百…　①Ⅱ.傅…　①辛亥革命—研究　Ⅳ.K25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7183 号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BAI NIAN XINHAI：QINLIZHE DE SIREN JILU

傅国涌　著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6
邮购电话： 010-65174355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339 千字
印　　张： 22. 5
书　　号： ISBN　978-7-5060-4197-3
定　　价： 38. 00 元

引 言

长期以来，我们所知道的辛亥革命几乎都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述，教科书的普及，年复一年的纪念，大量的革命记忆，几乎都是单向度的革命视角，我们看见的只是历史的单一侧面，然而却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当作了历史的全部。换句话说，辛亥革命的史实是以革命党人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仅仅呈现了历史的一部分，处于这个中心以外或不在中心视野里的大量史实则被遮蔽、忽略或遗漏了。我个人更希望看到革命发生时的社会心态。当革命来临之际，那些掌握优势资源、不愿看到革命发生的人是如何反应，如何面对的？王公亲贵特别是最高统治者隆裕太后怎样一步步作出选择，她的选择带来的正面效应该如何认识？革命在不同的社会力量当中如何激起回响？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碰撞、博弈又怎样影响了革命的结果？他们的共识是如何达成的？革命在哪些层面达到了确实的目标？

这些问号，以往的历史书或者没有回答，或者回答得不够清楚。百年之后，我之所以要重建辛亥叙事，就是想真正靠近现场，更客观、更全面地看一看那场不同于以往王朝更迭、原地踏步的历史巨变。真实是历史的生命所在，在基本史实都不够完整的前提下，我们作出的任何历史解释毫无疑问都是不可靠的。我们以往看历史时，常常是先有观点，而且这个观点又往往是固定、不可动摇的，然后再寻找史料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而与此相悖的史料则被毫不留情地舍弃了。

没有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想要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时代的真相，只有依靠亲历者当时留下的记录，及他们日后的口述和回忆。我更看重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这些私密性最强的文字，记录的往往是他们当时的亲历、亲闻和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带着他们的呼吸，裹着他们的心跳，那些许多可以触摸的细节，尤其具有现场感。

我曾说，在历史的深处潜伏着无数双眼睛，他们在各自的角度，看到了历史的不同侧面，体察到了历史的脉络是如何展开的。这些眼睛既包括了一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人，也包括被驱除之列的满人贵族和依附那个政权的汉人官吏，从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到一般官员，也包括张謇、汤寿潜这些立宪派，也包括留学生、国内的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现实有着不同的感受，对未来怀有不同的期待，透过他们的眼睛，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的面貌，体会当时的社会脉动。当革命发生，官员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面对、怎么记录的，过去我们知之甚少，几乎缺位。在大臣当中，那桐、荣庆、绍英、徐世昌等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当风暴袭来，他们的反应、心态、举动都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一句话，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也无人愿意去回天。起草了大量诏书的许宝蘅、资政院钦选议员汪荣宝、翰林恽毓鼎、广东地方官左绍佐等人都留下了日记，他们除了怀着不同的心情为这个王朝送葬，已无所作为。隆裕太后的眼泪挽回不了，升允的无限忠诚也挽回不了一个王朝的落幕，反对退位的恭亲王溥伟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到最后，“京朝达官纷纷奏请开缺，可耻哉！安乐则麇集，患难则兽散”。恽毓鼎在日记中不无悲愤。[1]

革命背后是不可阻挡的人心思变，这是天长日久积累起来的，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推背图》、《烧饼歌》这些神秘预言书的流行，星象预警，特别是一而再的水灾导致的粮荒，大米价格的失控，加剧了人心的变化。清朝势去矣，最终冲跨清朝的是时也势也，而不只是革命党人的谋划和武力，时势的后面是人心，正是人心恐慌，武昌起事引发了各地的挤兑潮、逃难潮，许多亲历者在日记中记下了大量细节，谣言的四处流传，城里人逃往乡下，乡下人逃进城，而最先提现金、逃跑的则是王公亲贵、官员们。天津、上海租界的人满为患，金融的恐慌、银行的倒闭……他们目睹了时代的激变，深味着乱世的恐惧。

许多在华的外交官、记者、传教士、海关人员、公司职员、情报人员见证了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他们在日记、书信和报告中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间谍宗方小太郎、公司职员内田顾一、传教士计约翰、记者莫理循的日记，大量外交官、海关人员之间的书信往来，让我们看到革命是怎样展开、一个王朝是怎样垮塌的，更让我们看到外国人在这场革命中选择的立场，他们大致上保持了中立，而不是支持满清朝廷。即使日本有意干预中国内政，试图影响这场革命，也因英国的反对而没有采取有力行动。革命最终以妥协告终，就与列强中立有关，正是列强拒绝给南北双方借款，南北财政几乎面临相同的困境，才走向对话，最终达成逼清帝退位、共建民国的共识。

如果说那时各国驻华使领馆的大量信、电掺杂了本国政治利益的成分，那么一个年轻的法国外交官儒勒·乐和甘的家书透露的完全是他内心的真实感受。1911 年 11 月 19 日，他在成都领事馆给母亲写信：

> 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无疑是历史上最重要和最不确定的。当然，不在场的人就没有兴趣。而对于我们这些一天天关注这场和平革命的人来说，简直太让人激动了。同时，也让人疲倦，因为看到他们是如何拖延而使人无法预料结局。[②]

在他们眼中，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崭新的共和制，却并没有在最广大的底层中国人中引起热烈的回响。这与鲁迅等人的观察是吻合的。辛亥革命带来的变化，表面上可以感知的就是剪辫、易帜、改历。五色旗在那场革命中的胜出具有标志性，过去的许多史书对此都没有说清，孙中山的表达也不对，1912 年 1 月 12 日，他在给临时参议会的信中说：“苏浙则用五色之徽志”，“苏浙之旗，以之克复南京”。[③]史家张玉法的《中华民国史稿》也说：“武昌革命爆发后，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黔等省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江、浙、皖及其他各省多用五色旗”。[④]其实，江浙一带独立都是采用白旗，十八星旗主要在湖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主要在广东，其他省很少采用。正是各省旗帜不一，南方临时政府出现前，各方经讨论通过以五色旗为国旗，此时南京已克复，五色旗从一开始即不是地域性的。就这面旗帜的象征意

义来说，更具包容性，与剪辫、改历一样，南北对五色旗也具有共识。这些最低限度的共识，降低了流血的代价，以较小的社会震荡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从这些具体而微却至关重要的变化中，历史推开了另一扇门。

在波涛起伏当中，被一个浪头卷入或被浪花溅湿过的普通青年、少年，不仅有毛泽东、李宗仁、张治中、白崇禧、黄绍竑、陈铭枢、蒋光鼐、顾维钧这些领袖、名将、外交家，更多在文艺、学术等领域各领风骚的人，如鲁迅、胡适、梁漱溟、茅盾、郁达夫、徐志摩、顾颉刚、叶圣陶、吴宓、左舜生、王云五、陈布雷、吴虞……他们都已从这里起步，这场革命给他们一生的影响有多大多深已无法测度，但他们曾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而且至今仍在影响着这个国度。叶圣陶、吴宓、胡适、徐志摩、吴虞以及陆澹如、朱峙三等人留下了或完整或零星的日记，更多的人留下了回忆或当时的文字，他们都是辛亥之子，虽然他们不是那幕历史的主角或配角，他们只是群角或观众，但是他们的私下记录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那是大时代中一双双怀着不同梦想的眼睛，以他们各自的见证丰富了历史。当我在百年前的辛亥大变局中，在密集的人流之中陆续看见他们的身影时，禁不住在想，历史原来就是这样悄然开始的，这一幕到下一幕。

本书分上、下册，共九篇，从“人心思变”到“创立民国”，通过大量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借助密密麻麻的真实细节，力图逼近历史的现场，复原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图景，回到当时的历史中。我的努力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唯有请读完此书的读者来作判断。

傅国涌

2011年6月2日杭州家中

【注释】

① 1912年1月17日，《恽毓鼎澄斋日记》（2），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71页。

② [法] 博里斯·马尔坦著，张宇凌译：《是在中国，给你写信儒勒·乐和甘——中华帝国混乱年代期间法国驻华领事》，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81页。

③《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页。

④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修订版]，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5页。

目　录

序　篇　人心思变

一、神秘预兆

1912年2月12日，一百多天来忙于替清廷起草文书的许宝蘅已经无事可做，下午三点他到承宣厅，知道辞位谕旨已下，他在当天日记中说：

> 二百六十八年之国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古语云："得之易者，失之亦不难。"岂不信哉？……古来鼎革之际，必纷扰若干年，而后国亡，今竟如此之易，岂天心已厌乱耶？吾恐乱犹未已也。

他想起1908年冬天慈禧太后死后，即有传说"本朝以摄政始，当以摄政终"。黄蘗禅师神秘的预言诗："继统偏安三十六"，"当时以为指年而言，不料仅三十六月。"[1]

此前1911年11月6日，同样效忠清朝的翰林恽毓鼎也在日记中提到黄蘗禅师的诗：

> 明臣熊开元国亡后为僧，能知未来事。国初有问以国祚修短者，

禅师作诗十首檃括其事，余幼时见传抄本，因其叙同治以前事历历如绘，颇疑为谶纬家事后附会。

10月27日，有门人朱楚白到他家，说起其乡先辈罗公（他记日记时忘了名字）生平精术数之学，曾说清朝入关第一个皇帝建号顺治，“顺字为三百一十八”，隐含清朝江山可以延绵三百十八年。如果这个算法靠得住，清朝还有五十年可以支撑，他内心盼望天佑大清，此说并非无稽之谈。

但种种迹象都令他不安，自武昌兵变那天起，他就不断地记下一些异象：

10月10日，“午前无云而雷，兵象也”。11日，武昌消息尚未传来，“在火车见月出时其色如血”。12日，他从儿子的快信中得知武昌已被革命党占领。

11月9日，他在日记中说，“世俗以牙牌占数，往往奇应”。当荫昌挂帅南征时，他以牙牌来占卜胜负之数，得到一首诗：“巍巍三晋大梁风，侈口称强气自雄。东败于齐南辱楚，始知余荫不为功。”下面还有注：“欲进反退，不如不动。”他觉得前两句是指袁世凯，看到“荫不为功”四字，他爽然自失，显然“荫”让他直接想到“荫昌”。再看到所注八字，“则告诫尤切矣”。这一天，他再次以牙牌占卜大局，得一诗：“手持利剑刬犀儿，迎刃而解差可喜。自郐以下无讥焉，其余不足观也已。”他解释：“上二句明指革命军，‘迎刃而解’四字尤切矣。玩‘差可喜’三字及下二句语气，则大河以北犹可保全，其余各省皆无救矣。”

到12月30日，清廷已摇摇欲坠，有人夜访时告诉他，京西潭柘寺有一樟树，每逢皇帝将嗣位，必先生出一枝，正枝才会枯干，历历不爽，相传呼为“帝王树”。同治末年，忽然旁出一枝，果然光绪以皇弟入承大统。光绪末年，其侧又长出一小枝，就是宣统帝。“今年老根旁突出一枝，与新枝不相附属，闻者骇异。”[②]这些异像对一个翰林的心理影响尚且如此之大，民间百姓更不用说了。

苏州少年顾颉刚清楚记得，当光绪帝、慈禧太后死后，溥仪即位、改元“宣统”时：

就有一位惯作预言的老人说："什么'宣统'，这不是'完结'了吗?"这两个词的字形果然相似，但如果人们对于清政府还存有一线希望的话，他也不会说出这般的预言，这就表现了人民对于清政府已经绝望了的咒诅。③

1912年2月14日，清廷退位第三天，恽毓鼎回忆起当时亲眼目睹的情景：

皇上即位，升太和殿受贺，大声痛哭，不肯升座，频言我不愿居此，我欲回家。监国强抑之，竟未安坐。毓鼎时侍班于御座前，见上号哭过甚，恐损圣体，急谋于御前大臣肃亲王，传谕殿前，草草成礼。拜跪未毕，侍阉即负之而去，且云："完了，回去罢。"毓鼎即觉其不详。今日果应"完了"、"回家"之语。④

福州少年萨孟武也回忆：

有人告我，宣统登极之时，因为鸣炮，受惊而哭。这是预兆，清祚大约将亡。此时革命风气渐次普遍，所以人们敢说此话。若在过去，说此话的将有灭族危险。

过了一年社会上又谣传宣统之母跟一位武生走了。这种谣言深足以破坏皇室神圣。……皇室的尊严失掉了，人民敬畏皇室的观念减少了，帝位的基础动摇了。满清帝祚已摇摇欲坠了。

深得慈禧太后宠爱的德龄公主，她父亲裕庚曾出使日本、法国，对时势有较清楚的认识。至少中日战争以后，他就已意识到王朝终结的命运，对女儿说："不超过十到十五年，中国就会爆发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将结束清王朝的统治，要是清政府能立即进行改革的话，结局也许还行。否则，到那时，他们只好结束自己的统治。"⑤

1910年，法国大将 de Negrier 访问中国后，预言满清危在旦夕，认为美

英德法四国财团和满清政府订立之1000万英镑币制改革及东三省实业振兴借款，不过是满清的埋葬费而已。[6]

连浙江富阳县城的少年郁达夫在学堂里都呼吸到了“人心跃跃山雨欲来的空气”，“学校以外的各层社会，也像是大浪里的楼船，从脚到顶，都在颠摇波动着的样子”。到了1910年秋冬，“四海汹汹，革命的气运，早就成了矢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局面了”。[7]

那时，少女苏雪林已稍能读报纸，也稍知时事，她觉得革命党是压制不住的，愈压制，反弹力量愈强，四川又闹保路风潮，各地也不平靖，便对叔父诸兄说：“我看大清朝的气运快完了，不久要逃回关外老巢去了！”祖母把这两句话说给祖父听，祖父大怒，把她唤去痛骂一顿，并赏了她两个“大爆栗”。她说：“祖父从未打过我，若非气极是不会如此的。”[8]

在河南柘城，秀才王居信看到当地在修筑寨墙时笑着说：“这有什么用呢！”还说：“大清是到尽头了，江山坐不长了……”[9]

此时，比黄蘖禅师的神秘预言、“完了”、“回去”之类更流行的是《推背图》、《烧饼歌》，在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王朝轮回中，国人只能依靠这类神秘谶书来占卜未来的大变动，幻想新一轮的变动会给自己带来好运。南通光复之前，“工商业受苛捐杂税的压榨，……极不公平，工商业者怨恨极了，大骂亡国政府，且有附会《推背图》、《黄蘖诗》各种谶言，以决定清朝必然覆灭。”[10]

> 烧饼歌同推背图，一朝弛禁听人沽。咸将清事从头按，总说般般尽合符。[11]

出自伍廷芳秘书朱文炳的《海上光复竹枝词》。据传《推背图》是唐代李淳风、袁天罡所著，其中第三十七象被看作清朝灭亡、民国诞生的预言：

> 谶曰：
> 汉水茫茫。不统继统。
> 南北不分。和衷与共。

颂曰：

水清终有竭。倒戈逢八月。

海内竟无王。半凶还半吉。[12]

以后成了政治学家的萨孟武对《烧饼歌》记忆尤深：

在前清末季，大约宣统元年之时，刘基的《烧饼歌》与什么和尚的《推背图》，在市上都可以秘密买到。社会太平之时，一切安定。将乱之际必有许多预言。这种预言比之文字上的宣传，效力大过万倍。……

革命风暴不是因预言而发生，预言乃是因革命风暴之将来临而出现。当时同学——小学同学，几乎无人不能背诵《烧饼歌》，“胡人亡已久矣”，这是《烧饼歌》中所说的。“手执铜［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辛亥革命之时，革命党皆臂缠白布为号，九十九是“百”字去一，“百”去“一”，不是白字么。革命成功之后，男人皆剪去头发，路上男女各半，不是“一路行人半是僧”么。其中还有“黄牛山下有一洞，可容一万八千众，先到之人得安稳，后到之人半路凶”数句，前两句我们都猜为黄兴。复有“火德星君来下界，金殿玉楼尽丙丁”，似须经过大破坏，而后才能达到太平之境。

《推背图》不似《烧饼歌》那样流行，……然其影响甚大，时人均深信清室必亡。[13]

杭州少年夏衍也有相似回忆，只是他把《烧饼歌》与《推背图》记混了：

［武昌新军起义］因为这正在中秋节之后，所以很快就传出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反满口号。我记得那时流传最广的一本书是《推背图》，老百姓说，那是“明朝的诸葛亮”刘伯温写的。我没有看到过这本书，但是我每次走过邬家店门前，都有许多人聚集在那

里议论《推背图》上说的“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这两句话。他们说九十九就是一百缺一，百字缺了一，就是白，因此革命军挂的是白旗。⑭

《阿Q正传》不只是基于小说家的想象，而是鲁迅亲历的历史：“至于革命党，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祯皇帝的素。”⑮

白盔白甲，一身缟素，正是民间从《烧饼歌》神秘预言中得到的启示。刘伯温《烧饼歌》中的这一段原文为：

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炮响火烟迷去路，迁南迁北六三秋。可怜难度雁门关，摘尽李花灭尽胡，黄牛山下有一洞，可藏一万八千众，先到之人得安稳，后到之人半路送。……火德星君来下界，金殿玉楼尽丙丁。……⑯

10月24日，搜集情报的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到武昌黄鹤楼下造访黎元洪，不得见。他在军政府的门柱上看到对联：“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斯其时矣。”⑰

我在当时的一张照片上看到，其实不是对联，而是标语，贴在大门口右侧，露出“手执钢刀……罢手斯其……”几个字，应该是“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斯其时矣。”

10月27日，同盟会元老谭人凤为首批援鄂湘军而写的《军歌》中也有这两句：

湖南子弟善攻取，手执钢刀九十九。
电扫中原定北京，杀尽胡人方罢手。

他对“手执钢刀九十九”作了不同解释：“革字九笔、党字十九笔，这句话本来是谶纬家的预言，却应在我们革命党身上。”⑱

就是“黎元洪”这个名字，不久也有人在《烧饼歌》中找到了对应的诗



黎元洪



《民立报》1911 年 10 月 14 日刊登的黎元洪画像

句。11月28日，湖南平江人、同盟会员凌盛仪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并记在日记里：

> 阅报中引《烧饼歌》："六一人不见，山水倒相逢"，谓象黎元洪之黎字，亦颇肖形。[19]

《烧饼歌》中确有这样一段：

> 东拜斗，西拜旗，南逐鹿，北逐狮。分南分北分东西。偶遇异人在楚归。马行万里寻安歇。残害中女四木鸡。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黑鬼早丧赤城中，猪羊鸡犬九家空。饥荒灾害并皆至……篷头有女篷头嫁，揖让新君让旧君。[20]

10月22日，叶景葵写给金仍珠的信里说："黎元洪有人谓确系革党。"10月31日，《申报》"自由谈"的"见见闻闻"说：有客自汉阳来，说起黎元洪轶事，称他素怀大志，富有革命思想，其所取"元洪"两字，实隐含元末朱洪武的意思，有人从他私宅过，曾见门外贴有对联："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又有人对他说，这副对联太露头角，才换下来。[21]

预卜朝代更迭的《推背图》、《烧饼歌》作为民间想象的重要根据，在民间大有市场。《民立报》后来发表一篇文章说，两个商人议论革命，甲说《推背图》中未见黎元洪，恐不能成大事。乙反驳说，黎元洪就是大明朱洪武的后人，不会不成功。[22]

人们在《推背图》中没有找到黎元洪的名字，却在《烧饼歌》中找到了，这完全符合民间的心理期待，强化了人们对这场革命的内心认同，有关黎元洪的小说也很快就出现了在上海街头。11月3日，杭州光复前夕，《申报》要闻版《杭州危急现状》报道，"杭州保佑坊文锦堂书坊闭市后，学徒某甲穷无所归，前日偶在上海购得民国军都督黎元洪小说若干部，及小影战胜图，沿途售卖"，被巡警抓去，指控他"传布逆说，意在煽乱"，有革命党嫌疑。[23]



黎元洪等人在鄂军都督府前合影，后面墙上有《烧饼歌》上的句子

11月4日，有人在《申报》发表《时事五更》，推崇黎元洪“军务精通赏罚公，真英雄，逢开战呀，十回九成功……”12月16日，又有人在《申报》“自由谈”仿板桥道情调咏叹：“黎元洪复武昌，义旗到，望风降，将成锦绣文明象，杀尽胡奴威日盛，独掌雄师实在强，恢复汉室耀祖光，这才算男儿志遂，华盛顿万古流芳。”㉔

长期被朝廷视为洪水猛兽、在通缉文告与内部文书中被写作“孙汶”［或“孙逆”］的孙文，在民间想象中也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在广东乡下长大的黄药眠口述：

> 我1903年生，1911年辛亥革命就成功了。但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前，当我只有七八岁的时候，耳朵里就储满了关于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传说。
>
> 也有人说孙中山有法术。有一次，他的住处明明被清兵包围起来了，但当清兵正要破门而入、着手擒拿他的时候，谁知他却脚踏祥云腾空飞走了。
>
> 也有人说孙文真有本事，连外国人都保护他，设法让他逃走。南洋华侨相信他，有钱人宁愿拿出几千、几万两银元来帮助他闹革命。㉕

难怪武昌起事不久，民间就传闻民军重要领袖孙武是孙文的弟弟，连日本间谍一时都弄不清楚，宗方小太郎10月29日的日记说：“孙逸仙之弟在武昌。”㉖

孙天生冒充孙文的侄儿，做了扬州都督，彭程万因伪造的“孙汶”委任状，当上江西都督。亲历江西光复的周雍能回忆：“而最好笑的是留日学生也借口‘我是孙文派来的’、‘我是同盟会’，向都督要差事。”有人甚至伪造了一个“孙汶章”，写了一张派令：“派彭程万为江西大都督”，图章的“汶”与清廷通缉文书故意在“文”字旁加三点水一样，正为难以应付局面而犯难的吴介璋，一看这一纸派令就让出了都督。㉗

追随孙中山的马君武对此气愤而无奈，11月24日，他在《民立报》发表

《言论自由》一文，感慨孙文在今日中国之地位，不过一国民：

前有扬州人冒称孙文之侄，以劫掠财物；后有江西人，冒称孙文所推，以夺取都督。

呜呼！孙文，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28]

此时，孙文还远在大洋彼岸。自天津南下革命的万耀煌口述：

……船过烟台时，船长宣布："上海独立了。"船工乘客大多表露出喜悦的神情，我们坐的统舱里，有专门跑天津接客的，高谈孙文、黄兴、黎元洪，把他们说成天神一般，把革命党人都说成三头六臂的英雄，尽管这些话可能为有识者所笑，可是这足可证明人心所向。

民间对孙文等革命党人满脑子都是这样荒诞的想象，扬州江都县丁沟镇的居民多不知道什么是革命党，"以为革命党就是大家合（扬州方言读合如革）一条命的党"。人们在进城的船上谈论革命党，有人说，"革命党人真厉害，能把炸弹吞入腹中，遇到敌人时，将身一跃，人弹齐炸。"[29]

四川大足的老百姓甚至传言，革命党人拿的枪就是"常用的无烟炮"，"只要二指头挨到机器一搬，对面的人立刻一排一排地倒地而死"。[30]

因为革命党人中留学生很多，所以外国军队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民间就纷纷传说他们是来帮革命党的。1912 年 1 月 7 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日军一部队日前到汉，当地愚民即有种种谣言传播。有谓日兵将自后方陆续调汉，目的在与革命军合力推翻清朝。革命军中一向有大量日本人，从事军事援助。现下革命军其所以励行剪发者，更证明革命军已服从日本云云。此种谣传闻曾发生于四川革命军励行剪发时，不料今日又于此地闻之，不可不谓为无稽之谈。"[31]

二、民谣与彗星

“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

这是流传在西安的一则民谣。王朝解体之前往往会出现一些民谣、顺口溜，辛亥之际也不例外。革命党人长于此道，受章太炎赏识的杜仲虑曾半醉不醒，狂歌过市，被看作疯子。他从太原赶到长安与景梅九等策划革命，一天他们在南城门边遇到卖豆浆的，喝了两碗，忽然他仰望天上彗星，东西辉耀，随即编了两句谣言：“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景梅九马上附和说：“这个童谣相传好久，不知道什么意思？”妙的是那买豆浆的接着他的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大清家快亡了！明朝不过二百几十年、清朝也差不多二百多年了，还不亡么？”他回应：“原来如此！”更妙的是警察就站在旁边，也说了两句赞叹的话。这个谣言就这样传开了，过了两天，就有多位革命党人来说：“外边流传一种谣言，很利害！甚么‘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人心大摇动起！”他俩装做不知，故意说“没听人说呀！”传着传着，后面又有人加上了两句：“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明年猪吃羊，后年种地不纳粮。”再往后变成：“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传得更远了。（也有说：“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32]

景梅九曾写过一诗记此事：

> 举首望长天，光芒射半边；彗星十万丈，宣统两三年。百姓方呼痛，官家正敛钱；也知胡运毕，何处不骚然？[33]

> 头戴小谟盘，身穿一裹圆，宣统作了帝，不过二三年。

五眼钢，六轮子，问你个舅子要银子。

这些在河南柘城传唱的歌谣是青帮首领、秀才出身的王居信他们编的，然后教儿童去歌唱。“小谟盘”、“一裹圆”是清军制服的样式，五眼钢，六轮子，是当时使用的武器。[34]

爷爷落，鬼出窝，赶上小儿跑不脱。

这是河北成安县流传的民谣，“小儿”就是指宣统，比较隐晦一点。民国《成安县志》收入这一歌谣时特意加了个注解：“见朝廷微弱，列强肆横，清代不久将丧失主权、清祀一二传亦将斩也。”[35]

辽阳今何在，二四旗不古，天下谁是谁，一省各有主。[36]

四川流传的这首民谣，“二四旗不古”就是指八旗的衰落，“一省各有主”则预言各省纷纷独立。

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

这是武汉“儿童争唱”的民谣。[37]

黄花黄，黄花黄，黄花时节万花藏。万花藏，黄花黄。
黄花黄，黄花黄，黄花黄时清朝亡。清朝亡，黄花黄。
黄花黄，黄花黄，黄花黄时民为王。民为王，黄花黄。
黄花黄，黄花黄，黄花黄时种麦忙。种麦忙，黄花黄。[38]

这首后来被赵元任谱了曲传唱的《黄花歌》，称清朝在菊花开时灭亡，又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联系在一起，很是打动人心，不知何时开始传唱。吴稚晖编剧的《黄花岗》也有类似的歌词，1912年5月在上海新新舞台举行黄花

闭流血纪念大会时，吴亲自上台演唱，催人泪下：

……黄花落黄花开，花开花落年年在，人去不复回；呜呼！大名争自误，热血代购来。黄花落黄花开，花开花落年年在，人去不复回……黄花落黄花开，花开花落年年在，人去不复回！[39]

与四处流行的民谣相随，武昌起事之前谣言就已四处流窜，真假莫辨。在那种时势和心理之下，任何一点异常的天象都会引起人心的波动，何况彗星、日食的出现。

生在湖南常德的女作家丁玲当时只有9岁，母亲常和她说起当时的氛围。她的小说《母亲》更多的是纪实：

可是还只到七月里，街上便不时有谣言。带回这些谣言的，总是看门的老于。……说是哪里有神兵要打来了，又说是哪里造反。……

“是讲得满厉害呢，衙门里都到省城请兵去了。到底是什么事我也弄不清，说是城里有歹人，又说省城更不稳，卖卜的都说看星相今年要动刀兵。……”

“我想不至于打到武陵来，纵是真有什么事，这么个小城，有什么必争之处！满城风雨，不过庸人自扰。”这是曼贞的意见。这个意见稳定了于三太太的心，于是她说：

“刀兵也许有的。五姑妈，说不定那些话应验了，不是说要赶走满清么，要打也总往京里去，隔我们这里还远得很，真不必怕，你说是不是?”

经她们这么一说，家里就平平安安过了好几天。可是有一天黄昏时候，老于又指手划脚在后院里说了起来：

“看呀！看见没有，远得很，那边，光拖得有两尺长……”

“噎，看见了，真的。”

天的西方，正挂着一个异样的星群，紧紧的挤着一团；成一个尖锐的三角形，这个星的出现，又动摇了全城的人心。已经发现了

三天了，一天比一天近了，而且大了。

“告诉太太去。明天一定还有，一定还要近些。去，告诉太太去！”

小孩们也跟着看见了，是那末拖着尾巴的一颗奇异的星，一定是怕人的星。大人们口里不说，心里也惊奇着。

每天一到黄昏，一天比一天出现得迟，家里的人便都站在院子里的东方角上，恐慌的望着那颗近拢来了的星。现在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一个大星在前面，密密的团在它后边的是无数千万的小星，看不清，只透露着一条河似的白光，成一个大扫帚形横挂在天上，已经有二尺多长了。每天这么出现一会儿，就又不见了。这颗星带来了无限的神奇在每一个人的脑中，又正当这谣言四布的当儿，于是谣言就更多了。

……这颗巨大的怪异的星，一直在天上出现了八天，忽然便不见了。孩子们在院子里等了好久，有点失望起来……

……可是谣言还是天天传来，夜夜都不敢睡。……

“怕革命党要起事了，有的说在南京，有的说在广东，有的说在汉口，不过我们这里也许不怕吧。假如有什么事，总也不要紧，城里总共不到两百个兵，洋枪还不知有没有。你们住的地方不当冲，是后街，我想不要紧。谣言讨厌。”[40]

富春江畔的富阳县城是郁达夫的故乡。他回忆，这一年（辛亥）夏天以后，“不知从哪一处地方传来的消息，说是每夜四更左右，江上东南面的天空，还出现了一颗光芒拖得很长的扫帚星。我和祖母、母亲，发着抖，赶着四更起来，披衣上江边去看了好几夜，可是扫帚星却终于没有看见”。[41]

福州少年萨孟武看见了，他回忆说：

大约是（宣统）二年吧，也许是三年，天上现了彗星，每晚由七时出现，至十时才不看见。该彗星极长，又极光亮，令人望之发生畏惧感情。彗星消失之后，一夜天上又现出五色，有似民国初年之国旗一样。俄而四川铁路问题发生了，俄而武汉革命军又起义了。

河南舞阳的少年郭廷以也看见了：

那年秋天，晚间乡下人在打麦场闲谈，忽然天上出现彗星，有人大叫说："天下要乱了！"所以我至今印象犹深。[42]

在江苏兴化县，当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时天空出现彗星，识者认为刀兵将起。富有之家，以井为库，大凡金银饰物，铜银钱币，密封完固，投入井中，撤去井栏，设置山石或粪便缸，掩藏了井的原状。年轻妇女，下乡逃难，乡间富有者，来城避难……"[43]

到武昌变起，两湖师范总学堂停课，学生朱峙三回到故乡黄州乡下，他日记中说：

10月13日

予不食夜饭，十一时乃睡熟，一夜尚安。彗星见，予未起视，闻人所说如此，实未见也。

10月22日

今日日食，天忽暗。乡间乃知以盆贮水观之；甚清晰。食既天黑，见日旁一星甚明，奇观也。此与庚子年八月朔日食相似，政治大变乱乃有此象，满洲皇帝或者命运已终欤？此则吾辈之愿也。[44]

同一天，资政院在北京开院，议员汪荣宝日记说："本院开院礼原定午前行之，因是时正逢日食，故改于午后行礼。"[45]

当时在北京办《国风日报》的景梅九记得：

[湖北消息传来] 无何而太白昼见，（一日到大栅栏，忽有数人仰首望空，众人受了一种暗示，一齐仰首，我也随着看起来，果见一个星，警察也不禁止，但说怪事，怪事！我想起彗星谣言，说了一声，这叫'太白昼见，天下大乱！'其实不定是太白星。）日有食之，在此科学彰著之时代，亦寻常事耳。乃皆因之为妖异……于是

谣诼四起，人心动摇，尤为可虞也！[46]

10月25日，恽毓鼎日记写道：

彗星见于东方，尾扫西南，长二丈余，星芒如月。

11月4日，缪荃孙日记说：

三鼓起，检行李，彗星起于檠下，其芒数尺，谁谓天人不相应耶？

12月12日，局势越来越变幻莫测，恽毓鼎又在日记中记下占星家的说法：

占星家言，自月之初一日，帝星不见，凡四十余日始复见，而摇动无光。孰谓天文荒远哉！[47]

连法国人也注意到了中国人对星象的敏感。10月17日，英文《汉口日报》报道：

昨天早晨大群华人观察天空，据说可以看到十分奇怪的事物，其实无非是一颗预示新朝代出现的星，尽管阳光明亮仍然清晰可见。

10月24日，法国驻北京公使代办斐格给外长写信说：

……革命党初战告捷的消息已在全国传开，这一力量的表现使他们得到许多人的好感。即使在北京，都有许多人已经不再掩饰他们的希望和对叛党胜利的祝愿。只是由于害怕混乱、危险和抢劫，才使他们害怕战争，现在大家知道革命党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合法政府，这个政府将标志满族统治的终止，那就已经不再需要什么就足以为新的民主共和国赢得一大批的拥护者了。

另外，同以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时一样，天上的某些征象标志着皇朝的末日，例如，大白天可以看到某颗星球和星星的汇合说明清朝大限已到。至此，准备欢迎新制度的人数与日俱增又有什么可令人惊讶的？实际上，他们在这里大有人在，并且越来越公开他们的爱憎，只是他们还缺少领袖人物。[48]

早在几年前，徐锡麟、秋瑾事件发生时，上海《时报》就发表过有关彗星的短评：

彗星现一　冷

据中国历史观之，彗星之现也，必有乱事，必有兵革之祸。今中国方有革命之恐慌，而又有彗星之出现，不知兵革之祸之兆彗星来欤？彗星之兆兵革之祸欤？

彗星现二　冷

彗星除旧布新之象也，今政府将有改革之风传，彗星之现或即主。然政府之所谓改革者，其果能除旧布新欤？抑或除新布旧欤？是又未可知也。[49]

"彗星的尾巴，在回归的前后，总是不停地左摆右摇、伸长缩短，显得那样焦躁和不安。然而，不管彗尾如何，彗核或彗头却总是一丝不苟地沿着开普勒轨道运行。"一位不相信占星术的天文学家也承认，哈雷彗星的回归常与中国社会转折的年代十分相近，天文学无法解释这一神秘的现象。1835年的回归，大体属于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的年代。而这一次的回归恰在辛亥革命前夜。[50]

三、天灾与粮食

辛亥前夕，长江流域水患严重，加剧了民众心理上的恐慌。一场暴风雨都可能引起人心的猜测和不安。1900年出生，不满周岁就来到中国的欧文·拉铁摩尔记得：

> 辛亥革命之前的那个夏天，我们一群孩子正在北戴河的游廊上玩，小孩子们的中国保姆坐在那里照看他们。突然间猛烈的暴风雨袭来，我们躲进屋子里，看着外面的倾盆大雨和闪电，中国保姆们吓坏了，低声交谈说，这场剧烈的自然突变肯定预示着要发生一场大灾难。她们谈到信使来到各个村庄，警告人们动乱正在降临。[51]

1910年到1911年，长江、淮河流域大雨成灾，成千上万的良田尽没水底，引起米价飙涨，哀鸿遍野，流离失所的难民纷纷涌入大城市寻求赈济。[52] 1910年，湖北连续第七年遭洪水侵袭，灾区遍及28个州县；湖南水灾也已持续七年，入夏后连日狂风暴雨，加以“朔风冻雪”，造成较罕见的“奇灾”，米珠薪桂，到处都是饥民。浙江、江苏尤其苏北、皖北暴雨成灾，东北三省、山东、河南、云南、江西、直隶、新疆、山西、陕西、广西、甘肃等省都有灾情。[53]

当年3月21日，湖北暂护湖广总督杨文鼎致军机处请代奏电：

> 湖北省产米本少，向恃川、湘、赣、皖等省米谷源源接济，连年叠受巨灾，虽经拨款赈抚，小民幸获安全，惟大灾之后，蓄藏久空，现值青黄不接之时，需粮尤急。近查武昌汉口等处米价日昂，民情甚形惶窘，文鼎详加考查，实以川湘等省近年亦复歉收，商贩成本较巨，不免裹足，遂致转输机滞……

当天，他又致电外务部，说明需米较多的理由："汉口为通商要埠，华洋杂处，工厂林立，需米甚多，万一民食不敷，难免变乱，有妨治安大局。"

军机处电令邻近的湖南、四川、江西各省督抚，不要阻止粮食出境，以救邻省湖北之灾。

湖南此时正自顾不暇，巡抚岑春蓂当月给军机处的代奏电，同样为粮食困扰：

> 惟湘省上年被灾较重之澧州、南洲、安乡及武陵、龙阳、沅江、华容等属，均系产米之区，未经冲溃坨堤不过十之二三，余皆颗粒无收，长衡等属亦因受旱歉收，又以澧洲等处遭灾，米价日见翔贵，目下每米一石需钱七千左右，灾区价值更昂，转瞬青黄不接，更不知如何？……

4月13日，长沙就发生了惊动全国的抢米风潮，饥民纵火焚烧巡抚衙门、税局、官钱局、大清银行、教堂、学堂、洋行等，军警开枪，死伤数十人。岑春蓂以"办事失当"被革职查办，其他文武官吏也受到惩办。产米区湖南从前米价最贵也不过每石四千余文，因为银贵钱贱，百物昂贵，米价先是涨到七千多文，4月12日当地有人在日记中说："先是米价腾贵，每石涨至八千四五百文。"南城外有一个老妇去买一升米，需钱76文，米店剔去二小钱，老妇哀求无效，等她换了两个小钱回来，米店又涨了二文，老妇斥其无理，众人也都愤怒，风潮随即爆发。4月19日，17岁的长沙少年瞿兑之日记略有出入："先是长沙米奇贵，石至八千五百文，而奸商他运者犹不绝"，南门外一贫妇拿钱买米，"米坊中少其钱而不顾"，妇女愤而抱幼子自沉而死，丈夫悲痛自尽，由此成为抢米风潮的导火线。岑春蓂下令控制米价，每升先减到54文，再减到43文，告示无人理会，贴出就被撕了。[58]

5月31日，受命署理湖南巡抚的杨文鼎给军机处的代奏电，分析长沙米荒原因：

> 湘省西路辰沅永靖，南路衡永郴桂，中路宝庆各属，所产米粮



饥荒中之难民

仅供本境之食，接济邻省者向恃长、岳、常、澧四府州所属各州县，而以滨湖之澧州、安乡、南洲、武陵、沅江、龙阳、华容各州县产谷为最多。近年澧州等七州县被灾失收之谷约四五千万石，于是本省邻省需米均受给于长属，小民喜得善价，商贾争相牟利，纷纷贩运出境，长属盖藏遂空。今春米缺价昂，每石涨至八千余，湘民惯食贱米，骇为前所未有，加以痞匪煽惑，致有三月初四日之变。

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再爆发，杨文鼎电奏：

近因阴雨过久，豆麦无收，又饬加赈。是灾区赈粜之谷尚须续拨。余如湘潭、常德均为繁盛商埠，五方杂处，安化茶市骤增佣工六七万人，又岳州所属之巴陵、临湘，宝庆所属之新化与长沙、善化两县之西乡、北乡，均苦乏食或请留谷或请拨米，告急文电，日凡数至。

“湘省民情强悍，遍地伏莽，一旦民食不继，势必铤而走险，扰害闾阎”，令他惶惶不可终日。

江苏、浙江等地情况也不乐观。3 月 27 日，浙江巡抚增韫给军机处代奏电：

浙省上年雨旸愆期，灾歉并成，米乏来源，民尤艰食，已奏奉恩准将补运米三万余石，递缓一年。乃入春以后米粮益形缺乏，价值尤昂，贫苦小民，粒食维艰，转瞬青黄不接，更虞不济，惟有吁恳天恩俯准，将本届新漕缓运四万石，留办平粜，藉资接济，而惠民食。

相距一个月，4 月 26 日江苏督抚给军机处发出代奏电：

宁与苏两属，上年秋收本歉，加以宜荆坛溧等县暨江北之淮扬海等属，被水成灾，……先后奏准拨帑赈恤并缓运新漕二十万石，藉顾民食，及由官商分次采购粮米，免纳厘税。……不料入春后积雨

伤麦，始仅米价飞涨，近则邻省同一缺米，去路日多，来源日绌，不特价昂，且无购处，人心惶迫。

两江总督张人骏担忧“东南人心浮动”，重演长沙抢米事件，建议朝廷将上年应运的新漕再予缓运十万石，专济苏属，并另购米三十万石，“以舒眉急。如此市面人心，庶可大定。”[55]

日本东亚同文会191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称：

湖北省出现数万饥民，官府穷于应付；而江苏北部、安徽、湖南、山西、陕西诸省，亦复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到处流浪。……这些饥民因得不到应有的救济与安排，终至酿成民变，惹起长沙的大暴动。

《宣统二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记载：“本年上半年，米粮歉乏，价格昂贵，全国皆然。”各处都出现闹米者。

进入1911年，水患没有过去，粮食危机也没有过去。6、7月间湖北连遭大雨，武汉三镇“水势浩大，茫茫无际，登高一望，四围皆成泽国”。湖南长沙、常德、岳州等地都成了灾区，“为从来所未有”，江西、安徽、江苏各地洪水泛滥，南京城内“高处水深没胫，洼处过腹及胸”。缪荃孙在这年终了还想起这次大水，“金陵城内可行船入市”。

辛亥春，张廷骧《不远斋见闻杂志》记载：“江皖二十余州县灾民三百万人，已饿死者约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约四五十万人。……饥民至饥不能忍之际，酿成吃人肉之惨剧，……”浙江的杭、嘉、湖、绍四府被淹成灾，不仅南方的福建、广东也有水灾，北方的山东、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都有水灾，东北三省还发生了鼠疫，约五六万人死亡。[56]

5月6日夜，在杭州府中读书的徐志摩到大英医院看影戏，刚到门口，“而喧哗之声大起，警局门前人聚若蚁，询之人云，米价太贵［至百文一升］，小民遂施其野蛮手段，杭城米店尽为所捣。因数人被警局拘去，故群聚局外，意欲索拘去之人。警局不释放，巡警持枪排列于内，以故未得逞志，时久人

愈多，看影戏遂作罢论”。[57]

6月13日，摄政王载沣召见张謇，征询他对时局的意见，他将“外省灾患迭见，民生困苦”列为内政第一要务。

《海关十年报告 1902—1911》记录，辛亥前十年间，宜昌、烟台等地的人工工资确乎增加了50%左右，但远远跟不上物价的涨幅，同时期的米价涨了81%，小麦涨了80%，大麦65%，豆类80%，柴草200%，食盐100%以上，肉涨了70%，在1902年前后，每天有八十文就可以维持一个重体力劳动者的生活，此时要维持同等生活非二百文不可。其他如福州、汉口、重庆、镇江、厦门、广州等地，柴薪、蔬菜、食盐、鱼类、肉类、蛋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涨了100%甚至更多，棉花、棉布、家禽、麻等价格也都大涨，不仅米价腾贵，而是物价普遍上涨。

百物昂贵、米价大涨的原因不仅是水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铜元贬值，这是滥发铜元、纸币造成的恶果。当时梁启超在《国风报》（第一年第10期）评论说“非物价之腾，乃货币价值之落耳”。[58]

9月9日，距离武昌起事还有一个月，还在日本的留学生黄尊三在日记中说：“本日看报，载中国南京一带，因闹饥荒，石米十二元，人心非常混乱。天灾如是，人事可知，一叹。”[59]

当时，御史陈善同上奏：“现在湘粤争路余波尚未大熄，而雨水为灾几近十省，盗匪成群，流亡遍野，若川省小有风鹤之警，恐由滇藏以至沿江沿海，必有起而应之者”。[60]不久，御史麦秩严也上折：“方今时事日棘，灾祲迭臻，岁饥民流，盗贼四起，中原大势岌岌可虞。”[61]

9月12日，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给伦敦的布拉姆写信：“中国长江流域各省的前景非常黯淡。……人民将会成千上万地死去，难民营里出现霍乱和斑疹伤寒。一位知名的中国人昨天对我说，前景从来没有这样糟糕，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水灾和饥馑的威胁。”[62]

9月16日，法国驻华武官高拉尔德给陆军部长写信汇报说：

> 人们指出，在四川铁路骚乱的背后隐藏着革命，这场革命即将蔓延到湖北、湖南，还有它经常爆发的策源地广东；还指出甘肃回

教徒的骚乱、饥饿威胁下的遭受水灾之害的省份。[63]

"全国饥民，数逾千万，迫饥寒而死者，道路相望……乃反观满政府，从未闻有一粟一粒之施。"10月11日，武昌革命军以黎元洪名义布告全国的檄文，将此列为"不可不急起革命"的理由之一。

10月12日，两江总督张人骏致电内阁称饥民载道，当天内阁转发湖广总督瑞澂来电也说："又值连年荐饥，灾民遍野，殊属可虑。"次日，江苏巡抚程德全致电张人骏说："目前各属灾荒告警"，同日致电内阁："现因各属水灾告警"、"连年荐饥，灾民遍野"。[64]

武汉粮食匮乏，10月18日，宗方小太郎日记说："官军缺乏粮食，勉强由九江购来米三万石。"

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的报告也说：

> 粮食问题已很严重，即使外国人也是如此。面粉已限量，4磅面粉要大洋1元，大米对中国人来说是极端缺乏的。黎元洪都督救了大家，送来了二千担大米。这些大米由水手们和义勇军卸下，并运到仓库，因为当时只有极少数征来的苦力。[65]

10月16日，朱尔典在北京给格雷写信时特别提及：

> 谷物歉收威胁到大半个帝国，扬子江流域到处充满了无家可归和嗷嗷待哺的人群。

辜鸿铭给《字林西报》的信里两次提到长江下游的几百万饥民，将不可收拾。

11月7日，严复写信给莫理循，分析起义的远因和近因，将"近几年来长江流域饥荒频仍"列为其中之一。

不仅长江流域，到处都受到粮食匮乏的威胁，10月25日，山东巡抚孙宝琦给内阁电说："本年各省到处水灾，饥民遍野，财用匮乏，市面紧急，危

亡呼吸。"[66]武昌消息震动京城，北京的官员家庭都在为买米而发愁。10月10日，日本驻北京公使伊集院致电外务大臣林董：

……一向准许向民间发卖之官仓米，自今日起已决定暂停发卖。此种措施，固属政府当局在当前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应急之策，但若长此断然实行，将不免加剧人心动摇。[67]

10月14日恽毓鼎日记：

……米价飞涨至每石银十二两，若非巡警得力，则剽劫横行，辇下不乱而自乱矣。[68]

10月15日，郑孝胥日记：

昨日，……米价每石二十元。[69]

10月17日，御史史履晋的奏折附片说：

自湖北告警，京师震动，人心惶惶，米价飞涨。

10月18日，清华学堂的陕西籍学生吴宓日记：

京师所需粮米咸仰给于东南，使通断绝则京师之民米食不足，加以经济界之恐慌，势至百物昂贵。人民无业而乏食者多，则必流寇纷起；土匪之祸扰，实在吾人意计之中。[70]

10月20日、22日，上海《民立报》连续报道乱事过程，米粮最为珍贵。上海为维持民食，曾想向邻省安徽平粜采购，但遭对方拒绝，因为安徽也无法自给。粮食供应来源既有困难，上海同样也限制米粮出口。德商美最时洋

行驻汉口分行致电上海总行，拟在上海购米五百石、面粉一百包运汉。该洋行禀经总领事，照会上海道请致海关税司验放，但上海道以米贵来源缺乏，加上人口日增，本埠尤恐不敷食用为由，未予照准。因为各地粮食紧张而采取的控制措施，所以有私运现象发生，上海有不法商人与铁路公司一起，偷运了七千多石米到浙江。[71]

10月20日，湖北襄阳张玉衡的日记说："粘米前日价八百零，今骤涨至一串一百文。"10月22日，"米行绝客货，凡米贩均寄米于关外"。

同一天，成都将军玉昆在家书中说："而今沿江沿海半多革命，一旦蜂起，漕运京饷纷纷奏停，而北京一地无处来源，数十万生灵难免冻馁之虞，尤为可怕万分。"[72]

恽毓鼎在北京深为粮食而忧虑：

> 观于京师偶有警耗，外米不至，奸商居奇（前十日米价涨至每石银十二两，而犹不得米），倘使仓庾空虚，都下十万户皆将饿死。始知书生之见，徒有理想而不合事实，断不可行也。余以为不唯海运不可停，并河运亦不可废。[73]

这一天，翰林徐兆玮在北京写信给张美叔："……米前数日贵至十一两一包，现跌至九两余；洋厘贵至七钱八分，现跌至六分五，市面稍固定矣。"[74]

10月2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称："目前城内可以出售给居民的大米储备只有一千八百石，因为需要派人出去采购，增加储备。"

10月30、31日这两天，广州城厢内外铺户居民纷纷搬迁，米价涨了，鱼菜异常昂贵。11月1日，街头出现两个人，肩上各扛一块木牌，上面贴有字条，书法苍劲，用红笔圈点，署名"梁鼎芬"，其中一块就是关于大米的，大意为："民贫米贵可虑，今官和绅商合办平粜，特传知。"[75]

10月23日，徐兆玮接到家乡常熟来信："日来晴多雨少，棉花收成尚好，惟米珠薪桂，农民度日维艰，为可虑耳！"号称鱼米之乡、产粮区的常熟都是如此，其他地方可以想见。难怪第二天，有人来访时向他感叹："天象

如此（谓各省告灾），人心如此，殊可儆惧！”[76]

11月9日，浙江平阳光复之初，有人对黄梅僧说：“今年六月杪，飓风二三日，早稻已略受伤。至七月初三，雨且风，寻即飓风大雨，忽作忽辍，直至十三日，始稍停，平路水深丈余。父老云：‘咸丰三年大水，无此凶恶。’天变如是，真换朝代之兆也！”[77]

天变，在靠天吃饭的老百姓心中，意味着统治合法性的丧失，一个朝代要陨落了。

辛亥前夜，民间对革命党人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从惧怕、敬而远之到暗中同情乃至支持。因参加广州“三二九”起义而被捕的吴适被关押在番禺县拘留所。知道他是革命党，里面的人都同情他，认为他是好人，不加虐待。本来狱中旧例，新犯入仓，都要睡在尿桶边的地上。但是他们竟让他上床铺睡。因为他头上没有辫子，被人们很亲热地叫他“没辫子”。

当时还有两个被难的女同志，关在隔壁，可以时常和他隔着板壁纵谈国事。所中虽然不能看到报纸，但来所探视的人都窃窃密谈时事，如某日将军凤山被炸，某日水师提督李准遇刺等消息。大家多来向他贺喜，说他决不至死，清朝必定灭亡，革命军必定胜利。[78]

与汪精卫一同谋炸摄政王被判刑的黄复生在北京狱中受到优待，不仅有来自犯人的同情，也有狱卒的照顾。所以，他在狱中能看到报纸，邻室一官犯黄润卿定有日报两份，交他看了告诉内容，因此外界的事都知道，黄花岗起义后，得知同伴喻云纪被害，他和汪精卫心如刀割。直到武昌出事前，每天都有报纸看。[79]

1901年生于广东省乐昌县一个村子的龚楚记得，辛亥暮春的一个晚上，他父亲备下一席丰富的酒菜，招待一位刚由广州回乡的袭士保。这位革命党人是他同乡同宗人，早年投入广东新军当兵，起义失败，逃回家乡。乡人对这位志士颇表尊敬，那天晚上参加晚餐的父老有十余人。席间这位志士讲起起义经过，讲到革命党进攻总督府，慷慨就义的情形时，各人都欷歔叹息，甚至感动泣下。深宵席散，人人都抱着悲愤的心情分别离去。“我当时目见耳闻，幼稚的心灵已激起了仰慕革命党人、痛恨满清政府的心理。”[80]

“三二九”广州起义之后，5月3日，远在杭州的徐志摩从报上得知革命军

已败的消息，“不仅为我义气之同胞哭，为全国同胞哭，痛羽翼之已成，而中道摧阻，是天不使吾汉族伸气也。夫何言，吾惟愿有血性、有义气之同胞，奋其神武，灭彼胡儿，则中国其庶几乎有称雄于世界之一日矣。同胞同胞，曷闻吾言而兴起乎。”5月21日，他写下《滚绣球》一曲，其中有“小丑亡，大汉昌。天生老子来主张，双手扭转南北极……杀尽胡儿复祖邦。……”等句子。[81]

郁达夫记得，武昌发难前夕，在富阳县城，“脸上画着八字胡须，身上穿着披开的洋服，有点像外国人似的革命党员的画像，印在薄薄的有光洋纸之上，满贴在茶坊酒肆的壁间……”[82]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秋瑾被杀之后，鲁迅笔下绍兴茶馆里闲人们的议论并不只是小说家的虚构。但他记忆的时间或许有误，那些画像，很可能是武昌事变后出现在茶坊酒肆的。但徐志摩“大逆不道”的言论却是真实可信的，一个14岁的中学生敢记在日记中，毫无恐惧之心，可见时代风气的变化。

四、人心瓦解

人心的瓦解，并非自武昌始，也不是自10月10日起。

1911年4月13日，成都将军玉昆写给儿子的家书即说：

> 现在国势日艰，朝廷宗旨不定，诸事变更，人心浮动，加之党类煽惑，为大员者心中实在不易，时刻忧杞在胸，有何乐境。……

4月29日，他的家书说：

> 刻下京中时局甚变，人心惶惶。加之诸物异常昂贵，家家户户半多不能支持，人心更加穷迫。……我原不妄想，乃国事可忧可虑。

下个月，他又在家书中说：

在京中景象异常奇窘，人人均有不了之局，穷计百出，屡接各亲友来信，告贷者多，问好者少。

7月12日，他写信给儿子，叮嘱资政院九月开会时，“万不可闲去旁听，尤恐暴动。风闻各省代表人过众，意在哄闹，恐有大乱。刻下国势岌岌可危，人心浮动，纷纷有赴京之说，切听我嘱”。不久，四川保路运动兴起，人心惊惶更不待言。

光复之前在福州的满人伊通甫回忆：“旗营的一般知识界中人均认为革命爆发不可避免；而在目前旗营中毫无生计可言，生活日见困苦，一旦革命爆发，这数千人的生活安排是个大问题”。[83]

人心变动，在华的外国人看得清清楚楚。

5月12日，长沙关税务司伟克非写信给总税务司安格联：

自从广州事变的消息传来以后，此地非常担忧。……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就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84]

5月16日，他又在给安格联的信中说：

中国的前途似乎非常黯淡，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尽在瞎胡闹。[85]

10月11日，莫理循给《泰晤士报》发出电讯：“北京被革命爆发和军队叛乱的消息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中国中、南部的城市接连不断地投入起义”。[86]这个判断并不完全基于当天发生的事，而是他长期观察的结果。

两天后，他又发出一电：

清王朝危在旦夕。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情革命。很少有人顾惜这个使用太监、因循守旧、腐朽没落的朝廷。满朝文武，忧心如焚，皇上的前景……有些不妙。[87]

当时，译学馆的朋友告诉梅兰芳说，京师大学堂的宿舍里听到许多人在谈："革命爆发，来势凶猛，大清朝恐怕保不住了。"[88]

10月15日，武昌的消息传到常熟一带，有人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感受：

闻近日大东门外某姓园中又山前桃杏齐放，柳河沿人家石榴开花二朵，照眼鲜明，宛然春末夏初光景。天气之不正，民气有以感召之也。[89]

10月16日，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写信给外长格雷，"一般的舆论认为，目前的乱事将被镇压下去"，"但满清王朝所面临的前景是暗淡的。它在本国人民中间，很不得人心；……"[90]

同一天，法国驻天津领事写信向外交部长汇报：

扬子江风潮早就在意料之中。仅仅在三个星期前，高而谦先生赴云南就任布政使途经天津时曾肯定地告诉我，由于在"恩准并可延长的一个月省亲假期结束之前便会发生的事件"，他是不会到达任所的。高先生还对我进一步肯定广州和武昌的革命党人所进行的准备工作。我觉得这位狂热的帝制拥护者变化真大，我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他只是说人老了，有了些经验。

……消息十分灵通的日本人曾预言扬子江风潮，他们的武官木青将军曾指出，武昌或南京将成为革命运动的首义中心。[91]

次日，莫理循写给布拉姆的私信说：

现政府被事态惊恐，但行事颇为果断。……但是，我遇到的任

何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外籍同事，都私下告诉我他们希望革命成功。有一天晚上，我的一个朋友同刚刚通过北京留学生考试的十二位毕业生聚餐，他们是从英国、美国、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大家为革命的成功祝酒。[92]

10月20日，斐格写信向法国外长汇报：

实际上，我们也毋庸讳言，在全国各阶层中希望革命党获胜的人大有人在，他们或多或少隐藏着自己的愿望。在这个方面，最近对形势仍十分乐观的北京宗座代牧主教对公使馆的一个成员坦白说，近几天，自从官军初战失利，他的感受大有改变，估计北京将发生示威活动。……在他看来，整个民族都希望造反者们获胜。这个民族了解了它的苦难以后，从苦力到手艺人都想到将来不可能更糟，他们希望来个变化。对于认识雅林主教、曾得以赏识他平时的谨慎的人来说，这种意见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不过目前北京仍然一片太平。也许皇宫周围多了些士兵，到各银行去要硬货币而不是要钞票的主顾比较多一些。[93]

10月23日，处于武汉下游的安徽芜湖，税务司梅尔士给安格联写信汇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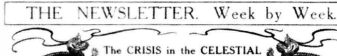
此间一切平静。大多数人心里都倾向革命，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在革命有胜利把握以前，他们不会有举动。

……

安庆某些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士写来的信，我都看过了。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当地的人只等适当的机会到来就宣布赞成革命，其它一切平静……

10月24日，湖南岳州关税务司克萨悌写信给安格联：

THE SPHERE 53


THE NEWSLETTER. Week by Week.

The CRISIS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The Men and the Movement

外国媒体的报道

摄政王载沣与他的两个儿子，其中站着的为5岁的宣统皇帝

武昌事变以来，此间始终很平静，但是这里的人全是赞成革命的。驻在岳州的许多士兵开小差去参加武昌的革命军，当局怕引起骚乱，不敢干涉他们。[94]

10月27日，莫理循给布拉姆写信：

我在这里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赞同革命。甚至比较开明的低级满族官吏也反对他们的政府。

即使政府军在汉口附近就要开始的战事中获胜，可以肯定这个成功只是暂时的，并且不会再有接踵而来的胜利。[95]

10月29日，广州粤海关税务司梅乐和写给安格联的信里说：

华中各省的革命运动进展很快，但在本月25日将军凤山到达以前，广州却非常平静。将军被刺使当地局势大为恶化，现在全城感到惊惶不安。[96]

11月5日，W.R.休斯在局势相对稳定的东北葫芦岛给莫理循来信：

和我交谈过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支持叛乱分子，但他们不敢公开这样讲。[97]

11月8日，保·亨·庆丕从上海给他来信：

这里，在上海形势越来越暗淡。到处是白旗，而且，显然人心向往“叛党”。……我认识的一个老先生今天对我说“只要皇帝肯退位，则天下太平”！[98]

自武昌消息传来，各地都是人心浮动。

四川争路风潮消息传至云南，即已传说纷纷，人心摇动。等到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人民如醉如痴；一般志士欲舞欲狂。……”[99]

北洋女师毕业的嘉兴姑娘沈亦云要去上海参加革命，她二妹性仁陪母亲坐船去乡下避难，跟乡下人讲革命，乡下人很起劲烧茶水请她母亲和二妹喝。她回忆说：“我家女仆周老妈妈曾以工资购买浙江铁路公债，至此又以工资捐助革命军饷。沪杭宁沿线各地朋友谈及家乡之事，多相类似，有力者踊跃出财助饷，讲演者有乡人煎汤以慰劳乏之事。……”[100]

10月23日，江苏巡抚程德全致电内阁：

> 窃谓今日之大患，不患革党之猖獗，而患人心之涣散；不患武昌之失陷，而患各处之响应。果能收拾人心，以杜响应，则武昌不足平，革党不足弭也；否则鄂乱虽指日戡平，而革命异说深入人心，由来者渐，人人有思乱之机，处处有蠢动之势，危急存亡，事机甚迫。[101]

他之所以不久后选择反正，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看到人心已变。

10月25日，广州各社会团体在农务总会开会集议，图谋广东安全，士绅江孔殷发言：“鄂变起事，数日内数省响应，土崩之势已成，无论吾人如何忠爱，对于今日大局人心，不忍言亦不必讳言。”[102]

11月4日，上海光复，《申报》的《海上闲谈》有一篇评论：

> 今上海之失守也，且不以夜，而以日，以三十余人执旗入城，而大局已定。觅县令则已奉让矣，询道台则已出走多日矣。于是革军遍贴告示，市面安静如常，若不知有改革事者。[103]

清廷民心已失有迹可寻，并非从这一刻起。早在10月17日，法国驻上海领事喇伯第写信给外长说：

> 湖北事变和革命党的首战告捷在上海和在全国各地一样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中国老百姓对此密切关注。然而他们并没有显出过分

的激动，仍然十分平静。如果说他们并未公开表现出同情革命，他们热切地希望革命取得成功，这却是显而易见的。要不是这样做，还有点危险，上海全城早就张灯结彩了。

10月25日，喇伯第给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的信中说："中国民众高高兴地获悉革命党最近的胜利消息。革命党有许多密使在上海，他们跑遍店铺，让商人们更改招牌中与满清统治有关的某些方块字。……不管是在租界上还是在中国地界里，秩序都未被扰乱。"

10月31日，上海租界的警务报告记录：

昨天曾走遍制造局、火药局及城南各炮台所在地，各处均显得极为安静。也曾找各种各样的人谈了话，得到的印象是：叛军可望于日内来临，一旦到来，制造局、火药局、各炮台等均将不声不响地投降。

当上海光复，南北市面安堵如常，租界更为热闹，与过去的人心惶惶、惊疑有加截然不同。旅沪西人的秋季赛马照常举行，而且观众比以前更为拥挤。[104]

海上警报日日至，阖邑人心尽惊惶。

这是一位宁波人当时写下的纪事诗。[105]

亲历宁波光复的陈肇英说，武昌消息传至浙江，"全国久蛰的人心，大为振奋。……（各地）的光复消息雪片飞来……"[106]

时在上海的宁波籍青年陈布雷回忆，"其时民气旺盛，人人望民军胜利，民国成功，即商贾工人，有同感焉"。[107]

无论惊惶还是振奋，都是真实的，背后就是民气之变、人心之变。

10月中旬，18岁的长沙少年瞿兑之在日记中说：

连日报纸所载湖北、四川事，甚骇心目，平昔传闻多不审，此

殆无疑矣。

> 秋清桂始花，坐树下读报纸，目迷五色，恐乱象已成，美景良辰对之亦索然寡欢。[108]

10月30日，清廷下达四道上谕（包括罪己诏、宣布立宪、开放党禁、撤消皇族内阁），以为可以挽回人心。有人笑话朝廷："闲时不拈香，急来抱佛脚"，"不知人心已去，吾民只有一笑以存之矣"。[109]

11月4日，广东韶州官员左绍佐感叹："数日之内，而天下震摇……盖自新政剥削苛取以来，十余年之间，其失民心为已旧矣。……"

两天后，他又说："沪已失。天津警报，恐将不远。然则天津失后，其气象岂可问哉！京城必将有迁移之事。此次迁移，比之庚子不可同也。庚子人心未失，此次因新法，因争路，人心已失尽。或言热河，或言蒙古，皆意中事。"[110]

11月15日，浙江平阳士绅黄光也在日记说道：

"谚云：'百姓齐，泰山移！'省城雄师百万，增抚台居然被擒。民心不服，洋枪无能为力也！"[111]

1898年生在海宁，当时还是小学生的蒋复璁记得，"当时历史课本之中关于清代的历史还称国朝，也会空格或抬头，但是我们同学不约而同地都把'国'字改去，好一点的改称'本朝'，有的竟改称'清朝'，小学生都能如此，更大的学生更不必说了。……（我们看到教科书上有'皇朝'两字，便会自动地把这二个字划掉，没有人叫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因我们痛恨清朝。）"[112]

莫理循南下汉口，观察了这座毁于战争的城市后，得出的结论是："袁世凯攫取总统还是僭越称帝，对于中国都无关紧要，清朝必须推翻，这才是民心所向。"[113]

1912年，亲睹这场革命的史家吕思勉写下《士气》一文，如此解释：

> 幼时闻父老言：满洲兵未入关时，明兵望而畏之，一满洲兵可走明兵数十百人；及辛亥光复，闻人述杭州、西安事，亦一汉人可驱数十百满洲人，非力之不格也，亦非降北之必获免也，此所谓士气也。……此所谓土崩瓦解，非复人力所可支障者也。转移莫捷于

气，而成败存亡系焉。[114]

与此相对应，反对这场革命的人，内心则充满凄凉与无奈。11月4日，天津《大公报》要闻，庆亲王奕劻在10月31日隆裕太后召见时奏称："现所患者，不专在革党之构兵，实在人心之思变，故风声所至，响应如此之速，即尚有未变各省，亦必不能多延时日，须即实行宪政，以为收拾人心之计。"摄政王也深以为然。[115]

12月11日，主张君主立宪制的翻译家严复作为南北议和的代表之一到达武汉，13日晚上他坐船去上海前夕写信给陈宝琛说："此间气象自是萧索。舆论于北军之焚烧汉口尚有余痛，民心大抵皆向革军。"[116]

王孝煃的《秋梦录》反思："前清二百数十年，既无甚暴之君，亦［甚少］厉民之政，何以十传而后，亡也忽焉？人心思乱，固为一种原因；而国多游民，不能生活，亦酿乱之根也。"

12月4日，恽毓鼎的日记说："人心喜乱，大非吉兆。"

12月28日，他又说："继思数年中亲贵乱国，论天道，论人心，均应遭此祸。"[117]

12月中旬，到上海秘密寻求南北议和的廖宇春目睹近万人参加的烈士追悼会之后，觉得"人心感动，势力为之一振"，又担心议和之事因上海的革命狂热很难取得成功。

1912年1月5日，汪荣宝在日记中说，有人自上海回到天津，"备述南中情形，此次革命几于万众一心，各以死自誓，虽妇孺走卒亦无不踊跃赞成"。[118]

武昌发难的消息，渐渐传到入川士兵的耳中，连一个普通士兵也感到"满清气数已尽，天命难以挽回"，"日甚一日，几有不能收拾之势。"[119]

这样的气氛连滞留四川的日本青年也感受到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第9期生今井美代吉、小岛利一郎等在《入蜀纪行》中写下这番话：

> 辛亥暮秋，世间桐叶初落。大陆的天空暗云密布，禹域混乱如麻，四亿之民迷茫而不知所从，满清的命运比临风的灯火更加危险。……[120]

"独居租界，惟闻四方土崩瓦解，望风归顺。自来民心离散，疆宇丧失，殆从无如是之速者。盖祸机早伏，一触即发，民之离散久矣。"[121]

这是晚清重要疆臣岑春煊发出的哀叹，他之所以转向共和就是基于这样的体会。

不懂外文的翻译家林纾举家迁到天津租界，有一天，他在街上见各报馆纷纷挂出白旗，上书"革命成功万岁"，许多人在那里欢呼，才知清帝已下诏退位。他亲历此变，"触事成诗"：

> 今朝父老欢呼竟，鼎革仍原上帝心。

【注释】

① 许宝蘅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94页。

②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2，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57、554—555、551、558、567页。

③ 顾颉刚：《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观感》，《中国哲学》第九辑，第515页。

④《恽毓鼎澄斋日记》，第577页。

⑤ 萨孟武著：《学生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德龄公主接受一家报纸采访片段《满清王朝垮台的原因是什么?》，［英］丁格尔著，陈红民等译：《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

⑥ 张馥蕊著，何珍蕙摘译：《辛亥革命时的法国舆论》，中国台湾《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三册，第67页。

⑦ 郁达夫：《自传》，杨世伟编：《郁达夫散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页。

⑧《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0页。

⑨ 董继广等十一人口述：《柘城农民起义纪略》，《辛亥革命回忆录》五，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86页。

⑩ 费范九：《南通光复记》，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7—218页，参考张鸣：《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

⑪ 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6 页。

⑫《烧饼歌与推背图》，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41 页。

⑬ 萨孟武著：《学生时代》，第 49、50 页。

⑭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12 页。

⑮《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13 页。

⑯《烧饼歌与推背图》，第 94 页。

⑰［日］宗方小太郎著、冯正宝译：《辛壬日记·1912 年中国之政党结社》，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7 页。

⑱《文史资料选辑》三十四辑，收入《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页。

⑲ 凌盛仪：《辛亥日记》，同明等编《湖南反正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46 页。

⑳《烧饼歌与推背图》，第 93、94 页。

㉑《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 327 页。《申报》影印本 1911 年 10 月 31 日，参考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年。

㉒《京津游记》，《民立报》影印本 1912 年 10 月 10 日，参考《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

㉓《申报》影印本 1911 年 11 月 3 日，参考《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

㉔《申报》影印本，参考《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

㉕ 黄药眠口述，蔡彻撰写：《黄药眠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 页。参考《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

㉖ 宗方小太郎：《辛壬日记》，第 43 页。

㉗ 沈云龙、陈三井等访问记录：《周雍能先生访问纪录》，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 年版，第 8、9 页。

㉘ 莫世祥编：《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246 页。

㉙ 贾廷诗等记录：《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3 年版，第 31 页。张羽屏：《孙天生起事见闻录》，《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301 页。

㉚ 陈日刚：《大足同志军》，《辛亥革命回忆录》三，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年，第 267 页，参考张鸣：《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

㉛《近代史资料》总 25 号，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600 页。

㉜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55 级学生集体编写：《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73 页。

㉝ 景梅九：《罪案》，《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5 页。

㉞ 董继广等十一人口述，《柘城农民起义纪略》，《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386页。

㉟《成安县志》，民国二十年铅印，《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51页。参考张鸣：《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

㊱《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下册，第276页，参考张鸣：《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第1645页。

㊲ 刘源深：《鄂渚纪闻》，转引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㊳ 陈一萍编：《先行者之歌——辛亥革命时期歌曲200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74页。

㊴《昨日新新舞台之薤歌声》，《民立报》1912年5月16日、《今日新新舞台之悲剧》，《民立报》1912年5月15日，转引自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

㊵ 丁玲：《母亲》，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0年版，第106、107、108、110页。参考［美］史景迁著、温洽溢译：《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88—189页。

㊶《郁达夫散文选集》，第283、284页。

㊷ 萨孟武著：《学生时代》，第58页。《郭廷以口述自传》，第36页。

㊸ 陈逸芗：《故乡兴化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

㊹《朱峙三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258页。

㊺《汪荣宝日记》第三集，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030页。

㊻ 景梅九：《罪案》，《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90页。

㊼《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4页；《艺风老人日记》，第2426页；《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64页。

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五辑，第200页。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第223页。

㊾《越恨》，《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4卷，第81页。

㊿《危机下的责任》，载1986年3月15日《中国科大》，《危机下的责任》，世界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51)［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52)［美］史景迁著，温洽溢译：《寻找现代中国——最后的王朝》，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16页。

㊸ 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上），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115—116 页。

㊹《长沙抢米风潮》，《近代史资料》1955 年第 4 号，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50 页。《长沙城内》，根据日记所写，《越风》第二十期，1936 年 10 月版，第 57 页。

㊺ 转引自陈三井：《故宫档案所见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的中国》，第 2314—2317 页。

㊻ 转引自菊池贵晴：《清末经济恐慌与辛亥革命之联系》，《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4、107 页。天津《大公报》1911 年 6 月 30 日版、《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转引自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上），第 123—125 页。《艺风老人日记》，第 2449 页。

㊼《徐志摩未刊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2、43 页。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六卷，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51 页。

㊽《海关十年报告》，参考菊池贵晴：《清末经济恐慌与辛亥革命之联系》，《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二辑，第 106、108—109、109—110 页。

㊾ 黄尊三：《留学、归国日记》，收入 1933 年湖南印书馆代印之《三十年日记》，《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卷，第 255 页。

㊿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69 页，参考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

61《辛亥革命》（七），第 269 页，参考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

62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1895—1912），知识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52 页。

63 法国陆军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350 页。

64《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34 页。《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41、43 页，《历史档案》1981 年第 3 期，第 32—33 页。

65《辛壬日记·1912 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第 32 页。（英）A.苏古敦著，郦玉明译，韩森、一之校：《辛亥革命在汉口》，《民国档案》1989 年第 2 期，第 9 页。

66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华书局 1984 年，第 37 页。卞孝萱辑：《山东假独立资料》，《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 1 号，科学出版社 1956 年，第 123 页。

67 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 页。

68《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52 页。

69 郑孝胥著，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三，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1350 页。

⑩《辛亥革命》五，417页。《吴宓日记》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4页。

⑪《民立报》1911年10月20日、22日，转引自陈三井：《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辛亥革命研讨会论文集》，1982年版，第74页。

⑫《辛亥革命襄阳见闻录》，《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页。《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中华书局，第212页。

⑬《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3页。

⑭ 徐兆玮：《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70页。

⑮《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49—50页。大汉热心人辑录《广东独立记》，《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447、448页。

⑯ 徐兆玮：《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71页。

⑰ 黄光日记，马允伦编：《黄光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60页。

⑱ 吴适：《参加辛亥广州起义及被捕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39、240页。

⑲《黄复生革命回忆录》，林能士编：《辛亥时期北方的革命活动》，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94页。

⑳ 龚楚：《参加中共武装斗争纪实》，原载《明报月刊》。

㉑《徐志摩未刊日记》，第41、49页。

㉒《郁达夫散文选集》，第283页。

㉓ 邱权政、杜春和整理：《蓉城家书》，《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205、207、208页。伊通甫：《辛亥革命前后福州满族旗营内情实录》，福建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1991年版，第22页。

㉔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7—88页。

㉕《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88页。

㉖ 转引自张功臣著：《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1840—1949）》，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㉗ 转引自彼得·汤普森、罗伯特·麦克林著，檀东鍟译：《中国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页。

㉘ 梅兰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43页。

㉙ 佚名：《常昭水灾闹荒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141页。

㉚《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37页。

㉑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 7 卷，第 210 页

㉒《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 762 页。

㉓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 7 卷，第 220、221 页。

㉔《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18—119、113 页

㉕《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 768 页。

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203 页。

㉗《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 774 页

㉘《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 778、779 页。

㉙ 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3 页。

⑩ 沈亦云：《亦云回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4、59 页。

⑩《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47—48 页。

⑩《广东独立记》，《近代史资料》1961 年第 1 号，第 436 页

⑩《申报》1911 年 11 月 4 日。

⑩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12—213、225 页。《民立报》1911 年 11 月 7 日。《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10 月 31 日，《历史档案》1981 年第 3 期，第 49 页。

⑩《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440 页。

⑩ 陈肇英：《八十自述》，转引自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5 年版，第 523 页。

⑩《陈布雷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9 页。

⑩ 瞿兑之：《长沙城内》，根据日记所写，《越风》第二十期，1936 年 10 月版，第 57 页。

⑩《广东独立记》，《近代史资料》1961 年第 1 号，第 446 页

⑩《左绍佐日记摘录》，《近代史资料》1961 年第 1 号，第 514 页。

⑪ 黄光著，马允伦编：《黄光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66 页。

⑪ 黄克武编撰：《蒋复璁口述回忆录》，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0 年版，第 23—24 页。

⑪ 转引自《中国的莫理循》，第 240 页。

⑪ 俞振基编：《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372 页。

⑪《大公报》1911 年 11 月 4 日，参考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43 页。

⑯ 严复致陈宝琛书，《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0页。

⑰《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66、567页。

⑱《汪荣宝日记》第三集，第1105页。

⑲ 手抄陈文斌：《生平记》。

⑳［日］沪友会编、杨华等译：《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4页。

㉑ 岑春煊：《乐斋漫笔》，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第一篇　恐惧世乱

一、谣言四起

辛亥年伊始就谣言不断，谣言起于人心的不安。

武昌起事之后，整个中国，大江南北，从城市到乡村，谣言更是像种子一样到处发芽，遍地生长。

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强烈地预感到大风暴即将来临。早在5月12日，一年前刚刚发生过抢米风潮、烧了巡抚衙门的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就写信给总税务司安格联说：

> 我的文案告诉我，军队里公开传说他们要清室下台。有人预言秋天要发生骚乱，大家也都相信这种预言。①

郁达夫回忆，在浙江富阳县，“这一年的夏天，在我们县的西北乡，并且还出了一次青红帮造反的事情。省里派了一位旗籍都统，带了兵马来杀了几个客籍农民之后，城里的街谈巷议，更是颠倒错乱了……

到了阴历的七八月，四川的铁路风潮闹得更凶，那一种谣传，更来得神秘奇异了……”②

9月16日，法国驻北京武官高拉尔德给陆军部长写信汇报中国的形势：

> 国家机器的弱点也在事件中突出地显示出来，预言王朝即将结束的悲观谣传似乎已得到证实。
>
> ……人们徒然地寻找着政府的支持，而那个政府原是幸亏群众的麻木和政府官吏及显贵的贪财才得以生存的。如果政府的利益脱离了满洲人，这个让人讨厌的政体就会完蛋……
>
> 以上的担忧似乎有些过分，毫无疑问，没有人能预测满洲政府与无数不满者党派间自去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的战斗的结局。然而目前的局势并不是绝对的新奇，中国的历史总是充满着暴动与反叛。[③]

在武昌，留日归来的黄仲垲记得："先是，七八月之交，谣言党人将于中秋节起义，据城杀官，武汉人心惶惶。省垣旗籍官僚咸遣人送其眷属财产于沪、汉等处为自保计。黠者且预籍差委他适"。[④]

江汉关税务司后来向海关总署的报告［1912年3月］称：

> 9月30日，谣传有人计划当晚攻打总督衙门。……报纸上几乎天天都登兵乱消息。然而，日子一天天平安地过去，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如果说谣言与那些乱党或称之为革命党人有关的话，他们的目的只是要警告一下清朝官吏而已。可是在10月9日，俄租界里一起爆炸事件导致一个炸弹工场暴露和一些起义文件被抄，并有两人被捕。官吏们惊慌得不知所措……[⑤]

10月5日，保定陆军随营军官学堂出身的何遂参观汉阳兵工厂，厂方说："革命党将要起事，风声很紧。有一半工已经停了。"等他回到北京，武昌已经出事。

10月8日，有人从荆州到武昌，此时已谣言蜂起，客栈中"剪发短服之人甚多，时时交头接耳，夜半犹闻密语"，他感觉不妙，当夜即搬到汉口去住。[⑥]

10月9日，也就是出事前一天，两湖师范总学堂学生朱峙三在日记中说：

今日寒露今日风声急；武昌特别戒严。警士双双扛枪站岗，若大难将至者。

10月10日 礼拜二 自是外面风声谣言大起，谓督署已获革命党名册，学堂、营盘中今日一一按名捕之。[⑦]

实际上，当时瑞澂已决定烧毁缴获的革命党花名册，对名单上的人不予追究。（这和10月19日发出的上谕旨意相同："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株连，致滋扰累。"[⑧]）困难在于，他没有办法将这一处理方案公开告诉参加地下组织或与这些组织有联系的士兵。这就给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谣言在传递过程中不断变化，也不断简化，10月9日上午汉口租界的意外爆炸，孙武受伤而逃，以为名册必被捕房交给清吏，然后会按名册抓人，当彭、刘、杨三人被捕遇害，而三人都是剪辫子的，谣言变成了"清政府正在按有无长辫子捉拿革命党人"，次日清晨，没有辫子的30标排长张廷辅被捕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谣传。因为新军中剪辫子的人很多，接下来，甚至谣传新军中的所有汉族士兵都要被捕。于是人人自危。[⑨]

当时还是学生的喻血轮回忆，10月10日早晨，他堂舅、革命党人梅宝玑在向工程营传递消息时不仅说名册已被搜去，还说城门已闭，要按名单捕人，请他们"速自为计"。正是这个信息当晚点燃了工程营的火。[⑩]革命就这样发生了。

谣言不仅点燃了武昌的第一把火，而且推动、扩大到全国。起事之初，黎元洪不愿接受革命党人的胁迫，问他们可恃的外援在哪里？钱粮多少？革命党人邓炳三随口诈称："京山刘英已集十万众，三日可到汉。"熊秉坤则回答："官钱铜币银币各局，及藩库存银不下三千万。"[⑪]

湖北咨议局中管财政的胡瑞霖向议长汤化龙建议通电全国，当时汉口未光复，电报发不出去。俄文教员夏维崧与俄国领事常有来往，谎称是瑞澂的电报，向各省求援，电文夸大其辞，"力述革命党势焰甚盛"，所用电码系各省与军机处联络的密码，由汤化龙在鸦片税大员柯逢时那里取得。安徽巡抚朱家宝、河南巡抚宝棻等都接到了这样的电报，云贵总督李经羲而且将电报

布告，使武昌消息广为人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忽然接到革命党的密电，要他转运粮饷，“盖密电本落贼手也。盛得电大惊颤”。[12]

10月15日，汪荣宝日记说：“在陆军部见汉口电局来电言，本局现受革党逼迫。嗣后不能通电，乃知电局已为叛徒所占，前此通电，均系该党转发，可谓大奇。”[13]

莫理循向《泰晤士报》总部抱怨：“因为汉口的电报业务中断，很难得到确切的消息。”10月18日宗方小太郎日记说：“汉口与上海间电报，因叛军已占领电报局，不许发密码电。”[14]

“汤化龙等到处演讲，以‘某省已陷，某军同党，第六镇来已备欢迎’等语”，来鼓舞武昌的士气人心。[15]

湖广总督瑞澂虽仓促逃到军舰上，但最初并没把结果想得太坏，“派人分途散播谣言，谓清廷已派大兵南下，革命党不日即可消灭”。带兵进川的军官也向部下声称：“武汉于某日为官军克复，宜昌于某日亦为萨军（萨镇冰海军）收回”。[16]

然而这些官方散布的谣言民间无人相信。

相反，官方对来自民间的谣言却失去了辨识能力。10月29日，海军部接到闽浙总督松寿来电，“日前传闻革党在新加坡制舰，顷又闻革舰已抵澳门之谣，请速派兵舰驻泊福州、厦门，以备不虞”。海军部大臣载洵等奏称“既有革党制船之谣，自难保其不来窥伺”，只是兵舰都派到长江各省去了，抽调不出，请示办法。次日的朱批只有“知道了。钦此”几个字。[17]朝廷在谣言面前充满了无力感。

10月12日，翰林徐兆玮从电话里得知汉阳失守，兵工厂被占，“盖乱事极炽，有不可收拾之势矣！”

10月13日傍晚，他得到南京督署被焚消息，以为南京有事，家乡常熟不能无警，电询，知是谣言，外务部无电，惟荆襄告警。“今日下午，警讯最多。……闻有云长沙失守者；有云安庆失守者；有云桂林失守者，纷纷不一，均似确有其事。”[18]

当天，缪荃孙正在聚餐，“酒半得金陵乱党起事信，大众失色”，他因为全家都在南京，尤为难受。（第二天得到家人回电，告知南京无恙。）[19]

同日，汪荣宝日记："闻有湘豫皖三省同时响应鄂乱之说，又有扬州失守之说，中原鼎沸，大乱成矣。……各处传来乱耗，多言长沙已陷落，长江流域一带均有摇动之势，或言扰及许郑……"有人来访时对他说"京师人心浮动，宜处以镇静……万不可毕涉张皇，致生枝节。"[20]

同日，被任命为湖南布政使的郑孝胥也听到长沙失守的消息，虽不大相信，也颇震动。接着又传来"南京督署焚、芜湖乱作"的消息。[21]

在外务部任职的曹汝霖告诉他"长沙甚静"。

也是这一天，许宝蘅日记说："传闻江宁、安庆、湖南等处均有变，夜闻传说不确。"[22]

10月14日，汪荣宝日记：有人来谈，"杂述乱事，亦多臆测之词，不得确实消息，因共往大清银行探询。……知江宁、安庆等处并无警耗，惟前日银行通电，沿江各省迄今不得一处覆电为可异耳。"随后他也从曹汝霖那里得知长沙失守系谣传。[23]

清华学生吴宓逐日记下了各种谣传，10月14日，"日来警报纷纭，一日数起，闻之殊令人惊惶异常。……惟据同学辈之传闻，则今日所闻者，事更急紧矣，云长沙、广州、南京迭遭失陷。此外四川乱未大定，而江西、安徽亦有不大安靖之说。其确否尚未可知。"[24]

15日，徐兆玮日记："但传闻都不确实，唯革党推黎元洪为首领则已确……今日安徽、湖南、广西电报皆不通，然亦无他警信……"[25]

傍晚，汪荣宝接到镇江来电，只有"镇安"二字，"益见前日长江各城骚动之说为无稽也"。[26]

16日，吴宓日记："国文教员杨言，就近日调查所得，仅武汉一隅为革党所得，其它长沙、广州、南京等处失陷之信，全系讹传。惟政府近来焦虑异常，诸大老毫无能为，惟互相悲叹而已。"

17日，"本校僻处城外，消息隔阂，谣传尚少，……闻各地失陷皆系虚言，然南京则确已落革党之手。盖闻该地居留西人及南京学生在京者，其家属均有电报来京，未始非实"。[27]

18日，汪荣宝得到消息，"武昌叛兵携赀溃逃，无烦官军一战矣"。陆军部传来的消息却说"并无叛军溃逃之说"。[28]

19日，云南人周钟岳在北京“闻云南失守之信，未审确否”。[29]

这一天上午，杭州徐子澄告诉徐兆玮：“言闻摄政王福晋出走已三日，至今未觅得。此等谣言，不知从何处得来，真奇闻也。……”[30]

20日，吴宓日记：“近日事变，纷纷传闻由京至陕邮信已经不通，午接到石君由陕来信一封，始知其误也。”[31]

22日，汪荣宝听说“宜昌兵变，府城失守”。23日，他听说长沙、西安同时有警，“知所闻不虚，似此各处响应，廿一二日之讹言成为事实，殆有燎原之势矣”。[32]

同日，许宝蘅日记载：“传闻西安亦有兵变，可虑之至。夜建斋来谈，亦闻陕西有变。”

24日，“又闻长沙有变，……夜又闻九江有失守信”。

同日，恽毓鼎日记载：“传闻宜昌陷没，又闻长沙失守，未审确否”。25日，“有得革命军告示于火车站者，署衔大都督黎，与明季都下于三月初即得闯贼示谕云十九日破京师，如印板文字”。[33]后来还有人以“北京大都督袁”的名义在北京张贴告示，以离间朝廷与袁世凯。[34]

26日，许宝蘅日记载：“闻香港报告，将军凤山又被刺。潼商道瑞清电告西安省城失陷，又闻杭州有警。各路蜂起，大局危殆。奈何！奈何！”[35]

同日，吴宓日记载，听说吴禄贞已在军中杀死荫昌，“以兵叛附革党。顾此事太似离奇，实有不可信者存”。[36]

28日，恽毓鼎日记载：“西安兵变，护抚钱能训，或云逃去。潼关亦陷。”又接到儿子从武汉前线来信，“始知宜昌失守之确”。31日，他听说太原兵变，“焚烧抚藩衙门，入满城尽歼旗人，呼啸而出，乘火车直趋娘子关(过关即井陉、获鹿)，为数仅六百余人，屯驻不敢进。朝廷调南苑第四镇兵拒之。”而外务部邹大臣“张皇其事，面色如土，忧惧殆不能堪”，他在日记中感慨：“嘻！岂有六百乱兵而能陷京师者乎？且其听之谣言离奇可笑，而邹则轻信，仓黄莫知所措，大臣识力如此，何以御外侮邪？”

11月7日，“或有传言，张绍曾将以滦州兵犯阙，监国欲避之，人心恟惧。复有都中旗兵仇视汉人，欲先发肆戮之说，于是满人惧为革命汉人所杀，汉人复惧为报仇满人所杀，讹言满城，朝不保夕。”[37]

11月8日，汪荣宝刚到天津避难，就听说“京城有敌围之信，颇疑其不确”。次日，他得知“京师尚安，惟出京者纷纷”。[38]

同一天，许宝蘅说：“知京中又传说天津有警，风声鹤唳之状，甚为可恶。”[39]

11月10日，汪荣宝听到外间喧传，袁世凯“在孝感被刺，未敢信以为真也”。也不时有利于朝廷的谣言在传，11月13日，汪荣宝听说黎元洪已投降，“武昌城内革军有溃散之说，并闻南京革军进攻大为官军所破，安庆以一千防营击退革军七千，南京官军且乘胜而下，将规复镇江、上海”。他次日回京，看了北京近日各报，“颇觉昨日在津所闻之不实”。[40]

11月14日，恽毓鼎听说福建独立的消息，叹息“朝命所行不出河南省”。[41]

在华外交官、记者也注意到了谣言产生的影响。10月16日，法国驻天津领事写给外交部长的信里说：

> 天津各衙门惶惶不可终日。昨天，总督派他的一名书记官来找我三次，问我是否有南方的消息，恳求我一有情况就用电话或派使者去告诉他，即使是在晚上也如此，因为他在外务局安排了日夜值班人员。就从这一情况已可见全豹。
>
> 晚上，他还派人给我送来一封很长的密电，密电是给瑞瀓总督的，他请我把它发出去，……因为他不相信本地的电报员，他们几乎全都是广州人。……
>
> 荒诞不经的谣言四处流传。我们的总督再度向皇上递交辞呈，但没有得到答复。

同日，法国驻北京公使代办斐格也写信给外长：

>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城里五花八门的谣言流传不息。一会儿有人宣称革命党迅速北进，一会儿又说某省加入了革命运动，或某军投向政府的对立面去了。而且这些消息得到许多热心人来为它们传

播，因为或多或少带点伪装的叛党党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多，而那种微笑聆听对叛党活动进展的宣布也足够说明问题了；人们原来还以为他们是清皇朝的忠实支持者呢。[42]

10月17日，《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给伦敦报社写信说：

北京充满了最离奇的谣言。[43]

10月27日，斐格给法国外长写信汇报：

然而在北京，街道面貌几乎没有变化。……有些满族妇女放弃了原来引以为自豪的发式，以免招惹危险。但是群众仍如以前那样激动不安，而各项事务却没有中断。

然而，对未知危险的恐惧在与日俱增，有人提到在土著地区可能发生骚乱。由于估计到了这种可能性，一星期来，已经有大约五百名警察开了小差，这是内务部侍郎昨天对我们的一位同胞说的。但现在仍是一切太平，尽管有过几张立即被警察撕掉的革命党的布告，某些想象丰富的人所预言的事变仿佛还是很难令人相信。……

朝廷对局势的危险性是确知的。前天，理藩部大臣寿耆亲王在接见我的时候清楚地表达了这方面的意见。他说："自太平军造反以来，我们还从来没有陷入过这样的处境。"他还影射城里流传的朝廷逃往热河的谣言说："真是疯了。我们谁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一旦离开我们的宫殿，便永远也回不来了。"如果说有的人已经想到了离开首都，那么，我们可以相信，这样的考虑将使他们尽可能地推迟行期。

总之，政府各部院仍然是那么举棋不定。那里还作出了一项决定，那便是对现制度的敌人们的一个让步。……然而，他们却还在犹豫是否应为袁世凯重返朝政作出必要的牺牲。

10月31日，莫理循写信给伦敦报社：

> 我在这里从黎明工作到深夜，企图通过种种谣传的线索了解真情。[44]

11月1日，林绍年的奏折称，“鄂变之起，不过旬余，而京城之逃徙纷纷，每次火车均拥挤不能容。市面则现银现钱搬取一空，屡向度支部商借巨款维持，尚有供不应求之势，以致百物昂贵，穷民愈无聊生”。之所以人心如此惊惶，人们急于逃离京城，是因为谣传朝廷即将逃走，近日以来有说邮传部已在预备火车的，有说热河已在修行宫的，有说密云在修道路的，又有外文报纸说朝廷将迁往奉天。这些传言已足以骇人听闻。还有一种谣传，说日本人运动留学生，结交亲贵，沟通内监，每天以奉天安乐，而他们又可以尽力保护，希望迁到那里去，等等。

11月9日，许宝蘅送家人到天津后回京，因为传说天津次日起停止京津间的火车，阖家为他挂念。“其实皆讹言也”。

11月13日，给事中高润生上了一个折子说：“查京师人心浮动，前以民政大臣桂春添募旗警，夜闭正阳门，致滋惊扰。自桂春罢去，人心稍定。”近日，因为步军统领衙门召集工匠修正阳门、宣武门，人们以为又要戒严，“见者侧目，闻者惊心，居民皇皇，谣言又起”。[45]

北京之外也是谣言遍地。

10月14日，叶昌炽在苏州，只闻“流言纷起，茫茫大地如炸弹爆发，顷刻燎原”。

10月16日，长江下游、靠近武汉的九江，海关税务司穆厚达写信给安格联：

> 此间外表上一切平静如常。但是现在很难发出电报，因为政府官电很多，把线路全占了。……
>
> 昨天谣传革命党将在昨夜起事。不过他们显然并不急于起事，因为九江是唾手可得的，不会有什么抵抗。昨天南昌来电说，那里

的人异常惊慌。

10月19日，他又写信汇报：

> 此间虽然谣言很多，一切却很平静。两天前，听说有人扬言要焚毁道台衙门，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事。毫无疑问，老百姓心里是同情革命党的，不过大批现在还没有表示。[46]

这一天，常熟各处都出现匿名揭帖，各学校都收到了，内容为10月25日大兵过境秋毫无犯，“于是人人相传，谣言蜂起，风吹草动，皆疑革军之来，多作迁地为良之计”。[47]

10月22日，江苏巡抚程德全致电内阁：“官吏逃亡，鹤唳风声……而民之讹言日甚一日，或谓某处兵变，或谓某处匪作。……加之本年水灾横连数省，失所之民，穷而思乱，止无可止，防不胜防。”这一天，恽毓鼎接到常州家乡来信，知道“里中谣言甚多，人心皇惑”。[48]

10月23日叶昌炽日记载：苏州前两天就有避地之说，“人言凿凿，今始知为讹传”。[49]

10月29日午后，周钟岳到香港，遇到从云南派赴天津的赵芷君，对他说：“武昌起事，各处响应，京、津已岌岌可危，无庸再去。”[50]

同一天，叶昌炽日记：苏州“讹言愈甚，铁瓮金陵，六桥三竺，皆有警耗飞来。……沪上传言苏六门已下键”。[51]

常熟则已在流传“北京政府有议和并出狩之谣”。[52]

10月31日，已任南韶连道四年的左绍佐日记说：“广东宣布独立，竟至竖旗，百姓以花炮相庆，街市秩序几乱。督电所云，挨户劝谕，风潮已平，但防外面谣言。此种情形，殊可虑也。”

11月1日，广州街头有人肩扛木牌，上面贴有字条，其中一块写着：“谣传广东初九日有事，今已过矣。同为大清国百姓，切勿轻听谣言，各宜安居乐业。”署名“梁鼎芬”。[53]

11月2日，左绍佐在韶州听说：

事势危迫，乱机之动，至于摇动大局，遍东南行省，而川陕震动，又复见焉，其可哀也矣。

传言南昌兵变，未知确否？九江不通电，则势趋于东矣。其声势可畏如此。

次日，他听到更不妙的消息："长沙传是已失，南昌不通电，九江传是已失，惠州亦有兵乱。"

11月8日，"谣言日多，人心惊惶，殊可骇讶。英德竟有绅商独立之电，可云奇怪"。

风潮日紧一日，官府布告禁止讹言，请绅商出面劝导。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说："此间商人皆喜鼓吹独立，不知何心，此所云下流社会者耶？然大局至此，其可危也哉"。[54]

11月5日，英国驻烟台领事勃特得到济南兵变、咨议局视若无睹，以致看到德州军械局被占领的报告后，向朱尔典汇报："然因本埠谣言纷传，此事实难查明。"

此时连皇室也因谣言而不能安居，何况百姓。11月7日，莫理循写信给布拉姆说：

我几乎每天给你发电报叙述这里发生的瞬息万变的形势。……皇室。如我昨日电报所说的："皇室因惊慌而瘫痪。"[55]

11月9日，叶昌炽听说张人骏、铁良、张勋等"相约背城一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担心万一南京的军队南下，苏州必遭蹂躏，所以动了"避地之思"。第二天，有关张人骏的"存亡消息，传闻异词"，苏州人心大为震动。11月13日，他从邸钞上看到10日上谕："神京虽不靖，钟簴尚未摇，为稍慰"。[56]

此时，相对稳定的东北也挡不住谣言的攻势，这一天，分巡锦新营口兵备道袁祚廙电告赵尔巽：

昨日东埠谣传京变，人心震动，商业学生退学回籍者数十人，

大清行忽运票根多箱赴大连。谣言纷起，极力镇静，今日稍安。[57]

江阴的小学教师、同盟会员章砚春说："彼时谣言蜂起，人心惶惶，不可终日。"[58]

11月12日，时在湖南平江的凌盛仪在日记中说：

> 城中来信，知得鄂中急电：孙逸仙、郭宝生统兵入北京，满酋遁，大局已定……此电虽不属实闻，已神为之旺，巨跃曲踊，大笑拍掌，举家若狂矣。

11月14日，他在日记中说："满陆军大臣荫昌被刺，载洵保清主逃往奉天；此事未必属实，然亦意计中事也。"

明知消息是假的，他依然如此激动，这就是当时民心的一种投射。

也是11月14日，在湖南乡下的王闿运得到摄政王已逃走的消息。[59]

生活在绍兴的周作人回忆："在那时候也有种种谣言，人心很是动摇，但大抵说战局的胜败，与本地没有多少关系，到了浙江省城已经起义，绍兴只隔着一条钱塘江，形势更是不稳，因此乘机流行一种谣言，说杭州的驻防旗兵突围而出，颇有点儿危险，足以引起反动的骚乱，但是仔细按下去，仍是不近情理，不过比平常说九龙山什么地方的白帽赤巾党稍好罢了。一有谣言，照例是一阵风的'逃难'……

但是辛亥年的谣言却只一天就过去了，只是人心惶惶，仿佛大难就在目前的样子。"[60]

他弟弟周建人的回忆提到这些谣言对绍兴的影响："（鲁迅在街上）见有些店铺已在上排门，有些人正在张皇的从西往东奔走。……（到学校）才知道市民因为听了败残清兵要渡江过来，到绍兴来骚扰的谣言，所以起恐慌的。"[61]

甘肃一直在忠于清朝的长庚、升允等人掌握之中，但在全国到处独立的大趋势下也很不稳定。"兰州谣言四起，一夕数惊。那年腊月某夕，我在八旗会馆闲谈，时方入夜，忽有一木敞车驾畜惊奔，声轰轰然，全街居民亦时惊惧万状，

终夜未敢安眠，既至天明，始知一场虚惊，当时人心浮动，可见一般。”[62]

上海独立前，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上海道刘燕翼一再发出告示，安定人心，说清廷已派“陆军两镇及加派兵轮并长江水师迅速赴鄂剿办，转瞬大兵云集，指日平定”，上海也已加强防范，安全可以无虑；劝导商民“万不可轻听谣言，互相摇惑”，过去遭遇时局变故，上海都能转危为安，加上上海乃中外商业机关所系，商民自应“如常贸易，保持中外信用，不必稍有惊疑，自生障碍”。[63]随后，两江总督张人骏出面查禁谣言称，自鄂变以来，骛耗频传，各处人心惶惑，市面大为震动，“沪上为通商大埠，商民荟萃之区，深恐遽行听信谣言，致使惊惶”，故特令查禁，并访拿造谣之人，严行惩办。[64]《民立报》、《时报》、《申报》这些重要报纸也纷纷劝告上海居民，勿做无意识之惊慌，以免扰及地方治安，而为土匪所乘。[65]

面对四处飞来的谣言，朝廷最初还想控制：“初，武昌义军突起，京师谣言繁兴，报纸复宣传各省将独立，协理大臣那桐，遂电各省每日报安，揭诸官报，以镇人心。未几报者日少，至是遂绝，都人愈惶恐。”[66]因为谣言如瘟疫一般袭来，防不胜防，朝廷最后只好放弃澄清。

10月18日，给事中蔡金台的奏折附片中有这样一番分析：“此次乱起，邮部禁阻交通，民部禁止报载，皆为军事正当办法。第禁令不及于洋报，转使匪党得藉以施其煽惑。而民间反因警厅之禁，滋疑而信谣。……人心乃惶惶不可终日。”[67]

不要说南方，就是北京和近在咫尺的天津有关消息也都有谣传。11月2日，“天津谣言殊甚，几有朝不保夕之虑。……此间得内阁解散之信，系滦州军队所要求云”。11月3日，“谣传东交民巷下戒严令，中国人非有护照不准出入”。[68]

11月6日吴宓日记：“忽喧传天津失陷，继知尚未也，特人心大扰乱，事亦将发现于二日内矣。”两天后早晨，“闻天津已陷，并闻北京非常惶惑。革军已有照会给各国使馆，言令于五日内，将一切预备停妥。五日后，即进兵来攻北京矣。”[69]

外务部参议颜惠庆记得，袁世凯11月13日进京之前，“京师则是一片恐慌，群臣犹如惊弓之鸟，神经质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一天，外务部的高

级官员正在讨论严峻的时局，当时，来自各省的报告充斥着谣言，或夸大其词。恰在此时，部内主管电报的司员冲进门来，只见他面如土色，声称已无法收到天津总督衙门的回电（当时正在盛传革命党计划攻打天津）。与会的各官员惊恐万状，纷纷喝令，立即套车，马上回家。几分钟后，那位司员又来禀报，与天津的电报联络已经恢复，刚才无人作答，实因电报员正在如厕。”⑳

上海独立之后，苏、常等处相继独立，谣言也没有止息。11月22日，盛宣怀后妻庄畹玉在上海给盛宣怀写信：

> 谣言四起，人心涣散，东南已成糜乱矣。
> ……昨有谣传，北京失守，庆戕摄逃……㉑

12月2日，江汉关苏古敦写信给安格联：

> 谣言很多，有的说北京已经失陷，又说袁世凯死了。㉒

同一天，玉昆在成都写给儿子的家书说：“邮电梗塞，使内外无闻，竟听谣传，日日惊吓不可待言。川闻九月初五［10月26日］隆裕皇太后改为垂帘听政，是日朝贺时保府军队猝变，直入大内，将王公诸大老尽行杀戮，吴禄贞保监国率领皇帝皇太后初七［28日］乘火车前往奉天暂驻；禁卫军与新军交战，互伤多半；宫内尽毁，旗人被戮者多，度支已焚。大局决裂如此，闻之不由痛哭流涕，心焦如焚。又不知家中如何，受惊否？心中悬念，日夜不安，万难得一准信，恨不能插翅飞京看看，方如愿耳。”

因为外界消息隔绝，谣言无孔不入，他听到的只能是谣言。到12月21日，他终于收到一个半月之前［11月6日］北京寄出的家书，第二天，他在回信中说：“数月以来，内外塞闭，谣言肆意造生，人人愁闷，令人叹叹。来信所言京中谣言亦甚，汉员纷纷回籍，人心岂有不惶惶之理！”㉓

1912年1月4日，南北议和北方分代表之一许鼎霖北返，慷慨陈言：“［南方］民间……又为［革命党］所蒙骗，谓北京已亡，痛心疾首，而无可如何。”㉔

北京已亡，大概就是最大的谣言。

二、逃难人流

10月11日，武昌街头行人甚稀，大炮声不断掠空而过，学生朱峙三一行到了文昌门，“城门半开，逃者拥挤”，甚至有三个人被挤死。等他们十多人到了江边，船都已被人雇尽，转到平湖门江边才雇到一船，坐12人已载重，船主要涨价，向每人索要五百文，平时渡江只需五十文。到了汉口，只见搭轮往南京、上海的人如织，多为达官大贾眷属。次日，船到黄州，下船的有一百多人，有两只划子来接，“向来无此事，洋棚中每人收二百文，今日共收四十余串，发暴财矣”。他再雇船回家。

这一天，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致电外务大臣林董：

> 各国租界俱已配置海军及义勇队防守。本国侨民无一人遭受损害，已命令妇孺等做好准备，随时均可撤离。
>
> ……商市完全断绝，良民陆续逃避。[75]

同日，苏古敦给安格联写信：“人民都外出避难。”

朱春驹的伯伯、三叔父都是五六品的小官，恐慌之中，收拾细软，领着家眷加入逃难洪流，在枪声时断时续的子夜，夹杂在逃难的男女中挨个出城门，投宿城外的客栈，准备搭轮船逃往上海，却被城外的地痞抢走了随身财物。[76]

10月13日，朱峙三日记说：“今日下午二时，自武汉水旱路归者络绎于途，风声甚紧。”次日，“武汉风声更紧，归者甚多，学界及小贸人亦均归来”。[77]

同日，在汉口的英国传教士计约翰日记：

……今天早些时候，新到的一批食品采取非常措施的价格。市场上无肉类供应，鸡蛋每只四分，鱼每斤售价五百二十文，鸡每斤四百六十文。[78]

也是这一天，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致电外务大臣林董：

[11日消息传到] 此间中外商人对汉口之贸易活动逐渐停滞，几已陷于中断状态，长江轮船已无货可运。目前，长江沿岸各地正值运进棉、煤及杂货时期，继四川暴动之后，汉口又发生此次变乱，对本地商情影响非小，但人心尚无不稳征兆。

10月15日，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在上海到武汉的船中发现，“招商局之江永号与日清之岳阳丸均载满难民”。[79]

10月16日，两江总督张人骏给内阁电中称：“鄂省变乱，讹言四起，武汉沿江避难者纷纷南下。”[80]

同一天，九江穆厚达给安格联写信汇报：“由于局势动荡不定，很多人已迁往内地或者跑到长江下游去了。”[81]

10月17日，喇伯第在上海写信给法国外长：

从汉口而来的轮船不折不扣地挤满了逃难的人。这里难民人数迅速增加，增加得那么快，以致房租已在上涨，房产公司“上海土地投资公司”的股票价也突然从九十二两上升到一百零四两。“英法土地投资公司”的股票同样在大幅度上涨，这家公司在法租界拥有很多房屋。

同日，南京的金陵关税务司卢力飞写信向安格联汇报：

长江航轮照常行驶，……轮船公司正从大批逃离湖北的中国旅客身上捞取巨额利润，船票涨价一倍以上。[82]



北京逃难的人们



汉口逃难的官员

"自武汉乱事一起，自长江东下的各江轮都满载避乱的人，沪宁路、沪杭路到沪乘客更是拥挤不堪，其中满洲人尤多，男人多剪辫子，女人多改汉装。"

10月28日，"汉口租界欧美各国居留人仓皇上轮，内地人民扶老携幼者，亦络绎于道，而大小民船，拥挤不堪，因而复没者甚伙。"[83]10月31日，汉口日本店员内田顾一日记说：

> 自从开战以来，人人都抱着惊恐的心理，一再避难。首先是商店闭市、银行关门，继而波及到小商人，终于连累到我们一般大众的身上来。比如很难买到粮食和日用品，纸币不能流通，连雇用的中国人也想逃走等；……停业关门的商店一天一天的多起来了。(豆腐、酱油、白菜等都用拍快电的方式要求上海尽速运来。)
>
> 日本租界可称女人绝迹，今后更是大杀风景。[84]

武昌发难的消息传到北京，北京政府内部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增援湖北前线的部队不可能在一日之间到达汉口。[85]

10月12日，前两天刚到彰德见过袁世凯的王锡彤说，"闻武昌有乱事，人心皇皇然"。[86]

10月14日严复日记："京师颇骚乱，南下者多。"[87]翰林徐兆玮四钟出前门，"车塞途，皆载行李，纷纷上东车站。闻大学堂学生及已考之留学生未验放者均纷纷出京，人心动摇一至于此"。[88]

同日，恽毓鼎日记说：

> 一日谣言甚多，传某某处皆兵变失守矣，或系伪电，或出讹传，均无其事。外城吴厅丞（籛孙）张皇失措，勒停唱戏，讥察行人，而无识无胆之京官，挈眷出都。邮传大臣复欲停止京津火车，一时人心摇惑，……[89]

远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求学的胡适得知国内发生的事件，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北京政府震骇失措。"[90]

10月15日，“市面梗塞如昨”。[91]郑孝胥日记说：“讹言廿八［10月19日］有变，居民出京者相继，火车不能容，天津船少，不能悉载。”[92]

10月16日，法国驻北京代办斐格写信给外长：

> 然而，在各个阶层中，至少在中国人中间，情绪极为动荡。已经有几位显要人物前来各国公使馆，询问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接待他们。有的人，如外务部侍郎胡惟德则已经让他们的家眷动身去上海。
>
> ……加之政府采取了一些显然不能平定人心的措施。大小剧院按照巡警总厅的命令全都关了门。还有，今天早上各公使馆接到通报说，今后电报局不再受理发往湖北、河南、江西、四川、贵州、云南各省的电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地区已经在革命党人的手中。我当即给外务部去了一函，询问作出此项决定的动机，并要求只要线路尚未被切断，保证公使馆和各领事馆之间的通讯联络。我还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
> ……昨天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认识的一位巴黎味儿太重了些的卫队军官受命去印刷厂为他所跟随的亲王取名片。他对名片的印刷质量表示满意，然而却指出名片上少印了目前对印名片人说来是最不可缺少的用语P. P. C（这三个字母印在名片上时意为：特来告辞。）

少年吴宓的日记记录了北京的人心慌乱、清华同学不断卷入逃难人流，以及他自己逃还是不逃、怎么逃的心路：

> 10月14日　日来警报纷纭，一日数起，闻之殊令人惊惶异常。
>
> 17日　警报迭传，战机未决，京师人心惶惶，不知所止。
>
> ……而同学之请假归家或避难往津沪者颇不乏人，而居者亦惶惶无定止，心咸思所以为计者。余则无法且不欲逃而他去，故只可静居此间，安待天命可也。

18日　余终日未能温课，只与叶君等闲谈而已。盖余虑及诸种事变，心亦惶惶。加以同学辈纷思逃避，皆以居此弗行，恐有后患。

……清华园孤悬城外，附近尽围以满人，生计维艰，倘使蜂拥而扑，则本校情势殊觉危险。且是时管理学生人等，咸各寻路逃生，余此一半学生居此实无法自卫，又有绝粮之忧，则不能不早为逃亡之计。且事机变化，消息加紧，则四方火车轮船交通全绝，即欲他适无所得行，……则悔之为晚矣。故此时早谋逃往他处，不为无计。

19日　昨夜火车之经园外者终夜不绝，其行殊速，汽笛呜呜，深夜闻之令人震恐。盖又由他处运兵至京，或调往助战耳。

……独怪中国现当多事之秋，则各省咸骚扰不宁，直无一片干净土可为逃避地。

25日　闻京师近日愈益戒严，至今日则将枪炮诸物已皆堆置城垣，大有守陴御寇之意。以是人心纷乱，各校学生请假回籍者更不乏人，固其所为未能谓为尽善也。

26日　今晨学生有出校回籍者。而同班之中，亦有若干人请假入城，侦探消息，藉作逃计，殊觉惶惶异于常日也。……午后，又开英文文学会……但会员到者仅十二人。上课人数亦如之，盖有若干人已整理行李，预备明日即行者。其它盖皆入城预备行事，咸思他适。今日一日间出校归家者，多至二三十人。

……自修室中，直无一人温理学课，皆聚谈奔走议逃避计。

……此时及早逃逸固是上着……

……余则意尚未定，且实无法可想。此时尚不欲作他逃计，待事局一紧，便当由京赴天津，搭海船至上海。……

27日　今日风声更紧，人益惶乱。同学辈纷纷逃走回家，全校学生几去其半，上课时同班到者仅十一人。

……余终日心中忐忑，至不静适。

28日　午后，范、唐二监督来校，在食堂演说，谓此时危险之说摇撼人心，诸生纷纷离校，我亦实不敢必留诸君在此。但如此随便来去，殊于本校前途大有妨碍。自今日起，一概不准请假。凡欲

去者，皆当作为自行退学，不能再算本校生徒。

然此令下后，诸生之去校者仍滔滔不绝，率皆自请退学。至晚，诸人又举代表向监督要求，凡去校当允其请假，不得作为退学。

29日　今日北京情状略如常日，闻初五、六两日［26、27日］备极恐慌，今日似又稍清。……城中各校学生业已尽退，几乎全空，而仍上课维持如故。[93]

10月23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写信给坎贝尔说：

北京开往天津的每班火车都装满了人，有的带着全家老小以及祭祀祖宗的牌位，纷纷逃离北京。

造成此刻北京市面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熊希龄等湖南共和协会150人后来给袁世凯的电报说得很清楚：

满室所最信任者，无如亲贵官吏。武昌事起，亲贵首先提取大清银行存款，市面因而摇动。……各省督抚司道，平日以贿得官，为咨议局所纠弹者，满室均袒置不理，一旦变起，纷纷逃走，无一死事者。是满室对于亲贵官吏，尚不能得其信用，更何信用于今日之一般人民？[94]

10月14日，正好在京的云南人周钟岳记下了他的见闻和感受：

都中人心震恐，各王公密议甚秘，外间不得知。第闻肃亲王主张以禁卫军严守宫廷，东西洋留学生在京者，暂令出境，派陆军大臣督师赴鄂，而已，又有主张挖断黄河铁桥，阻兵北来者。甚可笑也。[95]

19日，吴宓日记：

……闻京中京官之流，多有安顿家眷预备逃走者，则事机之来亦不远矣。

24日，莫理循给布拉姆写信：

消息灵通的汉人、满人已经离开北京。汉人害怕满人报复大批出走或将他们的家眷送走。满人出走是因为害怕将来的下场。各种财宝从北京运往安全的地方，如天津、上海的外国租界，更珍贵的则运往奉天，人们相信那里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可保安全。

一旦长江流域一带败北，朝廷将逃往热河。甚至有人建议皇上移驾日本。许多人在猜测这种可能性。[96]

25日，有人告诉徐兆玮，北军有溃散之说："今日京师金融益窘迫，大官家眷亦纷纷南下。时局如斯，可为浩叹！"[97]

27日，莫理循又写信给布拉姆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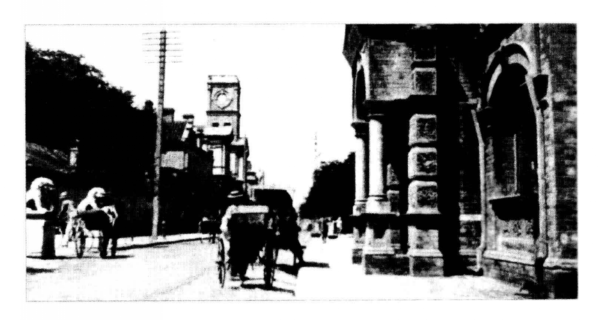
富裕的中国人继续以惊人的速度离开北京。连大学学生也受影响，许多教室几乎空无一人。甚至小店主阶级也在离去，逃往乡间。北京充满了荒诞的谣传。[98]

同日，吴宓日记"至京中现状，则闻已大有乱象。京官眷属，纷纷送之回籍。闻庆王已逃走"。[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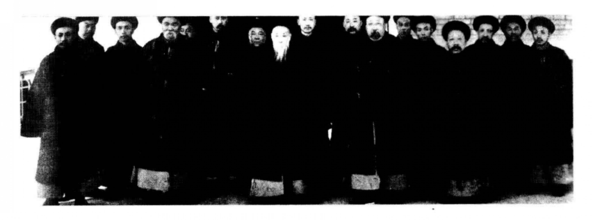
有人对徐兆玮说，"此次京师之慌，以亲贵为罪魁。施肇基出使美、日、秘、吉也；庆王托妻寄子焉，刻已挈之至哈尔滨矣。金叶数十万亦庆所收"。[100]庆亲王的一举一动都为人注目。

28日，朱尔典在北京给英国外长格雷发电：

虽然清政府坚决声称，袁世凯作为钦差大臣将于今天启程前往汉口，并对此项任命抱有很大希望，但是，公众对此事仍极为怀疑，



北京东交民巷成为王公大臣的避难所之一



庆亲王和大臣们

而且此处感到非常不安，有许多人纷纷乘火车南下。[101]

29日，吴宓日记：

然京官眷属业已纷送出京，其逃避出京之人，日不可以数计。

亲历这一幕的记者黄远生一年半之后对此仍记忆犹深："辛亥革命，未及旬日，北京人士，几于一空。"[102]

自武昌的消息传来，北京外出尤其南下的道路就不畅。10月13日，许宝蘅一大早起来，送家人到车站，"切嘱嘱其若前途有阻速折回"。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回来了，因为火车只能到黄河北岸，不能南下，只好折回。这一天，郑孝胥到车站，"闻只卖票至黄河"。[103]

10月24日，王锡彤南行，"京中闻鄂讯，大惊扰，京官眷属出京者，途为之塞"。与张一麐、赵秉钧等同车，齐耀琳、齐耀珊连座位都没有。29日，王锡彤和袁克定赴彰德，"京汉车上拥挤甚，妇孺尤多。远隔三千里尔逃难者已如此多，群众心理，皆知清之必亡矣"。梅兰芳回忆，"京奉铁路慢车停开，快车只卖头二等票；京汉车票只卖到黄河北岸，而且开车钟点也没有一定"。[104]

反向的车、船同样拥挤，10月23日午后，徐兆玮听说"此次北来船上亦甚挤"。[105]

10月27日，徐兆玮日记："消息日恶。……见毅军时入滋扰，南班惶惶作避难计。"[106]

同日，吴宓日记："……天津、上海诸地，人已满至再不能容。京津、京汉诸火车，拟初八日全行停止。"[107]

恽毓鼎到火车站送儿子南归，"火车人多于蚁，强得一席地而居"。他第二天的日记说，"南省京官争遁，车站行李堆积如山，登车稍缓，即被摈"。[108]

29日，吴宓日记："京津等各火车，日售票至三千馀张。而以拥挤不得上车而复归者，每晨又数百人。"[109]

30日，徐兆玮日记："继至车站，见出京者纷纷，比前数日更多。……

今日谣言甚盛，并云革命党有入都消息，以致内城纷纷移至外城。人心涣散，一至于此，真可叹也！”11月1日，他买了头等车票，上了车却无容足之地，一路站到天津，只能叹息“苦矣”！[110]

梅兰芳回忆：“……南方籍的京官，纷纷携眷离京，北京东车站的站台上行李堆积如山，儿啼母唤，失物寻人，纷乱不堪。”[111]

曹汝霖回忆：“当兵谏电已到之日，亲贵大员眷属，纷纷逃往天津，京津火车拥挤到无立足之地，人心之乱，于此可见。”[112]

11月3日，总税务司安格联写信给上海的墨贤理：

> 星期日和星期一北京发生恐慌，成千的中国人离开了这里。[113]

11月6日，高拉尔德写信给法国陆军部长：“惊慌笼罩着已经受到第二十镇和山西协反叛威胁的北方。自一个月来，有十万人离开北京去天津和上海租界避难。”[114]

11月7日，严复日记：“数日风信极恶，江浙皆告独立，资政院民选议员鸟兽散。”这一天，莫理循给布拉姆写信：

> 一些满族亲王和许多满族公主逃往天津，包括贵族良桂，他是皇太后的哥哥，荣禄的过继儿子，娶庆亲王的第二个女儿为妻。[115]

8日，许宝蘅去北京火车站送人，“第一次车上人已挤满，不能走，遂上第二次车，而人亦甚多，须八时方开行，余遂先归。十二时径到车站，少候即上车。三时半到车站，送田姨等到津，四时五十分开行。车中人又挤满，无处可坐，立亦仅一隙之地，苦极。八时到天津紫竹林，寄云已在站相候，遂至旅馆，熟人麇集，立问京中消息。其实京中甚安，总由人心不靖，遂成此种乱离之象。”第二天，他不胜感怆，“知京中又传说天津有警，风声鹤唳之状，甚为可恶。[116]

天津离北京最近，那里的租界成为首选的避难所。

10月15日，周钟岳在京，“晨起检点行装，坐午车赴天津。时出京者甚

多，车甚拥挤。天津旅馆亦几无隙地”。[117]

这一天，林纾也准备送家眷到天津租界暂避。[118] 18日，严复与他见面时，知他可能全家南行。[119] 实际上最后留在了天津。

16日，法国驻天津领事写给外长的信说：

> 从昨晚起，北京站站长已不得不增加车厢，运送从首都逃往天津或途经天津逃往南方的人们。[120]

24日，有多人来许宝蘅家，与他商量移眷去津的事。许多官员都将家属送往天津，自己则往来于京津之间。

26日，因为“数日风声甚恶”，严复先将11只箱子运往天津，寄存在亲友处。[121]

同日，法国驻天津领事写信告诉外长：

> 北京满汉两族难民继续向殖民地涌来，旅馆住得满满的，可用的房屋都租了出去，甚至租给天津老城区的官吏和显要人物。……
>
> 如果皇族不得不到其它地方去寻求避难所的话，他们也可以在这儿找到一条通往满洲的可靠的道路，满洲将在日本人手中变成第二个高丽。这种说法在这里流传颇广，而且也很有可能实现。[122]

27日，徐兆玮日记：“天津各栈所住均旗人眷属。”[123]

报人汪康年就死在了天津避难时。11月2日晚餐时，他得到京中友人密书，政府将起用袁世凯，叹息说：“今方主张共和，然是人可为拿破仑，不能为华盛顿也。”说完就去睡觉了，到夜半，家人听见他的呻吟声，“已昏迷不能言”，挨到第二天弃世。[124]

到11月4日，“上海独立风声更紧，京官逃避天津日以千计”。有人在天津车站目睹，“适北京车到，车中填塞几满，旗妇初易汉装者尤多，其举动至可叹，站外有日人恃照像镜摄影，观者狂呼。又有逃官多人，易其服色，仓皇行走。从者挟囊尾随之。路人指点曰此某某老爷大人，平日最煊赫，今

亦如此矣”。[125]

11月17日清晨，陈衍（石遗）动身登上汽车去天津，途中因车内拥挤，两位妙龄少妇无处可坐，直接坐在了他的腿上，使他非常尴尬。[126]

不仅到天津的车拥挤，自天津南下的船票紧缺，码头也拥挤。10月15日周钟岳离京，在天津候船，17日午后出帆，等了不到两天。比他晚一点，从保定入伍生队出来的万耀煌，在天津足足等了三天船：

> 这三天里见闻很多，满洲贵族和王公大臣的眷属几乎都逃到天津租界居住，北京、保定的文学堂都自动解散了，北京女子师范由师长带领搬来天津法租界，拥挤在两栋租来的小房子内，有些官吏携眷南下，南去的轮船也像北京来的火车一样拥挤不堪，由这些情形，可以看出清廷已到土崩瓦解的时候了。
>
> 我们等了三天，总算搭上了招商局的新丰轮，三人都是统舱票，可是甲板上的走道都被乘客阻塞，我们无法通过，只好由船窗爬到舱里去。……

程潜回忆，因为京汉路停止客运，只有到天津海道南下。10月21日搭商轮南行，沿途在各港起货上货，直到10月28日才到上海。[127]

10月29日吴宓日记：“由津至沪轮船之拥挤称是，船价确已涨至二十五元。”[128]

11月4日，徐兆玮在天津等船，“上午闻上海已树白旗，同人惶惶。……夜九时，奉天船到，即下行李。”[129]

同一天，缪荃孙离开北京，“因京人挤，改坐头等车”，到天津住在长发栈等船，11日买到船票，次日上船，“舱小而热”，到11月18日才抵达上海码头，与家人相见。陈衍到天津搭船赴沪，又从上海回到老家福州，路上整整花15天。[130]

11月9日，吴宓和同学结伴乘火车到天津，傍晚投宿泰安客栈，刚要休息，伙计说买到了招商局下属“普济”轮的统舱票，当晚就要上船。他们马上出发，一路高低不平，又有铁轨、铁丝，夜又黑，几次跌倒，他又生怕与

同学在人流中走散。终于由小艇上了船，原来是运煤船，临时搭客，船上多是官宦家眷，带有丫鬟、仆妇，行李箱笼众多，船舱放了许多马桶，臭气熏人。次日天没亮船就开了，一路在风浪中颠簸，他终日呕吐、晕船。17 日上午抵达上海，成了“半死之人”。[131]

富甲天下的盛宣怀已亡命日本。他的次女婿因为没有路费到 11 月 9 日才仓促出京，然后乘轮船南下，船行多日，18 日才到上海。[132]

还有人因为等不到南下的轮船而去了日本，《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孙子龙峨精灵（刘惠荪）回忆，“辛亥革命，家中避兵南下，在天津等船不得；滕田丰八博士劝往日本住了二年多”。[133]

逃难潮最先是因王公亲贵提款、送走家眷引发的。以及仓场侍郎而新署民政部大臣的桂春处置不当，更加剧了人心恐慌。梅兰芳回忆：“桂春叫京师巡警总厅通知戏园停演夜戏，前门大街上每逢三六九日的夜市也勒令停止。入夜后，热闹街市的饭庄、铺户都没有电灯，路少行人，景象萧条。同时谣言纷起，传说桂春从城外调来了三营旗兵准备杀汉人，人心更为恐慌。”[134]

10 月 15 日，郑孝胥日记说“内外城戒严”。徐兆玮日记：“……此次京师之谣言蜂起，半由民政部桂大臣临事张惶，而外厅丞吴彭秋亦举动失措，致有停止夜戏之谕。幸庆亲王闻而诘问，谓如此恐人心更为浮扰，桂大臣支吾其说，谓观剧之窑子太多，恐有闹事，一时传为笑柄云。”次日，他给人写信：“京师闻鄂事起后，大官举动张惶，以致人心浮动，今日已镇定如常。”[135]

同日，恽毓鼎日记也说：“桂大臣张皇特甚，符调城外旗兵入城，屯扎以备巷战。见者转滋疑骇。匪徒果陷京师，尚能巷战乎？徒增焚掠而已。”[136]

10 月 17 日，汪康年在他自办的《刍言报》发表生平最后一篇评论：“凡在当轴，须自知己之身，即国家之身，不能离中权一步也。岂惟身不能离，即心亦不能离也。夫如是乃能责之诸大臣，乃能责之诸有司百执事，若始责怀诿卸之思，继且存畏怯之志，甚至渐怀退志，规作自全之计，不特弛百僚之体，抑且为外人所哂。”[137]

更严重的是，传说民政大臣桂春主张“尽诛京城汉人”，而京师警察以旗人为多，人心更为惶惶不可终日。[138]

10 月 21 日，给事中高润生的奏折附片称，“京师人心浮动，自闻鄂耗，

众怪群惊。加以达官显宦往往向银行提银购金，致市面大起恐慌之象。又送眷出城者颇多。愚民何知，惶惑尤甚”。因为毅军入城，又引发谣传，街谈巷议，都说革命党已潜伏都中。

10月27日徐兆玮日记：“桂春上条陈清查汉人户口之一条。八旗学堂学生在堂演说，有誓杀汉人之语。以致各学生纷纷思去，真怪事也。”[139]

同日，汪荣宝日记：“日来京师谣言甚多，或云民政大臣将勒令内城汉民移住外城，或云禁卫军队将对于汉人起暴动，以致人心惶惧，纷纷迁避，若不设法镇抚，恐生意外。”这一天，吴宓在清华园也听说“满人确有欲尽杀汉人之意”。[140]

10月30日，御史史履晋的奏折说：“京师银根奇紧，银行、银号、炉房已倒闭十余家，大清储蓄两银行又被拥挤。其原因皆由于民政大臣无保卫治安之能力，诸事张皇，手足无措，以至人心摇动。”[141]

吴国桢回忆：

> 在摄政王将袁世凯从“放逐”中召回之前，北京确实存在着混乱，谣言四起，有人说首都的汉人要突然发动起义，并像五百多年前蒙古人时代（元朝）那样夺取皇宫。又有人说满人已秘密聚集了他们残余的追随者，并要屠杀所有带南方口音的人。

他父亲吴经明赴日本学习军事，1908年归国后在陆军部军学司任职。有一天，他父亲从官署慌慌张张地回到家里，同母亲秘密交谈了一会儿，来不及告别就离去，几个月之后才见到他。从母亲苍白而紧张的脸色，他推断某种异常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母亲没有对他们细说，但在匆忙打包时，却暗示由于上级怀疑父亲与革命者合谋，所以他们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必须立即出逃。[142]

在陆军部任职的恽宝惠回忆，武昌旗人遭杀戮消息传到北京：

> 署民政大臣桂春（满族），对于此事，顿萌报复之念，于九月初十（10月31日）左右，密令内外城巡警总厅，将汉族之充警察者，

查点人数，秘造名册，预备一律撤出；一面密调城外之圆明园、外火器营、健锐营旗兵（是名为三山，向驻玉泉山至香山一带）二千余人进城分住，俟将汉族警察撤除，全以旗兵顶补，即拟于某日夜间同时动手，屠杀在京城之汉人（其对象尤其是南方人）。事为民政部右丞汪荣宝（苏州人）所知，遂赴桂春住宅（在西斜街红庙），面见力争。桂怒气勃勃，瞪目大声说："本朝二百数十年，对于各省汉人，何等深仁厚泽，今竟敢造反，惨杀旗人，天良何在。此次调旗兵进城，乃为防卫之计，你们不必多管。"挥之使出。汪遂纠合三四品京官，往见奕劻，痛陈："倘若照桂春之办法，北京的汉人，如何能杀得尽。将来革命军能得到北京之时，旗人究居少数，焉尚有余命存在。即皇太后、皇上以及宫廷妃嫔，必致玉石俱焚。大祸临头，悔之晚矣。"……［奕劻］立将桂春召至，叫他不要胡闹闯祸。［再将赵秉钧召至北京，令署民政大臣，赵到任第一件事就是给三山旗兵二千余人一人一块大洋，令他们火速出城，仍回原地。一面向内外城两厅丞说明，前项荒谬举动，万万不可实现，桂大臣令办之事，完全取消。］……当时住在北京的汉族（尤其是南方人），人心惶惶，各想逃出北京，往他处避祸，东西两车站人山人海，拥挤不动，行李山积，争先恐后，秩序大乱，几致无法开车云。[143]

桂春被黜，以赵秉钧署任民政大臣是在10月30日，恽宝惠记忆的时间不确。桂春要杀汉人的传闻则在此前27日就已传开。[144]所谓汪荣宝与桂春力争，以及向庆王陈言，汪荣宝10月27日的日记都未见，他只是说和几个在京同僚陆宗舆、章宗祥、曹汝霖商议，"运动政府明降谕旨，解释群疑"，随后他们决定以商会名义拟一公呈，交部奏请，由他来拟稿。[145]也许桂春被免与此有关。荣庆这一天的日记说："罢桂大臣民政。"[146]

梅兰芳回忆："桂春的卤莽措施，不独汉籍官员反对，即亲贵中如载涛等也不赞成。御史赵熙上奏参劾'……且现当各省乱机窃发之时，京中人心亦极惶惑，该大臣决不足保护治安，维持秩序……'……把桂春调为仓场侍郎，派赵秉钧署民政大臣。警厅传知各戏院开演夜戏，广德楼、天乐园首先

恢复夜戏，前门大街的夜市也照常摆摊，市面秩序才渐渐安定下来。”[147]

10月30日夜，汪荣宝家人聚议避难，“决议由六弟妇、外姑及秀英分携子侄辈，赴津暂避，即于明午动身”。次日，他早起送她们，分别时他妻子秀英哭了，他也“为之黯然”。

11月4日，他接到天津电话，“知六弟妇辈将以今日安平船赴上海”。[148]

同日，吴宓日记说：“江西、湖南、四川诸省留京同学，皆由会馆筹得公费若干金，每人可得数十金，可持作路费他往逃避。余等则弗能也。”因为没有路费，他只能继续留在清华园里担惊受怕。[149]

11月7日，严复在北京东城金鱼胡同给莫里循写信：“目前我的孩子们在天津，我独自和几个仆人住在我的这所房子里。形势日趋恶化，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实在无能为力。”

同一天，汪荣宝得到“保定失陷”传闻，接着又传来吴禄贞被杀的消息，众人“相顾失色”，都认为“北方大局将不可收拾矣”！吃饭时，“闻吏部衙门起火，益惶骇”。他收拾行李，决议明早赴天津。第二天，他带着家眷，还有两家朋友到车站，“车中拥挤，已无立足之地”，想等下一班的快车再走，有熟人劝他上车，“止得勉强就道，狼狈不堪言状”。[150]

同日，清华学堂暂时解散，将余款3000元分给学生做路费，每人可得20元，第二天早晨，吴宓5点就起来，乘火车进城，前往天津。[151]

天津租界的房价大涨，旅馆也涨价了。梅兰芳回忆，“有钱有势的还把家眷送到天津租界内，于是外国人乘机大发其财。日租界的德义楼、奥租界的春满楼旅馆的房金猛涨几倍”。[152]

少年吴国桢随母亲先到天津：

> ……当晚，母亲、哥哥和我登上了拥挤的火车去天津，满清帝国允许英、法、德、意、日在那个港口开辟租界，我们可以去那里避难。由于是被迫仓促离开北京，事先没有安排，所以不得不到旅馆临时寄宿，经过长时间的疯狂寻找和屡屡失望后，我们才在一个寒冷的北方夜晚找到一间又小又脏的房间住下，其价格之高是平时的三四倍。第二天，母亲留下我们照看那值不了几个钱的行李，独

自去寻找更合适的住处。好多天以后，她终于在日租界一幢房子里租到一个单间，它比旅馆的那个房间大不了多少，但要便宜得多。那房子只有四间房，没有洗澡间，只有一个厨房，而在那紧张的形势下已住了三家共十多个人，一半是孩子。很容易想象到我们所面临的不适与困难，每家轮流用厨房，母亲做饭一点也没有规律。至于洗澡，我们不得不买一个木盆，并要忍受只能得到很少量的水。[153]

严复、许宝蘅在天津因租不到房子，只好在旅馆暂住。11 月 8 日，许宝蘅到天津，稍事休息，晚餐后即到奥租界、日本租界看屋，都已被他人租去。[154]

同日下午，严复由京赴津，"……租界避兵，人极众，至无借宿地。不得已，乃寓裕中洋客店。"11 月 11 日，他仍暂住裕中饭店，午前去见德璀琳，午后见到英国朋友那森（开滦矿务总局总经理），"许以秦皇岛房屋借住"。[155]

也是 11 月 8 日到天津的汪荣宝，"眷属等拟投租界长发栈暂住"，他差人去长发栈探听，"已无空屋"，后将眷属安顿在长发分栈暂住，他自己去朋友家住。11 月 10 日，他说："乱事决非旦夕可平，而客栈又非久居之地，拟就租界赁屋居住，颇不易得。"有人说日本公园附近有一处空屋可租，赶紧去看，"则已有人先入占之矣"。第二天早起，他得知四弟昨天在旭街 78 号找到一处房子，楼屋各两间半，另有厨房一间，月租 70 元，先付两个月。准备日内迁往。次日，他去那里，眷属和行李都已迁来，尚未安置妥帖。

许宝蘅 11 月 9 日回京后，得知房子已在日本租界租好，"甚慰"，12 日又接到家人来信，"知所租屋甚不合宜"。[156]

天津其实也并非安全之地。10 月 29 日，津海关税务司欧森给安格联写信：

此地如果发生革命，官员除逃往租界避难以外，不会有其它行动。总督已经准备好一只小火轮，随时可以送他顺海河开下去。[157]

外务部参议颜惠庆回忆，11 月 13 日袁世凯抵达北京后，"满朝文武，人心顿形安定，仿佛又恢复了元气"。[158]

这一点，从高拉尔德 11 月 16 日给法国陆军部长的信中可看出：

这是自革命运动开始以来的第二次间歇，它似乎再次带来了希望，皇室及其成员因此轻易地从中得到好处。

已经有些逃亡天津的居户返回北京，要求在外国公使馆避难的高级官员也减少了。

然而我们只要开始用心观察事件本身，就不难明白这种乐观情绪的依据何在，沿海各省一个接一个地宣布独立并建立临时政府。广东广西继云南之后，山东继福建之后自称共和国，具有国家性质。在天津、开封府甚至在皇族的诞生地奉天，也都显出了分裂主义情绪。不再有一个省，即便是遥远的甘肃或者荒凉的贵州，人们也不再挥动革命的火把。

在战场上政府也并非更有运气。[159]

但是，一有风吹草动，人们还是纷纷往天津逃难。11 月 20 日，法国驻天津领事给外交部长的信里说："四十八小时以来，大批北京人又重新涌往天津。这些迁移者仿佛属于十分富足的阶级，在最近这种恐怖时期，他们没法子为自己搞到专列，又没能和不敢搭乘普通列车。"据京津路局的调查，京官出京的即有 40 万人。[160]

直到 1912 年 1 月 21 日恽毓鼎还说："京官闻临时政府将立，恐反对者扰及市间，于是又纷纷遁去。呜呼！此百日中，南省虽乱，北方却一无所见，唯见京官眷属之乱烘烘而已。"[161]

1 日 23 日，坚持君主制立场的京官金还致电赵尔巽：

京津近日慌甚，还眷尚未全来，屋未定，甚焦灼。[162]

未逃出京的人也寻求外国人的保护，甚至把贵重家底交给外人保管。10 月 24 日，斐格给法国外长写信：

恐慌日益严重。昨天半夜三更还有一些人逃出华人区或旗人居住区，逃出流传着最离奇的谣言的地区的人，带着一家老小，跑到

外国人居住的区域，来到某些在中国定居已久的欧洲人家里。我们的一位同胞向我透露说，他已经收容了因为臆想的恐惧而来投靠他的三个大商人的家庭。

27日，斐格继续给外长写信汇报：

不管怎么样，中国人一致认为外国人不会受到威胁，而来北塘区要求庇护或就近寻找房子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163]

11月3日，莫理循在北京写信给布拉姆：

这里的汉人和满人都惶恐不安。好象每个人都害怕别的人。

11月7日，他写信对布拉姆说：

这里，人们一直处于疯狂的动乱状态中，他们离城避难的情形是我来中国后所见到的最触目惊心的情景。每个人都在寻求外国人的保护。我的一个朋友费士哈上尉，仅仅在一所满人的房子里居住（一个院落供他居住），每月就得到四百美元的报酬，所有日用品一应俱全。[164]

六国饭店也是人满为患。熊希龄等给袁世凯的电报说，“王公眷属迁入六国饭店，人心又因而恐慌”。[165]

11月10日，恽毓鼎日记：“使馆街有六国饭店，朝贵恃有外国人也，群赁居之。每屋一间住十余人，每人每日收租洋九元，每箱一只日租三元。禁用仆婢，禁小儿夜哭。每餐仅饭一筒，盐煮白菜一器而已。而人尚若蚁之附膻，至有宿于廊下者。偷生受辱，一至于此。锡三兄谓此直模范监狱耳。”[166]

早在10月29日，吴宓日记说：“而天津旅客栈等处，住客已满不能容。北京亦然，租价日增。”[167]



袁世凯　背景为汉口

逃难的人流

11月9日，度支部大臣绍英将家人送入法国医院暂住，一直住到12月3日，他当天日记说："慈亲率四嫂、大、二妞回家，一切安好，此次在医院住廿余日，送给捐助医院银三百元，赏下人廿元，该院尚欣然也。"[168]

北京的显贵借洋人的房屋保自己性命，而在独立后的上海，盛宣怀后妻庄畹玉同样想借洋人来保持自己的房屋。11月22日，她从上海写信给盛宣怀："前面洋房已借与日人，我想尚须多招几国人来住，借可保护。"[169]

逃难潮不仅发生在北京，10月30日上午八时半，宗方小太郎自九江出发，沿江而下，九时四十分过湖口县。"……兵士各藏白布一条于衣袋中，事起则即用以缠于左臂，以备变为革命党。人心恐慌，轮船每次下航时，向上海地方避难者甚多。"[170]

策划镇江独立的林述庆记录，10月17日后，镇江的驻防旗兵开始加强防备，将炮口对准新军的军营，"自是兵心动摇，夜不敢眠，纷议他徙，一夕数惊。"到10月28日，"见城内纷纷迁徙，道路拥塞异常，心甚恻然。旗兵未缴械前，镇人惴惴不安，战祸断难幸免，九月初旬［10月下旬］城乡内外纷纷迁徙，几于十室九空"。[171]

10月20日，因昨日谣言，常熟许多人家"争欲兑换金条叶件，以备携带逃避。金价亦骤涨"。

23日，"谣言甚多。路上扛运什物，赴乡赴沪，络绎不绝。……"

29日，"报载革军到镇江，……吾邑以为镇江路近，不半夜可至苏州，又复纷扰，作避地计。"[172]

同日，苏州也是"移家舆马不绝于道。……"[173]

30日午后，有人从南京挈眷回常熟，说各学校全体解散，"日来各典铺异常拥挤，而所质之物，以脚炉等铜铁重笨之件最多。搬场船只生意颇好"。[174]

同一天，苏州中学生叶圣陶日记："近日城中居民异常恐慌，皆纷纷迁家避难，或则至沪上，或则至乡下，而以今日为尤多，河中装家伙之船首尾相接也。不知此次之革命为政治为种族，岂为盗贼之欲肆行抢掠哉！……一般人如此无目光无定见，亦大可虑。而人心乱，秩序乱，实当归罪于此迁居之人，此一般无目光无定见之人。"[175]

11月5日，常熟城里，"出殡、移家，终日夜不绝声。城门之启闭不时，

亦无人管领矣"。这一天丁文江先到上海，然后去苏州，因为张勋的威胁，苏州城一片惊慌，他送女眷到长江北岸的泰兴，"也在极度惊恐之中"。11月7日，常熟城中，"居家几空，行人亦少，恍如年初一。下半日，光景萧条殊甚"。[176]

9日，苏州叶昌炽日记说："不为国殉而与叛人同投一烬，悔将何及，又动避地之思。"第二天，他与叔母商议，先让家中的妇女小孩共九人外出暂避，雇定一艘芦墟船，决定第二天去乡下。他感叹："哀此小民，惨罹浩劫，此间人心亦大震。"[177]

11日叶圣陶日记："一般人见南京未曾得手，多有惊慌者。迁家避难之事复起，街上挑什物者又屡见矣。此等人实在无主见，因之扰乱治安，诚可虑。"[178]

这一天回到故乡常熟的徐兆玮，"知城中已树白帜，巨室迁徙一空，外姑亦全家徙弟乡……乡僻尚无谣言"。[179]

14日，有客来叶昌炽家，告诉他自己家正在束装，次日携全家赴沪。"听说南京张勋的军队长驱至京口，有兵船四艘，水陆齐进，苏州人大恐。他不理解，"张军即无纪律，论逆顺之理，总为王师，何以畏之如虎？引领以望者，亦惴惴恐玉石之同烬，岂非古今之大变，到此真无从措意词矣！[180]

16日，苏州税务司师范西给安格联的信中汇报："许多有钱的人家已经搬到上海去了。"[181]

当时，《申报》"自由谈"发表的《锡金时事五更调》："钱庄不通，汇票钞票失信用。市面穷，财主人呀，家私才搬动，咦呀呀得而亨，大家走个空。"[182]

郁达夫说，武昌消息传到浙江富阳，"城里的谣言，更是青黄杂出，有的说'杭州在杀没有辫子的和尚'，有的说'抚台已经逃了'，弄得一般居民，乡下人逃上了城里，城里人逃往了乡间"。[183]

1902年出生在湖北黄陂乡间的陈碧兰，父亲留日归来，是武昌中华大学的教授、学监。当时她在新式小学读书。"这所学校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炮声中被迫停止了。由于黄陂县被起义军纵火助战，破城而入，解决了满清军。那是一个深秋的午夜，我的父亲突然被五里以外黄陂县城频密的枪

炮声惊醒了，我也被惊醒了。他跑到外面一看（我也跟着去看），只见红光满天，知道是由于战争，县城起火，据从县城附近逃难的人说：'是破城了，起义军胜利了。'但我们的村庄离铁路很近，一有战争就非常危险，……一时大家手忙脚乱，清理行装，准备动身逃难。……道路上逃难的人携儿带女，或牵着牛，赶着猪的步行者甚众。……我虽然也受这一紧张气氛的影响，但我一点也不害怕，更不晓得担心，内心里却充满着一种莫可名言的新鲜之感。"[184]

福建漳州在11月11日光复前，人心惶惶不安，居民迁徙逃避，商店关门，地方呈现一片纷扰局面。[185]

湖北陆军第三中学第三期的刘峙在武昌参加革命，返回长沙正是10月22日独立那天，他回忆："焦达峰引会党占据要津，大肆抢掠，长沙居民纷纷逃难，我又不得不返回自己的故乡。"当地青年瞿兑之在日记中记下了举家逃难的过程，"是日突闻城中衙署悬白旗，……颇有侵入民家及滥杀之事。余家亟谋避兵"。他家去乡下避难之日，"秋雨盈街，泥泞滑达"，乘肩舆出城，渡过湘江，再换肩舆到宁乡的乡间。

> 作客全家去，逢秋九月阴。雨垂花自秀，风遗雁遗音。北讯何由达，南迁日更深。二亲头并白，离乱涕如霖。

这是他11月上旬在乡间避难时写的诗。听到新任都督焦、陈被杀的消息，他们一家又想另找地方避难，全家从宁乡迁到湘潭，"扁舟过昭潭，暮霭苍茫中，睹石色纯青，水色澄洁，心尤系恋。潇湘诚胜地，他处未易得也"。等到局势稍为安定，他从湘潭回到长沙，还是不敢留下，当即乘船东下，前往上海。这已经是1912年1月中。[186]

丁玲母亲余曼贞（后改名蒋胜眉）为常德女师的教师：

> ……弟之友来告，城门（常德）已锁，恐有意外事发动，嘱作准备，如消息恶劣，当再送信。此时弟不在家，急与弟妇商量。我更因校长与监督均已去省城，校中（常德女师）仍有数十住宿生，她们皆是年轻姑娘，又处异地，万一有事，不堪设想，不若接来我

家暂避，……她亦赞许。时大雨滂沱，余撑伞到校报告一切，并把弟妇奉接意思申明。一刻儿如鸦飞鹊乱，联翩至吾家。且喜床铺多，天气不冷不热，四、五人一床，或品茶谈天，或看书下棋。第二天风声愈紧，乃反满战争（指辛亥革命）。民众平安久了，不胜恐惧，市上已搬空，学校停课，学生纷纷回家。我又喜又悲，不觉流出泪来。……

丁玲在《母亲》中叙述：

街上一天一天的空了，城门挨黑就关了。无形之中又加了恐慌。……

据说城里是有革命党，还有好些流氓混在一起，还有人亲眼看见从洋人的船上装运得有洋枪，子弹，说是只要听到外边起事，就到处响应。不只一处是这样，省城还要闹得厉害。这样的传说，使曼贞也信起来了，……

一直到谣言最厉害的那天，余曼贞才决定带着妇女、小孩到灵溪去。

可是城里的轿行都空了，喊不到人，价钱已经涨到三倍，轿夫也添了两倍，还是不够，她们只好等着。

最后只能叫来船，“把曼贞和一群孩子在最后的一天，就是说起事响应武汉的那头一天清晨，载到前乡一个叫刘家坪的小村里去了。那里离城有五十里路。就在那天夜晚，果真起了事……这条街上只有三家是没有走空的”。[187]

与丁玲的情况接近，11岁的杭州少年夏衍随母亲乘脚划船到德清县城的舅舅家避避。[188]

10月27日，杭州税务司铁士兰给安格联的信中说：

租界里来了许多汉人和一些满人，所有的房子和旅馆都住满了。[189]

广州的逃难从 7 月就开始了。

7 月 27 日，海关税务司梅乐和写信给安格联：

> 广州的局势又趋严重。生意萧条，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在下午五时左右关门，这个地方差不多没有什么生气了。许多富商已经搬到西关，还有许多人索性带着家眷到香港、澳门去了。广东公立银行发生挤兑，据说兑出了约计六百万元。[190]

9 月 23 日，法国驻广州领事伯威写信给驻华公使馆代办：

> 不断发生大批大批的广州人外逃的现象。人们特别注意到住在总督衙门附近和旗人居住地区的家庭的出走。城里大多数最重要的交通干线由于持续不断的逃难呈现出一片寂寞凄凉的景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8 月 2 日，一所女子学校不得不暂时停课。
>
> 即在 8 月 2 日前后，仅仅几天里，有一万多广州人踏上通往澳门的道路，躲避据称最近将卷土重来的革命党之乱。逃难者的绝大多数仍是充斥着中国各个省城的数目很大的候补官员，他们一如既往带着全部家眷。……
>
> 然而，大批广州人的外出逃难情况即便不比前几天更厉害，也仍然跟前几天差不多。……
>
> 不幸的是，除了当局为平定人心而作的努力之外，还有他们为以防万一而采取的细节应变措施。这些措施往往同那些努力背道而驰，使之徒劳无功，因为它们令老百姓觉得上述当局连自己都不那么相信自己说得振振有辞的安定人心的话。[191]

到凤山被炸死，广州人心惶惑，纷纷迁徙。

10 月 27 日左绍佐日记："此次官商避乱，香港、澳门、上海三处为多。香港住房，价甚大，日用亦贵；上海租界，稍亚于香港；澳门房价、日用，又亚于上海。"[192]

10月28日，因为连日来谣传旗营的满人对汉人动了杀机，以致住在旗满街的汉人纷纷迁徙，仓前街、大市街等处，公馆搬迁已尽。天将入黑时，从大南门出来的行李络绎不绝，挑夫的工钱已涨到一个人一元银元，才肯挑运。四牌楼一带的估衣店，多有将衣服包捆，运出城外，关门停业。双门底上下街等处的商户大多半闭门做买卖。巡警道看到这一情况，不仅出告示要他们安居营业，而且亲自到各街，挨家挨户劝说店铺照常营业，不要为谣言所吓。两广总督出安民告示："乃闻近日谣言，竟称旗人将有杀害汉人之语，以致居民惶惑，纷纷迁徙，旗街附近一带店铺，均多歇业。"无奈官府常常失信，无人相信这些告示。[193]

10月29日，梅乐和在广州给安格联写信：

>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贸易实际上停顿了，金融市场也非常混乱。每天有成千的人往香港和澳门跑，许多人正搬到西关去。[194]

30日，广州的各处船渡和汽车、火车都载客拥挤，比前两天更甚，路上行人绝少。各处典当几乎停止，一般贫寒人家几乎束手待毙，小北一带贫民号哭之声不绝。[195]

31日，各城门虽已开放，但人心仍然不安，路上行人稀少，城厢内外铺户居民继续纷纷搬迁，各大商店还在歇业，每条街上只有少数店铺照常营业，或半掩门，住户则已十室九空。这一天香港日船香山、永安两船开仓未及一小时，便已不能容足，其他广九、粤汉铁路及汽车，都异常拥挤，各江乡渡也是如此。官府安民告示无人相信，有一个重要原因，"各人因政界大小官眷，纷纷迁徙，故更惶恐。官眷能照旧迁返，不用出示劝谕，居民自必无疑镇静矣"。[196]

这一天，左绍佐感叹："此等地势，抑亦何可久居也，此时可以去矣。"[197]

11月3日，他在日记说："或云惠州与香港接连，革党所必争之地也。省城逃徙一空。"次日，他再次感叹："武昌事起，各省戒严，皆有朝不保暮之象，省城皆逃徙一空。……最奇者，自京城及各行省，……或一日数惊，或迁徙逃避，或盛加防备。"[198]

一批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正在四川考察，他们10月13日在成

都，本想到蜀汉皇城避难，怕赵尔丰也来避难，成为攻击目标，很危险，“于是现在又决定把位于城西南的高等学堂作为避难所地，但那里也不是安全的场所，荆州满人被虐杀的报告传来以后，当地满人也像我们一样神经过敏，且近于发疯，而且因为这个高等学堂是距满洲城最接近的地方，所以也不怎么让人满意”，最终也没能定下来。

贵州交通闭塞，外省的报纸比如上海的报纸没有一个半月带不到，所以武昌的消息比较晚，大约在阴历九月初了，忍庐看到《神州日报》，同许多年轻朋友谈起革命消息，“都觉得十分可怕，好像大祸就要来临，预备着逃难的样子。到了九月初十左右，市面上虽不见得有什么变化，其实富绅巨贾，早已把衣物箱笼都藏到乡下或秘密的所在，大锭的银元宝，有人也掘地埋藏起来——事后听说。当时笔者年纪很轻，略为有点普通智识，只晓得逃难是要走路的，所以预备了一张贵州地图，当作逃难的法宝，心里头惶惶不安的过了几天”。[199]

南京最初平静，张人骏不想增援武汉，只求自保。10月14日，缪荃孙接到家人南京来电：“惟惊慌已甚，拟避沪，然妇女多，男人少，行路亦甚难耳。”16日，他接到家人南京来电，第二天赴上海。[200]

但此时还未出现大规模的逃难潮。10月17日，金陵关税务司卢力飞给安格联写信：

> 这儿一切平静，不仅外国人还没有退出南京，中国人也没有逃走。城里的商店照常营业，据我们的华籍职员说，城内既没有恐慌，也没有动乱的现象……
>
> 长江航轮照常行驶，但汉口东运货物已经停顿了。[201]

10月24日，“江宁省城戒严。人民有迁徙入乡或上海者。上游避难来者日多”。[202]

10月25日，法国驻上海领事喇伯第给驻华公使馆代办写信：

> 南京的形势令人不大放心。这个城里满族人的数量相当多，他们

仿佛下了抵抗的决心。兵员众多的守备部队（包括有各种兵器的部队，其中有一个步兵师）让总督很不信任，因此收去了他们的弹药。……

尽管当局作了那些宽慰人心的公告，富人们还是全都离开了这座城市。挤得满满的火车每天把成千上万的人从南京送到上海，总督本人也遣送了他的家眷。……成千上万的难民在镇江和扬州避难，那里的不安情绪也在与日俱增。……[203]

30日，“新军出城前向各商店借贷，市廛闭户，行人绝迹”。[204]
当日，卢力飞给安格联写信：

半数居民都逃离南京了。这种逃难情况从本月26日起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城内许多商店也已关门歇业。

昨天下关一带挤满了逃难的人，简直使人们难于通行。从上游来的轮船已经满载旅客，不能再搭客。许多人就全家在江边马路上过夜，因为所有旅馆都客满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加班行驶，今天拥挤情况已见好转。[205]

次日，镇江关税务司戴乐尔给安格联写信：

这里人心仍然非常惊慌，城内简直无人居住，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老百姓逃走了，只有几家小食品店还开张营业。道台衙门里除了道台和大约四个职员外，再没有别人，所有书办和文案几乎都跑光了。道台的译员现在睡在我佣人的屋里，我住宅的外屋中还住着另外两个中国人，我的仓库里堆满了中国人的东西。南京来的旅客很拥挤，铁路也不得不加开列车。[206]

柏文蔚自述：“此时江防军以第九镇完全开出城外，肆无忌惮，任意横行，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到处借口检查，在老百姓家逼取财物。以致家家户户日夜不安，纷纷向上海逃难。”[207]

这一天，宗方小太郎日记说：

南京如一旦动摇。镇江、圌山、江阴三地即可响应，现正在观望南京之形势。一般人心大为动摇，避难者甚多，商业完全停止，有十室九空之概。

镇江与南京相同，人心恐慌，城内居民十分之七已避难各地，商贾皆罢市，动摇殊甚。……

武昌事变以来，长江沿岸一带成为无政府状态。如镇江亦因盐枭跳梁、避难者中途被要击，掠夺杀伤案件相继发生，人心浮动。[209]

因为张勋杀人，南京逃难者日多。11月9日以后，“南京城里所有衙门、机关、学校、商店，都已关了门，除了留下几个人看守发房屋意外，其余的都跑了。……有钱的居民纷纷到上海去避难”。11月13日，喇伯第给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信中说：

……［南京］市民们惊恐万状，他们纷纷逃走。欧洲人退到了江边的下关，生活在一些废旧船只上。……

我们在上海有与众不同、令人忌妒的地位，在这里，我们拥有地域广阔、有十万零二千居民的租界，现挤满了避难者；我们的租界与中国地界接壤，而我们的警察局需维持从黄浦江到离江七公里的徐家汇的秩序。

11月20日，日本驻南京领事铃木致电内田：

城内突然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因涉嫌而惨遭杀戮者已不下数十人。是以盗贼蜂起，随处抢掠，一度归于平静之人心又复恐慌动荡，四出逃避。由城内通往下关之仪凤门，每日十时至十一时开放，难民蜂拥于途，混杂之状，莫可言宣。十余日间，避难者已达十五六万之多，城内十分冷落，刻下搜捕仍在继续进行中。闻陆军系统各

学校教习、员工住宅以及新军各员住宅，均遭抄检。本职日昨亲出察看，城内居民逃亡者已超过半数。小店铺虽偶有开店营业者，但所售货物仅日常必需品而已。[209]

11月22日，《申报》刊登《石头城下之恶潮》报道：11月18日，“巡警以为张勋兵士所忌，大半潜逃。通西文者，尤属危险。华人离城以数万计。商业停止，城门紧闭，邮件不能入城，故邮局办公因以停止。乡间抢掠之事，屡有所闻。津浦铁路惟有火车一辆，被匪徒截留，搭客行李及邮件等物皆被掠去。”

第二天发表的南京访函说：“昨日有一宁人抵沪，详述南京目下情形……连日离城者络绎不绝，城门每日只开一时，自午前十时始至十一时止。城内米粮大缺，以致米价昂贵。民人皆出城购米，负囊而归。蔬菜之价尚贱。夜间无论华人、西人皆不准出门。张勋已允保护西人及西人财产，且派兵防卫西人房屋。”[210]

张勋宣布戒严，南京街头，大刀队手执红布飘拂的大刀，杀气腾腾，居民迁徙者上万户。

“自戒严令下，民苦搜捕，相率出亡。……宁沪铁路加发快车，赴苏沪之乘客，恒有守至终日不得购券者。江轮下等仓位价涨至银币十数元。三日间，迁徙达万户。城内外日没后即断交通，惟见江防、巡防营之哨探，枕兵卧交衢，或占民房聚博而已。”[211]

以后嫁给赵元任的少女杨步伟就在南京逃往上海的人流中，她家与张勋是邻居，经张勋关照才得上火车：

第二天一大早他的卫兵来了……革命军就从车站出来对督署进攻。张勋的兵也就回枪打起来了，等车的人大乱起来了。我们一串围到一堆，也无处躲，枪子就从头上飞来飞去的。一下子火车到了还没有停稳，大家都往上跳。……我们经过城里两个小站都没有停，看见地上的箱子行李堆的像山样的，人哭的叫的无法上来。

我们九个钟头才到上海，叫了三辆马车，一路到了五个旅馆都

是人已经满了，一直到夜半十一点才找到虹桥的一个破旅馆。床又有臭虫，我是一夜没有睡。

第二天一早我和三哥去找大表哥，兵工厂也封了门，禁止一切人进出，只得乱找房子，处处人满。（中国几次内战一般人都是逃到上海租界避乱，所以每次租界都有人满之患。）找到一楼一底店面房子一间楼，二十个人睡在地上，头靠头脚靠脚。两个用人一半睡楼梯口，一半在楼梯上……[212]

愚民自扰亦堪哀，到处城门挤不开。一路啼痕真惨状，最怜老妇与婴孩。

肩扛手挈向前奔，车价而今也不论。坐上不知何处去，片时客栈似云屯。[213]

少年程沧波记得，“辛亥革命消息到常州，天气已经新凉。那年吃重阳糕的时候，革命的消息正是澎湃到高潮。我们家庭的家塾也停课了。武昌城内的各种传说，震荡了全国。父亲在开封每天有一个电报到家。电文中只有一个‘安’字。到阴历九月底，谣言的传播，几乎草木皆兵。其实常州并没有驻兵，也非形势要害之区。城内造成的恐怖，至今想不出什么原因。后来许多亲戚，纷纷搬家到上海租界避难。母亲的信心也动摇了，后来决定搬上海。……大概在十一月底，……坐火车回到常州。”[214]

沪江大半是侨民，不少高官与巨绅。总为故乡常不靖，好凭租界稳栖身。……

栈房旅馆闹无伦，半是他乡避难人。最苦一班穷候补，归田从此志难伸。

车站门前见一斑，衣箱堆积竟如山。可怜逃难人无数，岂为遨游日往还。

轮船拥挤倍喧嘈，逃命何辞价值高。买办发财行旅苦，鹃声一路浪滔滔。

船票当时仅几成，那知十足客常盈。招商未得分权利，只为连番代载兵。

风声鹤唳岂无因，咸向春申访至亲。可叹寸金田地贵，广滩地铺强留宾。[215]

上海成为主要的避难所，租界尤其人满为患。10月17日，上海工部局董事会的会议记录："领袖领事有函递交董事会，其中包括道台的函件，嘱咐本埠居民要防止流氓无赖窜入租界。伯基尔先生称，捕房在此事上已认识到有密切监视之必要。"[216]

10月24日，"领袖领事有两函递交董事会，其中转来道台的信件，表达了他对租界治安的担心。董事会满意地注意到，领事公堂谳员要求开出对逃跑者的空白逮捕状的申请当即被拒绝"。[217]

同日，朱鹏在上海写信给朱旭初："上海房价贵而无处寻，旅馆每日须十元，现尚日涨。北京、南京、湖北各处移居来已达二十万人以上。"[218]

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记录，仅10月26、27日两天内，就有约三千人从沪宁铁路沿线各城镇来到租界。[219]

上海除银根呈现吃紧外，由于人口骤增数十万，有地皮之家莫不趁机高抬，故地价普涨二成，房租也步步抬高。[220]上海的大小旅馆人满为患，酒楼饮食业无不利市三倍。[221]

10月31日，《申报》"海上闲谈"说："半月来但闻内地人纷纷搬上海，轮船火车拥挤，无隙地。前昨两日，则城里人纷纷搬租界矣。行李之车辚辚不绝，而各城门遂因之竟夕不得闭。呜呼，始犹可曰上海安乐土，今则安乐土者，只租界矣，范围日小，风声日紧。"

等到上海光复，各省逃难者纷至，房租陡增。[222]11月15日，工部局董事会的会议记录：

小客栈人满为患，领袖领事致函董事会，敦促对此不良现象采取措施。董事会决定在答复中指出，在租界内各客栈之所以客满是由于最近难民涌入租界所致。[223]

大批官员和家眷逃入上海租界，有上海本地及周边，包括长三角各地的逃官。11月18日，盛宣怀次女婿冯敩榦到上海后写信给丈人："刻下镇江以下悉在军政府势力范围之内，旧有官吏逃避一空。民军云集于镇江，不日将于南京张勋之兵亦决胜负。苏、常绅富均来上海，婿万无回常之理，只得且住为佳。……惟刻下金融到处闭塞，贫富为难，势同一辙。"[224]

湖广总督瑞澂躲在这里，未到任的四川总督岑春煊蛰伏于此，两广总督张鸣岐也逃到这里……从北京南下的湖南布政使郑孝胥等人纷纷将上海租界当成避难所。11月23日卜鲁斯从上海写信给莫理循："目前上海挤满了下野的总督和官员。"12月26日，有人到北京与许宝蘅谈起上海情状，"各省逃官皆集于彼"。[225]

陈衡哲回忆，她母亲的一个姐妹在革命爆发时和做官的丈夫一起住在湖北。随后，他们一家搬到上海暂住。[226]苏雪林的祖父刚积资升海宁知州，杭州光复，他叫人到上海租界租房子，搬到上海当起了寓公。云南先于杭州光复，她父亲仓皇逃归，也随祖父一同到了上海。[227]曾国藩的孙子曾季融在浙江做官，带着在杭州读书的小辈曾宝荪等举家到上海暂避，并在那年圣诞节前受洗皈依基督教。[228]

普通人也纷纷逃到上海，12月中旬，胡适二哥绍之写信告诉他："大兄与明侄已逃上海，一身之外，荡然无存矣。"[229]

三、金融恐慌

1911年10月5日，武昌起事前，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写信给总税务司安格联：

> 武昌并没有发生事故，但是据说军心很不稳。食品涨价，银元兑价上涨，七十五两银子换一百银元，有时关平银一百两换一百四

> 十六元左右。猪肉这几天以内就要涨到三百文制钱一斤了。[229]

5天后，10月10日晚上，张謇登上“襄阳”轮正要离开时，在长江上回望武昌，只见草湖门工程营一带起火，“火光中时见三角白光”，10点开船，走了20里还能远远看见火光。[230]

10月11日，学生朱峙三逃离武汉时，“闻岸上商家已不用官票，银洋高涨，秩序已纷乱，以后如何尚难逆料”。[232]

同日，汉口的英国传教士计约翰说：

> 据说，让人从一根绳上滑下城墙去开价四千文。有几家商店仍在营业，所有买卖都用银子支付，拒收纸钞。[233]

时在汉口的胡石庵回忆：“时花楼街已有钱店二家被抢，官钱、银元等票，已失其效力。市面大惶恐，……人心惶惶，一刻数惊。”[234]

10月12日，京汉铁路总段长狄地埃从汉口致电盛宣怀：“造币厂被劫。湖北纸币，市上银号，商家概不收用，车站应否照收？请明示。路上员司发薪时所领纸币，请饬收支处换用洋元，以便购物。”

同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致电外务大臣林董：

> 汉口市内清国市区秩序混乱，商市断绝，纸币在市面已不能流通。汉口清国市区内之官钱局被焚，……[235]

同日，苏古敦给安格联写信：

> 纸币已不能用，银元和铜元都缺乏，各银号拒绝付款。……
>
> 目前钱的问题引起最大的困难。昨天整天都可以使用钞票，到晚上革命党停止使用钞票，今天早晨就很难得到现洋，今天下午两点，每一百两银子已经换不到一百银元了。我正接到道台的回信说，已经指示大清银行给我银元，但是他们说连总督要五万元都无法应

付。这样就使得大家都没有钱买食物，苦力拿不到铜元或银角子，就不肯工作。

同一天，江汉关道齐耀珊向内阁等发出求救电：“武汉陆军均变，汉市已有停机，银铜均兑空，目下大慌恐，请速派兵带银、铜元来，以维大局，而救市面。”[26]

当时还在上海的宗方小太郎日记说：“叛徒……发行中华银行纸币，因此各外国银行受到挤兑。”[27]

两江总督张人骏在得知道武昌消息后发给内阁请代奏电：“查前拟借轻息长期洋款五百万两一案，奏奉交部议复，归入地方公债，饬俟谘议局议决核办。现该局尚未开会，而时事万急，断难久待。且饥民载道，更应速为抚遣，……为地方安危起见，……特旨准照前奏由宁先产先行息借洋款五百万两。”[28]

10月13日，计约翰日记说：

> 政府发行的钞票无论在县城里和租界里均不值一文。外国银行拒收。革命党人已发行了自己的钞票，打算收兑政府的钞票。
>
> 应汉口领事团的要求，银行和商会于下午12时30分在总会举行会议，讨论用现存的银元和铜钱支付洋行雇员的薪水问题。……银行的代表称，他们已发电去上海要求拨款，四五天内，约有五十万元可到。纸币实际上仍然不值钱。三天前一张值一千二百文的纸钞现仅值五百文。

同日，汉冶萍总公司经理兼汉阳铁厂总办李维格日记说，汉阳铁厂未失，“目前最要者，发给匠工之工食非现银元、现铜钱不可，无论市已停止往来，无款可挪，纵使有款，银元、铜钱亦无处可兑，即外国银行亦只有锭银，而无银元，此实棘手之事。……一面设法办米，一面暂发匠工每名每日钱一百五十文，以举炊火，且顾目前”。[29]

汉口的日本店员内田顾一也说“纸币不能流通”。[30]

10月11日、13日，汉口交通银行连电向总管理处告急："情形甚危，兑票甚多，各商号外虽照常，实则已停贸易。汉给应兑票款尚口（疑为"多"字），且虑存款来提。"11日清军与民军相互炮击，秩序大乱，暂避洋街，"……汉行欠银行拆款三、四十万，钞票兑款廿万。"请总管理处迅速筹款济急。10月15日，再给总管理处发去告急电：

> 汉口自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陷后，人心大乱，既无长官，又无巡警，汉行持票兑现拥挤不堪，……至二十一日（10月12日）四点钟后，现银固属难支，而来势尤为凶险，只得随各银行一律停市。……二十二日已电报已不能通，昨今风声愈紧，恶耗尤多。

他们采取的紧急措施，一是将紧要簿据等送沪行寄存，以免意外；二是暂借汉口法租界扬子机器公司账房代收信件。为应付给道胜等外国银行的拆款，10月25日又电告总管理处，"汉口银根愈紧，所欠道胜八月底拆款二十万两，又德华八万两，正金五万……，各该银行日来催还甚亟，势难延缓，汉行现款如洗，实已无可应付，请鼎力速筹，由京、津、沪三行设法交付，以全信用而省交涉。"之后，汉口交通银行暂时终止营业迁往上海。[241]

10月16日，李维格日记说："上海银元、铜钱未到，而匠工之工食已推诿数日，无可再延，若一哄闹，则事将更难措手。昨至德商捷成洋行，无意之间闻其有大批银元到汉，设法与之商借十万元……上海谣传同人逃散，故银元、铜钱并未装用……"

这一天到达武汉的宗方小太郎日记记着："被服、粮食仓库亦被占领，并在官钱局铸造银币、铜币，且以中华银行名义发行纸币。"[242]

江汉关税务司、英国人苏古敦可证："革命党人作了一个很糟的行动，即宣布自由流通的湖北政府银票作废。这样13日上午武汉三镇实际上已无货币流通，只有50两的银锭和少量铜元，由于纸票更为方便，银子需求量一向就很少，而且库存也极有限，事实上，9月份兑价已是74—75两换一百元，而不是通常的71—72两。在一小时内，由于没有兑换率，银元的兑换值上升为100元比125两。中国的钱庄银号早处在飘摇之中，此时相继倒闭。信贷

不论大小一律停止。”

10月15日，张玉衡在湖北襄阳听说老河口官钱局封门的传闻，“钱价已到五十八九两，骤退至五十二两。官票不流行，各钱店纷纷兑钱，闻官钱局不能支，只准兑一串，多则不发”。曹太守派人过江弹压市面，维持官钱局，晓谕各钱店通行官票，“道、府、县各出示晓谕七十二行照常使用官票，不准折扣”。10月17日，他得知老河口官钱局未封闭，“与樊城发钱之法同”。20日，樊城各钱店停止兑票。次日，他看见街口张贴官府的告示，包括限定米价示、停止兑钱示。“襄樊各钱店罢市。”10月22日，“乡间兑票者纷纷至城”，24日，他听说襄樊各钱店每日准兑铜元二百串文。[263]

就在武昌出事当天，10月10日，日本驻北京公使伊集院致电外务大臣林董：

> 自湖北动乱消息传来，此间即暗自担心将发生银行挤兑情事。今日，本地各主要清国银行，如大清、交通、信成等行，都一齐发生以纸币兑换硬币或提取存款等挤兑现象。我横滨正金银行支行，自今晨起亦发生提款问题，其数额竟达万元之巨。幸而存款数目亦有所增加，故从结果看来，反而似乎受到良好影响。此外，一向准许向民间发卖之官仓米，自今日起已决定暂停发卖。此种措施，固属政府当局在当前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应急之策，但若长此断然实行，将不免加剧人心动摇。[264]

陆军部军法司长丁士源随陆军大臣荫昌出征，任武汉前线副官长兼总执法官。大军在北京西站出发，正准备开车，站长说盛宣怀大臣前来送行，并有要事相商，欢送军号吹而复止。盛登车时，手持汉阳地图，请荫昌下令，全军攻取汉阳时，如汉阳铁厂能少受损失，赏银10万元。荫昌笑着答应。

盛到了站台上还向着车窗高声说，刚才所言，诸君勿忘。荫昌大声回答：“你就预备钱吧。”此时，站台上的中外记者都听到了“预备钱”这一句，以为荫昌南下，军饷还待筹措，立马通电世界，以致第二天上海、天津、北京、广东都发生了大清银行挤兑之事。[265]



荫昌领军南下时的情景

随军出征、担任行营司令处秘书长即全营总文案的恽毓鼎之子恽宝惠也有同样回忆，盛宣怀登车，手拿汉阳地图，亲自交给荫昌，请下令攻汉阳时，保护汉阳铁厂少受损失，赏银 10 万元，由本人负责照交。盛还对他说了一句："恽世兄，你亦谨记弗忘。"因为他们都是常州人。第二天，即发生挤兑存款。[246]

其实，度支部 13 日就已拨了军饷，绍英日记说："……两镇前往剿匪，应领行饷五十万两，即日开放。"[247]

10 月 14 日，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给各地分行下达"时局危迫，借汇存支暂行停止"的电令。[248]同一天，翰林徐兆玮日记说："金融恐慌已极，钞票钱票纷往取现，信成银行门口以警察守之，只放一人入内，恐人多受挤也。闻信成储蓄尚可支付，大清、交通亦纷往取银，则更无意识矣。"[249]

同日恽毓鼎日记："……市面大扰，银行、钱店纷纷兑取银洋，周转不灵，遂致接踵闭门，钞票竟成废纸，甚至大清银行钞票亦不收用，是无国家矣。"

10 月 15 日，郑孝胥日记："昨日，大清银行取银者数万人，市中不用大清钞票，金价每两五十余换，……银圆每元值八钱余。"[250]

徐兆玮写信给张美叔："京师自闻鄂事，人心浮动，电局更多积压。廿二、三日（10 月 13、14 日）最为震动，以致银行钱铺无不受挤。今日晤映哥，云有大宗银元到京，可以救济，人心亦稍安定矣。"[251]

早上，汪荣宝得到一信，"汉局昨无警电，惟京师市面萧条，不胜杞忧"。[252]

同日，吴宓日记："京师亦已戒严，派兵分驻各所。而市上各银行，日来迭遭倒闭。缘商民人等自闻乱事，纷纷执钞票向钱店索支现银，该银行等一时存款无多，不能应付，故有此现象。余入城时，信成银行及其它钱店门口，皆有多人拥挤喧嚣。巡警群驻，力为排解保护。而虽用现银至钱店亦不能得兑银元，经济界之恐慌盖可想见。"[253]

梅兰芳回忆，"大清银行（在西交民巷，后改中国银行）发生挤兑，门口人声嘈杂，车辆拥挤，都是拿钞票来兑现洋，准备拉回家的。大老富商们更用银元兑换赤金，金价飞涨到四十几换"。

10 月 16 日，度支部侍郎绍英到银行将未到期的存款取出，宁愿损失利

息，当天他在日记中说："此次系因恐有市面扰乱之事，故急备现款以备需用也。"[254]

同日，斐格写信给法国外长说：

> 在北京，一切都还平静。只是在皇宫周围所采取的特别防范，以及在各银行钱庄前伫候的人群，使这些街道显得有些不同寻常。……另一方面，人们拒收大清银行和欧洲各国银行的纸币。昨天，连北京的入市税征收所都强令一位法国商人用银元支付他应交纳的一笔巨款。人们纷纷涌往出纳处换取银元，各金融机构受到猛烈冲击。[255]

印铸局长陆宗舆这一天的奏折说得更清楚，"[武汉事起不过三日]而京城居民均向大清、交通各银行持票争取现洋，至于塞途。以下商号更不待言。两日以来，京城市面之惶恐，人心之摇动，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武汉一带，风闻所有官银行、官钱局纸钞均已归于无用"。他担心南北各省省城商埠如再闻风效尤，有如京师情形，恐怕等不到武汉之乱平息，而全国上下将出现经济危机，"其骚动情状将不下于兵乱"。

10月17日，御史史履晋的奏折附片说："连日大清、交通、储蓄、信成、官商各银行，纷纷取银，大被拥挤。市面买卖非现银不可。其中难免无造谣生事之辈。亦官家诸事慌张有以致之也。"同日，恽毓鼎日记说度支部发银二百万两，以百万维持官银行，以百万发商会维持市面，人心稍定。[256]所说不确，经手人绍英15日的日记说得清楚，"是日进署放给银行接济市面银五十万两"。[257]

10月22日，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赫承先给安格联来电："我私下向汇丰银行经理请教过，据说革命的爆发使金融界受到震动，债券跌落2%—3%，后来又回升1.5%。"[258]

10月24日，莫理循写给布拉姆的信里也预言：

> 财政恐慌就要在北京发生了。国库贮备的白银不足一百万两，可以肯定，它无力支付官员的俸禄。而失信又会加深财政恐慌。[259]

同一天，日本公使伊集院电告外务大臣内田：

……惟自事变发生以来，一般人心动荡，在所难免；而米价上腾，百物昂贵、银行挤兑等现象，则各地皆同。[20]

10月26日，徐兆玮早晨起来，到东和合换钱，听说洋价昨夜涨至八钱一分，多有整百累千兑入者。他更动了南归家乡常熟的念头。[21]

25日，恽毓鼎听说信成银行关闭，又到了恒裕。27日午饭后，他去邮政总局取了现洋695元。当天晚饭后，他去找民政大臣桂春，商量安定市面、流通钞票之策。他们是同年进士。第二天，当他听说已商借奥国巨款4000万两，“以供军需及维持京师市面金融界之恐慌”，自认这是“昨夜晤商桂大臣之效也”，加上“外郡银元、铜元蜂涌运京，市面当可安定矣”。[22]

吴宓日记这一天说：“而北京市面恐慌尤达极点，汇兑亦几不通，诸人皆告窘乏。”[23]

盛宣怀的次女婿为法部候补员外郎，早就想南下却筹不到路费，11月9日离京时只有300元，不够路费，到天津用金饰向交通银行抵借了450元。[24]

11月3日，总税务司安格联给上海的思贤理写信：

袁世凯任总理大臣和皇室的屈服使局势缓和了一点，希望北京和天津不至于发生骚乱。不过今日不知明日事，谣言还是很多。只希望贸易能够恢复，财政紧张局面逐步缓和下来。财政混乱需要费许多事才能澄清，但是满人中唯一最能干的载泽被迫去职，度支部又少了一个好首脑了。[25]

11月4日，徐兆玮取道天津南下时听说，“[天津]金融窘迫，更甚于北京”。[26]

直到12月中旬，受派为南北议和北方分代表之一的冯耿光回忆，南下前夕，“庶务处送来每人一张银额二百两的大清银行支票，作为旅费。当时清

室动摇，市面上已经不大相信银两，因此现洋的兑率高得多了，记得二百两银子原可换到二百八十元，当时我们只换到二百三十元。”[267]

造成金融恐慌的原因，莫理循在10月24日写给布拉姆的信中说得很清楚：

> 摄政王、庆亲王、那桐和旁人大量提款使政府银行处境困难。庆亲王从大清银行提款二十五万两白银直接导致了我在15日电讯中所报导的危机。[268]

同一天徐兆玮说：“此次商民之惶恐，谣传庆王府以现银廿万易金，金价为之骤贵；京官以银易洋元，洋元亦贵至七钱八分；又闻摄政王之舅爷以大清银行股票出售，以致谣言益甚，亲贵之所为如是，可叹也！”[269]

熊希龄写给朱其慧的家书说：“北京王公贵人，一闻警耗，纷纷取现银换金镑，为逃走计，无耻已极，无怪政府之失败。”[270]

早在10月15日，吴宓日记即说：“京师经济界恐慌之原因，实因政府诸大老皆谋自逃之计，庆王首向大清银行提金币三十万两，他大臣亦略稍称是，人民见之，不知事果如何危急，纷纷效尤。而各大银行以是而皆十分空虚，故其结果遂致如是云。”[271]

亲贵一方面提现洋，一方面到外国银行寄存贵重物品。梅兰芳回忆，“……花旗、汇丰、道胜、正金等外商银行以存款骤增，对新存户采取不付利息的办法”。曹汝霖记得，“亲贵中之富有者，则以金钱宝钻之类，寄存英商汇丰银行，因不明手续，存于中国之买办处，收据亦由买办所出。迨事平往取，洋经理不知有此事，华买办不知何往。亲贵大受损失，买办大得其利，此亦可证亲贵们之毫无常识也”。[272]

10月24日，斐格给法国外长写信：

> 把金钱存进欧洲人开办的银行的官员很多，他们觉得把钱放进这些银行比放在其它地方好，不会遭到抢劫。[273]

英国传教士苏路熙回忆：

辛亥革命的时候，我十分担心温柔而有教养的满族妇女的生活。我担忧她们会缺乏日常的食物，特别是士兵们会抢劫了她们的家，抢走了能拿走的一切东西。当罗太太［其丈夫曾是山西巡抚］偷偷告诉我她悄悄把钱和珠宝埋在地下，我请她把钱放到外国银行，这样才安全。

“士兵还会来，烧了你的房子，挖出你埋的那一点钱。”

她担心的不是钱，而是一幅古代名画，是一位远在四川的朋友托付给她的。所以罗太太和我一起去银行，把小金块和金叶存在银行。

她告诉我：“金叶比金块值钱。”

还有珍珠、英国的金表（一位领事赠送的礼物）、各种各样的财宝和传家宝。因为这里用的是我的名字，银行工作员给我一个保管收据，我自然交给罗太太。

她不顾我的反对，还给我，坚持在我离开北京前，收据归我保管，包括她的房契。

我生平有许多自豪的时刻，这便是其中之一。……而在这里，在北方，一位高官的妻子要求我保管她在地上所有财富的凭证。[274]

金融的恐慌不仅出现在武汉、北京，上海、苏州、南京、镇江、常熟等地都大受影响。10月1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致电上海道：“苏沪银根颇紧，殊妨市面。沪市近日情形若何？望嘱商会速出维持，以免自扰。”

次日，他致电邮传部：“苏省自闻鄂警，市面颇为岌岌。近闻车站、电局均不用官局钞票，且排拒龙圆，只收英洋。似此举动，诚恐扰乱现状，牵动全省市面，请严密电饬各站局，所有钞票、龙圆，照常通用，勿得自扰，致滋恐慌。”

10月19日，常熟有人日记说，邮传部已电令沪宁路局、电局一体遵用官局钞票、龙圆。上海电报局表示，“当即遵电各分局，将钞票龙圆一律收用”。[275]

10月16日，两江总督张人骏接到苏州巡警道吴肇邦来电：

苏省安谧如常。惟因鄂事，银根紧急，群向裕宁索取现洋，极其拥挤。经邦派员督警弹压，幸未冲突。近两日已兑出洋圜十余万元。今日由藩库拨借洋十万元，明日当可支持，日久恐难为继。乞设法拨济，以维市面，而靖人心。

同一天，张人骏复度支部、邮传部电：

计连日运沪银元，已达二百万以上，均派人护送上车，平安无事。惟值此多事之秋，民间忽见大批官银接续外运，由是谣言四起，裕宁官钱局大受影响，持票兑现者纷至沓来。虽已筹拨现银，终恐应接不暇。国设、省设未能户晓，裕宁同属官家银行，一经失信，国家银行亦将并受排击。市面动摇，糜烂即在目前。务乞通电沿江及上海大清、交通各分行，与裕宁总分各局，互相联络，随时接济，以维大局。此间造币分厂存银。万请勿再提运，俾定人心，而保信用，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再，该分厂尚存银尚多，并请先借拨五十万，暂济眉急，并恳。

他怕度支部不管用，又发出一封致内阁请代奏电：

……裕宁官钱局大受影响，持票兑现者纷至沓来，势将被挤。虽已筹拨现银，终恐应接不暇。若市面动摇，糜烂不堪设想。……查宁省造币分厂所存现银五十万两，已由裕宁总局先行借拨，暂救眉急。该分厂尚有造成新币拟请敕下度支部，飞饬该分厂，尽数拨交大清、交通二分行及裕宁总局，以备应付钞票之用。一面出示晓谕，通行新币，以保信用，而安人心。

第二天［17日］，他给江苏巡抚程德全连发两电：“因鄂乱风潮，裕宁吃

紧，钞票兑涌。前电左藩司已拨借十万元应急，感甚！而分局林立，同时挤迫，虽洋债五百万已奏准派员签字，缓不济急。仍乞饬苏藩再借十五万元，交苏裕宁转济就近各局，洋债交到即还不误。事关大局，乞公大力维持。”[276]当时的体制，江苏省分为宁属、苏属，分归总督、巡抚管辖。

同一天，南京交通银行（简称宁行或陵行）向总管理处报告：“自闻鄂警以后，市面骤形恐慌，洋银俱缺，提现纷纭，加以沿江各埠随时吃紧，申、镇现货亦无，来源既竭，人益惶惶。现钱业已议暂不应付存款，而市面流行之钞票，势难止兑。”[277]他们只好向张人骏求救。当天，张连发两份致内阁请代奏电：

“窃鄂省事起，沿江一带市面紧急，风潮所及，裕宁官银钱局大受影响。……惟市面自发行钞票以来，银元日少，洋厘愈高。平时钞票畅行，所放军饷搭用居其多数，现在票不信用，而新币尚未通行，非多备现洋，无以流通市面；更无以镇定军心。沿江一带皆设有裕宁分局，均须总局时时接济，而上海银元亦极形缺乏。洋盘继长增高，如加价购入，吃亏甚巨。且市侩奸商囤积居奇，更恐有银，无从购洋，非另筹办法，不能支持。查广东今年因革党起事，钞票失信，曾奏准添铸旧制银元有案。宁省现因鄂事牵及，钞票情形相同，拟请由裕宁官银钱局筹备现银，交江宁造币厂，即日代为附铸，随时发用，以顾大局，而安人心。俟市面平定，即行停铸。”

“窃照裕宁官银钱局被挤，已电奏请拨借造币分厂现银及发行新币在案。现持票兑洋者户几为穿，银元本属缺少，加以风声所播，或藏匿，或外运，即立时罄尽。设法搜罗，竟无从购买。以现银兑票，均不愿领取。

刻下水陆新旧各军，及浦口江防军月饷，共计数十万，均须放给，向来搭发钞票居其多数，军饷为计授所关，零星日用以现银为不便，必索取银元。若应付稍迟，势必至于哗噪。闻汉口之变，亦由军士向交通银行取银而起，言之寒心，万一裕宁被挤失败，则全局不堪设想，且交通分行亦同受风潮。此外商办银行及各钱店，亦均岌岌可危。人骏不避专擅之嫌，未及候旨，迫不得已饬造币分厂先拨新币五十万元，分交裕宁总局，交通分行应用，以资补救，而定人心。”（10月14日，张玉衡在襄阳也听说，“因营兵在省换饷银与钱店争闹，被警察拘执，故尔起事”。）[278]

50万元新币，其中12万元分给南京交通银行。[279]

苏州吴肇邦再度向张人骏报告，“今日向裕宁持票兑洋仍形拥挤”，希望他电告程德全设法维持，以免酿成事端。[280]

10月16日，苏州税务司师范西给安格联的信中汇报：

“由于长江上游的革命运动，这里当然也很激动，不过除了金融市场几乎发生恐慌以外，其它方面都还平静。人民无疑是同情革命党人的，看来如果南京反正，这里也会照办。

中外银行的钞票都没有人要，裕宁和裕苏两家官银号都发生挤兑。”[281]

同一天，连中学生叶圣陶都听说，“近日银根甚紧，银元缺乏。裕宁、裕苏两局钞票遂失其效用，经济界大受其恐慌。如此情形乃属可危，……”[282]

常熟也有人在日记中记着，“吾邑银根奇紧，各典铺日须八九时开门，有来质当者，至多一二十两为率。东乡花业，每届八月异常拥挤，今亦大半停止交易。布业需款甚巨，因各庄不能应付，议由公所向五家钱业担任，每月支出洋一千五百元，维持布业已出之布，请县出示停缓一月将票归结。乡人之负米求售者，各米行亦暂不籴。”[283]

两天后，常熟因各店铺周转不灵，“同行集议自二十二日［10月13日］起改用现钱，概不记账。钱庄由商会请县出示，劝止各存户拨款：‘据商务分会函称：义隆、立裕等十庄到会，因鄂事未平，苏申来函均称停止收放，而各存户争先拨本，来源既绝，放出者一时不能遽归。环请出示劝喻各存户等，切勿误听谣诼，自相恐慌，争相拔本。常昭钱业，素称殷实，本二县为维持市面起见，如有地痞、棍徒暗中唆使，定当惩治不贷云云。’”[284]

10月17日，程德全致电张人骏：

“裕宁苏局钞票受挤，先由藩司续禀，尊电再拨十五万。查苏省库存现款，本不宽裕，除拨借裕宁及维持钱币外，所存无几；各营薪饷，所关紧要，自应留作预备。近日复准度支部急电，饬拨制造局十万两，又不能不分别应付。苏市恐慌情形，万分急迫，全城人心，赖有此少数库存现款，尚可稍示镇定，否则扰乱立见，不堪设想。裕宁行苏钞票，数尚不多，而各埠纷至沓来，难予限制。”

同日，他电告上海道，据镇道台来电，“现洋一空，织户万人停机待食，势将酿事。请电沪道筹借现洋十万元，即日车运，分交大清、裕宁接济，将

来由道解还。”

也是这一天早上，常熟的各花行一律停办，“常庄银根各不来往，乡间适逢新花上市，由此租事搁住……”10月31日，远在北京的徐兆玮接到家乡25日来信，得知此事。[285]

> 市面金融大恐慌，累他华股各银行。咸持钞票来提现，门首人多站两旁。
>
> 风潮暂息变重来，竟使行门不敢开。竭力维持才复旧，信成票尚费猜疑。
>
> 大清户部尽消沉，昔日交通不可寻。只有通商称独立，汇丰还被众谣侵。
>
> 裕宁还比裕苏强，一块犹存半块洋。最是裕皖人不要，钱文数十费商量。[286]

此时，上海现洋出现危机，10月17日，“上海现银顿乏，信成、四明、兴业三银行暂停兑换”。[287]

当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向外务大臣内田汇报：

> 今日，对清国银行之挤兑情形更加紧急，以致清国商办银行，如信成、四明及浙江银行等终于宣布今后一周之内停止兑现；清国各钱庄几已完全停止营业，信用扫地。外国银行，自昨日来以纸币兑现者骤然增多，但因汉口地区发生变乱，加以当地墨银缺乏，而一般清国人为准备避难而更加急需现银所致。为此，今日墨银牌价腾至八十二两，且有继续上腾之势。日来为应付本地市场恐慌，正由南京运来现银四百万两。其中五十万两业已运到，已由交通银行向外发放。今晚商务总会开会讨论，对其不足之额，将请求苏州巡抚以官银通融，一般交易几已完全中断。[288]

喇伯第在上海写信向法国外长汇报：

……然而政治形势也引起了新的金融危机。纸币在汉口已不再通用，各欧洲银行不得不给它们的支行送去大量银洋。从而使这种货币在上海市场价格飞涨。另一方面，湖北政府的纸币已出价到二千五，所有的中国银行都已被它们的主顾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想把手中的纸币银票兑换成白银。大批中国公众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惊恐。各银行勇敢地承受了这次冲击，大清银行一家昨天一天就付出了三十万块银洋。但是，不管那些银行有多大的家底，它们不可能长期顶住这样的恐慌。所以它们向外国银行呼吁，请求帮助，同意推迟短期贷款的偿付期限。我们希望就此意义上能够达成协议。然而中国人已经惊慌得连外国银行的纸币都不相信了，他们大量购买黄金日元，三星期内当有二百万块日元投放上海市场。[28]

《民立报》17、18日的报道说："上海一般有钱人为恐鄂乱波及，换钞票、提存款、购金饰，以保值自己的财产。不仅大户竞提取存银，即贫家亦持票兑现，故一方面造成银行挤兑风潮，一方面造成银拆抬高，洋厘放大，钱串缩小的情形，以致兑者蒙受损失，大吃其亏。"[29]

信成、四明、浙江等银行都在门口张贴告示：凡持票取现者暂缓一星期给发，信成更标明已赴香港采办现洋。浙江与业银行门首也贴出告示：乱事影响，现银缺少，凡提储蓄存款数在五十元以上者，先付三成，汉口、杭州各埠票银暂缓收兑。至于外国银行及大清、交通等官立银行依然照常兑换，惟较平时忙碌数倍，捕房深恐人多生事，特派探捕前往照料。[30]

10月18日，程德全给张人骏回电，无款可借："裕宁钞票拥挤，大局攸关，自应竭力维持。惟苏省全市危迫，库存现款无多，将有杯水车薪之虑。……宁苏一家，惟有体察情形，筹拨应付"。

10月19日，程德全致电度支部：据上海商董到苏州面告，"沪市危迫，朝不保暮。鄂乱虽只一隅，而风声所布，全国震动，危象迭见。鄂事吃紧，政府正在全力注重军务。惟上海为商务枢纽，金融状况又为国家人民命脉所关，万一力尽溃决，长江一带不待暴动，已无善地。……"[32]

此时，苏州的情况也很危急。这一天，日本驻苏州代领事池永电告内田

外务大臣："刻下苏州尚无纷扰，但警戒森严。江苏巡抚已将新军所有弹药缴收，是以谣言纷起，官方银行因遭挤兑而异常紧张。"[23]

10月20日，张人骏给程德全电中说，镇江"以银根奇紧，市面现洋一空，岌岌可危"，求借银十五万两。镇江为南京、扬州的财政机关，镇江市面吃紧，则南京、扬州大受影响，不能不设法维持，以保大局。再三计议，计划由裕宁分号续解银三十万两内先分拨十万，以救镇江的燃眉之急。但是须在11月10内分期归还。他给求援的瑞瀓复电也说："此间市面震动，银行、钱局大受排挤。搜罗银元应付钞票，业尽罄尽。饬厂开铸至今始蒙度部允准，缓不济急，正深焦灼。至财政困难，近日尤甚。"[24]

在10月17日举行的苏州商务总会常会上，各钱庄请求拨库款四十万以济市面，程德全只答应发廿万。[25]

10月20日，苏州叶昌炽日记："沪上商市糜烂，铜山西倾，洛钟东应，风波之恶不在兵祸，而在金融。"23日，他听说上海市面因为有江宁新币，"风波稍定，此间金融仍无流通之望，机匠已什百成群，铤险可虑"。[26]

10月25日，喇伯第自上海致信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苏州的安宁被九千失业织工所扰乱。经济形势很糟。巡抚给各银行增加了十五万两银子，让它们能偿付给一部分债务人。人们担心民众不久就要攻打各衙门和学校了。……"

10月26日，程德全给张人骏的电报说："苏州商会呈请拨借司库现币四十万元……减半借给，归钱业领取，维持典当。并议明裕宁钞票各典一律通用，当本以五两为度……各缎庄以资本不继，相率停工，机匠无所得食，蠢然思动……"[27]

两天后［10月28日］，苏州税务司师范西给安格联的信中汇报：

> 上星期末局势确实紧张起来。银元缺乏，丝织业和玉石业实际上停业，大约一万二千名工人有失业的危险，他们决定在23日罢工闹事。……不过绸缎出口几乎全停顿了。金融市场好转，钞票开始有人要了。[28]

10月29日，苏州叶圣陶日记说：“现在金融界受极无谓之大恐慌。现银缺乏，虽由商会发出一种不换纸币，亦未能通行。富贫之家尽叹无钱，而各业亦因之而阻滞，再隔十数日，将至不堪设想。所可望者，只有我人先自起事，遥应鄂军，鄂军中之经济固甚丰裕也。且观各处之已为鄂军占者，军政府皆极注意于维持市面，故知苟如此则必有望焉。”[29]

10月20日，喇伯第写信给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

……由于湖北的革命运动，导致一场金融危机已在上海爆发。各中国银行已无可能应付客户取款，决定收缩支付，并相应地要求外国银行准予延期，尤其是关于那笔估计达八百万两银子的借款。银行只有等逐渐售出资产后才能重新开始支付。估计资产是足足有余的，但在这期间，银行业务将完全停顿，从而导致的损失将十分巨大，尤其是因为这种局面还要延续下去。

各外国银行要求帝国政府紧急介入。它们强调指出，引起危机的原因绝不是因为投机或本地商界的错误，它完全是因政治事件引起的惊恐造成的，中国政府对此应负全部责任。

为了挽回这个局面，政府只要把目前一半放在南京，一半放在上海的“帝国银行”银库里的四百万新银元存放在上海的各家中国银行就可以了。这一措施可以结束危机，因为这个危机仅仅是由于货币减缩引起的。[30]

第二天［21日］，张人骏与程德全联名致电内阁及相关各部，言辞恳切：

鄂事猝变，长江一带谣言四起，市面动摆，银根紧急，影响及于沪市；其迫促情形，较去年夏秋尤甚。所异者昔为奸商架空牵动，今为现银元缺乏受挤。

汉口目下暂已不可收拾，若再动及沪上机关一塞，沿江大变即见，此鄙意所宜出全力以图之者。顷据上海总商会绅董来宁告急云，华商银行、钱庄因银元缺少，议停付钞票七天，期限至九月初三日，

为时已迫。钱庄向洋商折票数在八百万左右，约信十天，期亦将到，非有四百万之现银元从速发放，势将立涸。坚请以华商银行实业抵借一百万元，巨商叶成志实产抵借一百万元，南北市各殷实钱庄互相担保，请放二百万元。定期押款，以六个月放款，以三个月分别归还。再，上年由沪道向汇丰保借维持二百万两，已借仅九十万两。……

……惟际存亡危急之秋，东南大局所系非轻，迫求钧阁列部，切念时艰。商务所在，人心所系，国步所关。且使银根一绝，军饷立竭；哗溃事起，莫知所措，有非人骏等所忍言者。主持速复迅办，引领以待。

当天，他们接连收到上海道两电：

“昨夜商会总协理、钱业各董，并中国官商各银行经理仓卒来言，现银奇绌，钞票风潮万紧，市面岌岌，请转商通商银行暂将江宁币制局寄存新币，准以实在产业抵借，发兑应急，情词迫切。

……今日四明、信成、兴业、浙江四银行，因连日兑票太多，现款一空，不及运输接济，暂行停兑数日，声明俟现洋办到，再发兑钞票。

查沪埠工厂林立，工匠数十万众，厂家按日发给工资，全恃银行、钱庄为之转输。今鄂汉兵乱，警耗频传，市情如此恐急，非立予维持，恐有意外之虞，势将不可收拾，危险万状。向来别处遇有军事，每以上海为转运饷需一大机关，尤不能不设法保全，免坏全局。……”

“自鄂汉兵乱，各埠汇兑不通，沪市人心惶惶，连日争提现银，并以钞票换现洋，搜括一空，风潮极大。银行、钱业以变起仓卒，未及预备，均将挤倒。沪关为经理财政总汇，值此有事之秋，金融如此恐慌，非特各省关不将洋款解来，即沪关遵照商部奏案存放各庄号生息之公款，一时亦难提回。况外国各银行既允缓收拆票千万，暂救危急，刻下彼要我缓提公项，维持市面，岂能背道而驰！惟赔款洋债为数太巨，偿期甚迫，办法必须速订，非由大清银行速运备现银数百万在沪应急，洋款必至贻误。”

他们即将两电合并，电告内阁。

此时，远在北京的徐兆玮也通过报纸等途径得知，“上海金融机关甚窘，洋厘涨至七钱八分，与北京同，且有纷纷迁移者。幸而即平，商家之损失已不少矣”。[301]

10月22日，张人骏发出致内阁万急电，正与沪上洋银行议借轻息长期洋债五百万两，然而，除了归还重息的短期债款三百五十万以外，加以清付利息，所余挪支军储、赈粜之用已属无几。而在在需款，他请求，“现华洋信用尚在，趁此时再向洋行加借二百万两，即以已还腾出之官产为抵押”。[302]

上海城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商董沈缦云等为维持市面，除了拜会上海道台，还致电江苏巡抚转告度支部，请暂借该部寄沪的银币四百万，以为周转。另电邮传大臣盛宣怀转度支部切实维持，盛回电，已会商度支部核准照办，并已电知上海大清、交通两银行遵照，作为抵押款流通市面。又电沪道转知商会一律维持。[303]

上海道刘燕翼鉴于上海居民持有钞票者无不纷纷前赴各银行兑取现洋，转致金融呆滞，市面因此震动，特致函新关税司，不准装载银洋运往外埠，以保上海本埠现洋之流通。据税司接自香港电称，日内将有百万现银现洋运沪接济，特函致沪道移请商会传论各商知照。[304]

10月24日，朝廷要张人骏迅速派兵前往武汉，他给内阁请代奏电诉苦：“刻下各库罗掘已空；沿江官银号、银行因钞票被挤，均将失败；经多方筹济，始暂获保全，现上海银根断绝，各庄号已停止交易，七日宁省奉旨准借之外债五百万两，洋行因鉴于沪市情形，又因鄂省乱事，均意在观望，不能迅速成议，提取现银，此财政万分困难之情形也。”[305]

当日，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

> 广肇公所及本埠钱业同业公会来函，希望工部局发一布告以减轻由于金融市场，特别是银元市场的混乱而造成之恐惧。总董认为此类布告完全无必要，董事会普遍同意此一看法。但在摩尔先生建议下，董事会决定发布布告晓喻难民等人，工部局正采取各种可能措施以防止由于长江各省起义而造成在租界内之骚乱。总董　德格

雷总办　莱韦森[306]

同日，朱鹏从上海给朱旭初写信说："上海市面日坏一日，叶澄衷家已倒，义昌成亦在内，兴业、四明、信义三银行亦被挤。四明、信义已闭门，暂停交易。兴业日日光，现已出现二十余万元存款概不能提，其得以不倒者，皆蒋抑之一人奔走保护之力。"[307]

10月25日，喇伯第给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的信中继续写道：

> 上海的形势也一样。从金融观点来看，局面已有所好转。帝国政府给各华人银行使用的那二百万两银子使它们得以应付契约。一家曾中断支付的银行昨日恢复营业。……
>
> 道台在谈到金融局势问题时，他问我对宣布强行流通纸币的适时性作何想法。我回答他说，这种方法绝不会有效果，它只会增加惊恐。实际上，上海并不缺少银子。目前上海有二千四百万两银锭和八百万块银元！坏就坏在这些银子根本就不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也就是说不在本地的四十几家华人银行钱庄里。这些银行实际是与外国银行签订见票即付的借款，再把它们取得的银子以到期偿付的方式借出去，以至一旦出现恐慌，它既还不出外国银行的债，又付不清中国债权人的款，不得不到处求告，宽延期限。所以，纸币和"本地汇兑通知书"的强制流通对这种主要是由缺少法律而引起的情势是绝对不会有任何裨益的。[308]

金融恐慌波及上海的典当业，南北各典当以民心惶迫，由典业董事公议，当物至多以五元为限，如想多当则不允。有些典铺甚至暂停当衣物，使一般小市民无以周转，生计更为窘迫。[309]

10月30日，郑孝胥到上海的次日，以大清银行的汇票取银而不得。[310]

上海交通银行（沪行）在各分行中本来实力最雄厚，此时处境也十分困难，10月31日总管理处派来的视察员报告："沪行拆款九十一万，中有大清廿万、正金四十万、东方廿五万、汇丰六万。拟将正金先还一半，似可办到。

大清从缓。余则迫不可待。”汉口银行经理到上海，要求总处视察员转商沪行代筹道胜、德华、正金三行八月底拆款三十三万两，沪行也无力承诺。等到上海光复，虽还在勉力维持营业，但停止了埠际间的汇兑。[311]

11月6日，《时报》刊登《中华民国军政府告示》：

> 近来上海市面恐慌，达于极点。然目前急救之法，惟有流通钞票，使全市行用，方可补救。查得上海信成银行以商办合资有限公司开办最早，资本充足，章程周密，办事各员诚实稳妥……而该行钞票，现准由本军政府完全担保，以期畅通无阻。如庄号及店铺，或有挑剔，以致阻碍行用者，本军政府亦以违背法律论。其余各华商银行钞票，如兴业、四明等亦一律通用。

10月25日，南京交通银行报告总管理处：“日来又有九江失守之传言；江赣接壤，人心愈觉惶惶。陵行存在申、镇之银，因市面呆滞，各庄不能提现；即票价虽高，亦不能汇划，一时难以活动。所放借押款到期，目下亦复不能应手收回，倘兵事再迁延不定，商业殊不堪设想。”[312]钱商典肆都于这一天罢业。[313]

在江阴任小学教师的同盟会人章砚春对此记忆深刻：“彼时最棘手者是地方财政。金融机关已完全停顿，内外汇划不通，市上银元绝迹，仅有少数铜元、银角流通，维持零星买卖而已。纵有公共机关平时储存生息，到此时也是一概调拨不通。”[314]

11月8日南京战事发生，南京交通银行的重要簿据已移存上海租界，等经理杨万逊逃往上海，宁行陷于瘫痪。[315]难怪程德全12月6日以江苏都督身份到南京时，发布的第一个告示就是：

> 本督现已莅宁，首在安民保商；设法维持市面，开设江苏银行；钞票流通行使，金融自无恐慌；典当钱业铺户，务即开市如常；如有造谣生事，查获惩罚照章。[316]

11月14日，镇江戴乐尔给安格联的信中说：

目前我只好接受存票，准商人用从前的存款抵付税款。市场上没有纹银，我无法征收现钱，也无法取得上海汇票。[317]

11月22日，盛宣怀后妻庄畹玉给盛宣怀的信中抱怨："上海市面大慌，西人全不管。"[318]

12月8日，徐兆玮在常熟写信给京中友人："此间目前安谧，……商不放帐，农不输租，金融恐慌情形，与京津无异。"[319]

1912年1月31日，《时报》刊登沪军都督告示：禁止向汇丰银行挤兑，有人在上海散布谣言，称该行天津等处已摇动，人民纷纷向该行提取存款、兑换钞票，影响及于市面极大。要求勿为所惑，随同附和者以摇惑人心治罪。

金融恐慌波及全国，东北也未能幸免。

杭州，10月14日，日本驻杭州代领事池部致电外务大臣林董：

武昌发生变乱，警报传来，给此间商界带来若干恐慌，人心稍形不安。本日上午，兴业银行及其它一两家银行曾发生挤兑现象，均已照数支付，平安无事。但城内已实行严厉戒严。[320]

10月16日，税务司铁士兰写信给安格联汇报：

老百姓中间流传着很多谣言，据说本城有许多革命党或者同情革命的人，正在等机会。

兴业银行一般称为铁路银行，昨天全靠大清银行和浙江银行的帮助，才免于倒闭。现在到处缺钱。[321]

10月25日，喇伯第从上海给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的信里说：

在杭州是硬货币紧缩，它的后果是纸币持有者的惊慌，使得形

势十分紧张。

九江，10月16日，税务司穆厚达给安格联写信说："商业实际上停顿了。……各种纹银和银元都极缺乏。……"[122]

到12月16日，日本汉口领事馆情报第54报，由八木书记生提供：

目下当地市面上，纸币绝难通用，现银流通又受极大局限，市场大宗交易仍然困难。当地大宗输出品如麻、洋灰、纸等已有小量开始运出。闻当地革命军目下正在上海印制新钞票。

1912年1月4日，八木书记生报告"九江事情"：

革命变乱后，江西省内地物资交流，一时完全停顿，民船及中国籍小轮船多为运送兵员及军需品所征发，大宗交易绝无仅有。至最近则占江西输出大宗之各货，如棉花、茶、纸等货物逐渐开始盛行输出。但市内因中国钱庄大商人逃难未返，犹未开市，故金融上只靠太古等公司之买办等所兼营之汇兑业务周转。[123]

成都，10月16日，年轻的法国外交官儒勒·乐和甘写信给父母：

现在在成都，物价变得十分昂贵。我们欧洲人的钱还够花，可对于民众来说，抬价就是件十分残酷的事。再也找不到煤炭和木柴，一些行政机构徒劳无功地收购。煤和柴的需求量是最大的。……钱变得罕见：我们从能提款的银行里把钱都提出来了。官方办公室也停止发薪。[军饷也没有发][124]

宜昌，10月17日税务司葛礼给安格联写信：

此间局势很危险。宜昌全城银元奇缺，人们拒收钞票，认为不

再有什么价值了。前几天大清银行有库存银元时，曾尽量把钞票兑现。现在库存银币已经兑完，不得不关门停业。湖北省银行也已关门。[325]

东北营口、大连，10月17日，日本关东民政长官白仁致电内田外务大臣：

因受湖北地区革命动乱之影响，营口、大连两地经济界颇呈恐慌状态。

营口：过炉银价暴跌，自十六日晨起，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及官银号均遭挤兑，门前拥挤不堪，巡警用刺刀警戒。截止同日下午四时止，兑换款额为：大清银行十二万元，交通银行二万元，官银号五万元。大清银行除现存银币三十万元外，又于当天夜间急向奉天请领二百余万元。

大连：本日大清银行遭到挤兑，付出银币二十五万余元，兑取人数约达三百人，一时混乱非常。据闻，该行将于明日向营口方面调拨银币三十万元。[326]

营口交通银行（营行）也在向总管理处告急："营市恐慌，取现者日形拥挤，须筹备。所有存在津行三万左右及路局之五万，均已筹划在内，始可抵制，否则万难保全信用。务望转嘱津行，作速归款，以顾大局。"他们不知津行此时同样在求救告急。[327]

长春，10月18日，日本驻长春领事松原给内田外务大臣电：

吉林省发行之纸币即官贴，两日来行情不振，几致无人愿意接受。金融窘迫，市面交易萎缩，大清银行等已遭挤兑。一般说来，清国人只要个人生命、财产不受威胁，对于革命等等向来漠不关心，因而尚未发生格外动摇迹象。……[328]

10月19日，熊希龄在盛京电告北京盐政院晏海城：

鄂变起后，人心动摇，银根奇紧，此间大清银行及官银号，无不受挤。本司承办淮南借运之盐，垫款太多，颇难周转，且长江情形紧迫，万一中途有阻，淮商既未接收，此项亏损从何取偿？[329]

长沙，也是10月19日，日本驻长沙领事大河平给内田电：

关于湖北事变，本地谣言频起，人心惶惶。自大清银行以次各银行及钱庄均遭挤兑，纸币流通，殆已断绝。……[330]

厦门，10月20日，法国领事陆公德致信驻华公使馆代办：

湖北发生的严重事件自然在这里引起强烈不安，但它只是在商界才有反响。另一方面，民众却十分平静。……

骚乱的消息和叛乱分子作的声明说政府银行的纸币将不再通用，引起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纸币持有者们的恐慌，昨天和前天，他们急急赶往这两家银行，要求把他们的钞票换成银元。交通银行不得不找香港银行借支硬币以满足那些要求。两家银行今天发布一份公告，要公众冷静，说持有纸币的人根本不必害怕，恐慌是不可思议的，任何去找银行出纳处的人都能立即换到与他带去的纸币等值的白银。

这几天已经相当高的银价明显地上涨了，它已经从一元钱换0.77涨到了0.73两。

商业交易已缩减到最低程度，已经几乎完全停止了往北发送货物。[331]

沙市，10月21日，税务司葛云森给安格联写信说：

17日人心开始恐慌起来，铸造湖北银元的机构官钱局发生挤兑。［我立刻将公款送到海关银号去兑现。］银号负责人当天回来

说，官钱局停止付款，各办事处都被乱民捣毁；大清银行还在，但也停止付款。[532]

芜湖，10月23日，芜湖关税务司梅尔士给安格联的信说：

……由于缺乏现款，贸易停顿。刚运到十万元，可以稍稍缓和局势。

到12月5日，芜湖因现金缺乏，连当地官员开支都困难。[533]

广州早就局势紧张，7月27日，粤海关税务司梅乐和给安格联写信："广东公立银行发生挤兑，据说兑出了约计六百万元。"10月25日将军凤山被刺，全城惊惶不安，10月29日梅乐和给安格联写信说："金融市场也非常混乱。"[534]这个本来金融活跃的城市，仅广州交通银行（粤行）在市面流通的纸币就有60万元，却也挡不住人心的摇动。11月3日，粤行向总处报告："此次风潮，全国影响，人心动摇，实非寻常。固非一、半月可以荡平，更非数十万所能济急。粤行自前月二十起，提存换现者纷至沓来，于今迄未少息。市面短绌，周转不灵，直至危急万分。……今粤行张罗殆尽，力竭智穷，大有朝不保夕之势。""初九［10月30日］、初十［10月31日］两日，……商店俱停，官军戒严，大清行总办先走，同事亦走，惟粤行仍开门换票，同事一律挽留。十一［11月1日］、十二［11月2日］两日，街上亦极寂寥，现曾略有交易，而'土匪'四处发难，人心仍未定也。"撑了几天，粤行只能暂停营业，于广州独立后迁往香港。此前，簿据等已移存香港、沙面。[535]

济南交通银行（济行）10月24日向总管理处报告："凡使用银洋券者连日均纷纷取现，拥挤不堪，甚至官银号因争取钱票，踏死一人。各存户亦不论活期、定期，均来提取，或买金叶，或移送德国银行，情形如此，殊为可怕。刻下官银号抚台虽竭力维持，观其形状，大有不支之势。如果挤倒，则街市必出大乱。因官银号钱票太多，均在穷民之手，难保'土匪'不乘机滋事。人言如此，各有戒心。"

11月4日，山东巡抚孙宝琦致电内阁："加以金融之恐慌，外交之窥伺，府库之空虚，岌岌不可终日。"山东一度宣布独立后，11月8日、13日，济行接连向总处告急：

"济行现存之款，均抵票存，既不敢转移，又不敢动用。……银根已缓不济急，势难支持。"

"济行约欠津浦铁路局银一万六千两，洋两万元，实在无款可交。……现与济行有决裂之势，甚至诸无通融。……济行前放存粤、汉、津三行各五单，申行亦约欠济行两单，刻下函电交催，置之不理，想系银根紧逼所致。济行不得已求救京行，而京行亦因紧急无款接济。"

此时，各分行都已自顾不暇，有的勉强维持，有的已暂时关闭，济行无奈地发出了"当此之时，各行如此，奈何"的浩叹！

到12月25日，金融危机仍没有过去，济行报告总处："刻下东省市面毫无转机，且人皆言和议不成，东省必为战场，以致票存将取殆尽，拨存款者逼取如故，甚至谓革军到来，东政府银行首先占领，必连累存户。如此情形，毫无办法。"此前，重要簿据都已移存到德国控制的青岛。[336]

天津，10月29日，津海关税务司欧森给安格联写信：

据说从明天起所有中国人开的银行将停止营业一星期，有几家已经关了门。大清银行很不稳固，疯狂地向外国商行借款，以大清银行股票作抵押。所有本地银行已经完全没有现款了。海关银号的款子已经被政府提空，有倒闭的危险。

昨天上午的银价跌落到每百关平两换银元一百三十元，据说昨天晚间城里的银价又下跌了。[337]

11月4日，徐兆玮南归时在天津等船，有人告诉他，"天津人心涣散，亦有不可终日之势。金融窘迫，更甚于北京，存款均拨不出，洋价昂至九钱，尚无兑换处"。[338]

天津交通银行（津行）向总管理处告急："惟刻已窘涸极点，紧要提款无法对付，望部（邮传部）立电京奉拨洋，以撑大局。"总管理处姗姗迟来的

复函只是冷冰冰地说："总管理处有统筹全局之责，自应设法酌盈济虚，只因乱事牵动全局，市面金融恐慌，各埠情形均属相同，是以爱莫能助。"[339]

烟台，11月6日，东海关税务司安文写信给安格联：

> 财政情况并不见改善，钞票都打折扣，关平银一百两只换银元一百三十元。

12月27日，朱尔典写信给格雷说："烟台这个口岸因缺乏现银而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

奉天，11月9日，奉天关税务司穆厚敦给安格联写信："大清银行今天发生挤兑现象。英美烟草公司经理几天以前向我谈过，该公司对大清银行正在给以援助。"[340]

在这样的金融恐慌中，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可想而知。10月26日，吴宓在清华园的日记说："顾近日人之逃向津沪者多不胜数，船价一切涨益数倍，常日即由此至沪亦非三四十元不可。余一文俱无……"27日，他又想："往上海之说虽善，但中国到处皆乱，辗转逃避惟觉多事，其果能幸免与否，又未可必。余此时即使至上海，彼地人多地狭，物价腾昂，余父子将何以为食？且此时实不能得三四十元充余路费，虽欲逃走，岂可得哉？"[341]

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接到二哥胡绍之来信，11月3日，即上海独立当天：

> 余居租界，固可无虑，惟经济问题，最为困难耳！……值此时局，借贷无门，典质十文不值一文，真无可耐何！家中屡嘱寄洋，实无以应。望弟在美一切用费极其节省，十二月前，须汇美洋三十元至申……以便转寄至家，庶可支持，否则将成饿殍。如或一时难以凑足此数，或向友人暂移应急。

11月17日，胡绍之再次给胡适写信："国内金融恐慌，已达极点，现在大都借贷无门，典质价贱，匪言能尽。前嘱寄洋至家一层，实处万难之地，否则，断不忍言。"[342]

到1912年3月14日，安文在烟台给安格联写信："黄县平静，但是商业停顿。乡下没有产品运来，食物的价格高得像荒年一样。"[93] 其他许多地方也好不到哪里去。

【注释】

①《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87、88页。

②《郁达夫散文选集》，第283、284页。

③ 法国陆军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350页。

④ 黄仲垲（逸民）：《辛壬闻见录》，湖北省图书馆辑：《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⑤［英］A.苏古敦：《辛亥革命在汉口》，《民国档案》1989年第2期，第3页。

⑥《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471页。《辛亥革命征信录》，《辛亥革命》（五），第201、202页。

⑦《朱峙三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2辑，第252、253页。

⑧《辛亥革命》（五），第296页。

⑨ 转引自黄峻岭：《谣言与革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11月版，第142页。

⑩ 喻血轮：《绮情楼杂记》，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版，第51—52页。

⑪ 熊秉坤：《武昌起义谈》，《辛亥革命》（五），第93页。

⑫ 胡宗铎口述纪录，《口述历史》第七期，第56页。参考杨天石：《汤密电辨讹》，《从帝制走向共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9、250页。《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2页。

⑬《汪荣宝日记》第三集，第1023页。

⑭《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762页。［日］宗方小太郎：《辛壬日记·1912年中国之政党结社》，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页。

⑮ 王孝绳：《辛亥武昌兵变旅行记》，《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4页。

⑯ 转引自黄峻岭：《谣言与革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11月版，第144页。

⑰《辛亥革命》（五），第299、300页。

⑱ 徐兆玮：《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67页。

⑲《艺风老人日记》，第 2420 页。

⑳《汪荣宝日记》第三集，第 1021 页。

㉑《郑孝胥日记》三，第 1350 页。

㉒《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238 页。

㉓《汪荣宝日记》第三集，第 1022 页。

㉔《吴宓日记》第一册，第 161 页。

㉕ 徐兆玮：《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68 页。

㉖《汪荣宝日记》第三集，第 1023 页。

㉗《吴宓日记》第一册，第 163 页，

㉘《汪荣宝日记》第三集，第 1026 页。

㉙ 周钟岳：《惺庵日记》，《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 222 页。

㉚ 徐兆玮：《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69 页。

㉛《吴宓日记》第一册，第 166 页。

㉜《汪荣宝日记》第三集，第 1030、1031 页。

㉝《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54 页。

㉞《许宝蘅日记》第一册，1911 年 12 月 1 日："上海各省代表联合会电告已议决认承共和体，查获此地有伪示出现，标衔北京大都督袁，盖影射项城以为离间之地。"第 248 页。

㉟《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70 页。

㊱《吴宓日记》第一册，第 172 页。

㊲《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55、556、557 页。

㊳《汪荣宝日记》第三集，第 1047、1048 页。

㊴《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74 页。

㊵《汪荣宝日记》第三集，第 1049、1052、1053 页。

㊶《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59 页。

㊷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09—210、208 页。

㊸《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 762 页。

㊹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28 页。《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 771 页。

㊺《辛亥革命》五，第 482 页，《许宝蘅日记》，第 375 页。《辛亥革命》五，第 491 页。

㊻《缘督庐日记钞》，第 221 页。《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14、115 页。

㊼ 佚名日记，《常昭光复纪事》，《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143 页。

㊽《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45、46 页。《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53 页。

㊾《缘督庐日记钞》，第 222 页。

㊿ 周钟岳：《惺庵日记》，《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223页。

51《缘督庐日记钞》，第223页。

52《常昭光复纪事》，《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144页。

53《左绍佐日记摘录》、《广东独立记》，《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512、448页。

54《左绍佐日记摘录》，《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513、515、515页。

55《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1期，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39页。《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775页。

56《缘督庐日记钞》，第228—230页。

57《东三省辛亥革命史料》，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11页。

58《江阴光复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177页。

59《湖南反正追记》，第242、243页。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3145页。

60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293页。

61《略谈关于鲁迅的事情》，转引自《知堂回想录》上册，第295、296页。

62 甘肃督练公所测绘科科员张昌荣：《我在辛亥前后的经历和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543页。

63《民立报》，1911年10月16日。

64《民立报》，1911年10月26日。

65 陈三井：《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辛亥革命研讨会论文集》，第72页。

66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着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21页。

67《辛亥革命》（五），第431页。

68 徐兆玮：《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73页。

69《吴宓日记》第一册，第185、186页。

70 颜惠庆著，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3—94页。

71《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19，220页。

72《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39页。

73《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211、212、213、214页。

74《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68页。

75 朱峙三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2辑，第254—255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5页。

76《武昌起义杂忆》，《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第175页，参考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第158页。

⑦《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4 页。《朱峙三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 12 辑，第 255，256 页。

⑱ [英] 计约翰著，余绳龄、杜志圭、杨红译，李雪云校：《辛亥武昌战守闻见录》，《近代史资料》总 72 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19 页。

⑲《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 5 页。《辛壬日记·1912 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第 28 页。

⑳《历史档案》1981 年第 3 期，第 36 页。

㉑《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15 页。

㉒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13 页。《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20 页

㉓《民立报》1911 年 10 月 22 日、11 月 3 日。

㉔《李国镛自述》，《近代史资料》1961 年第 1 号，第 503 页。[日] 内田顾一，周树嘉译：《湖北革命战见闻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 3 辑，第 175 页。

㉕ 东京 1911 年 10 月 12 日电：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报告。郑曦原编，李方惠、胡书源、郑曦原译：《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第 383 页。

㉖ 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2 页。

㉗《严复日记》网络版 1911 年。

㉘《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68 页。

㉙《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52 页。

㉚ 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第 144 页。

㉛《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52 页。

㉜《郑孝胥日记》三，第 1350 页。

㉝《吴宓日记》第一册，161—177 页。

㉞《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 100 页。1912 年 1 月 25 日给袁世凯电，《熊希龄集》上册，第 237 页。

㉟ 周钟岳：《惺庵日记》，《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 222 页。

㊱《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 764 页。

㊲《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72 页。

㊳《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 764、768 页。

㊴《吴宓日记》第一册，第 174 页。

⑩⓪《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72 页。

⑩①《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8 页。

⑩② 黄远生：《最近之北京》，1913年8月7日，《远生遗著》，上海书店影印本，第145—146页。

⑩③《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368页。

⑩④《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762页。梅兰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344页。王锡彤：《抑斋自述》，第173页。

⑩⑤《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71页。

⑩⑥《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72页。

⑩⑦《吴宓日记》第一册，第174页。

⑩⑧《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5页。

⑩⑨《吴宓日记》第一册，第177页。

⑪⓪《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72页。

⑪①《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344页。

⑪②《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⑪③《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153页。

⑪④ 法国陆军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368页。

⑪⑤ 严复日记网络版，《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775页。

⑪⑥《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374、375页。

⑪⑦ 周钟岳：《惺庵日记》，《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222页。

⑪⑧《郑孝胥日记》三，第1350页。

⑪⑨ 严复日记网络版。

⑫⓪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210页。

⑫① 严复日记网络版。

⑫②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226—227页。

⑫③ 徐兆玮：《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72页。

⑫④ 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五，年谱四。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十二辑。

⑫⑤《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25页。《京津游记》，《民立报》1912年10月10日。参见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第158页

⑫⑥《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卷五，陈步编：《陈石遗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7—2018页。参见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

⑫⑦ 贾廷诗等《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第31页。《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77页。

⑫⑧《吴宓日记》第一册，第177页。

⑫⑨ 徐兆玮：《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73 页。

⑬⓪《艺风老人日记》，第 2426、2428、2429 页。《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卷五，参见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

⑬①《吴宓自编年谱》，第 107 页。

⑬② 11 月 25 日从上海写信给盛宣怀，《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 225 页。

⑬③ 龙峨精灵：《观堂别传》，《未能忘却的忆念》，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99 年版，第 188 页。

⑬④《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 344 页。

⑬⑤《郑孝胥日记》三，第 1350 页。徐兆玮：《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68 页。

⑬⑥《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52 页。

⑬⑦ 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五，年谱四。

⑬⑧ 凤冈及门弟子谨编：《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120 页。

⑬⑨《辛亥革命》（五），第 445 页。徐兆玮：《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72 页。

⑭⓪《汪荣宝日记》第三集，第 1035 页。《吴宓日记》第一册，第 174 页。

⑭①《辛亥革命》（五），第 479 页。

⑭② 吴国桢著，吴修垣译，马军校订、注释：《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 页。

⑭③ 恽宝惠：《辛亥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 487、488 页。

⑭④ 参考《许宝蘅日记》第一册、《恽毓鼎澄斋日记》（2）、《荣庆日记》、《汪荣宝日记》第三集。

⑭⑤《汪荣宝日记》第三集，第 1035 页。

⑭⑥《荣庆日记》，第 197 页。

⑭⑦《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 345 页。

⑭⑧《汪荣宝日记》第三集，第 1038—1039、1043 页。

⑭⑨《吴宓日记》第一册，第 118 页。

⑮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 781 页。《汪荣宝日记》第三集，第 1046、1047页。

⑮①《吴宓日记》第一册，第 118、187 页。

⑮②《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 344 页。

⑮③《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第 18 页。

⑮④《许宝蘅日记》，第 374 页。

⑮⑤ 严复日记网络版。

⑮⑥《汪荣宝日记》第三集，第 1047、1049、1050、1051 页。《许宝蘅日记》，第 375 页。

⑮⑦《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278 页。

⑮⑧《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第 93 页。

⑮⑨ 法国陆军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372—373 页。

⑯⓪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33 页。《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65 页。

⑯①《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72 页。

⑯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37页。

⑯③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23、228 页。

⑯④《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 777、778 页。

⑯⑤ 1912 年 1 月 25 日给袁世凯电，《熊希龄集》上册，第 237 页。

⑯⑥《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58 页。

⑯⑦《吴宓日记》第一册，第 177 页。

⑯⑧《绍英日记》，第 238、250 页。

⑯⑨《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 219 页。

⑰⓪《辛壬日记·1912 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第 44 页。

⑰①《江左用兵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246、268 页。

⑰② 佚名日记，《常昭光复纪事》，《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143、144 页。

⑰③《缘督庐日记钞》，第 223 页。

⑰④《常昭光复纪事》，《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144 页。

⑰⑤《叶圣陶集》第 19 卷，第 45 页。

⑰⑥《常昭光复纪事》，《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144 页。1912 年 5 月 2 日丁文江来信，《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 839 页。《常昭光复纪事》，《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144 页。

⑰⑦《缘督庐日记钞》，第 228、229 页。

⑰⑧《叶圣陶集》第 19 卷，第 54 页。

⑰⑨《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78—79 页。

⑱⓪《缘督庐日记钞》，第 118 页。

⑱①《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68 页。

⑱②《申报》1911 年 11 月 14 日。

⑱③《郁达夫散文选集》，第 284 页。

⑱④《早期中共与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10 年版，第 5 页。

⑱ 郑之翰：《漳州光复前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 143 页。

⑱ 刘峙：《我的回忆》，文海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 页。瞿兑之：《长沙城内》，《越风》第二十期，1936 年 10 月，第 57—58 页。

⑱ 丁玲：《母亲》，（3）、第 111—112 页

⑱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 12 页。

⑱《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71 页。

⑲《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94 页。

⑲ 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02—203 页。

⑲《近代史资料》1961 年第 1 号，第 511、512 页。

⑲《近代史资料》1961 年第 1 号，第 438、439 页。

⑲《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204 页。

⑲《近代史资料》1961 年第 1 号，第 445 页。

⑲《近代史资料》1961 年第 1 号，第 446、447 页。

⑲《近代史资料》1961 年第 1 号，第 512 页。

⑲《近代史资料》1961 年第 1 号，第 513、514 页。

⑲［日］沪友会编，杨华等译：《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 2000 年，94 页。忍庐《辛亥革命在贵阳》，《越风》1936 年 10 月 10 日版，第 24 页。

⑳《艺风老人日记》，第 2420 页。

⑳《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20 页。

⑳ 王孝煃：《秋梦录》，《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510 页。

⑳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24—225 页。

⑳《秋梦录》，《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510 页。

⑳《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21 页。

⑳《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45 页。

⑳《党人三督传》，第 179 页。

⑳《辛壬日记·1912 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第 45 页。

⑳ 马涯民口述，毛翼虎记录：《南京光复见闻琐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259 页。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31 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 37 页。

㉑《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522 页。

㉑ 茅乃登、茅乃封：《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386—387 页。

㉑ 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第 101 页。

㉑《上海洋场竹枝词》，第 206 页。

㉔《根富老老》，《沧波文选》，台湾文星书店 1964 年版，第 299 页。

㉕《上海洋场竹枝词》，第 212 页

㉖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 1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第 566 页。

㉗《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 18 册，第 569、570 页。

㉘《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 330 页。

㉙ 上海市档案馆：《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历史档案》1981 年第 3 期，第 50 页。

㉚《民立报》1911 年 10 月 17 日、10 月 22 日"上海春秋"。

㉛《民立报》1911 年 10 月 22 日、11 月 3 日。参考陈三井《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

㉜ 章天觉手稿：《回忆辛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 2 辑，第 158 页。

㉝《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 18 册，第 571 页。

㉞《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 225，226 页。

㉟《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 799 页。《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85 页。

㊱ 陈衡哲著，冯进译：《陈衡哲早年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第 160 页。

㊲《苏雪林自传》，第 20 页。

㊳《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28 页。

㊴《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 219 页。

㊵《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 页。

㊶ 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六卷，第 659 页。

㊷《辛亥革命史丛刊》第 12 辑，第 255 页。

㊸［英］计约翰：《辛亥武昌战守闻见录》，《近代史资料》总 72 号，第 113 页。

㊹ 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第 199 页。

㊺《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 194 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 4、5 页。

㊻《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5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 年第 3 期，第 20 页。

㊼《辛壬日记·1912 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第 26 页。

㊽《历史档案》1981 年第 3 期，第 32 页。

㊾《近代史资料》总 72 号，第 115、119 页。《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 221 页。

㊿［日］内田顾一《湖北革命战见闻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 3 辑，第 175 页。

24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与各地分行庄号的来往函电》，转

引魏振民《辛亥革命爆发后四个月间的交通银行》，《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第97页。

㉜《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22页。《辛壬日记·1912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第29页。

243 [英] A.苏古敦：《辛亥革命在汉口》，《民国档案》1989年第2期，第6页。《辛亥革命襄阳见闻录》，《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号，中华书局，第6、7、8页。

244《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2页。

245 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近代稗海》第一辑，第458页。

246《辛亥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485、486页。12月15日军咨府电，接到冯国璋的来电，因为攻克汉阳、汉口10万元赏银，就是当初盛宣怀向荫昌承诺的。《辛亥革命》（五），第368页。

247《绍英日记》，第234页。

248《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第99页。

249《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68页。

250《郑孝胥日记》三，第1350页。

251《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68页。

252《汪荣宝日记》第三集，第1023页。

253《吴宓日记》第一册，第162页。

254《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344页。《绍英日记》，第235、236页。

255 法国外交部，《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208页。

256《辛亥革命》（五），第413—414、417页。《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2页。

257《绍英日记》，第235、236页。

258《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338页。

259《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764页。

260《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1页。

261《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72页。

262《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4、555页。

263《吴宓日记》第一册，第177页。

264《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25页。

265《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154页。

266《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73页。

267 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357页。

268《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765页。

269《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68页。

㉗⓪ 转引自周秋光：《熊希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66 页。

㉗① 《吴宓日记》第一册，第 162 页。

㉗②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 344 页。《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4 页。

㉗③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 223 页。

㉗④ ［英］苏路熙著、吴慧译：《乐往中国》，第 394、395 页。

㉗⑤ 《常昭光复纪事》，《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143 页。

㉗⑥ 《历史档案》1981 年 3 月，第 36、37 页。

㉗⑦ 《历史档案》1981 年 3 月，第 97 页。

㉗⑧ 《历史档案》1981 年 3 月，第 37 页。《辛亥革命襄阳见闻录》，《近代史资料》1963 年第 2 号，第 6 页。

㉗⑨ 《历史档案》1981 年 3 月，第 97 页。

㉘⓪ 《历史档案》1981 年 3 月，第 38 页。

㉘①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67 页。

㉘② 《叶圣陶集》第 19 卷，第 36 页。

㉘③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142 页。

㉘④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142、143 页。

㉘⑤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73 页。

㉘⑥ 《上海洋场竹枝词》，第 233 页

㉘⑦ 《黄炎培日记》第一卷，第 22 页。

㉘⑧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 7 页。

㉘⑨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13 页。

㉙⓪ 《民立报》1911 年 10 月 17 日新闻、"上海春秋"专栏，转引陈三井《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

㉙① 《民立报》1911 年 10 月 18 日，转引陈三井《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

㉙② 《历史档案》1981 年第 3 期，第 39 页。《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45 页。

㉙③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 9 页。

㉙④ 《历史档案》1981 年第 3 期，第 41 页。

㉙⑤ 苏州商务总会档案，《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97 页。

㉙⑥ 《缘督庐日记钞》，第 222 页。

㉙⑦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50 页。

㉙⑧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68 页。

㉙⑨ 《叶圣陶集》第 19 卷，第 44 页。

⑳⓪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219页。

⑳① 《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70页。

⑳② 《历史档案》1981年3月，第43页。

⑳③ 《民立报》，1911年10月22日

⑳④ 《民立报》，1911年10月23日。

⑳⑤ 《历史档案》1981年3月，第44、45页。

⑳⑥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8册，第569、570页。

⑳⑦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330页。

⑳⑧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225—226页。

⑳⑨ 《民立报》1911年10月28日。

㉛⓪ 《郑孝胥日记》三，第1353—1354页。

311 《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98页。

312 《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98页。

313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386—387页。

314 《江阴光复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178页。

315 转引自魏振民：《辛亥革命爆发后四个月间的交通银行》，《历史档案》1981年3月，第98页。

316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562页。

317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147页。

318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20页。

319 《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80页。

320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6页。

321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170页。

322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115页。

323 《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595、601页。

324 [法]博里斯·马尔坦编著，张宇凌译：《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儒勒·乐和甘——中华帝国混乱年代期间法国驻华领事》，第77页。

325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67页。

326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8页。

327 《历史档案》1981年3月，第99页。

328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8、9页。

329 《熊希龄先生遗稿》1，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

330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9页。

㉛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 217 页。

㉜《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74 页。

㉝《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18、119 页。

㉞《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94、204 页。

㉟《历史档案》1981 年 3 月，第 98 页。

㊱《历史档案》1981 年 3 月，第 98、99 页。卞孝萱辑：《山东假独立资料》，《近代史资料》1956 年 1 月，科学出版社，第 123 页。

㊲《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278、279 页。

㊳《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73 页。

㊴《历史档案》1981 年 3 月，第 99 页。

㊵《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287 页，《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275 页，《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295 页。

㊶《吴宓日记》第一册，第 172、174 页。

㊷《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 217、218 页。

㊸《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294 页。

第二篇　报馆鼓吹

张謇在写给孙毓筠、王芝祥的信中说，日本人将这场革命称为“口舌革命”，西方人则称为“心理革命”。所谓“口舌”就是报纸。报纸乃公共的口舌，由口舌革命引发心理革命：

> 辛亥年冬，东人观战者云，是以口舌革命；西人论政者云，是以心理革命。公论在人，不容为讳。①

当时，许多人都有类似看法。1911 年 10 月 26 日晚，叶圣陶在苏州参加一个婚宴，席间，“颇有怪此次鄂军起义实由各报纸肇其端，而有不满意于报纸者。然文学实产生英雄，今日之众英雄皆报纸之生产儿，亦未为不可说。若辈无知，竟敢妄为推委，可恶；然如此无识，亦可怜”。②

报馆影响民心之大、之深实难估量。连浙江平阳县城的百姓都听说，民军毫无实力，“专赖各报馆鼓吹”。③11 月 26 日，梁启超写信给罗瘿公，要他转告袁世凯：“今兹革军之奏奇功，得诸兵力者仅十之三，得之言论鼓吹者乃十之七。”策动南北军人和谈的廖少游说：“南军得报纸社会鼓吹之力，凡所以励激人心，发扬士气者，罔不周至。”④有革命党人也认为：“辛亥革命是报馆鼓吹起来的。”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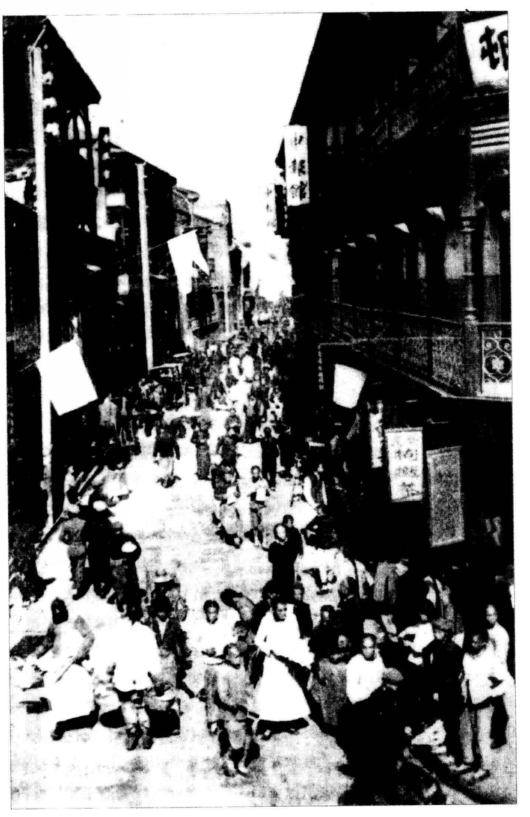
一、望平街上

望平街上报馆林立，《时报》、《申报》、《民立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新闻报》……当时上海乃至中国最重要的报纸几乎都集中在这条不大起眼的街上，本来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信息集散中心，《图画画报》曾有报道《上海社会之现象——报馆晨起卖报之拥挤》，各报一般都在清晨出版，经常大门未开，门外就已挤满苦苦守候的等报之人。等到武昌的消息传来，望平街更成了举世瞩目的消息枢纽，不仅与往常一样清晨出报时热闹，而且每天从早到晚，报馆都会不断地发送各类传单，密集时五六趟不为多，到了傍晚，还要特别加印号外，报道最新消息，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踊跃争购，供不应求，片刻即罄。

自10月12日从报纸中得知武昌起事、瑞澂弃城而走的消息，上海民立中学学生陆澹安和同学就不断跑到望平街探消息、买报纸。望平街上，人们读报、探听、议论、张口、瞪眼、脱帽、搔头、附耳细语、左顾右盼，甚至影响到工部局的修路工程，这是《申报》1911年10月15日的消息。报馆的大门、玻璃窗等醒目之处到处贴着有关当日战况的大字海报，以满足纷至沓来、翘首期盼的人们。⑥

18岁的少女沈亦云记得，“在上海商店伙计每日争阅报纸，其不得者，数人聚看一张，或一人读给余人听，顾客与店员隔柜讨论光复与共和，延迟买卖”。10月15日，《民立报》报道，上海的商、学两界成群结队，都以报纸为谈助，说到紧要时事，“则欣欣然有得色”。一般平民在虐政之下生活、挣扎久了，“虽未必个个赞成革命军，然于一切言语词色之间，却无一人反对革命军者”。⑦10月21日《民立报》发表的《热闹》一文说：“传单传单，电报电报，报馆门前，人声纷扰，也算小热闹一场。”

同日，《申报》“海上闲谈”说：



望平街上

或问：鄂乱如此，人心动摇。然究竟人心之向背如何？

钝根曰：欲知人心之趋向，请至上海英租界望平街各报馆门首，摩肩叠背掂足昂首之人团中，观其阅急报后之神色如何，观其前晚见革党小挫后之神色如何，更观其昨晚见革党大胜之报告后之神色如何。

10月25日，喇伯第自上海致信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说："人们继续贪婪地阅读报纸，争抢号外。"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收到10月29日的家书："近来国事甚急，一日数惊，诚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传闻安庆亦已失守，南京甚危。上海各报馆生意甚形兴旺。望平街一带人山人海，皆急于探求消息者。闻革军胜，则无不欣欣然以为喜；有谓官军胜者，则必迁怒于此人。如前日望平街人丛中有一无知者，闻革军大胜之言，微叹一气，后面之人，遽饱以老拳，事虽可笑，观此亦可见人心已大去矣……"[⑧]

武昌起义众心惊，报馆齐张革命声。争向门前探捷报，望平街上路难行。

传单一纸帖门阑，路上人人驻足观。但看某城光复矣，眉飞色舞竟忘餐。

人心一去总难收，咸切清军战胜忧。若报民军稍失败，门窗捣毁果何尤。

警报何如战报新，各家号外又分陈。还多晚报争先睹，卖报生涯竟军伦。[⑨]

朱文炳的《海上光复竹枝词》无疑是写实。"门窗捣毁果何尤"，黄炎培回忆，"上海息楼所在的望平街每晚人山人海，发生了大影响。望平街左右相望的报馆，家家大玻璃窗外，张贴各地消息。街上日日夜夜群众挤得满满地在探听，一个捷报到来，鼓掌狂欢；一个报告失败，认为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群众极度愤恨地把大玻璃窗砰轰砰轰地立刻打得粉碎。从此报馆不但不敢在门首披露失败消息，特别不敢在报上披露。报上一披露，

整个报馆那里还站得住……”[10]

《新闻报》记者严独鹤记得：“《申报》一得到冯国璋部队攻陷汉阳的电讯，立即在门口贴出号外来，并加上很大的标题，画上鲜红的圆圈。望平街头的行人看到这张号外，顿时引起愤慨，纷纷拥进大门，向馆中人提出责问。馆中人见来势汹涌，赶快取出电稿，给大家传观，证明号外消息并非虚构。……群众在哄闹之下，就将报馆门口的大玻璃窗打碎，借以泄忿。”[11]

10月20日，苏州中学生叶圣陶日记说：

“午后报纸来，则各种互有异同。……《民立报》则云革军胜，《时报》则云无甚胜负，《字林西报》则云革军不利。见‘胜’之一字固无甚惊异，盖如此正正堂堂之师，本当胜也；而闻不利之消息，则闷郁特甚。……革军如一不利，再不利，而终至于消灭，则其后之情景当不堪设想；而若吾侪者，尚何以为生乎！……顾心中终觉不畅。上堂受课亦呆目充耳，若未见闻。”

下课后，他看同学练足球，“观之亦无甚趣味。归家后心中怅怅然，未能温课也”。

第二天，“到校后，闻沪上某报馆有被众攻击，逐致停版之说。盖近日报馆之电报时有接到，而到馆探问消息者尤拥挤不堪。故各报馆接得一电后，每大书悬之门首，以便周知之迅速。而该报馆竟忽发奇想，伪造来电云革军大败。观看之众人见之，即入馆询以电码何在，该馆不能对，乃大撄公愤，竟起奋击。观此一端，则虽欲革军之败，其可得乎？”[12]

10月22日午后，刚从北京抵达上海的周钟岳日记说：“闻长沙、西安失守之信。……至沪后，闻某处、某处失守之信，各报馆时出一粉牌，或卖号外；望平街为之塞滞不通，得一信则人人欢迎，忽时事新闻有革党小挫之揭示；观者愤恨，几欲毁其报馆，于此亦可见人心之趋向也。”[13]

10月23日，江苏巡抚程德全致电内阁：

> 前日上海《时事新报》登载革军战败一条，即时有千百人前往攻诘。人心如此，良可慨痛！[14]

苏舆说：“《申报》载官军克复汉阳，即时封毁。”柏文蔚自传则说是两

个报纸，“时新、申两报载有不利于本党战事消息，曾被同志捣毁”。[15]

10月23日，远在北京的翰林徐兆玮日记说，午后，胡君瓛告诉，“每日下午，望平街报馆门首拥挤不开，皆探听消息者，各报因之下午加报一张”。[16]

从中学生陆澹安日记可知，这不是传闻，10月22日是星期天，他到望平街各报馆探听革命军消息，薄暮始归。第二天因最后一节课老师不在，他又和周允文等5个同学同往望平街，到6时才回家。29日又是星期天，午后他到望平街探问革命军消息。11月4日，上海光复第一天，他在望平街遇到周允文。6日，他到望平街，“购午报一份而归，晚饭后复至望平街，购晚报二纸，归家已十时半矣”。第二天，他又到望平街，“观一周而返”。8日上午他已在里马路买了一份《时报》，下午又到望平街探问战讯，薄暮始归。11日下午，他到望平街探问消息。12月3日，他到望平街闲游一周而归。10日下午，他到望平街，购画报数纸。[17]

当时，不仅同盟会的中坚宋教仁、于右任，更年轻的陈布雷、王云五等都在望平街上执笔。在《天铎报》执笔的青年陈布雷，《谈鄂》十篇接连刊出，少年意气凌厉，“布雷”之名从此为世人所知。他在文章中劝诫海军提督萨镇冰反戈一击，推崇革军“怀此坚苦卓绝之志”，“不惜犯空前之大难，志在出同胞于水火”，“固无时无地不隐伏一触即发之机”。他指出，鄂事成败问题关系着四万万同胞之生死。“夫鄂事万一无幸，期吾同胞万劫无回复之日，此义甚明，了无疑义”。如果大功告成，“则恢复疮痍，一新耳目，奠初基而消外侮”。[18]

他呼吁：“凡吾同胞，诚不宜以撑地指天之大任，专以诿诸一部分之人，而转置身于事外；诚以吾民有东崩西应之势，即政府有左支右绌之危，成败之机，争此一线也。”“夫武汉一隅，固将与美之波士顿、法之威色黎，同为世界史上一至足纪念之胜地。”[19]

《天铎报》与那些称“逆军”的报纸不同，言论、报道与《民立报》相呼应，一时名声鹊起，发行量达到4000份，连排字工人都很兴奋，认为“如再努力，必驾《神州日报》、《民立报》而上之，《时报》、《新闻报》不足道也”。[20]

回首生平文章，陈布雷最难忘当时意在策反浙军的那篇社评，相隔23年

(1934年冬天)，他从浙江省教育厅长位上卸任，在西湖小莲庄休养。《东南日报》记者黄萍荪夜访，问及他在《天铎报》的文章哪篇最有代表性，他回答，是《钱镠弩，鸱夷血，呜呼寂寂!》。第二天，他给记者抄送了全文，"吴山浙水，久矣无色"，"故乡大好，……宁无死所"，浙中健儿岂能束手待毙，这是旨在策反浙军朱瑞、吕公望们举旗易帜的文章，长不过千字，却力道很足。

王云五本来在中国公学和留美预备学堂教书，兼为《天铎报》撰稿，此时两校停课，他集中时力，"在《天铎报》作种种有利于革命的宣传，或撰写社论，宣扬民主，或就电传消息，画蛇添足，为革命张目，而鼓动响应。实际上革命成功如是之速，一部分不能不归功于上海报界之赞助与渲染。例如甲省本未独立，而由报界盛传其已独立，一则使乙丙等省当局恐慌，或受诱惑，二则乙丙等省人民起而赞助，结果对此等省分之独立发生不少促成作用"。[21]

11月3日，《申报》"海上闲谈"称："民心之向背，请证之望平街上一般看专电人之态度。"11月28日，蔡元培从德国回到上海，即听说："那时候，又有一段新闻，关于辜汤生［鸿铭］先生的事。自武昌起义以后，望平街各报馆每天发好几次传单，并在馆门口用大字誊写，借示行人，于是乎是望平街有人山人海之状。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通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先生含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诘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此为我回国以后所闻，未知确否。"[22]

此事并非传闻，10月29日，《申报》的"本埠新闻"有《怪物辜鸿铭》的报道，辜为邮传部设立的高等实业学堂教务长，在《字林西报》发表了一封信，大骂革军，"见者大愤"，有人给学堂来信，"如此议论诚丧心病狂之谈，欲将该堂烧毁"，学生得知，立请辜到校诘问，辜含糊以对，学生大哗，将他逐出。《申报》同时将《辜鸿铭致字林西报馆函》译成中文刊出：

此可为模范之租界，论理犹属大清之世界，若肯从上海报馆中人痴人妄说，刊刻排满图画文章，非独有违万国公例，抑岂事理之

平。外人犹记对于排外之文章情状若何耶？今独对于排满之文章若此，无乃大谬乎。……此等排满文章，意在鼓动长江及各埠数百万饥民，使其抛却服从皇帝之职意，使乘间起事耳。武昌革命之举，人颇惊讶异然。我今告之外人，革命军外表之文明，半由于曾练德国操，又为张之洞自创之军，现在风潮将传布上海及扬子江下游各地，此数百万饥民向无训练如武昌之军，徒欲藉此以获一饱。

他设问说，当印度乱时，葡萄牙人在印度设有租界，岂能让印度人刊刻排英文字？“如今日望平街前所刊排满文章，英人岂能置之不言？”[23]

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下，学生轰走辜鸿铭是自然不过的事。

到 11 月 27 日，留日学生黄尊三到达上海，看到这里的报纸只有一种声音，反觉得没趣：“余等稍为收拾，同至外洗澡。膳后稍休，买新闻阅之，千篇一律，无不歌颂革命军之胜利，或鼓吹北伐，或主张组织政府于南京。而武昌消息，则反寂然也。”[24]

望平街上所出的报纸不仅影响着上海以及周遍的南京、苏州、嘉兴、杭州等地，而且影响到遥远的北京、长沙等地，无疑，那一刻望平街发出的那些消息有着摇撼人心的力量。恽毓鼎后来感叹：“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如果说亡于上海的报纸，也不是毫无道理。[25]

10 月 17 日，金陵关税务司卢力飞在南京写信给安格联：“关于汉口的消息，我们没有接到直接来自汉口的电报，主要是依靠上海的报纸。”[26]

在嘉兴中学读书的茅盾回忆：

当天下午就有几个同学请假出去，到东门车站去买上海报。这是等候上海开来的火车到站后，上车去和旅客情商，买他们手中的上海报。偶尔逢到有人下车来，那就几个同学围着他抢买。

有一次，体操教员叫他一起去车站，上海来的火车刚刚过去，因买不到上海报而大为扫兴。[27]

在浙江富阳县城的少年郁达夫说：“在书桌上躺着候我开拆的，就是每

日由上海寄来的日报。……

武昌革命军的义旗一举，不消旬日，这消息竟如晴天的霹雳一样，马上就震动了全国。报纸上二号大字的某处独立，拥某人为都督等标题，一日总有几起；……

我也日日的紧张着，日日的渴等着报来……”[28]

在扬州巡警教练所做警察的张治中，“那时看上海报纸，知道上海已经响应革命，从街头巷尾看报人的表情可以看出‘人心思汉’，都希望光复。都拥护革命军。当时全国各地的光复运动，如火如荼，我卷在这一个狂潮热浪的漩涡里，也变成一滴飞溅的浪花。我觉得这样留在扬州站岗，根本不是办法，我就想到上海去。”[29]

在苏州中学读书的叶圣陶、顾颉刚和同学们每天着急地等待上海报。顾颉刚记得，武昌之后，许多省份相继独立，“我们在学校里再无心读书了，天大的一个任务是看报。上海各报，每天下午一时车运到苏州，我们就推定同学，在下午二时下班休息的十分钟里，赶快跑到宫巷桂芳阁茶馆里，向卖报人买了几份报纸，飞步回到学校，高声宣读。因为我身高腿长，走路快，就常常担任这个传达的任务。”[30]

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有生动的描述：

> “上海光复了！”焕之挟着一份报纸踅进课堂来，一只手挡在嘴边，表示这是私语，其实呢，连提高喉咙讲说的教师都听见了；他脸上现出兴奋的红晕，气息咻咻的，见得他是跑回来的。
>
> 在这几天里，上海报特别名贵，迟钝一点的人，往往只好看报贩子的空布袋。因此，他们同学中间定了个公约，轮流到火车站去买报；买到了赶回来，大家知道新消息比闲坐在家里的绅士们还要早，当然决不至于落空看不到报纸了。教师自然并未表示准许，但买报专使出去了，既而回来了，甚而至于跑进正在上课的教室，教师也回转了头，只作没有看见。这一天，这差使轮到了焕之。
>
> “啊！上海！上海光复了！好！哈罗！”一阵故作禁抑，其实并不轻微的欢呼声出自许多学生的嘴里。少数人便踅到焕之的座位旁

边，抢着看他买来的报纸，其余的人都耸起身子，伸长脖子，向焕之那里望，仿佛看见了径尺的大字“上海光复”，同时仿佛看见了好些迸出火星来的炸弹。[31]

这不是小说家的虚构，而是他少年经验中的一幕，自10月12日起，他逐日记下了看报得来的消息，内心的反应以及对报纸的渴望：

10月12日　课毕后阅报纸，见专电栏中有云：武昌已为革党所据……武昌据天下上游，可以直捣金陵，北通燕赵。从此而万恶之政府即以推倒，亦未可知也。

13日　课毕后报纸来，则见汉阳铁厂已为革党所得，军械取材愈将得手矣。又见蜀、粤两省亦有跃跃欲动之势，风云际会，盛哉此时，心滋喜。

14日　午后课毕后。急阅报纸。见长沙、重庆均为革党所据……

15日　饭后［与同学出去喝茶］……急租报纸阅之。……

16日　……报纸来后，诸同学拥观之。余不耐争挤，未之观。闻已观者言，则大事约略如昨日，乃即归家。

19日，听说芜湖已下，心甚喜，然未知确否，急欲得报纸阅之，而校中所常订之报还未送来，乃与颉刚请假出至观前，遇送报人，乃即购《时报》一份，入明月楼啜茗以阅之，却并无芜湖之信。更租他种报看，亦都无之，懊恼甚。……

21日　……饭后急欲以见报纸，请假出去，送报者未来，下去喝茶等待。已而即来，急购《时报》一份阅之。第一条专电即见廿八日革军系伪败，诱北兵而包攻之，北兵毙四千。我固以为革军必不致败也，心油然喜。以下各电亦殊可人意。

看毕专电即便归校，正在上第四课经学，以报纸携进教室，则同学争夺之，见第一条，皆笑色现于面，暗相告语，不顾程先生在讲台上矣。是课毕，同级人出以告其它众同学，则顿闻至响至宏之欢呼发于自习室中，是真爽快欢乐已哉。

课毕后即归家，以报纸呈大人，大人观之，其欢愉之状自流露于言词间也。

23日　饭后有同学出去买报，归后见报上皆革军战胜史，大喜。

26日　课毕后阅报纸，知南昌、西安亦已得手……广东亦有独立之说……

昨日盼好消息，而今也消息固佳。

29日　急租报纸阅之，知镇江确已得手。……各处起事，虽由诸同胞之良知发现，而其地有旗人居者，大都由旗人激之使然。[32]

与少年顾颉刚、叶圣陶们的欣喜不同，苏州一些绅士读了上海报后愤愤不平地咒骂报馆与革命党声气相通，“专播谣诼，以惑民听，好乱者皆从而和之”。[33]

10月12日，叶昌炽从报纸上突然看到武昌失守的消息，大为惊骇：“革党中秋即图举事……武汉为水陆通衢，江波腾沸，旦夕间耳。革党屡起屡踬，非有新军终不得逞，养虎堂奥，谁之咎欤？吾辈处危墙之下，安能瓦全。”[34]

10月14日，他从报纸上知道，“鄂乱势益张，……楚之荆宜，湘之长沙，蜀之重庆、嘉叙，流言纷起，茫茫大地如炸弹爆发，顷刻燎原，新政收效固极神速，铁路国有之政策又足为导线”。[35]

北京，不仅翰林徐兆玮、恽毓鼎这些人可以读到上海的报纸。顺天学堂学生梁漱溟的回忆、清华学堂吴宓的日记都说，他们能读到上海来的报纸，包括《民立报》。

当遥远的四川达县光复时，梅吉庵回忆：“我们六七个中心人物中间，没有一个同盟会员，对于光复意义，只在刊物上看到过一些；关于施政纲领和组织机构，脑筋中纯是一片白纸。景昌运订有上海《申报》，记载鄂军政府的组织极详，并载有军政府机构的分级，如第一级省和重要都市称军政府，领导人都称都督，第二级通府驻地称军政分府，领导人称副都督，第三级重要县份亦称军政分府，领导人称参督。我们比照这个规定，定名为东乡军政分府。”[36]上海报纸传来的消息成了他们建立新政府的模本，这也许是办报者没有想到过的。

二、民立馨香

早在筹划之中的革命突然爆发，宋教仁、于右任、徐血儿们的激动是旁人难以体会的，他们在《民立报》的回应也来得最快、最有力度。10月12日，《民立报》大号宋体字刊出多条专电，集中报道了武昌起事的消息。次日，于右任以“骚心”笔名发表大字评论《长江上游之血水》：

> 秋风起兮马肥，兵刃接兮血飞。蜀鹃啼血兮鬼哭神愁，黄鹤楼头兮忽竖革命旗噫！……
>
> 呜呼，蜀江潮接汉江潮，波浪弥天矣。……此三日间，天地为之变色矣噫。

宋教仁以“渔父”笔名接连发表《交战时之中立论》、《湖北地理形势说》、《上海市面无意识之恐慌》、《敬告日本人》等评论，自14日起，专辟“武汉革命大风云”专栏，以几乎整版篇幅报道武汉的消息。时在钱塘高等小学堂读书的蒋复璁记得：

“武昌光复，上海《民立报》每天用大字，旁加黑圆圈宣传，非常醒目，同学争相取阅，有鄂军都督印的报纸竟售至小洋一角。”[37]

同盟会人邹鲁多年后仍感慨地说：“辛亥武汉起义，上海《民立报》日事制造利于革命之电报新闻，清吏震惊，党人气盛。”[38]

沈缦云的儿子沈焕唐回忆，那时《民立报》一出，“购者纷至，竟至有出银元一元而不能购得一份者”。[39]

因为《民立报》在各报中最受欢迎，《申报》、《新闻报》每份售三个铜元，《民立报》则每份要卖到小银元三角，最高时竟至一元。从10月17日到12月5日，《民立报》的售价由原来的二分六厘涨到了三分八厘，但仍有

(辛亥年八月念一日) (星期四) (第三百六





背景畫傳習所展覽會通告

法界褚家橋寶

蘇州江蘇公報展期出版

本報原定八月念一出版茲因內部佈置……付出版謹此佈聞

江蘇公報

原文麥費孫 罕迭生 化學

此爲化學教科書中最新最近之作其文字簡淺而又論理

要詳……偏重……精確趣味

勝觸發……二元

上海商務印書

華商上海福和煙廠招工滿額即日截止報名

無錫九豐機器麪粉公司開股東大會廣告

本公司……開大會凡我股東諸君屆時務乞蒞臨集議……特此登報廣告

總理蔡緘三 協理唐保謙

《民立报》

以十倍之价购阅的。[40]

即便如此，在一段时间内该报仍然有来不及排印的状况发生，只能停刊广告，两面皆印新闻以暂时应对。[41]

上海海关税务司墨贤里1912年3月31日递交的海关报告说：

> 到1911年，这里每天可能有8种中文报纸在发行，所有这些报纸都可以说是主要报纸。其中，《民立报》创办约已两年，它提倡激进的观点，也许是读者最多的报纸。革命一爆发，中国新闻工作者找到了机会，他们以微小的借口发行“号外”。在报馆坐落的街道挤满了等待新的“号外”的人群，也许这是他们第一次对国家大事表示关切或是有了好奇心。[42]

18岁的师范女生张馥真（辛亥革命后出家，法名耀真）自述受聂政、罗兰夫人等事迹的感召，组织女子进行社，推销《民立报》，常奔走于茶楼、酒肆、旅馆、火车做推销报纸的工作。上海光复那天早晨，正是她们送报到南火车站之时，消息传来，路人为之欣喜。浙军平日所看的报纸也都由她们交火车转运。[43]

在江阴任小学教师的同盟会员章砚春回忆：

> ［武昌起义］越一日，我邑即得到消息，从此人人争看沪报。我们每晚派人到南门外轮船码头守候无锡来的晚班轮船，争购到一张《民立报》，驰归至辅延学校，候者已人头挤挤，请一人朗读，四壁静听。各处独立的消息像潮水般涌来，人心震动，老年官僚顿时垂头丧气，少年兴奋，一路踊跃欢呼。[44]

顾颉刚记得各省相继独立，《民立报》发表的诗中就有“大会不期侯八百，同心奚啻士三千”这样鼓动人心的佳句。[45]

《民立报》的影响及于全国，不仅江、浙周围的城市，远在湖南、河南、北京都有人在读。10月29日，清华学堂学生吴宓步行进城，看到了《民立

报》，“其中盛称革命不遗余力”。[46]北京中学生梁漱溟也能按期收阅，“辛亥革命前一年，在上海有一张《民立报》，是由于右任主持出版的，这是革命派的机关报，我们在北京也能看到”。[47]

河南曾有过几次独立的策划，只是都没有成功。11月10日河南咨议局发动的独立运动受挫之后，开封革命党人仍在积极准备，计划再次发难，张钟瑞在会议上慷慨陈词：“方今汉阳失守，上海《民立报》著泣血篇，全章大字，骂河南人为袁党，为满奴，为汉奸，诸君见之乎？上海和会河南代表李鎜在议席无发言权，诸君闻之乎？吾辈再不努力奋斗，将自绝于黄帝子孙！”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有人质疑：“此举策万全乎？”王庚先起立说：“吾辈为河南三千万同胞争人格，原不计成败得失。”众人破涕为笑，举手欢呼。[48]可见《民立报》舆论对他们内心的震撼。

胡适收到二哥绍之的家书（大约1912年1月中下旬）：“神州报近日退步无价值之可言，近沪上各报之议论，以民立为最切实，余拟为弟改购此报，未知吾弟以为何如也？”[49]对这场革命持反对立场的恽毓鼎，对《民立报》也是情有独钟，因为上海的报纸不能按日寄到北京，一般要三四天的一起寄送。1912年5月27日早饭后，他看了三天的《民立报》，坦承：“此报于政说学理特详，且具卓识，为南北各报之冠，而摭拾丰富，零金碎锦，多可采之辞……余素乏新识，中年脑力日减，不能更致力新书，而稍有一知半解；不见摈于当代闻人者，则得力于《国风报》（今已止版）、《东方杂志》及此种报纸居多。”6月25日，他读了《民立报》数份，对其中一篇《社会知觉论》大为赞赏，“报纸阐明政理学理，唯此种耳”。他第二天在日记中说，每天早餐后看《民立报》二三份，“无则看他报，然意味迥逊矣”。[50]

《民立报》是于右任继《民呼日报》、《民吁日报》被封闭后，得到沈缦云等人的经济支持，继续在上海租界开办的，“调子更放低些，议论更稳健些，居然没有再禁止，出下去了”。

民呼封禁变名吁，力竭声嘶势太孤。幸得年来民立定，造成民国赖匡扶。[51]

1910年冬天正好宋教仁从日本回国，受邀出任主笔，苏州中学生顾颉刚回忆，“这使我们读报时眼界骤然开朗，觉得它真是我们的引路明灯”，“那时革命的文学团体，是陈去病（佩忍）和柳弃疾（亚子）所领导的‘南社’，他们做起慷慨悲歌、愤时嫉世的诗来。他们除了每年出一本选集之外，又和《民立报》合作，替这个报编副刊。这个副刊登载的东西，有南社的诗、词，有苏曼殊的小说，有杨笃生、陈天华的讲社会主义的文章，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和上海的一般报纸偏重黄色情调和滑稽趣味的迥然不同，使得我们做中学生的仰望之若神仙。我的同学叶绍钧（圣陶）就在这报上抄下了许多心爱的诗词，作为他自己创作的模范”。[52]

1897年出生于福州的小学生萨孟武，“家里定有《民立报》一份，最初我不会看报，我所看的是其副刊。副刊有画，油印在毛边纸之上。我则把它剪为两页，积若干页订成一本”。[53]

与他同龄的徐志摩已在杭州府中上学，《民立报》也是他常读的，1911年3月22日下午，他下课后回宿所，“阅《民立报》片刻”。次日，他从《民立报》看到中俄交涉的消息，感慨“势必经大战争而后已，为国民者，其知自警乎”！[54]

辛亥前一年，只有14岁的管劲丞略通文理，在江苏掘港，“偶尔阅读上海来的《民立报》、《时报》、《申报》、《汇报》等，……《民立报》的言论最为激烈，记得当清朝皇族内阁成立时，《民立报》曾以《新内阁还是老庆》为题进行抨击”。[55]

北京通州教会背景的华北协和书院，多数师生喜欢读《民报》、《革命军》、《民立报》等，他们托上海友人假托李提摩太开设的广学会书局名义邮寄到院。[56]

湖北新军第三十标的革命党人，“每人每月捐出一百文或五百文，订《民立报》、《大江报》及其它有关革命的小册子”。[57]

辛亥年春天，广州的黄花岗之役之所以震动人心，主要是报纸的传播，特别是《民立报》的影响。在长沙、苏州、福州、浙江各地的少男少女都通过报纸（多人回忆是《民立报》）得知这个消息，并大为感动。黄花岗一幕被看作是民国的开国序幕不是凭空的。

郁达夫说："此绝彼起地在上海发行的几家报纸，像《民吁》、《民立》之类，更是直接灌输种族思想，提倡革命行动的有力的号吹。……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义举失败，接着就是四川省铁路风潮的勃发，在我们那一个一向是沉静得同古井似的小县城里，也显然起了动摇。市面上敲着铜锣，卖早报的小贩，日日从省城里到来。……"[58]

顾颉刚说：

>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广州起义，再前一点是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民立报》都作详细的登载和重点的描写。我们在报上看到温生才被捕时对捕他的人骂一声"丢拉妈"，固然我们不懂广东话，不知道这词的含意，但同学里就把这话传开来了，每每用了"丢拉妈"来骂不和谐的。七十二烈士的慷慨捐躯的伟大精神，更在我们的灵魂里取得到了崇高的敬仰。《民立报》上不知有多少诗人歌咏他们，又有《断指男儿》一篇写出了黄兴的凌厉无前的气概。……[59]

萨孟武说：

> 黄花岗之役于全国尤其闽省有极大的影响。
>
> 当时我已会看报纸，在许多革命党人之中，我很崇拜赵声，他有一首七律，我至今还能背诵，……黄兴我也极崇拜，他往攻两广总督衙门，断了手指，血流沾衣，仍能且战且退。英雄！他有似法国革命时代的Danton，每遇起义，无不身临前阵，这种作风深深感动我们小孩子的心。[60]

少女时代的苏雪林随祖父在浙江瑞安、杭州等地，"那时我已稍能读报纸，也稍知时事，广州起义失败，七十二烈士合葬黄花岗，上海《民立报》所发表的惋惜痛恨文字，我读了深受感动。林觉民遗妻书，曾教我流了不少眼泪"。[61]

湖南学生左舜生、毛泽东都倾心于《民立报》，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对斯诺说过这家报纸对他的影响："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这家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62]

左舜生说自己在高小第三学年起，开始看日报，当时学校有报纸两份：一份上海的《时报》，一份当地的某报，他自己与同学合买的书报中，除了上海的《时报》以外，又加订了一份《民立报》，而且对"血儿"、"渔父"等名字，也比《时报》上的"惜诵"、"孤愤"更来得亲切了，这是辛亥年开学后的事。他们全班同学合资订的上海报纸还有一份《神州日报》。"其时虽还没有航空邮寄，就是武昌到长沙的一段火车也还没有通，可是上海报纸到达长沙，也不过五天光景。上海的三种报纸，对黄花岗一役的经过都记载得很详细。我们读了那班烈士们激昂慷慨的供辞，看了方声洞林觉民陈更新等的遗像，实在是悲愤万状。有一天的《民立报》，画了一件清廷赏给李准的黄马褂，上面有团花，每一颗团花便是一颗人头，尤其给我以很深的印象。当时有一件事我很不明白：清廷之防范革命，不可以说不严，但何以这些公然鼓吹革命的书报，既未遭受检查，也从来没有听说不许邮寄，而可以一一听其到达我们这样一个小学生的手里呢？我想，这决不是由于清廷懂得什么尊重言论自由，或者只是由于它的懒惰和愚昧。"[63]

留学英国的章士钊将英国和欧洲的舆论反应，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不断发专电给《民立报》，于右任后来干脆称他是驻英记者，"当时《民立报》驻英国的记者就是章先生。辛亥革命时，章先生首先打一个电报回来说英国舆论主张对中国内政不加干涉，当时在国内革命进展上有极大的影响。"[64]

章士钊回忆："武汉起义之明日，英伦新闻界中，异议稍起，莫礼逊[莫理循]于克强[黄兴]尤多微词。愚审外邦舆论之力，可左右吾党之大事也，即择其议之袒己者，通电民立报，以安吾军心，主旨即在证明革命不足召瓜分之理。自后一日一电，或一日数电，如是者月余，愚发伦敦之电始休。"[65]他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电报费。

《民立报》刊登他的专电始于10月16日，标题为《欧洲关于中国变乱之要电》：

英国报界大声欢迎武昌革命党宣告共和政体，赞成黄兴为总统。伦敦《泰晤士报》宣告中立；大意恐外人权利有危险，故劝新政府极力保护外人。

18日，刊出他发来的《欧洲关于中国变乱之要电》三则，第三则说：

伦敦留学界开会恭祝宣布共和，并电粤督张鸣歧，请其联合革命党，且电驻汉英领事，托其转至黎元洪勿杀满人。（《民立报》按：学生胆大如此，独不畏开除官费否?）

30日，他发来的专电说：伦敦报界对于北军占据汉阳，保持沉默，只有《泰晤士报》北京访员莫理循电称，民军占据南京用兵敏捷，所得已足偿所失而有余。

12月3日他发出专电一则：旅居奥地利之华侨，因孙文回国，特捐助佛朗十万枚，由孙带回充民军饷糈。[66]

他发回的这些专电，有力地回击了所谓"革命导致列强瓜分说"。[67]

12月，章士钊回国后到南京拜会宋教仁，宋捧出一大本剪报递给他，都是他过去发表在《帝国日报》、《民立报》等报纸的政论文，竟被宋收集起来，"装订成册，以时考览"，他笑对宋说："江左夷吾偌大本领，原来孕育于故纸纸堆中，亦自可喜。"[68]他接任《民立报》主笔七个月，就是起因于这段渊源。

欧洲留学生都很看重同盟会员主办的《民立报》，10月19日，蔡元培自柏林写信给吴稚晖，留学德国的学生初得武昌捷报，除了开会演说，还以"留德同人"名义发出二电，表示赞成新政府之公见，一份给上海《民立报》，一份给香港《中国日报》。

10月24日，他给吴稚晖回信："此间于星期六拟发一电于上海报馆，大

意谓外国均赞同吾党，决不干涉，望竭力鼓吹，使各地响应云。"[69]

他们不是将《民立报》简单地看作是一个报馆，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革命据点，一个政治中心或枢纽。革命党的机关部就设在这里。[70]这在中国倾向革命的一般学生和军校学生中已不是什么秘密。万耀煌一行保定军校的学生南下参加革命，船到上海，一抵岸，就迫不及待地驱车往望平街找民立报馆。"到了民立报馆，我们问渔父、血儿、英士以及许多别的作者的笔名，我们知道他们都是革命党人，但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是什么"。[71]

沈缦云的儿子沈焕唐回忆，10月24日，他跟随父亲参加了在《民立报》举行的重要会议，与会的有陈英士、宋教仁、范鸿仙、叶惠钧、叶楚伧等人。会上决定联络商团，作为光复上海的重心，同时利用《民立报》宣传革命胜利的消息，激励民气。[72]

上海光复前夕，三千多人悄悄组成革命军敢死队，由张承槱召集指挥，因为他是于右任的学生，与于右任、陈英士常有联络，"他们相约每晚在民立报馆聚会一次，交换意见，互相报告，讨论进行。除陈英士外，当时上海巨绅李平书、吴怀九（务本女校校长）、叶惠钧（商团会长）先后都来参加"。张承槱说自己"吃饭总是到民立报馆去吃，免花费钱"。[73]

追随宋教仁的日本人北一辉抵达中国后发出的第一封信，就向内田良平报告，他到上海后，发觉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设在《民立报》，而《民立报》内的革命同仁在筹划各地革命起义时，无一不是按宋教仁原先所规划的方案执行。他甚至说，报社内同仁，动辄就举宋教仁之名以为背书。无论行何事，都称是按宋先生之意办理。在他眼中《民立报》简直就是"影子中央政府"。[74]从南京临时政府的内阁名单上，可以看到许多《民立报》人的名字，交通次长于右任、实业次长马君武、教育次长景耀月、未当成内务总长而出任法制局长的宋教仁。

革命前夕，望平街的时报馆是另外一个中心，立宪派的聚集地。编辑包天笑回忆，楼上专门辟出一间房子做了一个小小的俱乐部，起名叫"息楼"，报馆内外许多朋友到这里来闲谈、喝茶，有茶房负责招待茶水，听从差遣，常来的有举人出身的沈恩孚、袁希涛、黄炎培，秀才出身的龚杰、林康侯，以及史量才、朱少屏、杨廷栋、雷奋、陈景韩等人。[75]他们在这里谈论时局，

交换信息。

新军管带林述庆在策动镇江起事前，与黄炎培约定10月31日在时报馆见面，两人商谈许久。黄炎培回忆，当时经常在一起聚会的有教育界、新闻界、工商界人士和地方老辈，包括张謇、马相伯、赵竹君等，很自然地形成了几个据点，除了息楼，还有跑马厅前的江苏省教育总会、工巡捐局，以及赵竹君家的“惜阴堂”。“而奔走联络这几个据点的是我。”[76]

武昌起事后，因为赵竹君腿脚不便等缘故，这个中心实际上移到他家“惜阴堂”去了。

三、纸纸风行

10月15日，潘朕凡在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读书：

> 下午两课毕，忽见同学三五成群，窃窃私议。余伫足而听，始知校长万廷献下一命令，大意谓：奉部令，学生不得阅看报章，致荒学业云云。命意所在，莫名其妙。
>
> 迨至晚间，接武昌密电，谓武昌已于十九日起义，盼来云云。余等始恍然悟校长禁阅报之命意。而福建同学中旗籍者，似得信较早，已先期逃脱。同时若京口驻防同学，江宁驻防同学，亦均逃去……[77]

报纸影响之大，从总办禁止学生读报可知。其实消息是禁不住的，另一同学回忆，“南京城内街头巷尾，到处听到叫卖号外的声音。报童手里拿着号外，一面跑、一面叫：‘号外！号外！革命党在武昌起义了，瑞澂、张彪都逃走了！’一瞬的工夫，号外即抢购一空。……下课后，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地议论如何参加革命的问题”。[78]

10月12日，梅兰芳在北京，那天白天，“我正在煤市街南口文明茶园演出，忽然看见台下观众手持报纸，互相传观，交头接耳，纷纷议论”。卸妆时有人到后台告诉他武昌兵变，被革命党占领了。[79]

当年2月8日，景梅九、程家柽、白逾桓等同盟会员在北京创办《国风日报》，“其初不过摘发二三疆吏之罪过，指斥在位臣奴之贪邪，笔锋凛凛，已有不可触犯之威……及武汉兴师，全国撼动，本报乃显然张共和之旗。……”[80]

8月9日，田桐、景梅九等又在京创办《国光新闻》。

景梅九回忆，武昌消息传来：

> 《国风日报》用二号字特别标出大标题，以及各地响应的电报。北京住民，大为恐慌，作官的更是忙了手脚。每日正阳门外东西两车站，行客拥挤，市面亦为之大动摇。警察来干涉报馆，不准登载各种消息。

10月14日，徐兆玮日记说，“警厅奏陆军部札，令报馆凡关于鄂事暂缓登载”。[81]

同日，吴宓日记也说：“日来警报纷纭，一日数起，闻之殊令人惊惶异常。现北京各报，已为政府禁止登载各省乱事，以故一切详情难得确知。”

10月22日，“近日京师一切稍形镇静，缘自各报受禁令不得登载鄂事后，一切消息不易喧腾于社会间，而经济恐慌亦不如前日之甚。然北京内城各街则密置守兵，并有游巡队。政府已力为戒严。然实在消息虽不能知，而人民之惊慌夫岂可掩乎？……”[82]

确实如此，《国风日报》的白逾桓忽然想起一桩故事来：“法兰西革命时，全国革军烽起，巴黎报馆受政府干涉，不准登载革命消息，他们一律处白纸，人心更慌恐，我们也试办一下！”

景梅九回忆，当时也没考究他说的这故事从什么地方得来，但觉得这种方法很妙，便赞成他的话。

> 除一版广告及社会新闻外，正面一版，全空白；却在上面排了



望平街上时报馆

一行二号字道："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这真灵验！这纸白报一出，人心更是汹汹不定，都乱猜起来嚷嚷着说："大概革命军完全胜利了！清兵大失败了！各省都响应起来了罢！不然那有一版禁登的消息呢？"呵呵，警察先生觉得不妙，又赶紧来馆告诉编辑说："除过靠不住的谣言，准你们登载就是！"自然是照常继续登载起来。时北京有一画报，专画各报登过的趣闻，颇有滑稽风味。他见本报出张空白报，却想出一种插画，画的是四家打麻雀牌，一家放出一张白版在桌面上，从下家的口里画出两道画线来，中间写得是疑问口气道："你为什么出这一张白版呢？"[83]

北京人心慌恐的实况，他当时所写的《鄂乱怀疑篇》可以为证：

当鄂警之初至，吾人固未敢置信也。盖以武昌据长江上流，为南北重镇，水陆形势之区，兵备集屯之域也；有瑞瀓为之督，黎元洪、张彪等为之将，瑞于疆吏中称能者，有手挥如意，自拟诸葛之概；张彪虽一鄙陋小人，而治兵颇严；黎元洪则欧人称为第一流名将，为南皮［张之洞］最倚重之人物，岂区区革命党人所能争取于俄顷间者哉？……无何而京师戒严，市面恐慌，束制报馆，调遣兵警；于是都人士女相惊以革命党且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达官富人，争提取藏金于银行，至有携眷纷逃者。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良可浩叹！[84]

卢智泉、温楚珩一直为《国风日报》的作为而自豪，他们回忆，当武昌首义消息传来，《国风日报》"乘机在报上鼓吹南军声势如何壮大，北伐军已进抵某地，并谓本社社员温楚珩已率队渡过黄河，等等"。因此北京满城风雨，清室举朝惊骇，莫知所措。[85]

当清帝退位，《国风日报》发起庆祝共和提灯会，也是纪念他们亲身参与创造的历史。

时在上海《天铎报》执笔的陈布雷评点北京的报纸，首先就针对《国风日报》，称许其在袁世凯的政令之下，“独能自标异帜，不惜冒犯嫌疑，为民军力尽鼓吹之责，鸿文伟著，悦耳爽心，对于汉奸尤其指斥不遗余力，唤醒燕幽之雄魂，共企共和之大业”。其余《民视报》、《光华日报》、《帝国日报》、《帝京新闻》等则是为朝廷张目。[86]

华北美国公理会、长老会、英国伦敦会三个教会联合设立的华北协和书院在距北京 40 里的通州，书院师生就是受到报刊的影响，试图策动毅军兵变，因承诺的军饷没有着落而失败，书院遭解散，学生被遣送回籍，四川学生杨学羔以及无家可归的耿志清、陈保安留下，书院图书馆所订阅的一些报刊，仅有他们三人阅读。他们每天将报上所载各省独立、革命胜利的一些好消息，择抄誊写油印出来，邮寄给回家的同学。他们又常常撰稿投寄北京《国风日报》，或鼓吹革命，或讽刺清廷，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他们在京津各报见到清廷所颁的逊位诏书，“真是兴高采烈，喜欢的连觉都睡不着。于是星夜里将诏书誊写油印出来”。次日清晨，邮寄给在乡村的同学。[87]

在保定，张绍曾部下的新军管带冯玉祥回忆：

> 那时保定府不许民间私下看报，凡是私下看报的，就都以革命党论。
>
> 这时我家里弄来一架油印机，从早到晚印刷传单，每天将《大汉报》等刊物上所刊载的民军胜利的消息，各省响应的文电，还有许多鼓吹革命的小文章，都摘录出来，用油印印好，每次三四百份，到晚上派人偷偷地到各营去散发，或是由邮局寄到本地各机关去，常常忙的通夜不睡。[88]

在长沙，“青年学生更加激动，学校自动停课，学生们终日鹄立长沙关码头上，守候从汉口开来的轮船，打听消息，抢购报纸。碰巧我遇见一个相识的乘客，他的网篮中有包裹用的报纸很多，而且新的居多，我们用好纸换取了做包裹用的报纸，跑步回校，集体传阅，并摘要抄下张贴。当时大家极关心湖南几时反正，我们已无心读书，终日在外奔走，到处打听”。[89]

在相对稳定的清廷大后方奉天：

长江岸边的武昌首先升起革命的旗帜，形势发展很快。在奉天的中文报纸每天都有事态的详细报道。大街上的报亭每天都有报纸贴出来，人群聚集在报亭周围阅读。对于此事，奉天城的绝大多数人多少有些兴趣，但没有人愿意为此而战斗。11月，从南方来的革命党开始四处活动，人们普遍感到，很快就要出事了。[90]

在宁波，《四明日报》依靠转抄上海报上的革命新闻发行量增加了一倍。“望平街现象”也在当地出现，许多人挤在邮局门口阅读当天的报纸，“电文一天要印两三次，然后在大街上叫卖，它们立刻被那些激动的市民抢购一空”。[91]

《绍兴白话报》是王子余1903年在绍兴创办的，以“唤起民众爱国，开通地方风气”为宗旨。10月26日，该报发表一篇《大事记“湖北乱事”记》[蠡子供稿]：

这回湖北的事真是惊天动地，空前绝后了。……

凡是在湖北汉口的外国人，革命党都派人去保护，又送米食过去。湖北的兵，投降革命党者，已有二万多人。……武昌城里的米店门口，都有革命党管守，不许买米的人滋闹。每一升米只准卖六十文，每人只准买两升，不许多买。革命党又到各家富户去借银，无论多少，都可以。借到以后，就还他一张钞票，说等事成以后，但凭钞票，一钱不少。革命党又立了一个红十字会，有受伤的人，都到会去医治。所有罪犯，都归咨议局去审，不许军前正法。

……革命党自称是中华国民军政府鄂省大都督。廿七日（10月18日），又同北来的官军开仗，起先因为子弹缺了，退了回去。第二次又战，革命党竟得了胜仗。革命党又分去去取别处地方。湖北的黄州，江西的南昌，都被革命党夺了去。现在京城里得了这消息，

甚是惊慌，一班大老官，都提现洋，到外国银行里存放；各部小官纷纷逃避出京。旗人也多半逃往天津，有的将门牌改换汉人姓名。政府得了这信，多半没了主意。初一开资政院，摄政王不到，叫礼亲王世铎去代那桐宣谕，当即就开国会，收拾人心。

不知这番大祸，如何了结呢。[92]

四川因为赵尔丰的封锁，无论将军还是学生都体会到得不到消息的痛苦与不安。10月30日，成都将军玉昆即在家书中说，四川已“邮电梗塞，时有不通，令人闷甚”。11月15日，他在家信中抱怨：“四面电线不通，无从悬揣。日在闷葫芦一般，急不胜急……邮电梗塞，时有不通，令人闷甚……川南、湖北、陕西三路均不通电线，月余未见一字，不知道何处如何，真如聋聩，烦闷不必言之。终日五中焦虑如焚。”于是他嘱咐在北京的儿子“将京内阁抄由邮快信寄川”。但从10月29日到11月21日，近一个月之久未得到任何消息。[93]

郭沫若的回忆也是如此：

[武昌起义] 这个消息，一直在11月25号成都独立以后，我们才确切地知道了的。在此前，官方把外来消息完全封锁了。

[四川官场成了孤岛] 像赵这样倔强的人，在清廷并未灭亡前竟把政权和平地移交出来，是很难令人想象的。

他以为赵尔丰把外界的消息封锁了，“但这是对于我们的封锁，对他自己乃至当时的官场当然是开放着的”。从玉昆的家书可知，消息对官场也是不开放的，只有赵本人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事。[94]

清廷退位后，1912年1月27日，在清朝的发祥地东北吉林，海关税务司伟博德给安格联写信说：

17日清晨全城张贴了革命党的揭帖，接着就被警察弄掉。过了几天，这个揭帖在本地报纸上登载了。官方并没有对报馆采取行动，

估计本省当局是有意不加干涉，以尽量保持中立态度。

一切平静。

2月24日：

这里接到皇帝逊位和袁世凯成立临时新政府的消息时，人心非常安定。各报馆虽在阴历年假期间关门，还是发了号外，登载最新的几道上谕和袁世凯第一批文告。[95]

自革命发生以来，报纸对年轻一代的震撼和影响不容小看。早在10月25日，在北京的少年吴宓说："鄂事惶惶，殊未知结果何如？但据报章揭，则革党在鄂设施制度，一切迥有规模，气象蒸蒸，方兴未艾。而政府则萎遢，一无所为。将来事局如何，实未可以预卜也。"[96]

同一天，叶圣陶在苏州说：

革军文牍如祭天、誓师等，报纸多有载出，皆醇厚静穆，深得书经精髓，而自有一种雄壮慷慨之气，流露于字句之间。汉族重光，气象何其绚烂也。他若致人之函，谕民之示，亦大义彰然，为不可及。文学界似亦经一次革新矣，可喜。[97]

贵州盘县的少年张道藩回忆光复前后，"我由报刊上读到许多有关革命的文告和通电，对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有了更多的认识。我的思想慢慢的发生了变化"。[98]

报纸同样影响着香港以及海外的华人。早在10月19日，法国驻香港领事馆负责人就给外长写信说：

香港民众的大多数肯定是支持革命党人的。他们白天无时无刻不在读报纸的评论，连最贫困的苦力，都要在工作中停上一时半刻，读读那些报纸，或者请人念一念。人们焦急地等待着急件电报，加

急排印的号外随时准备出版。他们挨家挨户分发叛乱分子领袖的画像，他的面容早已为大家所熟知了。

八份主要的中文报纸，包括《中南商报》、《中国日报》、《华字日报》、《世界公益报》、《循环日报》、《维新日报》、《真报》和《少年报》。

“四份完全同意革命党人，两份同情改良派，另外三份是温和派的喉舌报。但是九份全都是反满清的和反外国人的。

由于我不懂中文，所以没法每天从那些报纸上摘录消息，像在中国的各个岗位上的人们那样做。”[99]

远在异国的中国人，无论革命党人，还是一般的留学生、华侨、华人都急切地通过报纸了解国内动态，章士钊甚至把英国舆论的情况专电发回国内。10月13日，蔡元培正在德国维铿斯多中学参观，忽见德国报纸载有武汉起义消息，有一德国朋友问他：这次革命是否可以成功？他答以必可成功，因为革命党预备已很久了。[100]

19日他到了柏林，留德同学每天都在同学会聚集，竞购晨报和午、晚各报，探取中国革命消息，互相交谈，或临时筹款发电报给某某等省当局，促其响应。[101]当天，他给英国吴稚晖回信，大讲自己在柏林留学生会的见闻：

见李［倜］君方以朱笔画出革命党新闻及其间之要语，顾君则节译其大要而书于黑板，其它诸君争阅报，或欢跃，或叹惋，或怀疑，均发于革命速成之希望心。[102]

张继在法国也很快得到消息，10月9日，“武昌革命起，各报皆大字登载，中外人皆兴奋”。他一直留意报纸上的国内消息，没有报纸就托朋友剪报，6月1日他到瑞士旅游，29日晚饭后，读吴稚晖寄来的剪报，关于温生才及广州起义情形。他在日记中感叹：“夕阳西下，四山群峰皆变红色。我心之红，亦与天然相和。不知我辈同胞，受此百数烈士鲜血灌注，阳机已发生否？”此刻他盼望的时机已临，11月中旬，他与十多个同志结伴取道意大利回国。[103]

10月12日，在美国求学的胡适从报纸上得知武昌起事消息，每天关注国

内局势的变化。他在日记中不断记下报上得来的消息，10月19日，他从《神州日报》看到消息，朝廷令岑春煊入川的谕旨。10月23日，“报载袁世凯果不肯出山，而以足疾辞”。26日，他知广州将军凤山被炸死。29日，他知前一天官军获胜，夺取汉口。[104]

顾维钧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即将获得博士学位，武昌的消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我记得我们有好几天都对学习失去了兴趣，把注意力集中在阅读报纸上。我们买了一份又一份的午报和晚报，有时还打电话给《先驱报》打听更多的消息。革命给我们的印象是成功得相当容易。”[105]

9月15日，在日本留学的黄尊三从报上知四川反对国有铁道事，数十人被枪杀，感叹“政府野蛮举动，中外古今未有”。16日，看了报载，他说：“此事盖因满政府欲强夺人民所有权而发，政府无智，人民岂真可欺哉。”17日，他早晨看报，“四川铁路风潮越闹越大，武汉有响应之势。或云此中另有作用，究竟情形如何，不得而知”。10月31日，他在日记中说，自9月22日以来，四十天中四川铁路风潮日渐紧张，革命潮流随之激荡，日甚一日，“不久或将有大事发生”。11月2日，他早起阅报，才知武昌革命军起，占领省城。“欣喜欲狂，绕室彷徨，不知所措。”他每天早起阅报，为国内的战事起伏而喜而忧。21日，他阅报知浙江独立，南京震动，将军铁良有出走之讯，“喜极”。第二天，他由东京动身回国。[106]

16岁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华侨黄来旺已在那里住了20年，通过报纸关心国内的变局。他给孙中山写信时附了1912年元旦当地报纸的剪报，报道说，孙中山当选总统的消息到达那里，“狂喜很快扩散”，人们轮流上台演讲，不再承认黄龙旗，到处都是鞭炮声……硝烟散去，整条街上铺满了红的、黑的纸屑，形成一条一英寸厚的地毯。[107]

四、推波助澜

1911年11月7日，严复从北京东城金鱼胡同写信给莫理循，分析革命发生的原因，“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头脑中带来的偏见和误解的反响”被列为第一条，认为摄政王“不知道他所倚仗的东西的基础已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瓦解了”。[108]

严复的判断虽然也带有偏见和误解，但当时报纸上确实充满了许多未经证实的消息。早在9月22日，法国驻上海领事喇伯第写信给外长塞尔夫（Selves）说：

> 四川骚乱并没有在上海导致任何暴力行为，然而却在这里引起一场轰动。中国公众密切关注着事件的变化。他们的全部同情仿佛都是向着造反者方面的，而如果说大多数报刊还没有公开声明自己的倾向，从它们的文章中却能容易地看出它们在暗暗祝愿包围成都的民众集团取得成功。上海报界一贯地大搞假新闻，这一回又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已多次宣布攻陷四川省府、总督及其全家和主要官员被杀、官兵哗变、端方大人在宜昌遇刺等等。毫无疑问，这种种谎言都是革命党人有步骤地宣扬出来的，他们恨不得在这里那里引起别的混乱，浑水摸鱼，可以掀起叛乱活动。[109]

10月13日下午，翰林院编修徐兆玮到《宪报》馆，“知昨日谣传南京、长沙、安庆诸处起事皆不确。警厅奏陆军部札，令报馆凡关于鄂事暂缓登载，而《顺天时报》独将谣言一一注销，以致人心愈为惶惑，以为果有此事，故警厅嘱勿登也。……”[110]

第二天，民政部官员汪荣宝日记也说：“昨陆军部咨请本部通饬京师各

报，于鄂中乱事暂缓登载，各报均已照办，而《顺天时报》乃大书特书，南京、广州、许州、岳州、九江、安庆等处失守之谣传，真堪痛恨。”

10月15日吴宓日记：“又今日报载，河南开封、许州已皆失陷。”[111]

10月17日，法国驻上海领事喇伯第向外长汇报：

> 我们没有汉口的消息。昨天电报通讯中断了。掌握在暴乱者手中的汉口电信局，只少量地受理外国商号用英语明码写的报文，确实，他们也受理来自各国领事馆的译成密码的电报。……
>
> 我们这里对中国其它地方的情况知道得更少。……而中国报刊却在大量散布假新闻，对革命党人十分有利的新闻，尽管有道台出来辟谣，它们在老百姓中还是大有市场。我们就是这样得到重庆、天津、保定府等地爆发革命运动的消息的……本地报纸这么做无疑是有意的。这是煽动其它地方暴乱的最简单的方法。不过，不管是读中国报纸还是读外国报纸，我们对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便是北京朝廷至少是有些手忙脚乱，他们居然还没有确定派去征讨湖北革命党的军队走一条路。[112]

10月19日，吴宓日记：“近日警报纷纭，一日数起。要皆影响模糊、毫无确据，闻之殊令人疑信参半，难言其必有，而实亦不信其必无。即如今晚报纸又载，湖北革党已为萨镇冰之水师所败。道路传闻徒增疑虑耳。”[113]

10月20日，徐兆玮日记说：“今日各报所言殊异，或云孝感车站失守；或云萨军战舰被击……”10月21日，“上海各报阅至廿五日［10月16日］；尚满幅谣言：有云天津失守者；有云保定失守者，述革党之文明如目睹，大半出于鼓吹。”[114]

这一天，《民立报》刊登一条南京来电，有人看见张勋手持人心去豆腐店买豆腐，然后以油煎人心，下酒甚乐。[115]这当然不是事实，却透露出人们对张勋的仇恨。

10月22日，徐兆玮给张美叔写信：“上海阅报至廿五日为止，其所载北来消息几无一确，恐南中亦不免震动矣。……大局日就危迫，家居亦非乐土，



望平街上报馆林立

如何！如何！……”[116]

24日吴宓日记：“又载陕西兵变，此事余闻之固亦吃惊，然实不敢信其必然。或即有此事，亦不过营伍间有争抗之事，其结果惟斩杀兵士若干人而已。至于叛而革命，则实弗信其确。盖余常谓陕人今日之程度低微，尚无为革命军之资格也。”[117]

同日，叶圣陶日记：“见众同学围监督聚谈，近视之，则一短札，上书南京兵起事，所谓总督亦不知走向何处等语。盖监督之友自沪上寄来也。此语传遍全校，皆哗然。或则喜而舞，或则惧思归。余亦心乐莫名。”

25日早晨，他到校后，听说南京起事之信实系不确，“盖沪上乃有此谣传也。懊恼甚”。[118]

蔡元培在德国从报纸得到的消息，多半并不可信：10月14日，“阅报，……长沙革命军亦起，安徽、广东闻亦起义”。19日，他从来比锡到柏林，“或言革命军已克南京、九江”。[119]当天他给吴稚晖回信说：

> ……今日诸报中，南京、九江皆已克复，败萨军，沉其二艇，皆好消息，然读者均皇皇然以为未餍，盖人心渴望自由已达此程度。[120]

20日，他又读报得知，“革命军昨已大胜满军。萨镇冰率水师反正”。[121]

曹汝霖回忆，“其时人心惶恐，谣言四起，报纸竟有政府请日本平乱之登载，资政院召开临时会议，请总理出席答复。外务大臣出席答复，以报纸登载，尽属谣言，不可相信。议员以兹事体大，非总理大臣负责答复不可，于是庆总理到院，议员即起立责问，外间有政府将请外兵平乱的风说，这事重大，到底政府有无此事，请总理负责答复。庆邸即起立答道，哪有这样的事，岂有叫外国人来打咱们中国人之理，外边谣言，切勿轻听，政府决没有这种意思。说罢，即说我还有事告辞了，话虽简单，亦干脆爽快，议员亦再不提议了”。[122]

10月26日，《绍兴白话报》讲到10月10日彭、刘、杨三革命党被杀后：

> 又拿了许多人，都是革命党，内中有两个女人，也自认是革命

党。问官讯问过以后，仍旧要在制台辕门口正法。忽然有许多看的人，都立住不肯走，官兵就吓他要放枪了，仍旧不走。一时文武官员大家商议，说这样情形，只有真正放枪了。制台也答应了下来，就吩咐官兵开枪。不料官兵说，要等黎标统（黎元洪）的命令，才好放枪。文武各官正弄得没法，却（恰）好黎标统坐了轿抬到。制台看见他到了，连忙说道："他们不肯开枪，正要等你到来，你可以吩咐他们开枪。"黎元洪忽然说道："今日我们是要来为中国的大计，不能依你了！"这时黎元洪袖子上已挂上了一块白布，又对瑞制台说道："你若要尽忠，我有手枪，你若要逃，你就逃走。"瑞制台看得势头不像，就叫文武各官都回衙门去了，自己走进后头，从毛坑边开一个洞，定时逃走，到楚豫兵轮上躲避了。黎元洪就坐在制台的案位上，叫人放火烧衙门，一霎时各处衙门同时火起。革命党四面管定，看见烧到民房，就去救。有逃出城的人，问他是汉人是满人？如查出是满人，就把他杀了。城门口死的人极多，都是满人。武昌夺去，竟是全不费力。到了第二日，革命党就挨家去安慰他，又说："昨天要你们受了惊慌，实在对不起。"四面城门，仍旧开放，叫商家仍旧开店做生意；又出了告文，怎样有赏，怎样有罚？一面去请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做民政院长，黎元洪做了鄂省大都督，黄兴对付外交……[123]

这篇报道的不少内容都与事实不吻合，尤其黎元洪的表现完全是编造的，连他是协统都说错了。

10天前，外报也有个离奇的说法：

瑞澂出逃时，遇到黎元洪，"瑞欲自匿，黎忽举枪问曰：'公欲成名乎？（谓殉城而死）欲全命乎？'瑞闻而泣下，俯首乞免，黎笑而纵之曰：'公且去，毋溷吾辈事。'瑞乃狼狈遁去。此亦得诸传说，未可以尽信也。"[124]

当时，报纸上有关黎元洪的报道多属夸张，早在10月16日，上海《申报》发表《武昌革命军总统黎元洪历史》说，湖北的一切军事擘画都是他主谋，他的革命思想得到历任总督的私袒，他治军宽严适中，爱兵怜才，湖北军界对他无不心存敬佩。20日，《申报》发表18日东京来电，横滨某党人

说，黎元洪早在甲午战后游学日本时，即已加入革命党，此次发布的告示也是四年前拟就的。[125]类似这样的报道到处都是。

10月22日，钝根即在《申报》的“海上闲谈”提醒读者：“上海人之对于鄂乱极为注意，在报馆门前伫观者，观鄂乱；在茶寮酒肆狂论者，论鄂乱；朋友晤谈一室者，谈鄂乱。亲知书札往来者，书鄂乱。夫关心世变固是佳事，然因此而张大其词，好为快意之论，不求事实之符，则又迹近谣惑，而非上海人之福也，愿与有识者共勉之。”[126]

又岂止上海，当时不仅上海的报纸，整个中国的报纸都充满了“迹近谣惑”的消息，让人难以辨认。

28日午后，叶圣陶从报纸上得知杭州兵已起事，太原为革军所据，北军主将荫昌已为部下所杀，北军全数投降。他虽说“佳消息迭至，可喜也”，同时又说：

> 近日报载各省之兵士人民已起事与否，殊未一律。汇各报而统计之，则十八省省城，只以南京尚未动也。余在校中阅报止阅一二种，故未能周知。……报上之信虽未必尽确，而不确者亦不过其小部分。终有一日，必达于其尽确也。且其日决不再远，当即在此旬日间。从此以后，……汉族同胞共歌自由，当即有一共和政体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半球之东，乐矣哉！[127]

其实，此时杭州还没有动静，所谓荫昌为部下所杀、北军投降更是无稽之谈。

南北的报纸正好相反，10月29日，吴宓日记说：“盖北京各报极力辩护，言毫无事情，好传荫昌胜仗，实皆不可凭信。而上海诸报则极力鼓吹，言革军之多胜利，实亦有过分语。吾辈今日处此，如在梦中，外间真确消息毫未闻知，实为不妥之至。”[128]

11月6日，法国驻北京武官高拉尔德给陆军部长写信：

> 满洲人与汉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因为一些过分的行为而增大，报

纸匆忙宣传各种传闻：满洲人申诉革命党人在武昌和太原府屠杀满洲人；汉族人指控满洲人在荆州的残酷行为并火烧汉口的老城区。其实对第一件事尚无任何真实的证据，而在第二件事中，也没有满洲人的任何罪证。[129]

11月6日，陆澹安在望平街，“忽时报馆贴出天津急电云，京城已破，清帝逃遁，太后、载沣不知下落，奕劻擒获，一时鼓掌欢呼之声不绝于耳”。[130]马叙伦回忆，冯国璋攻破汉阳，“上海各报不敢发表，因为那时的人民宁信《民立报》为宣传捏造的消息，而对于真实的如革命军失败的消息，就会打毁报馆的，《申报》、《新闻报》就被打过，这是民意的测验”。12月2日，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华探在南京路33号墙外发现贴着一张传单，其中指控：“《时事新报》、《新闻报》、《申报》、《时报》四家捏报汉阳失守等情，淆乱人心。”署名“国民公启”。[131]

广东独立就与一条刻意制造的假新闻有关，李文卿在上海为香港《循环报》发新闻电过活。华侨朋友温雄飞对他说，现在人心思变，官员惶惶不安，你由上海拍个使人震动的电报回去，香港、广州各报都报道出来，等于给清廷轰了一炮。他因此给《循环报》发去一新闻电：“京陷帝崩。”《循环报》没有立即发表，来电查询根据，他复电“京电不通”，《循环报》于是大印“京陷帝崩”的传单，并在门前用大字张贴，香港报界公会也跟着转发这条电讯，各报都登，广州也是。不到两天，广州的大员纷纷溜走，水师提督李准、两广总督张鸣歧都为自己的出路打算。[132]

多年后，当时在成都读书的郭沫若记得：“上海的报纸，特别是现在已经若存若亡的《神州日报》，和已经消灭了的《民立报》，那真是做了一项很伟大的工作。中国人惯会造谣的伟大本事在革命运动上倒真是发挥了它的伟大的潜能。清廷，事实上是到第二年的二月才退位的，但在上海的报纸上，在辛亥年的十一二月便已经崩溃了。四川，事实上是到11月25日才宣布独立的，但在上海的报纸上，省城是老早被保路同志军占领了。……”

就读于南昌陆军小学周雍能从报纸上看到报道，说南京在组织“陆军学生北伐敢死队”，他到了南京，却到处找不到这个组织，才知混乱中报纸捕

风捉影，随便乱登，登错了，也不更正，因为根本没有人为这种错误的报道计较。[133]

官方一直对谣言保持警醒，却无力辟谣。

有些封疆大吏还是具有一定的判断力，10月15日，两江总督张人骏致电直隶总督陈夔龙："京津安靖甚慰，南省情形亦如常。报纸讹言均不足信。"10月29日，他复电云贵总督李经羲："鄂垣满人是否尽殉，未得确音。宜昌并未被占，报纸谣言均不足信。"[134]

11月10日，他在写给张允靖的家书中说：

> 今日见铁路京电，言都中尚无他变，报纸均不足信。[135]

广东韶州的左绍佐10月22日的日记说：

> 报纸所言柯逢时、冯某、马某、汤某，皆为革党效用之说，殊不可信。

11月2日，"因报纸传京中慌乱"，他发电到京中打听，也是因为不大相信。

报纸所传有真有假，在外地往往难辨。11月18日，报纸传来陕西、山西、云南失守和保定、正定兵变的消息，"上海失守，有陶总办家电，似非报馆捏造，系十三日事。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国事至此，夫复何言"。[136]

当汉阳失陷，武昌城内人心惶惶，有一天，城内落下炮弹近百数，各机关逃亡将尽，"秩序尽失，人民去来奔逃，扶老携幼，哭声震霄，士心离散，遗枪满道途"，胡石庵的《大汉报》半天之内连出六个号外，不断报告假消息，称"他省战胜，援兵立至"，甚至说"北京反正"，以安定人心，结果"人心稍安，士气复振"。武昌出现了这样的童谣："大汉报真个巧，见了它胆大了。"又说："大汉报真胆大，人人怕，它不怕。"[137]

难怪恽毓鼎会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痛言："《论语》'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一章，近人咸疑其非圣言，谓岂有圣人而务愚民者，或乃迂曲以圆其

说。今日军民之乱，岂非民智过开及军人识字读报所致欤？乃知圣言真洞见万世也。”[138]

站在清廷立场上，早就有人洞察报纸对政权瓦解的威胁。

11月28日，知府吴兆毅从北京给东北三省总督赵尔巽写信：

“南军固乏实力，此次占据之处，半以诈取。其得利固在报馆鼓吹，其自恃亦误于报馆议论。”[139]

12月2日，租界华探发现一张传单说：“近日袁世凯特派员孟庸生辇巨金来申，联合雷继声、张菊生、夏粹芳等，主张君主立宪运动。”12月7日，蛰居上海租界的郑孝胥说：

> ……当时晚报报道，袁世凯认为可怕的不是武汉起义，而是各省独立，各省之所以独立这么快，是因为报纸的鼓吹，上海各报鼓吹尤力，所以派郑孝胥等带三十万银来运动报界，反对共和。

他将这则消息抄在日记，未加只字评论。[140]

12月28日，恽毓鼎应冯国璋之约到松筠庵，在座有三十多人。冯国璋求问保安畿辅之策，他回答：“欲靖土匪及乱党煽诱，非镇以兵力不可，而欲定人心，非解散咨议局，封禁报馆不可。”第二天，许鼎霖给给赵尔巽的信里说：

> 冯国璋、张勋均为外人所重，南方报纸诋毁各事，均无影响。愚民竟为所惑，西人故曰一纸报胜于三千毛瑟也。[141]

1912年1月4日，支持君主制的一百来人在北京琉璃井的宪政实进会开会成立“同志联合会”，推冯国璋为会长。1月8日，恽毓鼎参加“同志联合会”回家，在灯下起草《上内阁陈请排斥南报书》，当晚日记中说，“南报无不鼓吹共和，以淆惑视听，扰害治安，实社会之蠹贼。两月来，南省百姓已身受无君主之害，……敢怒而不敢言。北方无识者流，犹不免受其蒙蔽，袒共和而恶君主，一般京官又轻信谣言，惊恐纷扰，以乱商民耳目。是以欲固

根本，必须从此下手”。[142]

1月16日，“同志联合会”递交给袁世凯的呈文认为，“此次乱事之兴，首恃报纸鼓吹之力”，北方报纸附和共和、淆乱人心的也不少，“而京师重地，对于鼓吹邪说之报纸及扰乱治安之奸徒，邮部不加稽查，民部不加禁制，不特纲纪堕地，亦且危害国家”。他们吁请取缔报馆、禁销沪报、清除内奸，邮传部于轮船火车抵埠时严加稽查，凡南方造言构乱各报一律禁止行销，就是言论悖谬的函电，也应一律取缔。至于京津报馆，如有违背报律煽惑人心者，分饬民政部、直隶总督查明封禁。[143]

1月21日，叶景葵写信给金仍珠、朱旭初：“南方报章暗无天日，北方报章如《大公报》等鼓吹君主立宪，甚是。”[144]

此时，中华民国已在南京诞生，全国人心已去，君主制摇摇欲坠，无论是封禁报馆、排斥南报，还是鼓吹君主立宪，都来不及了。其实，就是在北京，有的报纸也已转向。1月5日莫理循给布拉姆写信说：

《官话报》是北京各报中最反对共和、强烈支持清廷的报纸。该报昨天的社论完全改变了立场。社论敦促朝廷接受必不可免的事情并逊位，因为这是人民明显的意志。该报竟以路易十四和理查德一世的命运告诫朝廷。[145]

五、“文字收功”

1912年11月10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胡适读到《时报》：

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

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146]

自戊戌时代以来，若论文字对中国的影响，梁启超确实首屈一指。

1904年，不足14岁的胡适从安徽绩溪乡下初到上海求学，接触到梁启超的作品，就大为倾倒，"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特别是《新民说》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都给他"开辟了一个新世界"。[147]

与胡适差不多时代的莘莘学子，几乎都是读梁启超的文章长大的。

1901年，周作人到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所看汉文书籍于后来有点影响的，乃是当时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的著作，以及严几道林琴南的译书"。[148]

1906年，14岁的梁漱溟进入北京顺天中学堂，他自述拥有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三整年六巨册、《新小说》全年一巨册，"这都是从日本传递进来的"，1910年后《国风报》也使他"得益甚大"，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生活上。[149]

1899年生在江苏常州的瞿秋白，1909年秋天跳级考入常州府中学堂预科，次年转为本科，同学李子宽说他喜欢读课外书，尤其是思想性读物，包括《新民丛报》和《饮冰室文集》等。他们班的同学因为受他影响也偶而借阅《饮冰室文集》和《仁学》等，"此两书内容秋白在校时常引为谈助"。[150]

自1897年在上海《时务报》发表那些风行中国的文章，抓住了无数读书人的心起，梁启超几乎没有一天放下手中那支常带感情的笔，他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一系列报刊，启迪了整整一个时代，在学生中拥有广泛的读者，从大学生、中学生到小学生，包括军校学生和士兵。

苏州少年顾颉刚记得，在父亲的案头看到梁启超在日本编印的《新民丛报》，"那时我已在学习作文了，梁启超的文章这样地浅显畅达而又感情丰



梁启超

富，是我在古文里从来不曾读过的，因此我在私塾功课之外就自己选读这刊物，其中尤以《少年中国论》、《呵旁观者文》等篇写得十分慷慨激昂，读得更高兴，俨然有古人‘痛饮读《离骚》’的样子，把作者的感情和自己的感情融化而为一了。我从这刊物里认识了中国所以必该变法的道理和旧制度应当怎样改革的方法”。[151]

福州少年萨孟武记得：

> 大约在光绪末年宣统初年，我就会看《新民丛报》。《新民丛报》是梁启超所办的。其中文章亦系梁启超所写。文字通俗，其影响前清晚年的人的思想甚大。
>
> 《民报》似由章太炎主持。大约文字太过古奥吧，所以影响力不如《新民丛报》那样的大。……
>
> 说实话吧，当时维新派的康梁与革命派的孙黄，在我们小孩子眼中没有区别，其价值似是同样。[152]

广西少年李任仁回忆，广西大学堂的学生廖延素与他哥哥是朋友，他们因此常有往来，“我看见他常看《清议报》、《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这类书报”。[153]

策动山东独立的夏莲居自述：“我自幼即喜欢研究问题，看到康有为、梁启超等所办《时务报》、《新民丛报》、《中国魂》等书报，思想上渐倾向于革新。”[154]

通州的华北协和书院有北京教会小学升学上来的少数旗人学生，如宝广林、惠辉庭，他们平时喜欢读《饮冰室文集》，受梁启超影响，主张立即实施立宪。[155]

嘉兴书香门第出生的少女沈亦云回忆，十几岁去北洋女师求学前，“梁任公先生的书在嘉兴已甚风行，《饮冰室自由书》成了我们的课本论题，《中国积弱溯源论》和《戊戌六君子传》读得唏嘘慷慨。读过任公文章后，我很觉心境不同，眼界亦不同。我后来与膺白（黄郛）同认，我和他，还有不少朋友，都受任公书的影响而趋向革命。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的教育，

原是鼓励志气多于研究学问，读任公书，他的笔下带着热情，而志气原亦需要学问”。[156]

少女陈衡哲追忆自己童年的阅读，“一年前我顺江而下的旅游中所读的梁启超的感人作品，已经在我年轻的心中点燃了从事文学事业的热情”。[157]

少年毛泽东也是梁启超的一个忠实读者。他在陕北窑洞里对斯诺说，在湘乡的新式小学时，表哥送了他两本书，一本就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是还有些糊涂。……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158]

在湖南长沙读小学的左舜生读过许多梁启超的文章，所以当倾向革命的老师曹孟其问他革命好还是君主立宪好？他脱口而出：“立宪好。”他后来回忆，“其时我脑筋里已经满储着康梁思想，像梁启超那类翻版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饮冰室自由书》、《饮冰室诗话》，等等，早已涉猎过”。[159]

因为戊戌前梁启超曾在长沙讲学，他初期的著作也以湖南翻印得最完备。他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他的作品单行本《饮冰室文集》、《饮冰室自由书》、《变法通议》等，左舜生都一一搜集看过，1910 年出版的《国风报》，他看的则不是翻印本而是原版，有一天晚上 10 点以后，早过了晚自修时间，同学都已就寝，他和同学易克疆在自修室看《国风报》，正看到梁以“沧江”的笔名和明水（即汤觉顿）辩论中国究竟会不会亡的长文。明水提出一段中国非亡不可的理由，沧江便发挥一段“中国不亡论”，一往一复，至十余次，明水的理由越强，沧江的答辩也愈有力。“梁任公在这一篇文章里，真是把他那一枝常带感情的健笔，发挥到淋漓尽致，我们两个青年的热泪，也就随着他的笔一直在流。”已过了 11 点，他们快要看完时，斋务姚先生出现在窗前，还好没什么事。[160]

在偏远的西北甘肃，也有一些血性青年，“起初系受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及其单行的《中国魂》、《饮冰室文集》等书刊的影响”。[161]

同样偏远的西南贵州盘县，1896 年出生的张道藩在本地高等小学读书，

"因为族中有两位长辈在日本留学常常寄回《新民丛报》等刊物，读了以后增加了不少新知识。……因为读《新民丛报》，由读其文而敬佩其人的，是梁任公。"[162]

不仅一般学堂的学生喜欢读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一类刊物，军校学生、新军士兵也是如此。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很多学生，平常喜欢阅读《新民丛报》一类的书刊"，等到武昌起事消息传来，他们便在课后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地议论如何参加革命。[163]

湖南新军四十九标"士兵中有文化的也很多（有秀才、中学生），喜欢偷偷地阅读《新民丛报》、《猛回头》、《警世钟》等书籍刊物"。[164]

1895年生在江西鄱阳县、就读于南昌陆军小学的周雍能读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对中国亟须改革有了初步认识。"由于《民报》等革命刊物不易流传内地，而梁启超的批判文字在国内流传甚广，许多人和我一样受梁启超的影响才有了革命思想的。辛亥革命一起，一般人以为是孙中山的功劳，实际上他奔走革命远在海外，而在国内的革命思想影响可能比不上梁启超。"[165]

这就不难明白，在新军将领中，对梁倾心的不仅有早年长沙时务学堂的得意弟子蔡锷，还有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这些手握兵权的将领，甚至也有良弼等满人亲贵。1911年1月初，主张君主立宪制的杨度上了一道折子，奏请赦用梁启超，称许他"著书立论数十万言，审论国情，开通民智，为力之大，莫与伦比"。[166]摄政王留中不发，《申报》、《时报》这些报纸却在1月15日公开发表了这个折子。

11月7日，严复在北京东城金鱼胡同给莫理循写信，分析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时说，梁启超有一支带感情的笔，并熟悉政治、经济和哲学：

> [《新民丛报》、《国风报》] 这两份刊物都畅销，对中国的舆论具有巨大影响。
>
> ……梁启超开始用他的杂志对摄政王政府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攻击。……内务部和各省当局被言论自由这个学说吓住了……这家杂志，连同各省数百家其它革命报刊，为全国对今年这场灾难作了思想准备。[167]

11月16日，袁世凯组织的内阁给梁启超安排了“司法副大臣”的位置，恽毓鼎当天的日记说，“梁任公授司法副大臣，以已革举人六品顶戴，一跃而至亚卿，中国从来未有之破格也”。但梁启超并不领情，袁世凯几次亲自致电、致信，召他回国，他都没有接受。对革命持反对立场、赞同君主制的严复12月23日日记提出解决时局的方略之一即：“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168]

一些重要的革命党人虽然与梁启超有尖锐分歧，他们自述精神源流时也都承认早年受到梁的影响。辛亥革命元老谭人凤对梁启超没有好感，他回忆1897年以来的那几年，购阅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与《新民丛报》，“感触于《时务报》者亦不少”，肯定梁启超“启迪国人，功诚匪浅”。同样不喜欢梁启超的胡汉民也不得不承认其文字的魅力，他在自传中说：“梁为文较严复为放纵有胆”，常使用日译新词，“时人不习见，多以为奇”。[169]

梁漱溟回忆，“革命派的出版物，不如立宪派的容易得到手”。[170]当然，国内也不是看不到革命派的刊物、小册子，左舜生在湖南长沙的高小毕业前，到定王台图书馆，把近年所出有关革命的书籍，全部涉猎了一遍（全部也不过三四十种，而且小册子居多），这是一个省立的图书馆，“可是对于革命书报，并未加以取缔，这不能说明当时的文网甚疏，只能说明满清地方官吏的麻木”。南桂馨是山西宁武县的一名秀才，被选入山西大学西斋，在那里看到过《民报》、《猛回头》、《革命军》等。[171]

梁启超的言论之所以更有影响，除了清廷对革命派的控制、打击更严厉，也不能忽略民众因恐惧而自律这个因素。早在1902年冬天，学生朱峙三就两次在日记中提及借读时务新书《中国魂》、《新民丛报》之类，“精神为快”，甚至说“习其文体是科举利器”。到1911年7月2日，他在两湖师范学堂放暑假回家时，“又借回《欧洲十一国游记》与父亲阅看。康梁之书各省尚不禁止，《民报》则不敢带归，虑有人查禁也”。[172]

文字收功，诚然不止是一个梁启超，章太炎在《苏报》、《民报》等报刊发表的文字同样影响了那个时代，1911年11月16日，《民立报》刊载章太炎回国的消息同时，专门发表社论《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说：“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祖国得有今日，文豪之力也。”同一天，印度尼西亚的

《光华日报》不约而同发表时评《文字功》，“则今日革命军赫赫之功，亦当推源于文字”，并首推章太炎与邹容，与《民立报》遥相呼应。

但要论文字的影响之深、之广，梁启超及他所办的报刊，不仅当时，恐怕迄今仍无人超越，辛亥革命的爆发更可以看作他的“文字收功日”。

六、应运而生

胡石庵被誉为“革命文章第一篇”，就是因为他在紧要关头自办《大汉报》有功。袁世凯要给他颁发一等嘉禾章，他却拒绝接受。

1911 年 10 月 12 日，在汉口开印刷公司的胡石庵听说汉阳继武昌之后已被民军占领，路遇两个日本人、两个英国人，都是平时熟悉的。他们问他，武昌之变究竟是什么性质？我们两国领事馆都接到瑞澂照会，说武昌系土匪勾结营兵作乱，意在劫夺钱财，与政治绝无关系，已就近调集湘、豫军队来剿，不日即可荡平。足下是武昌人，知其实情否？他立马回答：这是谎言。武昌此次实系革命军起义，决无二义，我对此深知。日本人听了他的话，笑着说，那么足下也是党人吗？他没有回答。英国人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三天来都是“闭城自固，绝无明文之公布，足令人心晓然。我欧洲累次革命，都不是如此隐密。”他顺口回应：“你误会了。武昌因还有满人抵抗，所以无暇顾及其它。今日全城光复，汉阳也已收回，转瞬就有公告宣布中外，以我所闻，一二天内完全之机关报也将出现，你们只要拭目待之即可。”

当时，他只是信口说说，以塞英国人之口，没想到他们听说有报纸出现大为注意，连问：“此言信乎？此言信乎？组织乃若斯完全乎？恐未的，恐未的。”他回答：“至确至确，不出三日，即有报纸出现，此事余敢必其不误。”此时，他已打定主意自办一报，把刚才说的话变成事实。英国人和日本人都喜跃而去。

他一回公司就聚集各位工徒，安排办报的事。他随即起草出版的传单，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


本館開設武昌省城內

中華民國公報

每日弍大張

黃帝紀元四千

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 為

布告大漢同胞……昔我皇祖皇帝軒轅氏……

[illegible]

賞格

如能取瑞澂暨黎昌以及張彪首級來獻者賞銀一萬兩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　日示

陸軍第二病院成立

陸軍第二病院已奉飭組織并全設立三佛閣內銀元局街第八號大宅以便病傷軍士就……特此廣告

院長王業棟白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 為

[illegible]

《中华民国公报》

赶付印刷，定于10月15日出版。仓促之间他没有好好思索，即从“大成汉记印刷公司”中取了“大汉”二字，定名《大汉报》，命人四处张贴传单，赫然与江汉关道齐耀珊、标统张永汉的告示贴在一起。这是当天傍晚5点钟的事。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中有这样几句：

大风起兮猛士兴，大汉光复喜气腾。报名采取非无意，胡乃一现便飞升。

14日早晨起，就有很多人到大成公司，问《大汉报》是否为明日出版，得到肯定的回答，他们就出资订阅。到晚上人愈来愈多，几有破门之势。他独自一人从事编辑，没有其他助手，只有两学徒做校对，从社论至于各种新闻，全部出自他一人之手，他以后回想此事，“亦可笑也”。[173]

15日，《大汉报》正式出版，假托“中华民国军政府”名义，发出《布告国人书》，主题还是“反满复汉”。他的初意销不过数千份，对待外国人足矣。没有想到，一日之内就销至两万份，还嫌不足，为武汉历来报纸所未见，因此人心大奋。“南北各省如苏、浙、皖、赣、湘、闽订阅函电纷至沓来，……而旅汉西人日辄十百联臂来购，购之不即去，每就馆翻阅，阅竟有复购多份者，不得，则以昂价致之。贩报小儿频以此获奇利。南洋华侨与夫欧美各国之民党皆专电致贺。”[174]

至此，靠他一人之力远远不够，于是他请《繁华报》主笔张云渊相助，随即又得到夏容宇、陈成城的热心赞成，担任《大汉报》义务记者。

胡石庵，字人杰，戊戌变法前夕游北京，结识谭嗣同，那年仅19岁。“日知会”事败后，他深以人民程度尚不足，专事鼓吹。有人说他文思泉涌，能日草万言，尤擅小说，有《新儒林外史》、《湘灵瑟》、《灵均恨》、《血泪因缘》、《新汉口》等作品行世。1910年，他在汉口创办“大成汉记印刷公司”，秘密刊印《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小册子。因他与孙武、詹大悲往还密切，革命党人的印刷物和报刊多交付大成公司印刷发行，如《江汉日报》、《商务报》、《大江报》等。[175]

两天后，湖北咨议局又派特别访员叶、杜、柯、贺四君按日来信，《大

汉报》的编辑渐有头绪，而瞿园美又来襄办一切，他这才有了一点空闲，留心其他事。这一天，各国洋人带着翻译到《大汉报》来称贺，前后足有两百人，一进门就脱帽称“恭喜革命”，且有数位洋人带着照相机，与记者谈话时，乘隙拍照，馆中的司机、司账等人，以及招牌房屋，都进入了他们的镜头中。[176]

10月16日，日本人宗方小太郎一抵达武汉，就注意到了《大汉报》，当天日记说：“叛军司令部自15日起发行《大汉报》，自16日起又发行《中华民国报》。”[177]

他不清楚《大汉报》并不是司令部办的，起初只是胡石庵的个人行为。《黎元洪年谱》称，“有胡人杰（石庵）者，以卖文所得之十千文，于起义之翌日自动发行《大汉报》，刊布光复军政消息，每张售铜元二枚（合二十文），一时争购者途为之塞。第一天销数即达二万余份，翌日倍之。于是，招人合作，扩充篇幅。一日来见，元洪出五千元为助，该报基础乃固”。[178]

《中华民国公报》则是军政府的公报，免费赠阅，胡石庵看到报纸之后，深感欣慰，觉得湖北报界至此“始一放光采也”，主笔张越为两湖师范学堂学生，在他眼里“文字殊淹博，令人爱慕”。10月23日，回到湖北乡下的两湖师范学堂学生朱峙三日记：“父亲在县中带有信来，附《中华民国公报》二份，乃知武汉诸事。并知胡石庵已出版有《大汉报》，起振大汉天声之义也。胡为革命党优于文学者。”[179]

詹大悲组织汉口军政分府，邀胡石庵辅佐，他也不干，继续办他的报纸。

英国《泰晤士报》称《大汉报》“为湖北首领报”、“民国之第一张报纸”，美国《纽约时报》称为“革命军之先锋”，又称为“革命军雄厚完全之现象”。葡萄牙报纸则称为“支那报界新产英物，坠地即飞”，法国《少年报》称为“革命后之第一出版物”，巴黎《日日新闻》则举《大汉报》证实拿破仑“一报纸贤于十万毛瑟之言”，德国官报称为“革命党之利器”、“革党所恃以挠动天下者”。

《大汉报》的出版不仅赢得了外国人的好感，对于鼓动国内民心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出版初日，销行三万份，三日后增销三之一，至七日又增十之二，直至机器之力告竭乃止。购者不得，乃至破门戟指而詈。盖彼时人民信仰本报，几如迷信者重神权。凡所记载，虽少参理想，亦云确实。故鼓吹便利，效力迅捷，一纸遥至，万众欢迎。……武汉人民皆仗本报，以决狐疑、定去就，至于军政府之檄文布告，尤赖本报之揭载，乃得不踵而走，旬日间传遍中外。本报之发行外埠者，九江、湖南、上海三处销数最多，而其后光复乃最早。据北方人言，当起义时，京津各地有以五十金购本报一纸者。即山、陕、川粤各省，本报一纸亦售洋一、二元。[180]

保定的新军管带冯玉祥甚至油印《大汉报》上的消息散发。

10月29日清军进攻汉口，《大汉报》在战火纷飞中还在出号外，直到报馆被焚毁，三人死难、机器尽失，损失约一万五千余元，才被迫暂时停刊。11月8日，《大汉报》在武昌继续出版，“人惊为出奇”。出版第一天，仍发行上万份。租界的外国人多派人渡江购取。北军中也有热心者，“出重资购得多份，于军中暗相传观”，冯国璋力禁无效。《大汉报》在租界设立一个秘密机关，“按日销行报纸，收发函件，旬日间，仍涨销至三万余份”。此时武汉邮路已断，各路所来公文函件无从投递，多由《大汉报》转交鄂军政府，每日不下百多起。因外省人士直接将《大汉报》看作革命军的特设机关，不知它是独力经营，与政府并不相关。军政府到11月上旬才拨款千元奖励，湖北官报印刷局提供部分机器及铅字，《大汉报》“始得稍事扩充，加大篇幅”，从小旅馆移到一个新馆址。

当时外报有英、俄两国觊觎蒙藏、瓜分中国的谣传，《大汉报》深为忧虑，11月上旬，即首倡五族共和，劝鄂军政府勿再杀满人，因此遭到攻击，“几陷不测，然此论一出，人多云然。国中各报乃纷纷登录，主持一是……此外关于用人、行政、进兵、退敌之策，或告黄司令，或陈黎都督及诸执权者……”[181]

汉阳陷落，武昌震动，《中华民国公报》停刊，胡石庵独力坚持：“《大汉报》当与武昌共存亡也。今日之势人心馁而战疲，此当有以作其气，然事

固可伪为也。”他半天出6个号外，谎称外省到处战胜，以安定人心。清军炮轰武昌，报馆落下炮弹多枚，门墙屋脊都被毁坏，工人吓得纷纷要走，他哭坐报门，拿大洋百元分给他们，并许诺给他们加工资，报馆才没有散掉。[182]

后来，《大汉报》按日登载“劝北军同胞”白话文，洋洋数万言，通过租界向北军散发，北军读了，“纷纷感动有泣下者”，旬日之间渡汉水来投诚，或解甲遁走的几近万人，将弁无法禁止。这是辛亥初冬之事，是《大汉报》“鼓吹最力时期”。[183]

所以有人说，“民国之兴，报馆之功多于战斗。石庵以《大汉报》处危机之中，数月之间，至于效死勿去，其功又在诸报馆先也”。[184]

武昌的消息传到柏林，留德学生中就有人主张立即办报，呼应国内发生的革命。10月19日，蔡元培写信给吴稚晖说，柏林大学的顾孟余主张在欧洲办一报纸，“于革命进行时为鼓吹机关，于革命成功后，为赞纠政治、诱导文明之机关”，他说留学界同人现在虽然都热心赞成革命，但如果革命军失败，这一热情马上消散，变得沮丧。革命军此举恐不免失败，失败之后，也定能再次振起，达到目的而后已。所以，报纸的鼓吹尤其要注意万一失败必复振起的准备，今天不可不办一报纸。

同在柏林大学的李倜不同意，“以为报纸非旦夕可建设。需款需人，需种种备具，且非目前急务”，两人辩论很久，谁也说服不了谁。蔡元培说，顾孟余可以先起草一个报纸发行办法，再来讨论。[185]

但此时国内办报已蔚成风气。11月18日，杭州光复不久，老报人杭辛斋即创办《汉民日报》，请年轻的邵飘萍为主笔，随后军政府创办《浙江军政府公报》（1912年1月22日），也由他兼任编辑。苏州光复之后，因为没有象样的报纸，军政府邀请张昭汉（默君）来办报，宣传革命，也取名《大汉报》，报馆设在沧浪亭的可园，那是少年顾颉刚、叶圣陶们常游的地方。11月18日，得知《大汉报》征集颂词，叶圣陶写下《大汉天声·祝辞》一诗，发表在21日创刊的《大汉报》上：

黄鹤楼高高百尺，登楼一呼咸感格。
三吴灵秀肯后人？一夜城头旗尽白。

……

于此乃有《大汉报》，一朝发现吴江浔，

……

报章鼓吹在平日，于此当不为无功。

少数英雄犹未足，无名英雄其实系大局。

大汉报乎须努力，吾有产生无名英雄责。

……

保护我自由，张我大汉魂，世界末日君尚存。[186]

11月22日，他从茶馆出来，遇到送报人，买了一份当天的《大汉报》，但前一天的已买不到，回校看报，觉得资料甚少，专电都是抄自他报，他感慨"在吴地创报馆总不能及沪上，亦地位使然也"。[187]

第二天，有同学买到《大汉报》创刊号，他才看到自己的诗已发表了。

他和顾颉刚知道张昭汉是湖南的一位女性，更联想到秋瑾，以为她一定又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女子，更激起他们的敬仰。他俩就写了一封长信给她，希望帮她作些报馆的事。但这信送去后杳无答复，不免使他们纳闷。[188]不过，他在《十四年前的印象》回忆，曾"得到一张回片"。[189]

12月，20岁的曾琦在重庆创办《民国新报》，王光祈、郭步陶等都是执笔者。1912年1月3日，陈去病、孙德卿等人在绍兴创办《越铎日报》，《越铎出世辞》为鲁迅执笔。

在上海，许多不同背景的报纸接连问世，10月19日，柳亚子就和朱少屏等办了一份《警报》，他回忆：

辛亥武昌起义的时候，我在上海和朱少屏同住安澜路大吉里。为了宣传前方胜利的消息，我们便办了一个《警报》。地址在城内一家小印刷所。见方不到一丈的楼面，编辑、印刷、校对都色色俱全。同事的，除我和少屏外，还有胡寄尘和金慰农。少屏和慰农翻译外报。方方的小纸儿，一天出两次，或是三次，批给报贩子，据说销路还不错呢。[190]

11月21日，邓实、李剑农等办《民国报》。次年2月20日，宁调元等办《民声日报》，经济上得到黎元洪的支持。3月28日，戴季陶等人办《民权报》。4月1日，姚雨平、叶楚伧等办《太平洋报》。5月28日，王河屏、王博谦等办《民强报》。7月20日，邓家彦等办《中华民报》，7月25日，吕志伊、邵元冲等人办《民国新闻》。

民国初成民报行，复来民影与民声。民权独具锄奸笔，今有民强与抗衡。……新报今称大共和，名词窃取亦何多。[191]

以章太炎为社长的《大共和日报》也在此时诞生。亲历其事的马叙伦回忆：

我到苏州，他们（应德闳、杜士珍）要我在上海办一份日报。我在上海福州路找了一所房子。

不久章太炎从日本回来，住爱俪园，我每日都去和章先生商谈。这时，汉阳被清军冯国璋攻陷，但上海各报不敢发表，因为那时民意激昂，热烈拥护革命，不愿意听到革命军失败的消息，报纸如果贸然把这个消息发表出来，就会激怒民众，报馆有被捣毁的危险，《申报》就曾因为这样而被打过的。章先生却得到了黎元洪的电报，知道了这个消息。他非常生气，在给我的信上竟把黄兴称做“逃帅”。我办的那份报纸取名《大共和日报》，请章先生做社长……[192]

11月22日，上海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报告记录，中华民国联合会计划出版报纸，将定名为《大共和报》。12月20日，无锡的锡金军政分府总理处日记记载：

接沪都督电：……章太炎昨抵苏，与程都督协商，拟在沪组织《大共和报》，以鼓吹临时政府之成立，催促共和政体之完全。[193]

1912年1月4日，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大共和日报》正式出版，日出两张，章太炎执笔的发刊辞以直言无忌自任："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君主专制，此为政体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恶之别。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1月5日郑孝胥日记说，"大共和报出版，章太炎发刊词对共和之失有批评。孟纯孙来信，孙中山主张五权分立，盖三权之外增纠察、考选两权，章太炎想以教育替代考选。他认为，纠察、考选、教育都行政内事情，愈分析愈纠缠耳。孙章等之不达治理如此。"[194]之后，章太炎在《大共和日报》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施政和主张如改历、建都等多有批评意见。

12月20日，京津同盟会汪精卫、李石曾、赵铁樵等在天津法租界创办《民意报》，正是南北议和时，政局复杂，相持不决，《民意报》发表文章分析利害，号召北人独立，以种种言论消除反对共和的顾虑。滦州起义，京津爆炸案，《民意报》都不遗余力地报道，招来清廷之忌。[195]1912年2月5日，《民意报》遭到法租界巡捕检查，查出手枪和化学药品，八人被捕，报纸几乎停刊。所以，黄兴在祝《民意报》一周年纪念词中称许它当初标举共和旗帜，号召北方豪俊，"今日一论，明日一文，默化潜移，卒扫共和之障碍物，而得大多数之赞同"。《民意报》最初经费由李石曾筹备，孙中山回国后每月资助1200元，后来唐绍仪月助400元，赵秉钧曾一次送来5万元，被拒。[196]

梁漱溟回忆，"以甄亮甫为首的我们一班朋友，所办的报纸则名《民国报》。当时经费很充足，每日出三大张，规模之大为北方首创。总编辑为孙炳文……我亦充一名编辑，并且还作过外勤记者。今用漱溟二字，即是当时一笔名，而且出于孙先生所代拟"。[197]"我当时的职务是外勤记者，任务就是对外采访新闻，偶尔也写一点短评之类的文章。我在文章上的署名没有一定，有时是写'寿民'，有时还写成'瘦民'。我们这位孙炳文大哥，有一次在给我写扇面题词时，在称呼上给我写了'漱溟'这两个字。我一看，这两个字比我的'寿民'、'瘦民'两个字好，从此我就改名为梁漱溟。"[198]

《民国报》最初设在天津，不久迁到北京，梁漱溟的同班同学甄亮甫（元熙）担任社长，他在《民国报》做了一年多记者。

1912年春天，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临时大总统府的秘书星散，任鸿隽在出国留学前，曾在北京国务院襄理文书，却有意"尽力言论界"，兼为天津

《民意报》、重庆《新中华报》提供他采访的"确实政闻"。后因赵铁樵恳切邀请，出任《民意报》总编辑，杨杏佛为驻京访员（兼《新中华报》的访员），他们每天或通电话、或通信。期间，他将好友朱芾煌托他保存的日记改写为《共和建设别记》，在报纸上连载，透露了朱在武昌起事后与袁世凯父子密谋斡旋南北的许多内情，令袁很是不安，文章连载到一半，《民意报》就遭天津租界当局停刊一个多月的处分。[199]

加上原来的《国风日报》、《国光新闻》，北京有革命党背景的报纸已不少，但宣传的目的太强，党派色彩太浓。5月11日，杨杏佛在北京写信给柳亚子：

> 报纸虽众，强半为个人之机关或一党之机关，日以攻击异己，排斥他党为事，舆论之价值如是而已。现本会拟办一大报，发挥会中主义，已有函劝铁崖先生来主持笔政。[200]

同月25日，任鸿隽家书中也说：

> 唯北京同志所办之报虽多，皆苦于能文者少，故皆无甚价值。[201]

在这些私信中，他们流露出对北京报纸的失望。这一年，全国报纸骤增到500种，销量达到4200万份。[202]

【注释】

① 张謇1913年给孙毓筠、王铁珊函稿，《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98页。

②《叶圣陶集》第十九卷，第42页。

③《辛亥光复日记》，《黄光集》，第361页。

④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1页；《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页。

⑤ 秋虫：《武汉新闻史》，第22页，转引自刘望龄：《湖北的舆论导向与武昌起义的成败》，《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下），

中华书局1994年，第992页。

⑥ 转引自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第18页。

⑦《申报》1911年10月19日，参考陈三井：《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辛亥革命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72页。

⑧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225页。《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216页。

⑨《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05、446页。

⑩《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65页。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56、57页。

⑪《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闻界动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82页。

⑫《叶圣陶集》第十九卷，第39页。

⑬ 周钟岳：《惺庵日记》，《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222、223页。

⑭《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47—48页。

⑮ 转引自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第36页。

⑯《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70页。

⑰ 陆澹安：《澹安日记》上册，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第38、39、42、43、44、47页。

⑱《天铎报》1911年10月25日，转引自《陈布雷回忆录》，第53、54页。

⑲《天铎报》1911年10月27日，转引自《陈布雷回忆录》，第54、55页。

⑳《陈布雷回忆录》，第49页。

㉑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47页。

㉒ 蔡元培：《辛亥那一年》，《越风》杂志第20期（1936年10月10日）。

㉓《申报》1911年10月29日。

㉔ 黄尊三：《留学、归国日记》，《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2卷，第259页。

㉕《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774页。

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120页。

㉗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㉘《郁达夫散文选集》，第283、284页。

㉙《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㉚《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观感》，《中国哲学》第九辑，第519页。

㉛《叶圣陶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1页。

㉜《叶圣陶集》第十九卷，第34—44页。

㉝ 王德森：《辛亥九月苏城变乱记》，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等编：《苏州

史志资料选辑》第13、14辑合刊，1989年内部发行，第156页。转引自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第28页。

㉞《缘督庐日记钞》，第219、220页。

㉟《缘督庐日记钞》，第221页。

㊱《回忆辛亥革命达县的情景》，《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324页。

㊲ 黄克武编撰：《蒋复璁口述回忆录》，第23页

㊳ 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二篇），《民国丛书》第一编第25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493页。参考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

㊴《上海光复迁徙的一次重要会议》，《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48页。

㊵《民立报》刊登《本馆特别通告》，《民立报》1911年12月6日，参考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

㊶《本报特别启事》，《民立报》1911年11月1日，参考《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第49页。

㊷ 张雪筠等译编，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上海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㊸《辛亥前后江浙妇女界的革命活动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70页。

㊹《江阴光复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177页。

㊺《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观感》，《中国哲学》第九辑，第514、516页。

㊻《吴宓日记》第一册，第177页。

㊼ 梁漱溟口述，金若年记录整理：《在辛亥革命中我的活动》，《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12页。

㊽《开国文献》第二篇第五册，转引自《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1912—1927》，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七十四年，第312页。

㊾《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222页。

㊿《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93、597页。

(51)《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19页。

(52)《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观感》，《中国哲学》第九辑，第514、516页。

(53) 萨孟武：《学生时代》，第40、41页。

(54)《徐志摩未刊日记》，第20、21页。

(55)《掘港光复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232、233页。

(56) 杨学羔：《华北协和书院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42页。

(57) 鲁祖轸：《第三十标辛亥首义事略》，《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90页。参考

刘望龄：《湖北的舆论导向与武昌起义的成败》。

㊺《郁达夫散文选集》，第280、283页。

㊾《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观感》，《中国哲学》第九辑，第517页。

㊿ 萨孟武：《学生时代》，第53页。

(61)《苏雪林自传》，第19页。

(62) 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2），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18、119页。

(63) 左舜生：《近卅年见闻杂记》，第139、145页。

(64)《我还想做新闻记者》（1945年1月12日），《于右任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450页。

(65) 孤桐：《慨言》，《甲寅》1卷16号第7页。

(66) 转引自白吉庵：《章士钊传》，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1页。

(67) 参考李日：《大时代的旁观者》，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2页。

(68)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142页。

(69)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

(70) 李鍪：《光复上海组织军队日记》，《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页。

(71)《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第31—32页。

(72)《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48页。

(73)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6—267页。

(74) 黄自进：《北一辉的革命情结：在中日两国从事革命的历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九十年，第131页。北一辉著、董炯明译：《支那革命外史》，未刊稿。

(75)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

(76)《江左用兵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249页。黄炎培：《八十年来》，第53、54页。

(77) 潘朕凡：《余之辛亥革命日记》，同明等编《湖南反正追记》，第29、30页。

(78) 沈铸东：《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学生赴武汉参加革命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9页。

(79)《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343页。

(80) 景定成：《〈国风日报〉之回顾谈》，林能士编著：《辛亥时期北方的革命活动》，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16页。

(81)《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67页。

(82)《吴宓日记》第一册，第161、168页。

⑧③《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 88、89 页。

⑧④《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 89、90 页。

⑧⑤ 卢智泉、温楚珩：《记北京〈国风日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65 页。

⑧⑥《天铎报》1912 年 1 月 1 日，《陈布雷先生文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4 年版，第 1、2 页。

⑧⑦《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 448 页。

⑧⑧ 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26—127、114 页。

⑧⑨ 邓介松：《辛亥革命在湖南所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 204 页。

⑨⑩［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张士尊、信丹娜译：《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17 页。

⑨① 陈梅龙等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一宁波、温州、杭州海关贸易报告译编》，宁波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8 页。参考瞿骏着《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

⑨②《八十年前〈绍兴白话报〉报导的武昌起义》，《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 11 辑，1991 年版，第 63—65 页。

⑨③ 邱权政、杜春和整理：《蓉城家书》，《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 211、212、第 213 页。

⑨④ 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38、240 页。

⑨⑤《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324 页。

⑨⑥《吴宓日记》第一册，第 171 页。

⑨⑦《叶圣陶集》第 19 卷，第 41—42 页。

⑨⑧ 张道藩：《酸甜苦辣的回味》，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8 年版，第 6 页。

⑨⑨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16 页。

⑩⓪ 蔡元培日记，《蔡元培全集》第 15 卷，第 436 页，《辛亥那一年》，《越风》1936 年 10 月 10 日。

⑩①《蔡元培全集》第 15 卷，第 437 页。《蔡元培全集》第 7 卷，第 111、303 页。

⑩②《蔡元培全集》第 10 卷，第 106、107 页。

⑩③《张溥泉［继］先生回忆录日记》，文海出版社，第 53、54、42 页。

⑩④《胡适日记全编》（1），第 143—148 页。

⑩⑤《顾维钧回忆录》一，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72、73 页。

⑩⑥《黄尊三留学、回国日记》，《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卷，第 256 页。

⑩⑦ 邓丽兰：《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第 169 页。

⑩⑧《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 783、784 页。

⑩⑨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01 页。

⑩《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67—68页。

⑪《汪荣宝日记》第三集，第1022页。《吴宓日记》第一册，第162页。

⑫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213—214页。

⑬《吴宓日记》第一册，第165—166页。

⑭《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69—70页。

⑮ 南京专电，《民立报》1911年11月21日。

⑯《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70页。

⑰《吴宓日记》第一册，第166页。

⑱《叶圣陶集》第19卷，第41页。

⑲《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436、437页。

⑳《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107页。

㉑《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437页。

㉒《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㉓《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64页。10月24日，朱鹏从上海给朱旭初的信中也说："瑞澂逋楚豫，途遇黎元洪，长跪乞命，可鄙也！"可见谣传甚广。《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328、329页。

㉔《辛亥革命征信录》从《字林报》、《文汇报》、《泰晤士报》、《大陆报》摘录的报道，《辛亥革命》（五），第202页。

㉕《申报》1911年10月16日。参考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

㉖《申报》1911年10月22日。

㉗《叶圣陶集》第19卷，第43页。

㉘《吴宓日记》第一册，第170页。

㉙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368页。

㉚《澹安日记》上册，第43页。

㉛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第42页。《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76页。

㉜《辛亥归国锁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423页。

㉝ 郭沫若：《少年时代》，239页。沈云龙、陈三井等：《周雍能先生访问纪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12、13页。

㉞《历史档案》1981年第三期，第35、47页。

㉟ 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㊱《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510、513、515页。

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27、228页。参考黄峻岭：《谣言与革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11月，第145页。

⑬⑧《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58页。

⑬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345页。

⑭⓪《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75—76页。《郑孝胥日记》（三），第1366页。

⑭①《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354页。

⑭②《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69页。

⑭③《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85、286页。

⑭④《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371页。

⑭⑤《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825页。

⑭⑥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0页。

⑭⑦《四十自述》，《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4页。

⑭⑧《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⑭⑨《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1989年版，第681、682页。

⑮⓪转引自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⑮①《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观感》，《中国哲学》第九辑，第512页。

⑮②萨孟武：《学生时代》，第40、41页。

⑮③李任仁：《同盟会在桂林、平乐的活动和广西宣布独立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453页。

⑮④夏莲居：《山东独立前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291页。

⑮⑤《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48页。

⑮⑥《亦云回忆》，第35页。

⑮⑦《陈衡哲童年自传》，第161页。

⑮⑧《斯诺文集》（2），第116—117、118、119页。

⑮⑨《清民之际的长沙》，《近卅年见闻杂记》，第138页。

⑯⓪《近卅年见闻杂记》，第143页。

⑯①韩定山：《辛亥革命在甘肃》，《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86页。

⑯②《酸甜苦辣的回味》，第6页。

⑯③《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69页。

⑯④余韶：《湖南光复及四十九标援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159页。

⑯⑤《周雍能先生访问纪录》，第6页。

⑯⑥杨度：《旷代逸才》，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⑯⑦《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783页。

⑯⑧《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60页。《严复日记》网络版。

⑯⑨谭人凤：《石叟牌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胡汉民自传》，

《党人三督传》，第 12 页。

⑰《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 683 页。

⑰ 南桂馨：《山西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 145 页。

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 10 辑，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36—337 页。《辛亥革命史丛刊》第 12 辑，第 244 页。

⑰《湖北革命实见记》，《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第 200、201 页。

⑰《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 225、226 页。

⑰ 范韵鸾：《〈大汉报〉主干胡石庵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 527、528 页。

⑰《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第 201 页。

⑰《辛壬日记·1912 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第 29 页。

⑰《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卷，第 173 页。

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 12 辑，第 258 页。

⑱ 倪琴舫、夏容宇、余慈舫、张云渊等：《〈大汉报〉历史记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册，第 226 页。

⑱《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 227 页。

⑱《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 529 页。

⑱《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 228 页。

⑱《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 529 页。

⑱《蔡元培全集》第 10 卷，第 105、106 页。

⑱《叶圣陶年谱长编》，第 73、74 页。

⑱《叶圣陶集》第十九卷，第 61 页。

⑱《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观感》，《中国哲学》第九辑，第 520 页。

⑱《叶圣陶年谱长编》，第 74 页。

⑲ 柳亚子：《辛亥光复忆语》，《越风》半月刊 1936 年第 30 期，参考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第 588 页。

⑲《上海洋场竹枝词》，第 219 页。

⑲ 马叙伦：《我在辛亥这一年》，《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 178 页。

⑲ 柳州市图书馆藏：《锡金军政分府总理处日记》上，《民国档案》1988 年第 4 期，第 22 页。

⑲《郑孝胥日记》（三），第 1378—1379 页。

⑲ 黄以镛回忆，《辛亥革命时期北方的的革命活动》，第 157、158 页。

⑲《辛亥革命时期北方的的革命活动》，第 159、134 页。

⑲⑦《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686页。
⑲⑧《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516页。
⑲⑨《任鸿隽家书》，第56、58页。
⑳⓪《杨杏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87页。
⑳①《任鸿隽家书》，第56页。
⑳②《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第620—621页。

第三篇　剪辫

一、辫子、辫子

"光头、光头、辫子！光头、光头、辫子！"

不少日本人从窗户伸进他们的脑袋，上上下下打量着我们，然后唧唧咕咕相互议论一通。我们不知道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日文翻译官也不懂。……

我反复听到这种声音，就像教堂里催眠的钟声一样敲打在我的心坎上。声音里似乎带有某种威胁和嘲弄的味道，我想，大概是把我们看成了对他们不利的人。我清楚地记得那种声音，那是我第一次绞尽脑汁想要弄明白的日本话。……实际上，此后一个星期我就明白了。他们说的是——

这就好比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到了美国，被美国的顽童抓住辫子嚷："中国人！长辫子！中国人！长辫子！"①

裕德龄曾在宫中居住，深得慈禧太后宠爱，移居美国后以"德龄公主"的笔名用英文写作。她少女时代随父亲裕庚出使日本，他们一行在神户上岸，在前往东京的火车上，最令她震惊的就是日本人对男人留辫子的嘲笑

和讥讽。

从1872年起，容闳带往美国留学的幼童都拖着辫子，不许剪辫和信教是朝廷严令禁止的两条。美国小孩常常跟在他们后面喊“中国女孩子”，甚至辱称为“猪尾巴”。留辫子不卫生，参加体育活动也很不便。幼童想剪辫子而不得，就把整齐的辫子盘在头上，用帽子使劲压住，或藏在衣服的后领中，生怕被人看见。只有极个别的幼童（包括容闳的侄儿容揆）违反规定剪辫，而被勒令遣返，以示惩罚。[②]

少年孙中山在檀香山上学时，他的辫子曾是当地学生取乐的对象。乃至以辫子出名的辜鸿铭早年也有这样的体验，当年他从南洋到苏格兰上学，他父亲嘱咐不许剪掉辫子。他在1919年告诉胡适：“每天出门，街上小孩子总跟着我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③]

1903年，鲁迅留学日本的次年剪掉了辫子，并在照片背面写下那首传诵很广的《自题小像》。1906年赴日本留学的浙江平阳人黄光也剪去了辫子。与蒋介石同时赴日的张群对人说，“我们当年都是留发［带辫子］出国的。到了日本就把辫子剪掉，这也是从事革命的第一个表示”。[④]有些人的辫子则是被强行剪掉的，如王军余的辫子就是在日本被陕西同乡张季鸾强行剪去的，民国成立前一天，南京满街都在剪辫子，他路遇将任总统府秘书的张季鸾。季鸾笑问他说：“你今天看的剪发，是否和我们在东京与你剪的情形一样？”[⑤]

但是，更多的留日学生不敢剪辫子，拖着辫子又怕人笑话，所以流行把辫子盘在头顶上，再戴上学生制帽，被鲁迅戏称为“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⑥]

1909年8月10日，赵元任到上海准备赴美留学，“我们必须换穿西装，最重要一点是剪掉发辫。我告诉理发师剪掉辫子时，他问了我两次，以便确定我要那么做，他说有一个人（不是我们团体之一）剪掉了辫子，他的太太竟而自杀”。[⑦]

到辛亥前夕，留学生剪发的渐多，无论民间还是官员对此都很敏感。湖南粟戡时回忆，“先是自日本留学者归，类皆剪发，民众颇为惊异”。[⑧]

1911年4月13日，成都将军玉昆给儿子的家书说：“然川地近来游学回国甚多，均系薙发，看看行为，居心叵测。”[⑨]

自清兵入关以来，男人留辫子的时间已跨越两个半世纪，在中国之外的文明世界，早已被当作一种笑柄。1898 年 9 月 5 日之后，戊戌变法即将落幕前，康有为还给光绪帝上了一道《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吁请光绪帝率先断发易服，与民更始。他列举的剪辫理由中就包括辫子在外国为人指笑，“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10] “戊戌六君子”谭嗣同身后印行的著作《仁学》也提出剪辫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当时，京中曾流传皇上将改衣冠、剪辫发，因不久发生流血政变、光绪帝被幽禁而未成。

进入 20 世纪，剪辫子的呼声逐渐高涨。1903 年 1 月 15 日，《大公报》赫然以“剪辫易服说”为征文题目，两个月后陆续发表获奖文章，第一名朱志父的《剪辫易服说》认为剪辫易服和废弓矢、立学堂一样，是因时制宜之举，与尚武精神、强健体魄联系在一起。《大公报》按语称之为“新中国特别精神”，“唤二百余年来不醒之沉梦，呼数百万方里不返之国魂”。

不仅在留学生中，就是国内新学堂学生当中，剪辫也渐成风气，1903 年 10 月 16 日《大公报》报道，“江南之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以为不如此，则形式上有缺点也”。少年胡适到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发现许多同学都剪了辫子，“还有一些激烈的同学往往强迫有辫子的同学剪去辫子。但我在公学三年多，始终没有人强迫我剪辫”。[11]

1903 年，17 岁的柳亚子在上海爱国学社时就想剪辫子，家中反对，母亲甚至威胁，倘若他把辫子剪掉，就要悬梁自尽。他的辫子虽还在，但把四周的短发留了起来。[12]

音乐家沈心工将民间小调《鲜花调》》（后改《茉莉花》）加以颠倒，编成了小学生的进行曲《剪辫》：

我同胞梳辫子，几时起？自满洲人，进中原，把发剃。叹二百六十八年里，做奴隶。

你看那宙宇里，圣贤人，自关壮缪，岳武穆，一般神。问几人剃发梳辫子，拖后身。

更看那戏台上，做戏文，自上古起，历汉唐，到宋明。问谁人编发拖辫子，在背心。

况当今全地球，五大洲，有哪一国，编发辫，拖背后。愿同胞急将辫子剪，勿再留。⑬

1895年生在湖南宝庆的蒋廷黻在湘潭一家教会学校就读，1908年或是1909年夏，“我在靖港和家人及一些学徒把辫子剪掉了。辫子是满洲人逼着汉人留的。留辫子就代表忠于满族。满清末年，它一变而成为奴隶的象征。我必须说明，在当时我对辫子的种种实在无甚了解。我剪辫子只是想表示要做个自由人而已”。⑭

比他年长两岁的左舜生时在长沙长邑高等小学校上学，辛亥年开学不久，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他们所崇拜的湖南立宪派明星、资政院民选议员罗杰（峙云）在北京剪了辫子，而且做了一首告别辫子的诗。他们班三个年纪最轻的同学柳大纯、曹应生、舒之璋剪去了三条小辫子，校长大为紧张，悬牌将他们开除学籍，他们收拾行李黯然回家。

当晚，左舜生事前预备好一把颇锋利的大剪子，大家进了寝室，他便将寝室的总门关闭，把四十几个同学集中在一间房里开会，未说明任何理由，先把自己的辫子剪下。然后对大家说：“我们今年就要毕业，校长如果把我们全体开除，他很难交代，只有我们全班同学同时把辫子剪去，才有可能保全三个同学的学籍。”说完，便将剪子交给几个事前约好的同学，他们都剪下辫子，有三五个同学有点儿迟疑，看见大家都剪，也只好忍痛照办，于是四十几条辫子全部剪了。他们打开寝室总门，报告斋务姚先生，请他转告校长慎重考虑，如果坚持非将三同学开除不可，他们准备采取第二步办法。校长吓慌了，第二天下午，把开明的长沙劝学所所长左学谦（字益斋）请来，给他们演说。他一走进讲堂，对四十几个没有辫子的学生望了一望，就态度雍容地说：“罗峙云先生，是我最敬佩的朋友，辫子不是可剪不可剪的问题，只是迟剪早剪的问题，我自己便也对这条辫子非常讨厌，可是目前的时局非常不安，没有辫子，很容易被官方误为革命党，颇妨碍我们的工作。听说你们这班的成绩很好，希望你们好好用功，不要看见报上什么消息，随便乱动，尤其不要没有辫子在街上乱跑。三位已开除的同学，可以叫他们回校，继续上课，等到你们毕业的时候，我再来和你们见面。”说完即退出。一场风潮，

就此解决。[15]

这一年在长沙读书的少年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当保路运动兴起时，“同学们越来越激动。……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去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其它一些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不守信用。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主张全部取消辫子了”。[16]

这年5月14日晚上，鼓浪屿寻源中学的林庆余等几个同学率先剪掉辫子。翌日，又有10多人剪辫。校长是美国人，责问他们剪发是不是闹革命，他们说是为了卫生，校长无语。[17]

1895年生于江西上饶的张恨水，1910年从南昌大同小学毕业，考入甲种农业学校，课余喜欢读文学书，受《桃花扇》、《洪秀全演义》的影响，他一剪刀把辫子剪了。他在《写作生涯回忆》自述：“由于学校和新书给予我的启发，我是个革命青年，我已剪了辫子。”[18]

到辛亥年春天，南通学生剪辫子已成风气，状元实业家张謇担心风声传到外地，北上进京前夕专门到南通师范学校，将70多个剪了辫子的师生召集到理化教室讲话：用功读书才是学生的本分，要朝廷立宪，要国家富强，不关辫子的事。吩咐他们赶快装一条假辫子，以后不可再有越轨的行为。在场学生徐海萍回忆，他在讲话时声泪俱下。

也是这个时候，“没有人知道是谁提倡的”，绍兴中学和师范学堂的一些学生把辫子剪掉了。鲁迅时在绍兴中学做学监，“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19]学生不听他的，还是把辫子剪了，他只装做不知道。第三天，师范学堂也有6个学生剪了辫子，当晚就被开除。[20]

远在边陲的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学生纷纷剪去辫子。长期在奉天传教的一位传教士说，“近几年，奉天的所有学生都剪掉了辫子”。或许有点夸张，但剪辫渐成风气则是事实。1899年出生的齐世英九岁进沈阳两级师范学堂附属小学读书，因为羡慕在奉天中学堂读书的二哥剪了辫子，就跟同学商量，要

同学替他把辫子剪掉，可是大家都不肯。有一天，大家都去吃饭了，他没有去，自己拿了一把剪刀剪辫子，剪了老半天，还没有完全剪掉，一直等到同学吃饭回来，再请他们帮忙才剪掉。“似乎在小学部剪掉辫子的，我还是第一人。”[21]

辛亥春节期间，在葡萄牙治下的澳门，培基学生把辫子看成亡国奴才的标志，先后剪掉辫发的为数不少。当时港澳方面剪辫的风气还未普遍，因为剪辫与反清被联系在一起，许多人也有顾虑。那天，“澳门华服剪辫会”在戏院开大会，当场即有一百多人剪了辫子。[22]香港有“华服剪辫会”，剪辫者数以万计。

剪辫子在陆军学堂和新军中，也成了一股挡不住的潮流。

1904年，练兵处因为要改军服、军帽，辫子成为障碍，请求朝廷同意剪辫，未被允许，只好将辫子盘于军帽中。不少新军官兵将发辫剪去一束，比如天津的警察都剪去了三分之一。到1906年，军人剪辫的越来越多。1910年，军咨大臣载涛得知禁卫军军官中多有剪辫的，决定听其自由，不加禁止。

慈禧太后的出殡大典，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拍了许多照片，许多新军官兵脑后光秃秃的看不到辫子，如果不是全部剪掉了辫子，至少也是大部分。辛亥革命之际，距成都90华里的川西大县彭县，一位学生目睹新军进城：

> 新式步枪上面安有长长的刺刀。那时大家都还留有辫子，但新军每个人的辫子已经剪去了五分之四，只头顶上留一小撮，盘在头上，用军帽盖着，从后面看去，简直是没有辫子似的。我县的人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兵，所以他们称新军叫作“和尚兵”，因为没有辫子的原故。[23]

1891年生在湖北黄冈的万耀煌，1909年进入湖北陆军中学，经历过一场剪辫风波，“一日在自习室，我同邻座毕家珪偶然谈起，我问他：‘我们剪辫子好不好？’他立表赞同，我拿出剪刀，请他先替我剪，虽然我们的座位在自习室的一角，不易被人发现，没想到我还没有剪完，顷刻间自习室的人都

走光了，原来大家都跑到楼上寝室里关起门来剪辫子，刹那间剪辫子的狂热传遍了全校；因为剪刀少，再加上剪得又慢，第二、三、四队整整剪了一夜还没有剪完。第二天早上八时，总办命令集合训话，大家自然猜得出是为了剪辫子的事，有的人只剪了一半，不得不加速剪，甚至有些还没有剪的人，觉得机会不再，竟一面向集合场跑，一面剪。

集合完毕，总办命剪发的同学向前走五步，结果向前走的竟达百分之九十，又命剃光头的再向前走三步，于是像和尚头的同学又有百分之三十。总办起初认为只有少数同学剪掉辫子，将予重惩，甚至不惜开除，今见此情形，不得不另作别的打算；他遂即训示我们说，留辫子是国家的制度，剪辫子等于违反国法，我们必须把头发留起来，剪辫子的每人先记大过两次，名单送陆军部。我暗中想，人心既已如此，革命的大势是阻止不了的。”㉔

1909年考入广东黄埔的陆军小学余汉谋，“一进了陆军小学，便把辫子剪掉了”。㉕1910年12月18日上午，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童保暄，“同苏仲平、熊海卿二君次第剪辫，而二十年来之赘物自此后则一丝不染矣，颇快。……是夜悦山及诸同学续剪辫者数人。”几天后，他写下一首剪发诗，留在日记中：

> 茫茫寰宇久亡圣，大道如愚不是愚。
> 斩棘披荆新界世，地球无异此头颅。㉖

浙江新军由标扩编成协，日本士官生出身的标统蒋伯器未能当上协统，突然来了个杨善德，以剪辫子为革命党的象征，但是第二标自蒋以下全是剪了辫子的光头，杨也无可奈何。㉗

黄绍竑投考广西陆军小学，招生的考官为尹昌衡，当时剪去辫子的人尚少，在投考学生中见到剪去辫子的人都录取了，他也是这样被取的（照他当时的程度，是考不取的）。㉘

1911年年初，陆军第三中学共500多学生，不约而同相率剪辫的就有两百多人，贵州学生最多，陕西次之，广西学生早已剪尽，前后剪辫的共四百多人，总办原想按规定将剪辫者一律开除，奈何人太多，“开除不胜开除”，





慈禧太后葬礼上新军的脑后已无辫

只好各记大过一次作罢。[29]

这年春天，武昌陆军测绘学堂全体学生都打算剪辫，不约而同剪掉的就有97人，没剪的寥寥无几。总办宣布剪辫者记过一次，责成即日起蓄发。

1910年9月间，刘精三在山西陆军小学堂联系了24个同学一同剪辫，到冬天，二百多个同学中除了少数旗人，剪辫的同学达170多人，太原各大专的学生说："陆军学堂变成了寺院，学生当了和尚；但也有带发修行的。"次年7月中旬，刘精三在北京的陆军部陆军第一中学堂第三期即将肄业，"全堂十一省区的学生共千余人，剪辫子者七百余人"。武昌起义引发西安、太原等地响应，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和学堂当局惊慌失措，对剪了辫子的学生防范极严。[30]

新军高级将领中，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因为剃了辫子，人们都喊他"徐秃子"。[31]

南京陆军第四中学的学生伊通甫是满族，武昌发难后，张勋要杀没有发辫的人。在校同学全无发辫，纷纷逃离南京，各归家乡。他与没有发辫、身穿新式军服的满汉同学40多人，于10月30日回到福州。第二天早上，他和20个满族学生到将军署报到，跪下磕头时，不能不脱军帽，全露出了光头。将军惊问："你们全是洋学生，都参加革命党了罢！"他们回答"没有"。"你们既然没有参加革命党，为什么没有辫子呢？""这是陆军部的命令，哪敢违抗！"将军一时语塞，分派他们去巡防营。[32]

其实，陆军部并无剪辫的命令。1891年生于江西都昌的刘士毅，1909年考入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炮兵科，"在军校期间，大家都留有辫子，陆军学生，尤其炮、辎、骑各科，不仅有操作，且须骑马，出操时，对辫子处理，极感困扰，……因此有些同学便主张把它剪掉，但剪辫是犯法的，最后大家想出个办法，一千多个学生都剪辫，学校总不能将全体开除，因此一下子，除了旗人学生外，一齐剪光。这一来事情糟糕了，旗人学生向清政府打报告说：学校中革命党很多，一夜之间辫子皆剪掉，事情非常严重。幼稚无能的清政府，接到此报告后，马上下令给驻扎保定的第二镇统制马龙标，要他派兵包围学校，搜查革命党。督办段祺瑞知道消息后，即打电话向马说：'你不要轻举妄动！小孩子们剪辫全为出操方便，并无其它用意。至于诬告校中有革命党，我可以身家性命保证不确；若你派兵前来包围学校，学生都有武器，

甚至比你部队精良，如不幸双方发生冲突，岂不酿成大祸。’此外，段又打电报至陆军部，说明学生剪辫全因操作不便，绝非革命党，如有不法之徒混进学校，请让他来查办。如此陆军部才收回成命。”

“自从这件乱子之后，凡剪辫子的都被视为革命党人，因为有了这种心理，自己反而觉得是否参加同盟会不是重要的事了。”[33]

辫子是汉族臣服于满族的一个符号，代代相沿已成习惯。当时剪辫子的毕竟还是少数人，尤其在偏远内陆，没有辫子会被人看作怪物。天津创办新学而知名的年轻教育家温世霖因带头发起学生运动，呼吁召开国会而被流放新疆，他在 1911 年 5 月 24 日，由孚远县起程，走到双岔河腰站休息，乡民见他无发辫，“以为奇怪，聚观者甚多”，他在当日日记中感慨：“风气不开，无怪其然。惜无人为之演说，以开通民智耳。”[34]

二、假辫子、真辫子

剪辫可能惹麻烦甚至引来杀身之祸，迫于环境，不少人即便剪了辫子，也只得装上假辫子。

1903 年 10 月 16 日《大公报》报道，已剪去辫发的江南学生和留学生要参加这年的乡试，“又复假装辫发，依然入场考试”。

毛泽东对斯诺说，在湖南湘乡的小学堂读书时，一个教音乐和英文的教员是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不喜那个‘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欢听他谈日本的事情。”

“假洋鬼子”是《阿 Q 正传》中的重要角色，鲁迅也曾被叫做“假洋鬼子”，他从日本回国，一到上海首先就是装假辫，“这时上海有一个专做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留学生都知道。他也做得真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

道你原来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他装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不装了。[35]

1890年生在江西的许德珩18岁进入九江中学堂，在留学归来的地理老师和图画老师影响下，加入同盟会，还剪了辫子。“因为剪辫子在清朝是冒风险的事，我有时不得不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加以掩饰。”[36]

1909年考入广东黄埔的陆军小学的余汉谋剪掉了辫子，“当时剪辫子是一件维新的事，清廷更视剪辫子者为革命党。很多人剪去之后，心里害怕，又戴上假辫子，我没有理会这一套。其实我对于剪辫子的意义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更不是革命党，只觉得多了一条辫子，实在太麻烦，不如一剪了之”。[37]

1910年，刚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同盟会员袁希洛由江苏省教育会介绍，担任苏州第一中学堂监督，不肯留长了头发梳真辫子，就将假辫子缝在帽子上。[38]李任仁在广西进优级师范那年剪掉了辫子，平日出入常戴假辫子。[39]

云南省立师范学校有个同学倪德舆因剪辫子被学校处分，记过一次。学生们于是在剪辫后，又编一假辫子，在学校上课时带上假辫子，外出时则把假辫子取掉，学校当局也莫可奈何。[40]

蒙古族的学生博彦满都在沈阳蒙文学堂读书，辛亥前经常鼓吹开国会、颁宪法，“我们把头上的辫子已经剪掉了，在乡村做宣传时，还要带上假辫子掩在帽子里，因为乡村老乡们看不惯没有辫子的人，他们说剪辫子的人是要随外国当鬼子。

剪辫子的人成了当时统治者严密注意的对象，他们说，剪辫子的人都是革命党。我们好几位同学因剪辫子受了他们旗下王爷的责罚，有的挨黑鞭子，有的罚款、罚牲畜并停止上学。”[41]

到1911年10月10日，武汉三镇风声鹤唳，风暴即将来临，汉口的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给安格联写信汇报：

道台派人送来一个查抄到的印信的印模给我看，印文是“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之印”。武昌各城门今天早上都没有开，直到十

点钟才开放汉阳门……听说今晨在武昌已经抓去了四个。我们职员里有三个人没有辫子，这样的人是有嫌疑的，我很替他们担心，叫他们多加小心。……听说本地学校里凡没有辫子的人，都叫装上一根假的。[42]

10月27日，法国驻华公使代办斐格给外长写信：

然而在北京，街道面貌几乎没有变化。警察们好好地扛着他们的步枪，他们中许多剃光了头发的人现在戴着假辫子出来。[43]

沈雁冰（茅盾）在湖州中学转到嘉兴中学前就听说，学生剪辫的很多，校长和很多教员都是革命党——

我到嘉兴中学以后，果然看到很多光头。校长方青箱装上一条假辫，据说因为他常要去见官府，不得不装假辫。……

终于，武昌起义的消息，由偶然到东门火车站买东西的一个四年级同学带回来了。立刻轰动全校。那天晚上，代数教员又到我们的宿舍闲谈，就有几位同学问他关于“武昌起义”的下文。他的回答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后来临走时他指着自修室里的几位未剪辫的同学，包括我在内，用了证方程式的口吻说：“这几根辫子，今年不要再过年了。”给大家一次兴奋的，是第二天午饭后计仰先（几何老师、革命党）的“闲谈”。他一进自修室，就对装假辫的同学说：假辫子用不着了。……

但是第二天，全校的光头忽然都装上了假辫。据说是有一位走读的同学，光头上街，大受路人注目，说他是上海来的革命党，所以全校的光头不得不临时戒严。

……

跟着，老百姓忙的，是剪辫子的“仪式”。有人主张先剪去一半；有人主张四边剪去，只留中间一把，依旧打辫子，盘起来，藏

在帽子里；更有人主张等过了年看个好日子再剪，然而也有爽爽快快变成和尚头的。[44]

在广东农村长大的学者黄药眠晚年自述，清朝垮台前：

> 剪辫子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但又有人怕事，剪了辫子，又做个假辫子接回去。于是就有人说，这些人，在家里露出了剪辫子的头颅，是革命的志士；出门的时候，则又照旧拖着长辫子，是清皇朝的不贰之臣。那时我虽小，但看见这些现象，也觉得奇怪和滑稽。[45]

11 岁的杭州少年夏衍在德清舅舅家避难，被表哥煽动剪了辫子，舅舅命令他不准出门，又找出一顶瓜皮帽，把剪下来的辫子缝在帽子里面，逼他戴上，装作没剪辫子的样子。直到十月底朝廷准许官民剪发自由的命令下达。[46]

假辫子是很容易被识破的，尤其不大逃得出侦探的眼睛。这是两则辛亥年奉天有关革党活动的探报：

> 查得日站悦来栈第二十八号房住有剪发二人，第四十三号房住有剪发二人，每日出门，全戴假辫。……日警前往盘问，传说如系革党即为保护，否则驱逐。
>
> 查得日栈大和旅馆住有戴假辫者二人，大星旅馆住有剪发者二人，沈阳旅馆住有剪发者四人，均南方口音。[47]

革命党人姚雨平对此深有体会，他回忆辛亥春天，“当时广州有不少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的学生把辫子剪去，但他们不一定是革命党人。……有些人认为革命党非剪去辫子不足以为革命的表率；我却认为在清朝残暴统治下，剪辫适足以暴露自己的身份，倒不如留辫作为掩护，比较好些。但我的意见不为党内所采纳，所以我也剪了辫子”。“三二九”之役失败后，他就是因假辫子被查，而遭到扣押。[48]

张奚若多年前由陕西到上海时已剪掉辫子，等到辛亥秋冬要回故乡策动起义，却为没辫子而犯了愁——

> 这次又是在风声鹤唳中经过北京，当然相当危险，然而装了假辫子又容易看出来，所以还是没有装。北京我是初次去，……
>
> 我带了两箱子没有卖出去的字画，匆匆地在八月二十二日离上海北上。
>
> 我记得到北京的那一天已经将近晚间八点，因为没有辫子，在前门车站就被仔细检查了一番。我住在前门外西河沿的中西旅馆，从晚间八点钟到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我一共被检查了八次。检查者包括内城外城各种军警机关。[49]

滦州起义失败，参与密谋的管带冯玉祥幸免于难，"我头上却装着一条假辫。那时王怀庆有命令，凡是没有辫子的，就是革命党，都加以逮捕。我为了头上的假辫子，每次进城，都是提心吊胆，惟恐被守兵看出破绽"。[50]

假辫子容易被识破，没辫子容易被盯上。10月16日，法国驻天津领事向外长汇报说，"我们租界里有好几个中国旅馆，目前那里广州客人往来十分频繁，大多数西装革履，没有辫子，举止诡秘"。[51]

不少革命党人如陈英士、谭人凤、邹鲁等人，之所以一直留着真辫子，就是为了不引起注意，便于活动。蒋维乔记得，当各省纷纷响应武昌，上海谣传特盛，有一天，他在电车中遇到一个人，起立称他为先生。他似曾相识，对方自称是他的学生陈英士，原来在中国教育学通学所，他教过初级化学。这时，他已将辫发剪去，陈英士的脑后却还拖着长辫。问其做什么事，回答说是报馆的访事。仅仅几天后，沪军都督赫然就是陈英士。"陈不去发辫，就是为秘密工作便利起见，非其本意"。[52]

11月3日上海发难前夕，陈英士拖着辫子，戴着瓜皮帽，穿着时式獐绒马褂，带来一只藤箱，内藏六言告示，在大操场内踱来踱去地没有开口。[53]光复之初，陈其美还没来得及剪发，拖着一条辫子，与袁希洛等谈他如何打入制造局，如何被关起来，等到李燮和打入制造局，一同夺得制造局的经过。[54]

上海光复前夕，柳亚子与朱少屏、金慰农、胡寄尘等办《警报》，“少屏、慰农老早就穿西装的，我还拖着辫子，长衫披发。寄尘呢，他本来有一根线香辫子的，一天，忽然剃了个和尚头，跑进印刷所来。少屏很不满意，埋怨他为什么要这样卤莽，他也以一笑报之。原来这时候上海还是清朝的世界，尤其是城内，我们所做的工作，颇有危险性，恐被他们识破机关。但当时的警察，浑浑沌沌，简直不晓得革命党是什么东西，我们也就安全地过去了”。[55]

邹鲁回忆，直到广东 11 月 9 日独立，“这时我在香港的任务完成，便预备回广州，动身的那天，一位女同志买了剪发机，就把我的辫子剪掉；我感谢之余，拿我所藏的袍褂和辫发送给她。旁人都取笑我，说为什么这两件宝贝，一直保留到现在。我笑着说：‘我活动革命时得此二物的庇护不少呢’。”[56]

三、辫子与脑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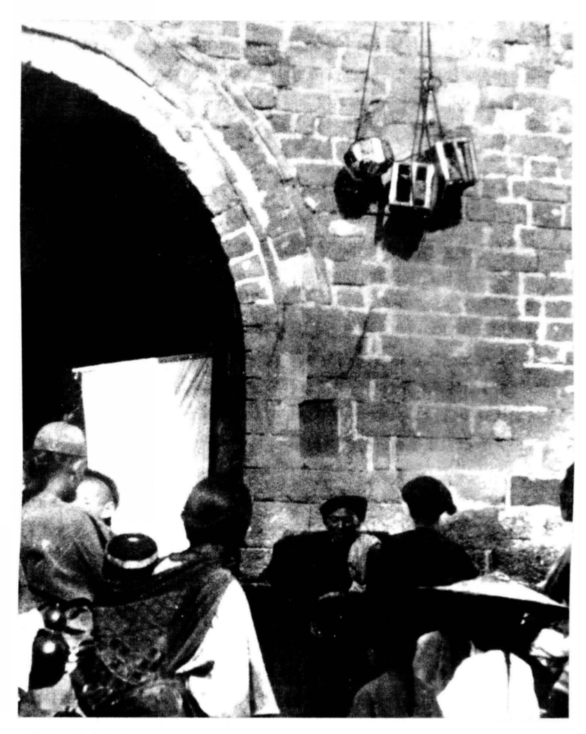
不用追溯清兵入关时的遥远往事，辛亥春天，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此次击毙乱党，剪辫者最占多数，其余未剪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善界连日在收埋尸体时却发现，有辫子的尸体也多是装假辫子的。[57]

清吏下令闭城三日，搜查革命党人。“凡属没有辫子的、穿黄军衣的以及来路不明的人，一律格杀勿论。”[58]

“三月三十日［4 月 28 日］，长堤一带及永清直街，凡见有剪辫西服之人，稍有可疑即被拿去。某报记者及光华医社，某某学堂学生均被误拿……闻在城厢内外拿获剪辫者百十人，或西装或长衫或常服不等，然实非党人也。

四月初二日［4 月 30 日］，河南爱育东街某车衣店一剪辫西装者，为巡防勇拿去，不由分辨即行斩首。又东关某茶居店东亦西装中人，亦被拿去处死。”

此时，香港的剪辫者很多，凡来广州的都被官兵扣留，因之人心惶惶，



没辫子可能被砍头

都不敢来了。[59]

惠州因谣传革命党四月初六攻城，人心异常惶恐。“届时全无影响，人心稍定，惟各处查拿剪辫者甚严。剪辫学生肩上则缝一布，写某学生及盖戳记，免被误拿……”[60]

在福州，尚其亨主张把剪辫子的都抓起来杀掉，总督松寿力主慎重，没有实行。[61]

到10月中旬，武昌革命已起，邮传部给度支部、税务处发公函：

> [接江督、赣抚电] 大致以沪、汉各轮搭客，无辫及形迹可疑之人甚多，恐匪党混迹上下，勾结生事，请设法防范。[62]

10月31日，武汉就有人因无辫而丧命，英国传教士计约翰说，“当两名外国人走进清军营地时，清军正好抓到一名奸细嫌疑犯，因为发现他没有辫子，正要将他推出去斩的当儿，那人见到外国人似乎获得了希望。他招呼外国人，拿出一封撕破了的信，证明他曾在美孚油公司工作过。他说他想去见他的老上司，想不到在去油库的路上被抓了。他用洋泾浜英语恳求把他从清军手中救出来……外国人竭尽全力想解救他，但一切徒劳。清军坚持说他‘不是好人’，不断指明他没有辫子，就是他作恶的证据。最后，那人只得死去，就如所有落入灰衣军中的无辫者的命运一样……”[63]

安徽省咨议局于11月2日宣布独立，巡抚朱家宝不能自安，突然下令逮捕“和尚头”（革命党人都是剪去发辫的和尚头，故朱以逮捕和尚头为目标），于是一夜之间，革命党人纷纷逃出安庆。[64]

在日本大阪工业专门学校求学的张廷谔，参加滦州起义失败。清吏大搜滦州城，“见无发辫子者即指为乱党，枉死甚多”。他侥幸逃脱。

方仲纯从绥远南下雁门和太原联络革命党，在大同西关外车店休息，当时他已剪辫，不小心脱帽，被店伙看见，神色突异，掉头而去，接着他听到窃窃私语“昨日孤魂滩杀无辫革命党一名，是城内某老财之子，年才十七”。同行者将他拉到后院说：“毅军最恶剪辫人，粗暴野蛮，非他人比，不速去，迟恐无及”。他们虽带有绥远将军的公文，但还是马上上马逃走，连衣囊都不要了。[65]

辫子是最明显的政治辨识标记，一有风吹草动，剪了辫的或逃，或装上假辫。武昌起义后，凡在北京的剪发学生，均有被捕杀的可能，于是纷纷化装逃避，京师大学堂的医预科剪发学生陈豪也是其中之一，由海道逃避来沪，参加中华民国学生军团。[66]

10月26日，清华学生吴宓就听说，"闻前日禁卫军中皆系满兵，有人倡议欲戮杀汉人，而先从无辫之学生下手，闻管理官所止，始克无事"。[67]

辛亥年到保定入伍生队的万耀煌记得，"在我未离开保定之前，队里谣言很多，说外面盘查极严，并指剪辫子的就是革命党（北方同学都没有剪辫子），还有说拿着革命党即就地正法……"到了天津南下的轮船上，他与同行的三人则因剪发而引人注目，"见者多肃然起敬"。[68]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遭炸弹袭击，京师戒严，廖少游日记说，"凡剪发者，都以嫌疑而被搜索"。[69]

北京没有大开杀戒，南京的张勋却因此赢得恶名。没有辫子和穿学生装成为"革命党"的罪证，立即杀害，"尤以两江师范学生被杀更多"，一学生戴着缀系着假辫的瓜皮帽外出访某同学，到了同学家，觉得很热把帽拿下，到门外小便，不巧遇到张勋的巡逻兵，立马拔刀将他杀死。[70]

"凡是剪去辫发的青年和穿着学生装的少年都被指为革命党，一律捉将官里去，不分皂白，加以杀害。……至于居民方面，被张勋的大辫子兵借口检查革命党人，实行逼取财物之事，更是不胜枚举，弄得家家户户，日夜不安，走投无路。"[71]

王孝煃《秋梦录》记录：11月10日，南京闭城，防营兵杀戮无辜。"壮丁、学生多有剪发辫者，悉拘杀不赦。"11月22日《申报》"石头城下之恶潮"报道：11月18日南京来信："城内华人无辫者，多被杀戮。"[72]

11月10日，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向朱尔典汇报：

> 在城内，最近的三天对那些不幸的居民来说是恐怖的日子。……有人估计，自星期三以来，被枪杀或处死的达五百人以上，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剪掉辫子或带有钱财，特别是后者，被认为是谋叛的确凿证据。我的一位同事看见有四十个首级被钉在张勋提督的衙

门周围；在其它许多地方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景象。在受害者中，大约有一百人属于总督的亲兵，因为他们的忠诚被认为是可疑的。……城内的其它各文职官员均已逃走，凡是能够通过仪凤门出城的居民也效法他们的榜样，仪凤门每天开放的时间很短而且是难以确定的。今晨，在允许通行的一个小时内，有一万人出城；另有一万人排成一条两英里长的长队，被关在城内。

除了几名日本人将于明日动身之外，现在城内已没有外国妇女和儿童。男人们留下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因为街道上已完全没有警察，而他们的仆人也已经逃走。[73]

这些情报被沪宁铁路的一位英国工程师所证实，他在给总办朴柏的信中说：11月8日夜间，清军挨户搜查，对稍有可疑之人，即予斩首，并把首级悬挂在各户大门上面，总共达四百个之多。邮政司看到了这种恐怖的景象。该工程师又说：他们奸污妇女，进行抢劫，并且犯了其他残酷的暴行。他们似乎在武器和弹药方面得到充分供应，但缺少食物，因此各城门于11月10日开放了一段很短的时间，有17000人被赶出了他们的家园。

朱尔典随后给英国外长格雷写信汇报时，称张勋“开始进行恐怖的统治。凡是被怀疑为起义者的人都被处死，有钱或剪辫就是充分的证据”。[74]

11月11日《申报》头版专电说：“宁省铁路停驶，居民无辫者杀死无数，兵士抢剥衣物、行人绝迹。”11月13日，法国驻上海领事喇伯第告诉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南京无疑发生过许多暴力行动，也有过冷酷的令人憎恶的凶杀，可是满洲人并没有对不留辫子的汉人进行普遍的屠戮”。[75]

11月14日，随宋教仁抵达下关的日本人北一辉也听说，南京城内大施拘捕，凡是无发辫者，皆就地屠杀，学生遭杀戮者逾千人。[76]

11月18日，金陵关税务司卢力飞给总税务司安格联写信：

［15日］应该于下午七点钟到达的上海快车没有来，后来才知道镇江南京间铁路运输断绝了。这是因为南京车站的员工很恐慌，有些员工已经剪掉了辫子，过去几天士兵在城内和下关挨户搜捕革命

党，凡是没有辫子的人都被捉到城里去杀头。

处于上游汉口的苏古敦也听说了这些恐怖的信息，12 月 2 日给安格联写信：

> ［南京］红十字会的人带来许多关于清军所作所为的可怕的传说。他们听说……把大人小孩的辫子剪掉，然后把这些人作为革命党杀死……红十字会的人还看见许多乱砍下来的辫子。[77]

以后嫁给语言学家赵元任的杨步伟只是个二十来岁的少女，亲历这一恐怖时分：

> 张勋住在我们对门巷内。看门老蔡进来说，张公馆门口兵满了，才有一个卫兵来告诉我说，他们才得到消息武昌革命党起始革命了，南京现在全城的内外城门都关了，现在下令捉拿革命党，凡没有辫子的除了是和尚都捉了去杀怎么办呢？
>
> 大家听了这消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看看二哥，二哥没有辫子，他是刚从日本回来的。二哥看看三哥，六弟，和欧阳九原（欧阳竟无的儿子）——他们三个人不几天前把辫子剪掉的。所以我们指望了多数时候的革命，到事情来了马上就发生紧急的问题到我们头上来了。
>
> 这就是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九日，就是 1911 年 10 月 10 号的事。

她趁大家不注意溜到大门口，叫了辆洋车到花牌楼看看形势。经过张勋家门口，卫兵不让过，她们又转别的路去，因为督署在大行宫，有什么事必须经过花牌楼。她们还没到，远远地就见一大堆人围在那儿看许多人头往墙上钉，说是杀的革命党。[78]

即使旗人也会因无辫而罹祸。伊通甫是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学生，“张勋关闭城门要杀没有辫子的人，他认为凡是没辫子的都是革命党，于是人心惶

惶，我虽系旗人，但也没辫子，当然也很惶恐，当即设法求得南京将军铁良的护照一纸，于旧历九月初七日中午由南京逃往上海。……九月初九船到福州海口马祖岛……沿途遇到多次的搜查，对我这没辫子的人未加盘问。在校同学全无有发辫，纷纷逃出南京，各归家乡。我10月30日回到福州，一同回来的满汉同学四十多人，都没有发辫"。[79]

"报上登有南京惨杀一事，凡无辫者皆遭杀戮"，成为11月18日资政院剪辫提案的主要理由。[80]

等到南京被攻克，抢劫财物的辫子兵来不及逃走的，被杀头，首级挂在树枝上，垂辫林立。[81]从无辫者被杀，此刻又轮到了有辫的被杀。

11月3日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24日取消，"遍设侦探，凡剪辫之人，几无不有侦探随其后"，"凡无辫者过三堂，有辫者过一堂或两堂不等"。[82]

南京以外，因为辫子而杀人较多的要数东北。一个蒙族学生曾亲眼看到："沈阳城的城墙上悬挂着一排一排的没有辫子的人头，城门内站立着几十个手持枪刀、身穿灰衣、垂着大辫子的张作霖的喽啰，正在那里以凶恶的贼眼注视来往人的发辫，有时他们还叫人把帽子摘下来验一验。"他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他们更注意剪辫子的人，不知有多少剪辫子的人被他们杀害。"[83]

1912年1月3日，袁世凯致电赵尔巽：

> 顷接唐大臣电称，准伍代表函开：……奉省官吏遇学生及剪发辫人，诬以盗贼胡匪，私刑惨害，或戳伤抛□纲毙之……

赵不承认，次日给袁复电："省内外学堂学生，照常上课居大多数……剪发自由，毫无歧视，曾经出示晓谕。犯法与剪辫无干，亦未闻有因剪辫被诬。"[84]

在奉天生活了30年的英国传教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回忆，1月24日黎明时分，"人们就开始悄悄传递消息：昨天夜里张作霖的部队闯进一些人家里，杀了很多人。奉天到处弥漫着恐怖气氛。据说，天黑出去很不安全，每个街口都有士兵，检查过往的行人。蓄辫子原来就是满人的风俗习惯，也是

非满人服从满人统治的标志，而近几年，奉天的所有学生都剪掉了辫子，此时，即使在大白天，街上再也看不到剪了辫子的人。”[85]

1月30日，奉天税务司穆厚敦给安格联信中也说：“从25日起，剪了辫子的人感到非常恐慌。一共约有二十五人被杀害［包括张榕等］。大批的人逃往南满铁道附属地，有些人在半路上被捕了。……但是张作霖接连捕杀了好几天。”[86]张榕被杀，小学生齐世英跑去看热闹，“突然人群中有人说这小孩怎么没有辫子呢？”他见势不妙，溜之大吉。回家告诉他母亲，母亲见情势不好，不能再在沈阳住了，买个假辫给他戴在头上，要他回铁岭乡间的老家去住。[87]

掉脑袋的血腥记忆强化了众人对失去辫子的恐惧。1903年出生的黄药眠口述：

> 我在辛亥革命时期，惟一的革命行动就是剪了辫子，我本来是宣统皇帝的臣民，后脑勺也留过不长不短的尾巴。大概是9岁那年，我家里才下了极大的决心，叫人给我剪去辫子。……记得剪辫子的时候，我周围还围着许多人看，有的人啧啧称奇，有的走得远远地看着这剪辫的行动，恐怕走得太近，将来会惹来麻烦，有的人又为我担心，说：“剪掉辫子这没有多大关系，就是恐怕将来连小头颅也有失去的危险！”[88]

许多人不愿剪辫，或出于惯性，或出于担忧。留学日本归来的黄光（梅僧），在家乡浙江平阳先后创办务本学堂和毓秀女校，时为当地议会议长。1911年11月9日，他日记说，两天前接到省城来电，已经独立，各邻里来问消息，见他已剪了辫子，大惊，说他“太卤莽，时局未定，负胜莫卜，闻民军毫无实力，专赖各报馆鼓吹，若一旦失败，岂非为金钱会兑字之续？”他回答：此一时彼一时也。自己以前留学日本就已剪发，回国再留起来。剪与不剪，无大关系，“且近来种族学说印入脑海，牢不可破。人心已去，实力亦用不灵也”。[89]

金钱会是发生在当地的一次反清起义，事败之后，许多参与者被杀。这

种对于剪辫子的担忧也不是杞人忧天，尘埃未定，掉脑袋的传说和记忆早已深入人心。11月30日清军攻下汉阳后，英文《大陆报》记者丁格尔再到武昌：

一个星期前我去武昌时，观察街道上和商店里的人群，兴旺的商业和自信的人群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剪掉了辫子，小衣服和丝制帽的行业特别兴隆，那些都是仿效西方的样式做的。他们随心所欲地穿戴，蔑视那些小小的、圆圆的满洲式帽子。西式的帽子随处可见。在街道旁的商店里，墙上挂满了这样的帽子。一顶帽当时值七毛钱，现在可能变成两毛了。那些过去做这种生意的人现在又把洋货抛到一边，重新卖起那种圆圆的、顶上还有一个红团的满洲帽子。……

没有什么能比他们在解放宣告中第一件事就是叫人们剪掉辫子这一点更清楚地说明问题了，因为十七世纪蓄辫子和剃掉前额头发被当作是臣服于满族统治的一种象征。

革命一开始，各地就开展了剪辫子活动，尽管清朝一项敕令容许人们既可以蓄辫也可剪辫，但他们还是仅仅因为没有辫子就杀死了成百上千个安分的百姓。[90]

四、剪辫令

1909年7月19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一则闲评《剪辫较立宪尤难》：

各国皆有宪法而中国无之，各国皆无发辫而中国有之，今中国的宪法已定于九年颁布矣，吾不知剪辫之令亦可分九年之阶级否？

剪辫的呼声持续多年，一直没有在《大公报》等报刊上消失，不仅孙中山、章太炎这样断发的革命派，鲁迅这样的留学生，与外部世界有接触的朝廷官员也深知辫子不合时宜，朝野之间，剪辫终于渐成共识。

1910年9月25日，上海《东方杂志》发表前刑部侍郎、出使美国等国大臣伍廷芳的《奏请剪发不易服折》，12月30日，《帝国日报》以《前使美大臣伍廷芳奏请剪发不易服折》为题作了转载。他表示自己“职在外交，周览各国，见闻所及，不敢自安缄默”，吁请皇上下旨准许官、商、士、庶剪去辫子，服饰则可以一仍其旧。

10月3日，具有议会雏形的资政院第一届常会在北京召开，来自湖南的民选议员罗杰、周震麟分别提出《剪辫易服与世大同》、《剪除发辫改良礼服》议案。1911年1月11日，资政院在闭会前获得通过了这两个议案，但朝廷没有接受。

1910年11月，农工商部曾以各省商界同人和商务总会的名义给朝廷上书，以辫子有碍军事训练和外交等理由，要求剪辫易服。清廷不仅不接受，还颁发上谕，要求臣民保留辫发，不要“轻听浮言，致滋误会”。[91]

民间则不予理会。11月23日，天津的广帮商人首先剪发。12月31日，广东商人何乐琴发起的“华服剪发会”决定全体会员当日剪辫子，到这年年底，在清廷眼皮底下的京津各界，剪辫的人也不下数千。剪辫的风气甚至波及清朝的“龙兴之地”东北奉天、营口及黑龙江等地。[92]

1911年1月15日，伍廷芳在上海张园发起大规模的剪辫大会。前一天早晨，他就在家中剪去了辫子。天津《大公报》报道：“赴会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午后聚集已逾二万余人。”当日会场中设高台，旁列义务剪发处，理发匠十数人，剪辫者有千余人。园主感叹：“自开园以来，未有如斯之盛况。”两个小时中，当场剪发的就有三百多人。[93]

11月18日，武昌点燃的火已成燎原之势，有人在资政院第十一次会议上再度提出剪辫议案：

“现在实行立宪，日进文明，发辫为东西各国所无。况近日剪发者已多，曷若明示剪发，既可弭满汉新旧之别，且可免外人文野之讥。应请我皇上暨我监国摄政王毅然剪发，为天下倡，并请明降谕旨，凡议员、官吏、军警、

学界，一律剪发，商民听其自由，以示与民更始之意。”

资政院经过辩论，11月20日举行的第十二次会议上通过了这个提案，决定将剪发和改历案一同上奏。汪荣宝当天的日记说：

> 开会首议剪发具奏案，多数赞成。

第二天，他日记中说，“到法制院访仲和，剪发、改历两案均已于本日具奏，然未有谕旨发表。闻尚须经内阁会议方可决定云”。[94]

公开表示反对的有湖北道监察御使温肃和湖南道监察御史欧家廉，温的意见：“武昌乱起，首下剪发之令，犹之洪逆初起，以蓄发为标识也。我朝蓄发之制相沿已久，去之未必立见富强。乃该院必欲比而同之，使人皆剪发，以暗遂其排满之谋，是何居心？”欧直接弹劾资政院误国、通匪大罪十一条，其中“误国之罪三”即为：“奏请剪发改历，易我正朔服色，使政事纷扰，愚民惊疑。”[95]候补参议陈毅则建议先拖一拖，等国会召开后再讨论。[96]翰林院侍读恽毓鼎11月21日的日记表示：

> 资政院建议剪发改历……议员见识若此，何值一钱？[97]

商人中也有反对剪辫的。景梅九自日本回来，发现剪辫的人不少，“留学生回来没有戴假辫子的了。我自然是秃头，也不觉得有什么怪看。当时还有请下剪发令的，却惹起一场笑话。因为那时剪去辫子的人，都不大戴中国硬壳瓢帽；于是卖瓢帽的商人，大起恐慌，向清廷请愿说：‘万不要下令剪发，以致妨害我们的商业。’”[98]

这些反对者其实都是汉人。

11月30日，国务大臣会议讨论资政院剪发、改历两案。[99]12月7日，朝廷终于下旨：“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辫。”[100]这一天离满洲人入关下达剃发令已经267年。

袁世凯在写给梁鼎芬的信中表示：“绝不辜负孤儿寡妇。”就在准许百姓自由剪发上谕发布的那天，在散朝外出的路上，与袁颇有交情的世续指着自

己脑后的辫子笑问道："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他肃然回答："您放心，我还要设法保全它！"[101]

第二天，唐绍仪等大臣就剪掉了辫子，当时报纸上甚至误传袁世凯几天后（13 日）也剪掉了辫子。

对剪辫持反对立场的官员郑孝胥等人的日记虽寥寥数语，却深藏着他们内心的隐痛：

12 月 7 日恽毓鼎日记：

> 谕臣民剪发自由。[102]

同一天许宝蘅日记：

> 资政院前奏剪发、改历两案，今日降旨：凡我臣民皆准其自由剪发……[103]

12 月 9 日郑孝胥日记：

> 内阁奉十七日上谕："资政院奏，恳请降旨，即行剪发，以昭大同。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发。"[104]

直隶提督姜桂题反对剪辫，声称他所部毅军，"全体均不剪辫，倘若政府以强迫命令行之，则必全体解散"。[105]

姜桂题没有做到的，张勋做到了，他的军队不顾剪辫令，一律留着辫子，以"辫子军"出名，他本人垂着辫子，招摇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直到 6 年后复辟失败。

南方的剪辫令从武昌开始，1911 年 10 月 12 日，鄂军都督府发布《宣布满洲政府罪状檄》，第八条就是指控发辫之罪，"垂狗尾以为饰"，随后下达剪辫令，先官后民，军警政人员必须剪辫，一般民众则没有这么严格。[106] 10 月 19 日《民立报》报道，陆军学生奉命到武昌街头宣传剪辫令，商会则议定

准于10月22日一律剪辫。[107]

这一天，尚未光复的江苏常熟到处传言民军要来，还有革命军临时政府下令10月22日一律剪发的四言告示：

> 中华光复，百事更新。惟此发辫，起于满清，既碍工作，且害卫生。昔呼鞑子，编入戏文；今称猪尾，惹笑四邻。……[108]

曾任湖南外交司长的粟戡时回忆：

> 湖南反正之后，人心望治，尤望除弊，故军政府以剃发、放足、禁烟三事为首先推行之政治。

他请谭延闿都督明令剪发，剪发令为他所拟："凡军民人等，所有辫发，限三日内一律剪去，否则由警察干涉之。"

> 贴于高脚牌上，乘夜派队赴四城鸣锣高唤，人心乃定。而被压迫二百七十年满洲装束之辫子，从此去矣。[109]

10月31日南昌独立，军政府第二天就下令剪辫。11月4日贵州独立，军政府发布的檄文，公订约法第一条就是"男子一律剪辫"。[110]

11月11日，上海张贴《剪辫告示》：

> 自汉起义，各省响应。凡我同胞，一律剪辫。除去胡尾，重振汉室。[111]

12月29日，陈英士鉴于一般下流社会无知识之辈积习难返，意存观望，以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的名义再度发布《示令剪辫文》，呼吁有血气的国人剪去辫发，"除此数寸之胡尾，还我大好之头颅"。[112]次日，《民立报》再次以民政长李平书名义发出《剪辫布告》，要求劝导民众，速将辫发剪除。

即使在上海，剪辫令也并非畅通无阻。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报告记录，12月29日下午三时三十分，有一队敢死队员在制造局外面马路上剪过路人的辫子。当时有一些华界巡警尚未剪去辫子，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他们对敢死队绞剪辫子提出抗议，双方发生殴斗。此时又有一百余名敢死队员从制造局出来相助，结果4名巡警被捕并被带往海防厅。

第二天，敢死队队长刘福彪坚持要求将被捕的4名巡警予以处决，被陈英士驳回。不过，三名剪辫子时因抢劫被剪人财物而遭扣押的敢死队员，则在他的请求下获释。

12月31日，总巡勃罗斯向工部局总办汇报，“一个有五十名本地剃头匠的代表团，于30日下午三时，在知县衙门晋谒县知事。他们申诉说，由于士兵经常进入他们店内剪顾客们的辫子，因此他们已无法营业而在挨饿。县知事答应为他们向陈英士都督递呈请愿书”。

1912年1月1日，《申报》发布陈其美《禁止强迫剪辫告示》：

> 通知民军人等，起义皆重文明。至于劝剪发辫，各界早表同情。……近闻各军兵士，未免过分热心，硬剪行人发辫，以致议论纷纷。责成各军官长，火速查禁无徇。……

三天后，《申报》又在1月4日发布《通令军人剪辫》告示：

> 对于普通人民，剪辫与否，原可听其自然，不以政令干涉；而军人为齐民之表率……为此，即着各兵士迅将发辫即日剪除干净，如有违抗不遵者，即行追缴饷银，革除军籍。

所谓普通人民“听其自然”，也只是说说而已。4月6日，民政长李平书再次在《时报》等报纸发布剪辫告示：“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113]

11月6日宁波军政分府成立后，下令剪辫，官吏学生士兵等限三日内剪去。“但顽固之人抗不服从，不肯剪去。后来再经民政部、执法部会衔出示：

凡不服命令、不剪辫子者，剥夺其公权及诉讼权。”[114]

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当天，就下达剪辫令，剪发的人很多。11日，广东以民政部长陈景华名义颁发通告：“既为中华国民，脱离奴籍，则此满制辫发，亟应剪除……凡本部执行警务人员，自本部长以下，即一律剪发，以尊人格。”[115]

11月23日，重庆蜀军政府成立次日即布告安民，“少数服从多数，世界公理所存，人民不分满汉，剪发即许投诚”，宣布禁止“辫发之屈辱”。[116]

11月27日成都独立，“所有军学界剪发，余自便”，大汉四川军政府名义发布剪辫告示，“照得编结毛辫，向非汉制所遗……况处尚武之时，剪发更觉便宜……”。少女胡兰畦记得，军政府下达的这道命令说：“男人梳辫子，是满清政府强迫汉人服从他们满人的奴隶风俗，现在光复了，……每个汉人都要剪掉辫子。”[117]

12月6日，英国驻云南总领事额必廉致信朱尔典：

> 11月5日，云南府贴出了一张告示，命令人民在五天的期限内剪掉他们的辫子。可是，人民普遍没有理睬它，因为它没有说明不遵守命令时应给予什么处罚。[118]

罗佩金到通海后，召集县知事、绅士、军官开会，宣布第一件事就是男子一律限24小时内剪去发辫，女子除50岁以上的一律放足。[119]

广东潮州，民军一进城即张贴四言告示：“蓄发垂辫，满清陋制，豚尾悬肩，供人弄戏；民族光复，理应毁弃，若不自动，军民代剃。”[120]

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没有马上下达剪辫令，直到清廷退位以后，3月5日他才颁布了口气强硬的《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要内务部通令各省都督，传谕所属地方：

> 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三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干净，有不遵者违法论。[121]

1月26日下午，两湖师范总学堂毕业的朱峙三在乡下剪去发辫，准备到省城谋事，他大姊为他做了一顶西式便帽。第二天，他与另一剪去发辫的秀才一同出门，有人见他们无辫，或“骇甚”，或“惊异”。他感叹：“噫！满清入关，在江苏等省勒令剃发蓄辫子以示真正服从，至有留发不留头之上谕。至今剃头匠挑担，前置水盆，上有旗竿小斗形，下挂荡刀布，作长条状，即当时书‘奉旨薙发’四字者。明遗民士族抗拒以死者何止千万？”[122]

事实上，仍有不少人没有遵令。直到1914年8月11日，天津《大公报》还刊登警察厅劝人剪辫的白话布告：“更有一般孤僻的人，自己觉着不肯趋时，他哪里晓得孔子是时中的圣人。他若生在这个时候，也是要剪了辫子，同大家一样。”

五、剪辫与革命

1911年10月13日，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纽约时报》发表述评《清国革命旨在推翻满清300年统治》，干脆将这场革命称为“剪辫”运动：

> 最近横扫清国的“剪辫”运动就是汉人反对满人统治努力的一部分，蓄长辫是满人强加于汉人的最有满族特色的风俗之一。[123]

武昌起事之初，有人告诉时在汉口的胡石庵，“咨议局已作为司令处，聚有无数剪辫之人”。[124]

在湖北陆军中学，“大约到11日午前三、四时的光景，又将学生带回校中……有些还没有剪辫子的同学，也由别人帮助他剪去，表示决心。(大多数人的辫子辛亥暑假前就剪去了的。那时候学生们以剪辫子为反清的标记。)”[125]

英国传教士计约翰日记：

10月18日

据说，黎元洪希望所有参加革命的人都剪去辫子。

10月20日

大批革命军士兵正在剪去他们的辫子。[126]

参与首义的邓飞鹏记得，就在这一天［10月20日］，他在咨议局收发室用铅笔写下10条建议，其中第一条：请军政府下剪发令，以示决心。无论军民人等，一律剪辫，以免逃走。次日，剪发令下，胡廷佐一标，完全剃光头。[127]

模范小学和各路小学堂的学生参加童子军，管带戴鸿炳说："我们革命者首先都要剪掉辫子，大家今天参加革命，如果有决心的话，那就希望立刻把辫子剪掉，但也不勉强。"全体同学都争先恐后地把辫子剪光了。[128]

10月22日湖南独立之后，各学堂学生"接着互相剪除辫发"。左舜生所在的小学，"全体教员学生都把辫子剪了，但黄校长依然把辫子盘在头顶，戴上一顶高高的帽子，我们实在不胜愤慨，再推举几个同学，硬逼他剪掉"。[129]

那年只有14岁、在明德学堂读书的陶菊隐［后来成了名记者］回忆：

剪辫子是革命后最早形成的一种风气……于是在学校中剪掉同学的辫子，当街剪掉路人的辫子，施者引为笑乐，受者啼笑皆非。（有些人）就把辫子盘在头顶上，用帽子遮盖起来，或者索性把额发留起来，改作道士装，借以逃过这一关。[130]

10月24日，离上海独立还有十来天，《民立报》发表文章说：

今日革军起事武汉，又劝民人剪辫，人多乐从。若革命终胜，则世界永无背垂发辫之人矣。[131]

此时包括陈其美都还留着辫子。11月3日准备夜攻制造局的上海商团公



辛亥前商务印书馆部分员工合影，他们大多剪了辫子

会5个体操会会员都到沪军南营操场集合，“十数人一群，便衣短服打扮的进场时都要问口令，这些人歪戴帽子，辫子绕在颈项上，绑腿上带着小插刺”，商团的直属队员（称为基本队）“辫子都已缠在军帽内了”。只有骑着一匹高头黑马进场的商团总司令李英石，穿着短制服，军帽后已没有辫子。[132]

11月6日在海防厅推选沪军都督，上海商团团员许奇松是80个会场警卫的带队之一，他们大多还没有剪掉辫子，而是盘在军帽内。陈其美穿着学生装，辫子已剪去，随身带了刘福彪的敢死队，刘的辫子缠在头顶，其他40个队员的辫子，有的缠在脖子上，有的盘在头上，也有头上裹块黑布，把辫子藏在里边的。[133]

上海商团义勇队改名为联军先锋队，驻扎龙华寺。“当时来投军的很踊跃，先验体格，写履历入册，然后剪辫发，制制服，那时四金刚座下，都是剪下的辫发，有数百条之多。”[134]

11月28日下午二时左右，驻在河南会馆的450名新兵把辫子剪了，每人发到两元赏金和一顶欧式便帽。其中200名在下午晚些时候被送到吴淞。12月10日，城里有两座庙宇进行免费剪辫，前往剪辫的约有500人。公共租界工部局次日的警务报告都有记录。

12月3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附有一份张家花园散发的传单：

> 满清发辫外人讥为豚尾。大汉光复已经月余，一般下等社会仍复拖辫不去。岂甘为畜牲乎？抑甘为满奴乎？殊不可解。请各界人等从此决去，切勿再误，……

11月8日，苏州第一中学堂学生叶圣陶剪了辫子：“到学校，有同学令时来，发辫已剪去，劝我尽剪去之。近日同学中剪去者已十之八矣。余应之，就请令时捉刀，‘嗑榻’一声，豚尾之嘲已解，更徐徐修整，令之等长。对镜自照，已不出家僧矣。而种种举止行动得以便捷，则我生自今日始也。”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写下《剪发吟》两绝句。[135]相隔多年，同学顾颉刚仍记得他的剪发诗中有一句“辜负头颅十八年”。

看着许多同学都剪了辫，顾颉刚着急了，可是他的长辈觉得马上改变这

老习惯有些看不顺眼，劝他迟一点。他心生一计，“我就对同学们说：‘凡是留辫的请不要到我家里来’，于是这夜受招待的便一色短发。回头我就对长辈说：‘你们劝我暂不要剪，你们不看见吗，现在同学们已经全剪了！’长辈们也知道大势所趋，无法阻挡，容许我在第二天上午剪去了辫子。在我的宗族和姻亲里，我还是第一个去辫的”。[136]

12月10日叶圣陶日记说，“近日割辫者甚多。校中先生同学殆已割尽。然亦有一般人冥顽不灵，牢种奴性，死留此一条亡国之纪念物，自名为不肯与世推移者。此种人无以名之，只得谓之不完全之人耳”。17日，他给一个同学剪辫子，修剪完成花了两个小时。[137]

在常州府中学读书的瞿秋白经常指着辫子对同学说：“这尾巴似的东西，留着有什么用，我们非把它剪掉不可！”不久武昌消息传来，他独自在家把辫子剪了，拎着对他母亲欢欣地说：“皇帝倒了，辫子剪了。”[138]

11月16日，上海民立中学的学生陆澹安“将发辫付之并州快剪”。[139]

11月17日，镇江都督林述庆车到龙潭，“回时见卫队、敢死队尚有未剪辫者，遂令一律剪除。各兵闻命，甚乐从，用小剪互相剪去。时余颇闲，或亲为剪发，目兵悦甚”。[140]

《民立报》12月13日报道，吴江靖湖厅有人发起“辫发剪清会”，连日报名约剪者，已有七百多人，听说他们已约定次日将辫发剪清。[141]

12月16日，翰林徐兆玮在故乡常熟给人写信：“城中剪发流行否？日内拟开会演说，以为革新之起点。”[142]

不仅在江苏，各地都把剪辫被看作是革新的起点。16岁的胡宗南在浙江孝丰县高等小学堂将要毕业。11月12日，县中同盟会人王立三运动驻军反正，全堂学生欢呼剪辫，他是第二个剪辫的。[143]

有些学生等不及光复就迫不及待地把辫子剪掉了。蒋复璁时在钱塘高等小学堂读书：

“九月初十，二哥与我都把辫子剪了，其实上海九月十四日才光复，杭州十三日光复。我们家乡硖石镇则是九月十五日下午挂白旗宣告光复。

辛亥革命，最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将辫子剪去，从此小孩子不怕打辫子了，拖了条累赘的辫子，汗水凝结，痒而发臭，那才难受呢！”

他回忆读小学时拖着一条累赘的辫子，汗水凝结，又痒又臭，难受不用说了，更麻烦的是每天早晨要打辫子。学堂为此专门雇有两个剃头匠，为全部住校的学生打辫子，一则小孩子没有耐心枯坐那么长时间，二则打辫子时要先用木梳来梳，辫发乱后，梳起来很痛，于是小孩子早晨一见剃头匠就逃，剃头匠一面追，一面喊某少爷不要跑。如果被堂长看到，不是叫剃头匠带走，就是令带走打辫子后罚站壁角。[144]

浙江处州中学堂学生毛虎侯回忆，“我们留在校内的同学得到丽水即将光复的秘密消息，就自动地把辫子剪掉了”。[145]

贵州光复，忍庐回忆：“不剪发不算革命，并且也不算时髦，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所以革命不到几时，年青的男子们，早把头发剪了，向后一把梳……笔者受了一位留东回来的老师劝告，一口气剃成光和尚头，受了亲友们好多次的讥笑。”[146]

1892年生在四川乐山的郭沫若时在成都高等学堂的分设中学：

“我们最大的喜兴是等不到独立的宣布，在头一天晚上便把辫子剪了。在这时，我们拿着剪子去强迫一些怕事的学生和首鼠两端的老教员们，我们赶得他们鸡飞狗跳。特别是那位都喇嘛先生，我们拿着四五把剪子把他包围着，弄得他无处可逃，终竟在谈笑之间把他的辫子的支配权和平授受了下来。

万岁！革命成功万岁！只消大家把头上的毛辫子一剪，从此以后，中国就可以一跃而为世界上天字第一号的头等强国了。

这样狂欢的态度，在那些得到政权的新支配者，比我们还要荒唐。”[147]

11月9日广州光复，剪辫踊跃，“无论老弱少壮之男子以及士农工商兵，罔不争先恐后，纷将天然锁链剪去。是日堤岸一带之剪辫店，自朝至暮，挤拥非常，操此业者，几致食亦无暇。……统计是日剪辫者，尽有二十余万人”。当夜，顺德数千人参加的演说会上，当场剪辫者无算。第二天，有人在一个轮渡上演说剪辫，有一八十老者当场剪辫，船上共有十多人剪辫。[148]

石龙一路民军沿途所过乡镇，人民夹道欢迎。出面殷勤招待的乡绅们穿着蓝布长衫，还用红丝绳结着辫子。等到石龙一光复，镇上的人纷纷剪掉辫子；原来民军中不少人也是拖着辫子的，此时也纷纷剪掉。女同志一般都成为临时的剪发师。[149]

11月15日在安徽寿县，淮上军司令部张贴布告，劝募义务兵，布告旁贴着标语："愿当义务兵的快把辫子剪掉。"一时大街小巷，辫发满地，四乡农民纷纷割掉"辫子"前来从军，报名申请的竟达两万多人。[150]

11月13日，偏僻的福建永定县中坑，全村悬挂白旗，燃放爆竹，热烈欢迎民军。全村男子剪掉辫发，报名参军的就有数十人。[151]

李烈钧派兵到安庆时，有三千多拖着辫子的巡防营士兵散在各处，乐意则来，不乐意则走，不好管理。李烈钧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指定一个地方，把他们集中起来，将辫子剪掉，加以整编。[152]

端方从湖北带到四川的新军士兵陈文斌回忆，他们杀掉端方后，全体官目兵同时削去辫发，摘去肩章，臂缠白布，手扬汉旗，返旗回鄂。[153]

另一位士兵则回忆，在杀端方之前，即有士兵在外面剃发铺剪去发辫。于是剪辫子之风，一传十，十传百，不到三个钟头，全标人——除标统之外，都剪去了辫子。此风也立即遍传资州城内和四乡。[154]

辛亥年冬天，即使在北京，顺天府中学堂即将毕业的学生梁漱溟不仅悄悄参加了京津同盟会，而且剪了辫子。[155]那时在北京剪辫还是有风险的，11月26日，恽毓鼎在看夜戏时发现，"旃檀寺所驻禁卫军三百余人皆在戏场，……军士见无辫而似留学生者，则怒目而丑骂之。呜呼！怨毒深，杀机动矣！恐终有激愤相屠之一日也。"[156]

1899年生在宁波的法学家的吴经熊说："1911年革命后，剪辫子成了时尚，但我大娘并不知道这件事。有一天，我的辫子被同学剪掉了；我回家时，把辫子拿在手里，看上去像一条死蛇。可怜的大娘一见我就吓得号啕大哭起来。……这辫子可是她十年里每天早上都精心地梳理打编的。"[157]

1900年生在杭州的夏衍有相似的记忆，他在德清避难时，表兄说杭州开始剪辫子了，问他敢不敢，他说敢，于是拿一把大剪刀把他的辫子剪了。可是当他拿了尺把长的辫子给母亲看时，意想不到地引起了她的暴怒。[158]

六、强迫剪辫

武昌首义时值中秋，肩贩柴米者清晨入城多戴瓜皮小帽，而站岗士兵迎面刺刀一晃，挑落小帽，强行剪辫。军政府司法部长张知本见状急赴都督府，问是否有命令如此作为？黎元洪答称没有。他说：“速下令禁止。乡人惜财，一帽带用一生，如此用刺刀挑落满地，成何景象？设乡人今后畏缩不来，柴米何以补给？”黎马上命秘书草令严禁。[159]

等战事停止，四乡的人纷纷到城中来，有辫子的仍十居八九，剪辫工作交给学生军。朱春驹回忆：“我们负着守护官钱局的责任。这官钱局，在武昌鼓楼街，正是全武昌城的繁华中心，是人人必走的要路，于是就发给每人一柄两仪刀，叫我们在负勤务时，替有辫子的过路人义务剪辫。我们对于这件事很有兴味，剪刀一动，啼哭并作，十分有趣。”[160]

从武昌开始，剪辫造成的恐慌曾波及各地。粟戡时说，长沙反正，“士兵持剪在街上拦剪途人之发，甚至波及女子，民心惶恐，乡人至不敢进城”。

12月12日，凌盛仪日记：“早见太阳。省城兵丁，在各街巷，以强迫手段剪人辫发。有涕泣求免，跪拜求免者，均不许允。今日约剪数千人，亦快事也。都督出示，禁拦街截剪，但限五日内，一体剪完。”[161]

剪发虽然任自由，清廷已覆复何留。万千烦恼删除尽，真个申江遍滑头。

……

有修后面有当头，竟有中间寸许留。此辈皆因强迫剪，恐犹耿耿恨难休。

华界纷来剪辫团，见拖豚尾必留难。磕头拜揖无能免，藏匿还



强迫剪辫

先代免冠。

乡愚啼哭纵堪怜，尽有流氓抵抗坚。狡计扭将租界去，教人侵我自由权。

下流社会最尊王，辫子依然挂得长。……[162]

上海也出现强迫剪辫的现象。12月19日的《申报》报道，张园（明伦堂）的先烈追悼会进行到一半，与会的商团学生发现不少参加者竟然还未剪辫，就群起而攻之说今日是烈士追悼大会，你们却留有满奴的记号，应该马上剪去。遂请来理发匠强行剪辫数十条，当时颇有倔强不愿之人。[163]

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常有相关记录，他们转录12月29日《民族先驱报》的报道：

前日有数名敢死队员奉派去附近地区剪过路人的辫子，昨日他们又被派往十六铺执行同一任务。

昨夜有若干手持剪刀之先锋队员在新舞台剪观众们的辫子，有些观众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12月29日，应于下午五时十五分到达的宁沪列车，昨日误点至下午六时三十分抵站。

看来这是由于在南京有六名革命军士兵登上火车，并着手绞剪所有旅客的辫子，很多留有辫子的旅客对此表示反对。这些士兵在苏州下车，据估计大约剪去辫子一千条。

12月30日，制造局及龙华火药厂有10名山东籍熟练铜匠，宁愿辞工也不愿剪去辫子。[164]

宁波军政分府成立，六城门旁边站岗巡警各执剪刀，遇见进出之人拖着辫子的，即强迫剪去。又派员在各热闹市区及城隍庙等处演讲剪辫子的好处，劝导群众服从命令。因此城中居民大都剪去辫子。乡下风气未开，一般老农都不敢进城。[165]这是当地人写的记事诗：

城市少年好事徒，手持快剪伺于途；瞥见豚尾及锋试，道傍观者拍手呼。

下面还有自注：乡人有辫子的被叫做“豚尾奴”，城市少年见了，即强迫剪去以博一笑。[166]

成都独立，尹昌衡当都督时下达剪辫令，但当时遵守这个法令，自觉剪辫子的人少，不遵守的人却要多些，特别是那些没有文化的，一时想不过来，不愿剪发。于是军政府下令，在城门口挂上几把大剪，凡是进城出城的人，没有剪辫的拉着就剪。当时有人埋怨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也有的人怕剪去辫子，干脆躲着不出门。但是，工人、农民要进城谋生，无法躲避，只好由那些兵剪去算了。[167]

苏州叶圣陶12月31日的日记：“同学有自观前返者，谓有浙军十数人，持剪刀行，途次见有辫者，辄剪去之，被剪者已数十人。愿为辫子作忠臣者多趋避焉，所以顷刻拥挤异常。”[168]

也是这一天，以后成为画家的陕西青年王军余，在南京参与接管造币厂，听说临时政府要下令强迫剪发，以肃清余孽。他乘坐造币厂的黄包车到下关去，计划沿途看看热闹。果然一出厂门，就有一个警察拉住他的车夫，要剪去辫子，车夫当即跪在地上，恳求他代为说情保留。这位早已剪辫的留日学生不仅不为之说情，反而对警察说：“不管他，剪了再说。”一路上，只见剪发队络绎不绝，街道上、火车中、江岸边，遇有垂辫者，无不立予剪去，尤其乘船上岸的人，上一个，剪一个，其间有不愿割爱的，多是跪地求免，也有手提断发垂泪而归的，也有摩顶长叹，或大笑的，面对辫子的消失表现各不相同，他认为煞是好看，且觉大快人心。等他从下关返回，一路望去，街上已尽是光头。[169]

1912年1月2日，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写信给朱尔典说：

驻在南京的浙江部队用很特殊的方式庆祝孙文博士当选为临时总统。白天，他们的队伍带着剪刀做武器在各主要街道上游行，对他们所遇到的所有那些仍然蓄辫的中国人，一律用剪刀剪去辫子。

他们不分老幼贫富，所有人的辫子都遭到同样的命运。此地的人民对这个暴行确实感到非常愤恨。正象他们提出的正当申诉那样，没有给予他们正式的或其它方式的剪辫通知，所以他们完全是遭到突然袭击，没有机会避免士兵们在旁观者的嘲笑声中当众强迫剪辫所带给受害人的那种侮辱。……不过，到现在，南京必定只有很少的人仍然保留着他们的辫子，因为为了避免遭到当众剪辫的侮辱，这里几乎所有的男人现在都已经剪发。甚至年轻的姑娘们也把头发卷成小面包形，盘绕在头顶上，而不像以前那样梳成辫子垂在背后。

1月7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的情报说，自二三日前开始，士兵携带剪刀拦阻行人，强行剪发，所剪下的发仍交还本人。[170]

1月，烟台的剪辫队由军队组成，他们活跃在大街小巷，“剪掉他所遇到的所有那些人的辫子”，持续两天，引起恐慌，还有士兵闯入一家外国人开的商店，剪掉了所有中国职员的辫子。[171]

像广西都督沈秉坤在1911年11月7日独立演说中称“辫发任人自由”的地方很少见。[172]从城市到县城，一直到乡村，剪辫几乎成了革命的主要内容。

11月24日夜，民军首领杨伯震等进入福建上杭城，直入县衙，要知县剪辫交印，其部属又将上杭县牌及团防局灯笼捣毁。一时人心慌乱，商店闭门。夜十二时，杨在团防局传集全城绅士，审问杭城情况，并勒令剪辫。[173]

江苏海州光复后，当地青少年纷纷剪辫，不戴瓜皮帽子，改戴招檐帽子。老年人蓄发居多，也有仍旧拖辫子的。时间既久，拖辫与蓄发的逐渐减少。[174]

四川达县新成立的警察局，警察的主要任务之一即动员群众剪去辫子，“每个岗哨挂一把大剪刀，不愿剪的就由警士强迫剪下，短期中，每个街道常闻哭声。每天进城沿道农民占多数，因怕剪辫而改令妇女来城买油盐。日久宣传深入城乡，群众觉悟提高，也就开始自动剪发了”。[175]

忠县党人吴恩洪一登台，即通令全州，无论官绅和人民，男子一律剪去发辫，女子恢复大足。“惟中间有少数农民狃于习惯，不肯剪辫放足。嗣经党人们多方开导，也就一致遵行，毫无阻碍了。”[176]

武昌首义之初，“男人剪发的也是少数，这些少数底中间更是花样百出，

或割去辫梢，长拖二尺，或剃去四围，顶上留作桃形；更有人是一半剪发一半留辫，他们把头发挑开，剪去一半，一半梳成辫子，盘在顶上，戴上铜盆式的呢帽。就一些也看不出来还有辫发了……”[177]在鲁迅笔下的未庄，“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早经说过，最先自然是茂才公……”[178]

许多地方，不肯剪辫的人常常把辫子盘在顶上，戴帽遮着来伪装。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剪除。更有联合多人同时剪去，燃烧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

在贵阳，“还有许多赶时髦的乡绅，既不肯剪发，又不肯留辫。有些改学道士装，有些把发辫盘在帽子里……当时还有某要人因为剪发辫，他的夫人还和他相骂了好几天。又有某绅士去见都统，一不留意，发辫从帽边儿逃出来”。[179]

江苏兴化县的一些秀才、举人，都是当地的体面人物，什么学务董事、农会董事、商会董事、积谷董事，他们既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之不祥”的观念，又有不敢讲出口的担忧，“截发容易留发难，万一大清复辟，视无辫者为革命党，必有杀身之祸”。他们将辫发盘在头顶，从箱底翻出儒巾，扬长过市。一般居民想起而仿效，却没有儒巾，只好戴上瓜皮小帽，因为帽太浅，如同浮在头顶，风一吹，就会掉落。可以藏辫子的尖顶帽由此时兴起来，就连穷人也宁愿缺穿少吃，去买一顶。

不久街头出现“剪辫队”。一位塾师虽穿上道士服，还是被识破，剪了辫子。一位年过花甲的老秀才认为“革命不是革辫子”，虽只剩寥寥可数的几根头发，也不肯剪辫，但最后还是被剪了。[180]

浙江松阳县素有“黄老虎”之称的大地主黄秋江，认为“辫子乃系头发，与革命何关”，扬言不剪辫。每逢一、六为松阳的市集，非常热闹。处州府军政分府派巡防队到各城门口，手拿剪刀，乡人进城还留辫的一律剪去，发生争吵打架等事的也不少。黄秋江早知城内正发生剪辫风潮，依然脑后垂一条大辫子招摇过市，巡防队也不敢下手。军政分府下令以“不剪辫子”的罪名将他逮捕，当时正值集市，街上人山人海，人人称快。最后军政分府处罚“黄老虎”55000元，并剪去辫子，才予以释放。[181]

1901年出生在广东农村的红军将领龚楚回忆，民国诞生的大喜讯很快传

到他们乡村，一时人人放下工作，奔走相告，同庆新生。他当日即跑到本村的灵武小学堂，参加集体剪辫，当晚他的父亲和大哥也将长辫剪掉，乡人陆续都将长辫剪去，从此，留辫的风气不复再现。[182]这么自觉剪辫的情况不是很多，尤其农村。1902 年生于湖北黄陂乡村的陈碧兰说：

> 这次革命，在我的幼年回忆中，实行得最普遍和最彻底的，就是男子的“头发革命”——实行强迫剪辫子，革命军无论到任何地方，一经发现有辫子的男子，便毫不客气地用刀子割下来，这算是辛亥革命的一种最彻底的“改革”。

记得那年春天雨后初晴，她同奶娘去采桑叶，光了脚在青草地上玩，几个武装士兵走向她，不问三七二十一，一把抓住她的辫子，就要剪掉，她大叫“我是女孩子呀！”“女孩子怎么不包脚？”原来她是天足。[183]

广东东北部铜鼓嶂下的一个山村河姑潭，属丰顺县。梁若尘有生动的回忆：

> 辛亥光复风暴吹到了这个山村，年轻男子很多把辫子剪掉……我哥哥是其中之一，他还说通我母亲把我的小辫子也剪掉了……我爸爸剪辫子的日子，辫子刚剪下，就有人燃放长串鞭炮……
>
> 来了一队光复军，扛着各种各样的旗子：有的三角白色镶红边，有的四方白色镶黄边，有的长方黄色镶黑边。多是神庙中取来的。武器有鸟枪、牛臂枪，还有更多的……进圩后，最引起人注意的是要人家剪辫子。义军中有手执剪子的，要赶集的男人剪辫子，有不愿意的就采用强迫手段。因而有哭诉的，有哀求的，也有逃跑的。但手起剪落，不少人终于失掉了辫子，那“头”便赶上革命了。[184]

大约 1914 年，留学美国的胡适接到故乡安徽绩溪乡下老友的来信，“吾乡一带，自民国成立后，剪去辫发者已有十之九”，在更偏僻的山间乡村，“剪发者只有半数”。[185]

七、外国人看剪辫子

外国人对辫子很敏感。1911年10月16日，法国驻天津领事写信向外长汇报，租界的广州客人往来频繁，大多“没有辫子，举止诡秘”。[186]

10月30日，广东有一次独立的尝试。当地海关税务司梅乐和给安格联写信汇报：

> 后来在城里开会，决定成立广东临时共和国，会后几小时内人心振奋，组织了游行，大放鞭炮，以示庆祝，据说街上已经在剪辫子了。[187]

11月10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记录，有人报告租界内有一幢房子为一群没有辫子的中国人所占……每次开往汉口的轮船，或日本开来的轮船，有多少乘客“没有辫子”，都会被一一记下。12月22日，云南人吕志伊在松崎旅馆住宿。报告不仅记录了他的其他信息，还特别注意到他“不留辫发”。[188]

11月17日，北海关税务司黎蔼萌给安格联写信：

> 今天有一名邮局信差从北海以东二百八十里的安铺来到这里，他说那里平静无事，沿途也没有发生乱事的迹象……革命党的旗帜到处飘扬，人们都在剪辫子。总起来看，前景是光明得多了。
>
> 北海剪辫子的风气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今天有三个供事剪了辫子。过去三天就有五百人剪了辫子，其它的人不久也会照办的。[189]

12月22日，法国驻香港领事馆负责人给外交部长写信，附上当天的《华

南早报》，其中一篇《孙逸仙访问记》记录孙中山到达香港时的情景，一艘有巨大横梁的双桅中国火轮停靠在码头边，从上面下来了许多旅客，其中大多数都是些身着西服的中国人，而且都没有辫子。这些当地改革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出现，暗示孙逸仙此刻可能就在附近。[190]

1909年来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汤姆森写过一本目击记，“整个中国南方都在效仿信仰基督的总统孙中山，剪掉辫子，穿上卡其布的衣服，宣布他们不再是清廷的臣民。很多教会组织成员都拿着剪刀，甚至在九龙的油麻地都有，他们会走到一个汉人面前，叫他去理发，如果他不肯，他们便拿出剪刀剪掉他作为清廷臣民象征的辫子。泰国曼谷的中国人采取的方式很有趣，他们把革命政府的三色旗升起来，然后把剪掉的二百条辫子绑在旗杆上！”[191]

年轻的史迪威在广州注意到那些刚刚剪去辫子的中国人看上去怪怪的，他还看到一个中国人剪了头发后放在报纸里卖。[192]

12月29日，日本驻南京领事铃木写信向内田汇报：

> 自本月27日以来，本地革命军士兵和警察在市中心区强制行人剪去发辫。此举似系革命党内部过激派所发动，但告示上却公开言明发起者为中国社会党南京支部，与上海之励行剪辫似乎同出一辙。

1912年1月2日，铃木从南京电告内田：

> 今日市中遍悬国旗，过路行人已全无垂发辫者。[193]

同一天，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在给朱尔典的信中详细讲述了强迫剪辫的情况。相隔一个多月［2月9日］，朱尔典给外长格雷汇报此事，还附上了这封信：

> （浙军）带着剪刀作为武器在南京各街道上游行，剪掉所有那些

仍然蓄发的中国人的辫子。

……

南京人民对浙军的暴行感到非常愤恨，……在前些时候，华南所有的汉人都已剪去辫子，作为支持革命派的标志；南京居民对于没有机会避免公开遭受侮辱一事有理由感到愤怒。他们迄今对革命军政府的体验已经极为不满；采取向商人们强制借款和强迫征税以募集资金的专横方法，使所有的人们都受到影响，同时又进行剪辫运动，从而大大增强了革命事业在该城内已经引起的厌恶情绪。[194]

可见英国官方对此有多么反感，在此前后，各地发生强迫剪辫的事几乎都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1911年11月20日，腾越代领事史密斯致信格雷说：

就腾越所能见到的情况来说，公众舆论对革命是冷淡的。人们没有任何热情，……剪掉象征满族征服的辫子，远远不是很普遍的，所以在街上很少见到剪了辫子的人。当然，由于下层群众中盛行戴头巾，从而在许多场合下使人们不可能看见他们是否还留着辫子。但是，人们预料恰恰是下层群众将坚持他们所熟悉的那些习惯；当大多数高贵的人仍留着辫子的时候，他们是不大可能剪掉辫子的。[195]

12月6日云南总领事额必廉写信给朱尔典：

（11月5日，军政府限期五天剪辫子，很多人不理睬。）但是，期限届满后，各主要街道上布置了士兵，用大剪刀剪去那些仍然留发的所有市民的辫子。结果是不可思议的。在十二小时内，城内看不见一条辫子，现在甚至在附近的村庄内，大多数人已经没有辫子。那些不遵守新规章制度的人们，当有事前往城郊的时候，在他们也许碰巧经过的最近那个警察哨所内，有人替他们剪去发辫。

一个月后［12月20日］，史密斯又在腾越给朱尔典写信：

腾越城内的情况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除了几天前当局对于一般老百姓表现对自由如此缺乏热情感到愤慨，所以决定至少应强迫他们抛弃受满族人奴役的标志。因此，凡是在街上被发现蓄着辫子的人都被警察捉住，并被迫剪掉这个引起反感的附属品。我自己的一名仆人就是这样被捉住的，但在说明他是什么人之后，没去剪发便被释放了，并且还向他道歉。这项措施的主要结果，是辫子不再明显地留着了，而是把辫子缠在头上，戴上一顶帽子或一块头巾。警察对自由的热忱，常常促使他们去攫取那些没有恶意的过路人的帽子，以便查明在这个自由的领域内，这些过路人是否在内心仍然是满清的奴隶。

同一天，英国驻长沙领事翟比南致函朱尔典：

长沙正在继续发生争吵，不是在士兵们相互之间，便是在他们与老百姓之间。在后面的这种情况下，争吵时常是因士兵的不法行为而引起的，那些士兵最近驻守在各城门口和主要街道上，用刀子和剪子做武器，对过路的行人采取粗暴的行动，强迫剪掉他们的辫子。都督禁止这种做法，但关于这个问题发布的告示委婉地承认了他的软弱无力，因为它要所有的人在五天内剪去辫子，以便消除这种混乱场面。另一方面，士兵们对该告示丝毫不予理会，继续推行剪辫运动，直到12月15日，当太古洋行轮船“吉安”号买办在该洋行码头登岸的时候，士兵们对他采取了凶暴行动，在他进行反抗时又虐待他，最后不顾他的请求，终于剪掉了他的辫子。

我对这个暴行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且还补充说：我不认为当局默许或甚至赞同这种高压行动，但一个政府的首要职责之一，是要维护公共的安宁……

12月29日，成都总领事务谨顺向朱尔典汇报11月27日新的共和政府掌权10天内的情况：

成都出现了使和平居民感到惊讶和恐慌的情景。巡防队的勇丁脱下了遵守纪律的一切伪装，涌上了街，土匪头目则率领他们的武装弟兄蜂拥进城，……由于把头发梳成新式的顶髻并戴上银首饰，从而使他们的外貌更加生动了，他们采用这种头发式样是为了反对剪辫子的运动，基本想法是：虽然蓄发者不再是满族人的奴隶，但他们不想通过剪发而模仿外国人。

12月31日，安徽芜湖开始流行剪辫风气时，属于英国的怡和洋行在行栈的房屋上悬挂了两面英国国旗，还是被士兵强行闯入，一大批雇员的辫子被粗暴地剪掉。当地英国领事专门对此提出抗议。军政府迅速发布告示，禁止实行强制性的剪辫。（黑德爵士1912年2月14日的备忘录）

1912年1月9日，英国驻镇江领事德为门致函朱尔典：

上星期，在镇江城内各街道上和郊区，正式推行剪掉辫子，使那些安宁的和平静的居民感到极为愤怒，当革命军代表被问及此事的时候，他们声称：这是无业游民和不良分子干的；但据我看来，此事无疑地获得了军队首领们的赞同；而且很可能是他们下命令这样做的。我见到一个人在城内一条拥挤的街道上活动，他带着一把大剪刀，采取久经训练的衙门仆役的态度回答我的问题，并且说，他奉上级长官“朱大人”之命剪辫子。

剪辫的命令来自浙军司令朱瑞。

军政府对剪辫热潮的态度是：如果发生任何危机或麻烦，不鼓励人们相信它会采取坚定措施。它发布了几个告示，用软弱而又含糊的词句谴责使用暴力，但宣布即将完全废除蓄辫；最近发布的一

个告示是呼吁所有的人剪掉辫子，但商人们除外，他们是由于自己提出申请而得到豁免的。与此同时，对许多此类使用暴力的事件，没有施加一次惩罚……[196]

八、剪辫与兵变

各地因剪辫惹出的风波不断，甚至出现兵变。

1911年11月8日，安徽省咨议局推巡抚朱家宝为都督。自称奉命从武昌前来接任都督的王天培，携带炸弹4枚，进入安庆，要朱家宝立刻交印，否则武力对待。这个王天培只做了半天都督，即因强剪老百姓的发辫，触犯众怒。[197]11月9日，王天培自称安徽大都督，下令限官界三日、军界半日全部剪发，军民腾怨，惟恐朱家宝离开安徽，聚集数万人到抚署，守住朱家宝，再拥到军政府，索取都督印，王天培仓皇出逃。[198]

人称"屠伯"的广东潮州知府陈兆棠，平日杀人如麻，广州独立的消息传来，他首鼠两端，一面揭出白旗表示降服，一面倚仗有僚属与革命军中的友人暗通声气，希望继续把持权位。他手下的兵士阻止民军为路人剪发，杀了学生军八人。11月14日，民军在盛怒之下烧掉官署，悬赏5000元缉拿他。他虽剪了辫子、穿上西服还是被抓住了。羁押数日，群情激愤，纷纷要求镇压，却被胡汉民保住了。[199]

柏文蔚回忆，光复镇江、攻克南京有功的林述庆在扬州成立北伐军总司令部，未及两周，却因强迫剪发，他的总司令部卫队被不肯剪辫的徐宝山部全部缴械，空气万分紧张。[200]

1912年1月26日，叶圣陶在苏州听说，江防营与先锋营为了剪辫的事发生冲突，"竟各持枪械战于来远桥一带，城门因而闭，市面因而罢"。他听说江防营中死了7人，此事如何了结尚不得而知，"江防营之忠于豚尾，竟甘因而流血，可鄙亦可叹"。[201]

清廷下达退位诏书后，南方迎袁专使到达北京时，发生举世震惊的兵变。身历此事的第三镇参谋官杨雨辰回忆，2月27日晚间有提灯游行：

> 尽管政府已经公布要把辫子剪去，很多汉人由于习惯势力，已经忘记满人入关时强迫剃发留辫的种种惨剧了，……对于猪尾巴反而恋恋不舍起来，不肯剪掉。因此，在游行队伍中就有些所谓"维新"的人，手里拿着剪刀，看见谁的辫子还拖在后面，就悄悄替他剪掉。这一来，立刻在游行队伍中引起了一场混乱，有叫的、吵的、骂的、笑的……

因为担心第二天继续发生这类事，市政当局派警察挨门挨户去通知，游行队伍中决不许随便代剪辫子。

2月29日，第三镇发生兵变，袁世凯向外交团和各方面解释，"这次兵变就是因为命令他们剪辫子和取消战时津贴引起的"。[202] 恽毓鼎当天的日记也提到提灯游行，有人带着剪刀"迫人截辫，如饮狂药"。这一天，还有人群集曹锟第三镇的司令部——帅府园，"劝诸军剪发，不从，则且语以辱骂之，遂哗变"，使繁华锦绣场，一夜之间变为焦土。[203]

兵变发生时，第三镇第六协协统陈文运正好在帅府园，总理办事处打来的电话就是他接的，大意说：

> "剃小辫，自由；加饷，照旧；米贴也照常。赶紧通知队伍，不要闹事。"最近听说，南北议和没有战事了，加饷和米贴都要裁减；还因为民国成立，士兵也要剪去小辫，军队里很多人表示不满。袁世凯认为这是酿成兵变的原因，所以临时发出命令……

他判断，"士兵们因为剪辫子、裁加饷、减米贴三件事情，心怀不满，激成了兵变。……袁世凯不愿南下，固属事实；若说这场兵变是他指示发动的，则恐未必。古人说：'兵犹火也。'放火容易收火难，发动兵变不难，要

想收拾可不是容易的事。……”[24]

3月3日，朱尔典给格雷的信中说：“北京骚乱是由属于第三镇的一个标开始的，该标是袁世凯嫡系部队的一部分，……他们中间似乎曾流传消息说：当袁世凯拟访问南京就任总统时，将解散北京的军队，人们将强迫他们剪掉辫子；他们的饷银将从战时编制每月五元减为平时编制每月四元一角五分。不过，骚乱爆发的真正原因仍然是不能断定的。”[25]

冯玉祥认为，这次兵变，“许多文献中都众口一辞，说那是世凯预定的阴谋，故意制作出来，以为他不能到南京去的借口的。我觉得这未免太恭维了袁世凯，当时老袁对于部队哪有这样擒纵的能力”。[26]

到底是否剪辫引发了这次兵变，迄今仍无最终的答案。但广西独立之后，确因剪辫引起过旧巡防营的兵变。

1911年11月7日广西独立，两天后正在举行提灯游行，突然响起枪声。李宗仁、黄绍竑等人都是陆军小学学生，他们武装整队，有枪却无子弹，旧军向他们开枪，他们不能还击，一时队伍大乱，有的同学哭了起来（他们多数才十七八岁），有的同学把帽子、枪支都扔了，一哄而退，回到学堂。黄绍竑说：“旧军兵变，是由于在开庆祝会之前要他们剪辫子。我们同学有的早已剪了辫子，有的是宣布独立后才剪的。旧军从来就没有剪辫子的人，一下子要他们都剪掉，自然有一些人要反对。”[27]

李任仁也回忆：“及后听到传说，凡是剪了辫子的人，在街上都被捉去枪毙。……后来才知是巡防营一部分湖南兵搞的。营长下令剪辫子，他们不服从，武装旁边，一面抢东西，一面碰到无辫子的人就开枪打。”[28]

九、剪还是不剪？

武昌首义后奉命看守黎元洪的刘莘园到晚年仍记得：“[黎元洪] 脑壳上顶根小辫子。……尤其是他那南瓜脑壳上顶着的、像大指头那样大的小辫子，

一翘一翘的，像根南瓜藤，我看着不顺眼。到了第三天，黎剪了小辫，我也受命去干别的事，不再看守他了。”[209]

留日回来、做过鄂军政府外交局长的黄仲垲说：

“连日部署略定，见黎元洪意志稍定，乘间劝他剃去发辫，以新耳目。邻近各处响应，南洋华侨来电祝贺，他欣然同意明天剃发。”[210]

对于剪辫，黎元洪骨子里并不排斥，当初他部下陆军四十一标二营学兵李佐清，“以发辫一物于操作上大有妨碍，日前毅然剪去”。他不仅没有处罚，还说：“我国朝野上下，近因受外界之刺激，于剪发一事几乎风靡一时，余本欲先行剃去，以为军界同仁倡，因明诏未颁，故而终止。今尔毅然剪去，免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非特社会所欢迎，亦即余崇拜也。”《民立报》1911年1月3日就有报道。[211]

张难先回忆，10月11日黎元洪决定次日剪辫，他到咨议局后两天吃不下，蔡济民、甘绩熙、陈磊等一直在劝慰，“陈磊以黎尚蓄发讽之，黎作色曰，你们年轻人，再不要如此激烈，我决心与你们帮忙就是，你们说要剪去辫子，我前在营中，并下过传单，令士兵愿剪者听，明日我剪去就是。众人鼓掌称快”。[212]

都督府顾问谢石钦（梼公）记得：“蔡济民躬亲为都督剪发。”[213]也有人说他因为剪了辫子而哭过一场。[214]

就在剪辫那天下午，他在军事会议上坦率表示：“我前天未决心，昨天也未决心，今日上半天还未决心，这时是已决心了。”此时，他的心情也轻松多了，蔡济民抚着他的头开玩笑说，都督好像个罗汉。他还笑着说，有点似弥勒佛。这是参谋官甘绩熙的回忆。[215]

11月20日，问世仅两月余的英文《大陆报》专栏记者埃德温·丁格里（Edwin J. Dingle）在武昌见到黎元洪。[216]在他的笔下：

> 黎元洪是一个英俊的中国男人……剪掉了大辫子，一头浓密粗硬的黑头发……[217]

11月6日，程德全以巡抚身份在苏州反正，次日早上，同盟会人袁希洛

到苏州车站，到处挂满了白旗。他到同盟会江苏支部时，章梓却很气愤地对他说："你主张举程德全做江苏都督，现在程的发辫未剪，我方派去的军事司令，程不接受，我们在苏州的同志薪饷不发，看光景，我们非派军队前去与他武力解决不可。"

他在会客厅见到程德全，将这些情况说明，程没有犹豫就叫来理发师当着他的面将发辫剪去，立即将薪饷发给在苏各同志。[218]

11月29日，英国驻成都总领事务谨顺给格雷的信中说，军政府宣布成立之后，新当选的都督蒲殿俊和新政府其他成员发表简短演说，所有演说的人都已剪掉辫子；事实上，前一天《商报》号外已经宣布：参加典礼的人都将是没有辫子且身穿军服。[219]

姚崧龄目睹贵州宣布独立时，几个风云人物张百麟、任可澄、杨荩诚，或刚剪掉发辫，或是和尚头。[220]

各地官员或被迫剪辫主动剪辫，成为他们归顺或反正的一个信号。

11月9日，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宣布反正，剪去辫发。

11月中旬，当年黄兴策反未成的钦（州）廉（州）道台郭人漳在钦州宣布独立，以后担任陆军部警卫混成团团长的林虎回忆，当他们见面时，郭揭掉帽子哈哈大笑，露出已剃光的头说："我们已宣布独立几天了。"[221]

11月12日，福建大埔，萧文赏与当地群众拥进县衙，要求清知事胡良铨和县府人员立即剪辫、交印、交钱粮，如交代清楚可以保证安全出境。胡良铨和眷属被安全护送出境。[222]

松江举人沈思齐曾做过县知事、候补浙省、历署衢县首兼浙抚增韫总文案，赫赫有能声。一听说武昌起义消息，星夜弃职回乡，自动剪除发辫，因此被推为副司令。[223]

塞北丰镇，警务长朱尧思想转变后，剪掉发辫，决心革命。[224]

11月10日，上海关税务司墨贤理给安格联写信说，"从可靠方面得到消息，有人正竭力劝海关道参加新政府工作，他很可能会投诚。这样，他必然要把这许多重要文件带去。他的秘书昨天来见我，这个人的辫子已剪去，上面的话就是他告诉我的"。[225]

11月22日，重庆知府钮传善在朝天观会议上，被迫献印投降，田得胜一

剪刀剪掉了他的辫子。次日，蜀军政府成立。[226]

向楚的回忆与此虽有出入，但也讲到了钮剪辫的事。这一天，川东道台朱有基已先逃跑，重庆知府钮传善不到，党人手持炸弹、手枪去府衙找他。钮为人狡猾，平时本善说辞，此时却瞠目结舌，同段荣嘉一起跪在地下，剪去辫子，缴出伪印，并亲笔书写“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誓词，当众宣读。[227]

成、渝相继独立的消息由岷江水电板（在特制的小木板上写字，放在江中，顺流而下，叫“水电板”或“水电报”）辗转传到叙永，县议事会议长、县城董事会总董事、团练局长、永宁中学校长、学务总董兼劝学所视学组织小组会议，提出独立步骤，一是征求官厅同意，换印挂旗，宣布独立；二是官绅士庶一律剪去发辫。他们去官厅向熊济文晓以大义，决定11月26日独立，是日召开全县团保士绅六百余人大会，熊济文在会上亲自拿剪刀剪去发辫，群众一片欢呼，陆续剪去发辫。[228]

同一天，刘铭传的孙子，贵胄学堂出身的永宁道刘朝望为脱祸自保，迫于形势，在考棚试院宣布反正，剪去辫子。[229]

当绥定被围攻十余天后，府官广某是满人，见城内人心动摇，粮草将尽，而且援兵已绝，只得高举白旗乞降，他俯首跪地，剪去发辫，缴出印信，被遣送离境。[230]

11月30日，奉节在万寿宫召开群众大会，全城百姓欢欣鼓舞，额手称庆，自动剪去辫子，夔州知府陈昌迫于形势，不得不在大会上剪掉辫子。[231]

温州光复时，温处兵备道、温州知府都不愿反正，有人率义勇军到陆师巡防营，将统领梅占魁请到府署公开剪辫，正式宣布独立。[232]

12月16日北伐军开到宿州，接见绅商学界代表，并出安民告示。各界首脑人物多剪去辫发，表示倾向革命。[233]

为了逃跑方便，官员也会剪去辫子。11月20日，有人在上海看见两广总督张鸣歧剪辫剃须，戴着西人小帽。[234]

12月5日，英国驻北海领事馆助理领事莫斯给总领事杰弥逊写信说，在北海西北的廉州，士兵因为欠饷而发生哗变，“知府是一位很受爱戴的诚实官员，于第二天化装为一个苦力而且剪掉了辫子来到本领事馆。我把

他隐藏在海关内，……他乘下一班轮船动身前往香港”。[235]

也有人不愿剪辫。外号“蒋干”的江北都督蒋雁行，做过北洋将弁学堂、速成学堂提调。在清江宣布独立后，还把辫子留着，随时打算逃走。别人劝他剪发，他无奈只好把辫子盘起来盘到帽沿处，仍不愿剪发。[236]

徐宝山原是长江稽查，外号“徐老虎”，领兵杀了孙天生后当上了扬州都督，至死不肯剪辫子，有人劝他剃发，他说：“老虎怎能没尾巴?”[237]

在湖北做过知县等职的李石泉出任扬州民政长，一日乘轿去署，在路口遇到浙江来的军队，替行人剪辫子，问轿中何人，知是民政长，大哗：“难怪扬州人不肯剪辫子，连民政长的辫子还未剪掉呢!”当时就要在街上代剪，李答应自剪。第二日，人们就在教场九如分座（茶馆）门前，看到民政长剪下的辫子，装在玻璃盒子里悬挂，“以资提倡”。[238]

11月9日，在南宁北校场开大会宣布广西独立，有数千人到场，情况热烈，但是很多文武官员还没剪辫子，并穿着清朝袍褂，特别是左江道纪堪谨拖着辫子，戴着顶子，非常刺目，人们觉得这些人宣布独立，脱离清廷，不像是真的。散会时雷鲲池从袋里摸出剪刀，一手牵着纪堪谨的辫子，一面说：“宣布独立了，纪道台你还留这辫子做什么?”一面用剪子把纪的辫子剪去。大家都感到痛快，而纪堪谨则痛哭失声。[239]

11月27日，四川古蔺县独立，巡防军管带李晓清被推为都督，他独揽军政大权后，虽出布告要老百姓剪掉辫子，可他的辫子一直留着。[240]

广东独立后，陆军提督龙济光最初留着辫子，占据城内，拒绝民军进入，直到大势已去才剪发奉令。[241]

福建泉州统带唐万胜、知县黄逢年不肯交出兵权印信，也不肯剪辫。随义勇队而来的当地人杨山光从中排解，为唐、黄保证三月内履行剪辫条件，并愿以自己首级作保。三个月既过，唐、黄仍不剪辫，有一天，许卓然等多人突来向杨索取首级，情势非常紧张。唐、黄拖延到缴交印信的那天才剪掉辫子。[242]

有一天晚间，山东登州军政府召集地方士绅开大会提倡剪发，孙丹林与民政长葛式瀚、司法长柳仲乘都到会，群众注视财政长宋赓廷、刘雨屏、葛式瀚三人，既任要职，却不肯剪辫。有一少年孙震北是海军子弟，血气方刚，

持剪要强迫他们剪辫子。争执之下，突然枪响，孙肋下中了一枪。[243]

1912年6月24日，朱尔典给格雷信中讲到，驻乌鲁木齐的巡抚与据有伊犁的民军首领之间不和，4月1日发生激烈冲突，结果巡抚袁大化被击败，损失了3000名士兵。4月13日，革命党在阿克苏发动一次暴乱，杀死道台和知府。这些消息震撼了喀什噶尔，道台立刻剪掉他的辫子，劝告汉人也这样做。他还在衙门中悬挂一幅卷轴，上面题有"中华民国万岁"字样。可是，有些官员，包括提督在内，予以拒绝，继续留着辫子。

到4月底，喀什噶尔的道台和提台（提督）调解了他们的分歧，提台声明赞成共和，并剪去辫子。[244]

袁世凯最初派到武昌的代表刘承恩、蔡廷干，刘有辫发，身为海军将官的蔡则是光头。当时见到他们的张知本说，刘的辫发与蔡的光头"相映成趣"。[245]

载泽、戴鸿慈出国考察宪政，40多个随员中剪辫子的居半，其中有翰林、有道府，有武员，都是有功名的。他们回国之后主张剪发。1909年，军谘大臣、阅兵大臣载涛贝勒主张剪辫，得到荫昌、善耆、邹嘉来、载泽、戴鸿慈等王公大臣的支持和呼应。年轻的亲贵中，也有人在革命前就剪了辫子。后来被彭家珍炸死的良弼，"不但平日侈谈革新，还率先剪去了辫发，这在当时守旧派的眼中，就成为需要警惕的'新人物'了"。[246]

10月8日，武昌兵变前夕，载涛贝勒在秋操时召东、西两军总统官、统制、统领、统带和阅兵处全体幕僚会食。酒酣之际，他见各将领有发辫的居半，传令资格较深的冯国璋、丁士源率先剪辫，作为全军楷模。[247]

11月26日，汪荣宝在北京，到日本理发店"剪除发辫"。此时，资政院已将剪发案具奏，但谕旨尚未下达。[248]

声名显赫的江南立宪派领袖汤、张都剪去了辫子。12月7日，盛先觉在上海给梁启超写信，12月3日访章太炎时遇到汤寿潜，"汤清服无辫"。[249] 12月14日，张謇在上海剪下辫子，寄给他南通的哥哥做记念。（几个月前，他还为南通师范学生剪辫而担心。）[250]

12月18日郑孝胥日记：

报言唐绍仪随员声言，二十二条款非满洲政府所主张。孟莼孙告诉他，陆伟士不肯剪发，自言惟当被发阳狂。问其宗旨如何，说他执“杀老牛莫之敢尸”之义耳。郑孝胥说贤哉伟士。因孟次日去南京，相约等他归来邀伟士来谈，共饮。

12月21日　严复来，谈甚久。严复不剪辫，以示不主共和之意……

郑孝胥对不剪发的人大表赞誉，但自己在清廷剪发令下之日就剪掉了辫子，12月9日他日记说：

四点钟剪发，小乙亦同时剪。[251]

随唐南下的代表之一冯耿光记得，他们到上海租界，有人恫吓副总代表杨士琦，要剪他的辫子，因此杨赶紧走避到亲戚家，不仅不敢出屋，以后简直就没露过面。[252]

汉军镶红旗人章福荣（绶卿）作为八旗代表南下参加和议，他到沪后，曾写信告诉人：

同船诸人中，有讥唐绍仪发辫后垂、形态腐败者。唐手提发辫谓众人曰：“你们别看我有发辫，我也是主张共和的。”[253]

这个回忆不确。1911年12月8日蔡廷干给莫理循的来信说得很清楚：

唐绍仪昨天晚上在铁路卧车四号房中剪了辫子。梁士诒和其它一些人大概是在同一个房间里把头发缒子放了下来。[254]

唐动身南下前，正值剪发令下达，他剪发的新闻12月10日的《申报》即做了报道。（《申报》要闻版：“有清廷人员多人剪去发辫，唐绍怡亦在其内。”）

不过1911年12月17日《大公报》有关袁世凯12月13日剪去辫发，“以为各界之倡”的报道却是误传。直到清帝退位诏书下达之后，他才剪辫，身边的唐在礼回忆：

当天晚上，袁世凯就在外交大楼里剪了发辫。在剪的时候袁自己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袁的这种情况很难见到，后来也未曾见到过。当晚在袁周围的人也很兴奋。“袁宫保剪辫子”这件事，很快地就轰动了整个北京城的军政上层人物，不少人也剪了。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的人迟迟不剪。有科举功名的，尤其是翰林公们，剪辫子的比较少，像江朝宗、陈宝琛、华世奎等简直不理这件事。[255]

1912年2月14日，莫理循给朱尔典的信中说：

蔡刚才来看我谈关于我在今天下午五点钟去见袁世凯的事。他说袁世凯讨厌至极，他连辫子都不肯剪掉。

2月16日蔡廷干给莫理循的来信：

他们同意让我去剪掉总理（大总统的）大辫子，而不是叫理发师，因为他感到相当难为情。

这是你的独家新闻。

同一天，莫理循给伦敦的布拉姆写信：“我刚刚接到外务部打来的电话，说袁世凯今天下午三点一刻钟时叫蔡廷干剪掉了他的辫子，在场的有袁世凯的儿子和一位秘书。给我打电话的人说：‘我把这条独家新闻给《泰晤士报》。’”[256]

1月26日，那桐日记：“无事。二侄今日剪发矣。”[257]他没有对侄儿的剪辫表示什么不满。

在陆军部任职的恽宝惠回忆，王士珍退隐，段祺瑞就任陆军总长，到部召集科长以上谈话，段本人尚未剪去发辫。[258]

到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出席的上百人，“内有洋服者、有中服者、有有辫者、有红衣喇嘛者、有新剃之光头者，五光十色，不一而足。其中以海军部人员一律军装为最整齐，以法部人员之一律拖辫者为最腐败”。[259]

莫理循记录这次盛典时则说：“袁世凯与所有代表一一握手。不再有辫子。”[260]

外务部的部员、参议而成为外交次长的颜惠庆说：

> 当时发生的另外两件有趣的事是剃发和易服。理发匠、裁缝乃至皮鞋匠的生意顿时兴隆起来。由于不知怎样梳分头，一些剪掉辫子的人索性把头发全部剃光，犹如寺庙中的和尚。[261]

剪辫的风气甚至蔓延到了台湾岛上，台湾男子本来都留着辫子。他们从画片上看见孙中山和其他领袖都剪掉了辫子，知道大陆在易俗。最先由住在城里的一些广东原籍人领头把辫子剪掉，以表示自己是中华民国公民。他们剪辫时，像办喜事一样，鸣放爆竹，以志吉庆；有的甚至备办酒宴，请亲戚朋友喝喜酒。1912年春天剪掉辫子的少年王文德回忆，剪发的风气从各城市遍及农村。那时台北市一般的理发费大人五分钱，小孩三分钱，而断发费，无论大人小孩，都是四角。（此前，日本人早就强迫台湾人剪辫子，但是除了在机关、企业、学校当职员、教员的那些人被迫剪了头发，谁也不肯剪发。）[262]

2月26日晚上，有人告诉吴宓，下午在电车上遇到一华人，像是一个读书人，脑后还拖着长辫，同车的一个外国人突然抓住他的辫子，问他这叫什么？那人回答：“此物中国名之曰辫发。”外国人笑着说：“中国人素无是物，焉得有是名乎？”那人感到惭愧，车停即下去，直接到理发店剪辫。[263]这是发生在上海的情况。2月27日，成都将军、满人玉昆给北京的儿子回信，“再京内剪发一节，外省更甚。我儿调查京中剪去者多数”，他叮嘱儿子也不

妨剪去辫子。他说自己在成都“已剪去一少半”，如果还不行自可全剪，四川政界中多半剪去了辫子，满洲都统“奎［焕］大人亦剪去”，他要儿子“不必过于拘泥，以至不能出门”。[264]

5月11日，杨杏佛在北京等待留学时给柳亚子写信：

> 都中情形与南方大异，剪发辫者百无一人，且有仍用宣统四年者，其它知识不问可知矣。[265]

爱惜辫子的遗老南北都有。“一些芝麻绿豆大小的官僚，……他们头上辫发，当然不舍得剪，头发盘成小髻，插上黄杨木如意发簪，身披圆领大袖海青，足登云鞋，不道不儒的遨游于上海、青岛繁华商埠中。”[266]

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临危受命，做过江苏布政使。进入民国他以束发道装打扮，假道号“清道人”，门口挂“玉梅花庵道士”牌。[267]

恽毓鼎一度也束发道装，到1912年5月21日终于还是剪了。他当天的日记说：“此辫与我相守五十年，一旦截之，不无恋恋。唯上流社会人俱已濯濯（唯商界中人尚有存者），余既不能杜门自守，……日受刺激，只可降心从众矣。”[268]

郑孝胥虽剪了辫子，见到老朋友，却首先注意对方有无辫发。[269]曾写公开信谴责黎元洪的前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的梁鼎芬不肯剪辫，南北议和后他到武汉为端方办丧事，在汉口大旅社被几个学生强行剪掉了辫子。门生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称他——“辫发短垂，终日戴长尾红风帽，不露有角。戴风帽者，师黄梨洲入清装束也。”黎元洪想请他过江宴会时将他的辫子剪去。《武昌革命真史》作者曹亚伯等人等不及了，直接过江赶到旅社，任凭他两手护发，乃至倒地护发都无效，两个人抓住他的手，一个人拿剪刀，一剪再剪三剪，剪光了，“剪者呼啸而去，梁乃伏地号哭”，等刘成禺赶到时他还在拥着风帽流泪，当夜即乘火轮东去。[270]汉口成为他不忍再提的伤心之地，他以“大清国第一忠臣”自期，失去辫子的心痛，外人又如何能体会。

到1921年，就连15岁的废帝宣统也在故宫里剪掉了辫子。

剪掉有形的辫子容易，剪掉无形的辫子却很难。

1913年出任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回忆袁世凯剪辫子：

“当蔡廷干极力主张把它剪掉的时候，袁氏叫人拿来一把大剪刀，对他说：‘这是你的主张，你来实行这个主张吧。’蔡将军用力一剪，就把袁世凯变成了一个现代人。但是袁世凯的内心并没有从此发生很大的变化。”[21]

留学欧洲多年、曾在张之洞幕府的辜鸿铭坚持留辫，他在北大任教，成为一道风景。1920年，《纽约时报》的星期杂志发表他的论文《没有文化的美国》，中间插了一幅他的漫画像，穿着前清的顶戴，后面拖着一根大辫子。

北大学生罗家伦回忆，有一次与同学们开玩笑说：“有没有人想要立刻出名，若要出名，只要在辜先生上楼梯时，把他那条大辫子剪掉，那明天中外报纸一定都会竞相刊载。”[22]

其实辜鸿铭的辫子不大、也不长，而且有点焦黄。

有学生回忆，初入北大，有一次在校园里，正好辜鸿铭走在前面，他们小声议论他的辫子，没想到他回头对他们说，别看我留着辫子，你们身后还拖着一条精神辫子呢。

【注释】

① ［美］德龄著，荷莎、苏森译：《德龄公主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73、74页。

②《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高宗鲁译注，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7、42页。刘真：《留学教育》第一册，台湾编译馆1979年版，转引自刘斌、刘利民：《清末民初剪辫运动与近代观念的变迁》，《许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110页。参考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页。

③ 胡适：《记辜鸿铭》，《大公报》1935年8月11日。

④ 张群口述，陈香梅笔记：《张岳公闲话往事》，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页。

⑤《张季鸾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⑥《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02页。

⑦《从家乡到美国：赵元任早年回忆》，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

⑧《湖南反正追记》，第23页。

⑨《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205页。

⑩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8—369页。

⑪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6、77页。

⑫《柳亚子文集 自传 年谱 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69页。

⑬ 沈心工编：《学校唱歌》第二集，《先行者之歌》，第93页。

⑭《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43页。

⑮ 左舜生：《我的少年时期》，陈正茂主编：《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论集》下册，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第1606—1607页。

⑯《斯诺文集》（2），第119页。

⑰《昙花一现的“厦门学生军”》，《福建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纪念辛亥福建光复八十周年”，1991年，第49页。

⑱ 转引自张伍：《我的父亲张恨水》，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⑲《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88、189页。

⑳《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64页。

㉑《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第220页。《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第7页。

㉒ 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界参加革命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307页。

㉓ 肖华清：《一个县城学生看到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383—384页。

㉔《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第21—22页。

㉕《口述历史》第七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202页。

㉖ 宁海县政协教科文卫体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童保暄日记》，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㉗《亦云回忆》，第53页。

㉘《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481页。

㉙ 转引自陈生玺：《清末民初的剪辫运动》，《渤海学刊》1995年第三期，第25—26页。

㉚ 刘精三：《晋南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164、165页。

㉛ 苏勋丞：《江北发难前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89页。另有说，徐绍桢直到南京发难前才被迫剪掉辫子。

㉜《辛亥革命前后福州满族旗营内情实录》，《福建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第25页。

㉝ 刘士毅先生访问记录，《口述历史》第八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62—63页。

㉞ 温世霖著，高成鸢编：《昆仑旅行日记》，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第149页。

㉟《斯诺文集》（2），第116、117页。《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88页。

㊱《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㊲《口述历史》第七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202页。

㊳《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观感》，《中国哲学》第九辑，第516页。

㊴《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466页。

㊵ 孙天霖：《云南学生运动点滴》，《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408页。

㊶《辛亥革命时期的内蒙古》，《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424、425页。

㊷《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页。

㊸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228页。

㊹《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82、83、84页。参考《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2页。

㊺ 黄药眠口述，蔡彻撰写：《黄药眠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㊻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13页。

㊼《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131页。

㊽《追忆庚戌新军起义和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295页。

㊾ 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147、148页。

㊿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126页。

51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209页。

52《辛亥革命闻见记》，柴德赛等编：《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

53 傅昌裕讲：《夜攻制造局》，《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541页。

54 袁希洛：《我在辛亥革命时的一些经历和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284页。

55 柳亚子：《辛亥光复忆语》，参考《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第588页。

56 邹鲁：《回顾录》，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第41页。

57 岭南半翁：《辛亥粤乱汇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第357页。

58 应德明：《黄花岗起义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324页。

59 岭南半翁：《辛亥粤乱汇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第345、346页。

60《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第358页。

61 钱履周：《光复前夕福州社会情况杂忆》，《福建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第58页。

62《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13页。

63《辛亥武昌战守闻见录》，《近代史资料》总72号，第146页。

64《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388页。

⑥⑤《口述历史》第七期，第156页。《辛亥塞北革命纪略》，《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号，第50页。

⑥⑥ 陈雪涛：《回忆中华民国学生军团》，《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555页。

⑥⑦《吴宓日记》第一册，第172页。

⑥⑧《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第31页。

⑥⑨《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381页。

⑦⓪ 钱化佛、郑逸梅：《攻宁记》，《辛亥革命》（七），第85页。

⑦① 徐森、谌秉直：《第九镇秣陵起义和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238页。

⑦②《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511、521页。

⑦③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1、152页。

⑦④《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143—144页。

⑦⑤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231页。

⑦⑥ 黄自进：《北一辉的革命情结：在中日两国从事革命的历程》，第128页。

⑦⑦《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126、39页。

⑦⑧《一个女人的自传》，第98、99页。

⑦⑨ 伊通甫：《辛亥革命时的福州满族旗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123、129页。

⑧⓪《大公报》1911年11月21日。

⑧① 马凌蒲：《回忆辛亥革命》，《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97页，转引自陈生玺：《清末民初的剪辫子运动》，《渤海学刊》1995年第四期，第67页。

⑧② 郭孝成：《山东独立状况》，《辛亥革命》七，第329、330页。

⑧③《我辛亥革命时期的内蒙古》，《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425页。

⑧④《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113页。

⑧⑤《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第220页。

⑧⑥《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307页。

⑧⑦《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第7页。

⑧⑧《黄药眠口述自传》，第12页。

⑧⑨《黄光集》，第360页。

⑨⓪［英］丁格尔著，陈红民等译：《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31页。

⑨①《宣统政纪》卷29，转引自李喜所：《“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与二

十世纪的中国》，第 1503 页。

⑨②《大公报》1911 年 1 月 26 日、2 月 15 日，参考陈生玺：《清末民初的剪辫子运动》。

⑨③ 参考吴善中、黄蓉：《浅论辛亥革命迁徙狂飙突起的剪辫运动》，《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版）》2002 年第 2 期。

⑨④《汪荣宝日记》第三集，第 1059、1060 页。

⑨⑤《辛亥革命》五，第 497、502 页，参考陈生玺：《清末民初的剪辫子运动》。

⑨⑥《宣统政纪》卷 65，转引自陈生玺《清末民初的剪辫子运动》，《渤海学刊》1995 年第四期，第 68 页。

⑨⑦《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61 页。

⑨⑧《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 78 页。

⑨⑨《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80 页。

⑩⓪《宣统政纪》卷 66，转引自陈生玺：《清末民初的剪辫子运动》，《渤海学刊》1995 年第四期，第 68 页。

⑩① 爱新觉罗·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 2007 年，第 28 页。

⑩②《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63 页。

⑩③《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82 页。

⑩④《郑孝胥日记》三，第 1368 页。

⑩⑤ 天津《大公报》1911 年 12 月 3 日，参考陈生玺：《清末民初的剪辫子运动》。

⑩⑥ 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卷下，武昌久华印书馆 1948 年版，第 68 页。转引陈生玺《清末民初的剪辫子运动》，《渤海学刊》1995 年第四期，第 65 页。

⑩⑦ 转引自陈生玺《清末民初的剪辫子运动》，《渤海学刊》1995 年第四期，第 65 页。

⑩⑧ 佚名：《常昭光复纪事》，《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143 页。

⑩⑨《湖南反正追记》，第 23 页。

⑪⓪《辛亥革命》（六），第 45 页。

⑪①《时报》1911 年 11 月 12 日，上海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293—294 页。

⑪②《民立报》等刊登，《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 324 页。《陈英士先生文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77 年版，第 92 页。

⑪③《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 509 页。

⑪④ 林端辅：《宁波光复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180 页。

⑪⑤《广东独立记》，《近代史资料》1961 年第 1 号，第 451、460 页。

⑪⑥ 向楚遗稿，《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 84 页。

⑪⑦《胡兰畦回忆录 1901—1936》，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 页。

⑱《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281页。

⑲ 陈天贵：《回忆辛亥革命前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160页。

⑳ 翁辉东：《潮汕光复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259页。

㉑《辛亥革命》（八），第25页。

㉒《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2辑，第269页。

㉓《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第385页。

㉔ 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第197页。

㉕ 刘莘园：《回忆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22页。

㉖［英］计约翰：《辛亥武昌战守闻见录》，《近代史资料》总72号，第130、134页。

㉗《辛亥首义纪事》，《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第119页。

㉘ 刘树棠：《辛亥首义时的湖北童子军》，《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辑，第200页。

㉙《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论集》下册，第1607页。

㉚ 陶菊隐：《长沙响应起义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194页。

㉛ 田光：《发之关系》，《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67页。

㉜ 郁懋培讲、傅昌裕讲：《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533、534、541页。

㉝ 许奇松口述：《争夺沪军都督现场目击记》，《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174页。

㉞ 钱化佛述，郑逸梅记：《攻宁记》，《辛亥革命》（七），第80页。

㉟《叶圣陶集》第19卷，第52、53页。

㊱《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观感》，《中国哲学》第九辑，第519页。

㊲《叶圣陶集》第19卷，第68、69页。

㊳ 转引自陈铁健：《瞿秋白传》，第19页。

㊴《澹安日记》上册，第45页。

㊵ 林述庆：《江左用兵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439页。

㊶ 费璞安：《吴江光复的回忆》，第150页。

㊷《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80—81页。

㊸《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页。

㊹ 黄克武编撰：《蒋复璁口述回忆录》，第23—25页。

㊺ 毛虎侯：《辛亥革命在丽水》，《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201页。

㊻《辛亥革命在贵阳》，《越风》1936年10月10日，第25页。

㊼ 郭沫若：《少年时代》，第243页。

㊽《广东独立记》，《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56、457页。

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315、316页。

⑮⓪《淮上军革命实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421页。

⑮①萧文：《大埔、永定、上杭的光复和革命军在长汀的失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377页。

⑮②卓仁机：《辛亥革命的几个片段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361页。

⑮③陈文斌：《生平记》手抄件。

⑮④罗任一：《辛亥秋鄂军杀端方琐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244页。

⑮⑤《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530页。

⑮⑥《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62页。

⑮⑦吴经熊著，周伟驰译，雷立柏注：《超越东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⑮⑧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12页。

⑮⑨沈云龙、谢文孙等记：《张知本先生访问纪录》，第30—31页。

⑯⓪丘政权、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0页。

⑯①《湖南反正追记》，第23、251页。

⑯②《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22—223页。

⑯③《再记追悼会详情》，《申报》1911年12月9日，参考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

⑯④《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第49、50页。

⑯⑤林端辅：《宁波光复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180页。

⑯⑥《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1页。

⑯⑦《胡兰畦回忆录1901—1936》，第14页。

⑯⑧《叶圣陶集》第19卷，第75页。

⑯⑨王军余：《追念同学张季鸾君》，《张季鸾先生纪念文集》，第55页。

⑰⓪《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600页。

⑰①《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612页。

⑰②《辛亥革命》（七），第221页。

⑰③吴默林：《辛亥革命上杭民军被陷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85页。

⑰④郭耀如：《海州光复前后》，《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374页。

⑰⑤梅吉庵：《回忆辛亥革命达县的情景》，《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317页。

⑰⑥陈德甫：《忠县辛亥革命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194页。

⑰⑦《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第180页。

⑰⑧《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17页。

⑰⑨ 陆丹林：《革命史谭》，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史》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辛亥革命在贵阳》，《越风》1936 年 10 月 10 日，第 25 页。

⑱⓪ 陈逸芗：《故乡兴化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 110—113 页。

⑱① 江天蔚：《辛亥革命后松阳的一次剪辫斗争》，《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203、204 页。

⑱② 龚楚：《参加中共武装斗争纪实》，原载《明报月刊》。

⑱③ 陈碧兰：《早期中共与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忆》，第 6—7 页。

⑱④ 梁若尘：《一个山村里的革命风暴》，《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 364 页。

⑱⑤《胡绍之等致胡适的信》，《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 222 页。

⑱⑥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 7 卷，第 209 页。

⑱⑦《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205 页。

⑱⑧《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历史档案》1981 年第 3 期，第 52 页，1981 年第 4 期，第 45 页。

⑱⑨《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239 页。

⑲⓪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 7 卷，第 244 页。

⑲① ［美］汤姆森著，朱艳辉译：《北洋之始》，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 年，第 49 页。

⑲② ［美］巴巴拉·W. 塔奇曼著，万里新译：《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新星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1、46 页。

⑲③《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 39、197 页。

⑲④《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 445 页。

⑲⑤《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231 页。

⑲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281、320、390、372、467、387—388页。

⑲⑦ 王一民：《安徽光复经过与都督的争夺》，《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407 页。

⑲⑧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大东图书公司 1980 年版，第 243 页。

⑲⑨ 翁辉东：《潮汕光复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 258、259。张醁村：《潮汕光复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 361 页。

⑳⓪《柏文蔚自传》，《党人三督传》，第 187 页。

⑳①《叶圣陶集》第 19 卷，第 87 页。

⑳② 杨雨辰：《壬子北京兵变真相》，《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 434、437 页。

⑳③《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79 页。

⑳④ 陈文运：《当我调回第三镇以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 518、520 页。

⑳⑤《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 492 页。

⑳⑥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 133 页。

⑳ 黄绍竑：《辛亥革命前后的广西局势和广西北伐军》，《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487页。

⑳ 李任仁：《同盟会在桂林、平乐的活动和广西宣布独立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466页。

⑳《回忆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27页。

⑳（逸民）《辛壬闻见录》，《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第15页。

㉑ 转引自陈生玺：《清末民初的剪辫子运动》，《渤海学刊》1995年第三期，第26页。

㉑ 柴德赛等编：《辛亥革命》五，第215页。

㉑《愕公随笔》，《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489页。

㉑ 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103页。

㉑ 甘绩熙：《躬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及阳夏鏖兵之经过情形实录》，台湾《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元前一年，第678页，转引自《清末民初的剪辫子运动》，《渤海学刊》1995年第四期，第64页。

㉑ 西里尔·帕尔：《辛亥革命中的莫里森》，《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八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7页。

㉑《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第15页。

㉑ 袁希洛：《我在辛亥革命时的一些经历和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285页。

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247页。

㉒《辛亥革命贵阳光复目睹记》，《传记文学》第10卷第1期，第96页。

㉒ 林虎：《我参加辛亥革命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434页。

㉒ 萧文：《大埔、永定、上杭的光复和革命军在长汀的失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373页。

㉒ 朱叔建：《松江军政分府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87页。

㉒《辛亥丰镇起义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268页。

㉒《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156页。

㉒ 陈攸序：《袍哥唐廉江与辛亥重庆“反正”》，《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357页。

㉒ 向楚遗稿，《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83页。

㉒ 李铁夫：《同盟会在叙永县活动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251、252页。

㉒ 杨兆蓉：《川南起义到泸州独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349页。

㉓ 王维舟：《回忆辛亥革命川东绥定、东乡地区光复前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188页。

㉓《奉节反正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206页。

㉜ 梅冷生：《温州光复概述》，《梅冷生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㉝ 张从五、丁洁尘：《辛亥宿州光复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429页。

㉞《郑孝胥日记》（三），第1357页。

㉟《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06页。

㊱ 苏勋丞：《江北发难前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103页。

㊲《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106页。

㊳ 吴佩江：《扬州光复事略》，《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304页。

㊴ 雷沛鸿：《同盟会在南宁的活动和广西独立前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474页。

㊵《古蔺县独立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274页。

㊶《胡汉民自传》，《党人三督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㊷《泉州光复史事拾零》，《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478—479页。

㊸ 孙丹林：《山东辛亥革命之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338、339页。

㊹《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605页。

㊺《张知本先生访问纪录》，第24页。

㊻ 载涛：《吴禄贞被刺真相》，《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246页。

㊼ 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6页。

㊽《汪荣宝日记》，第1065页。

㊾《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23页。

㊿ 张謇日记1911年12月14日，《张謇全集》第六卷，第661页。

(251)《郑孝胥日记》（三），第1368页。

(252)《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360页。

(253) 张樾生：《追记八旗代表章福荣所谈南北议和的一鳞半爪》，《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427页。

(254)《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810页。

(255) 唐在礼：《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340页。

(256)《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879、885页。

(257)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710页。

(258)《辛亥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487页。

(259)《申报》1912年3月18日。

(260)［澳］西里尔·珀尔著，檀东锃、窦坤译：《北京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2页。

㉖①《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第99页。

㉖②王文德：《辛亥革命前后台湾的一鳞半爪》，《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510页。

㉖③《吴宓日记》第一册，第198页。

㉖④《蓉城家书》，《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215页。

㉖⑤《杨杏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页。

㉖⑥朱春驹：《武昌起义杂忆》，《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第177—178页。

㉖⑦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台湾联经出版社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89页。

㉖⑧《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592页。

㉖⑨《郑孝胥日记》（三），第1415—1417、1466、1818页。

㉗⓪参见黄波：《梁鼎芬的辫子》，《随笔》2010年第5期。

㉗①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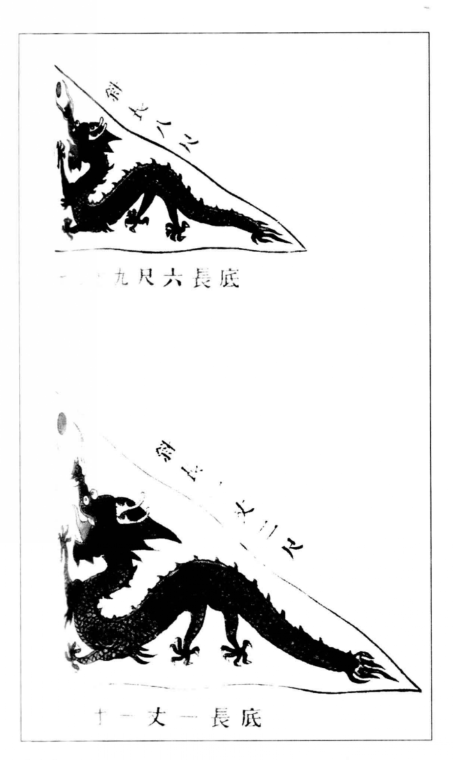
㉗②罗久芳、罗久蓉编辑校注：《罗家伦先生文存补编》，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版，第89、88页。

第四篇　易帜

一、黄龙旗的爱与恨

1862年10月17日，距1644年满清入关、席卷大陆已有218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所有水师船舰悬挂三角黄龙旗，作为中国官船旗号，获准。22日，照会英法俄美四国，黄龙旗作为国旗正式启用。相隔10年，1872年10月4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规定：三角形龙旗用黄羽纱制，龙身用蓝羽纱制，龙头向上。11月1日所有旗帜一律更换。12月3日的《申报》说："北京总理衙门照会各西国官员，谓中国新定旗式形如三角，色用黄，中画龙，用蓝色，……其船长一百六十尺之下者，该旗长用六尺四寸，其船长一百六十尺之上者，该旗用九尺六寸。"

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国途中看到各国国旗多为长方形，对黄龙旗的颜色也有微词，认为用尖角、黄色"太为失考"。他将各国国旗样式一一记入《使西纪程》，"存此以备他日考定旗式之一助"。1881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改三角形龙旗为长方形，其他不变。1888年9月，《北洋海军章程》（主要起草人为郭嵩焘之后出使西方的曾纪泽）明确黄龙旗为长方形，获准。1889年3月，两广总督张之洞照这一规定新制国旗：长方形，黄色，中嵌青色飞龙。5月，出使美国大臣张荫桓奏请，依据《北洋海军章程》，以



黄龙旗

长方形黄龙旗为国旗。从1862年到1889年，黄龙旗的正式确定，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岁月。[①]

20世纪新学开办，许多流行歌曲中都出现了“黄龙旗”相关字词。沈心工词曲的《男儿第一志气高》中就有“龙旗一面飘飘，锣鼓咚咚咚咚敲。”他作词的《凯旋》歌有“我龙旗飞扬，到处人瞻仰。”《大国民》歌中有一句“大旗翻飞正当阳，黄龙灿灿风飘荡”。新年歌中有“去年今年一时迁，龙旗飘飘齐插遍。”亡命日本的梁启超作词的《终业式》开首也是：

国旗赫赫悬当中，华旭照黄龙。[②]

进入1911年，飘了半个世纪的黄龙旗还能飘多久，在王公大臣心中显然并无这样的忧虑，记日记的那桐、徐世昌、绍英、荣庆这些人，在辛亥年春节期间依然忙于进宫问安，忙于迎来送往，祝寿拜年，应酬唱和，几乎无人察觉这将是大清最后的一个春节。

此时，在清廷权力不能覆盖的澳门，营地大街的宝衡银号照例挂出龙旗庆贺节日，没想到一群培基学堂的学生前来抗议，与银号主事人发生争执，学生们甚至向龙旗扔掷石块。银号请葡警前来弹压，带警探来到现场的澳门华探目刘康善，发现肇事学生很多是当地的绅商子弟，一面劝导学生守秩序，一面劝告银铺把龙旗取下，息事宁人。[③]

发生在澳门的这件事，在大历史中很容易被忽略，当时不会有人想到这是个不祥之兆。即使到武昌兵变消息传到京城的那个晚上，上上下下也无人想到龙旗将从此落地。正是从这一天起，自武昌到汉口、汉阳，挂了二百六十七年的龙旗陆续卷起。10月24日，日人宗方小太郎日记说：

“汉口招商局之快利号为叛徒所扣留，撤去龙旗，悬挂占领旗。招商局遂不得已停止上海、汉口间之航业。”[④]

另一位日本人内田顾一的日记也说：“招商局的汽船悬挂白旗投降革命军。”[⑤]

10月19日，法国驻香港领事馆负责人写信给外长：

一早，华人区便显得异乎寻常的忙碌。人们注意到主要有两个

没有辫子的中国人满街跑着要他们的同胞跟他们走。队伍很快便形成了，朝着飘扬着清王朝旗帜的那几幢房屋走去。王朝的旗帜在那里已经很少了。因为大多数亲皇朝派的中国人预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克制着自己没有挂旗。示威者们丢石头，大喊大叫，要求把黄龙旗收回去。最严重的示威活动发生在中国商业无限公司办公处和明确忠于当今政府的（也不是最反对革命的）报纸《新报》编辑部门前。大门都被砸烂了。巡警赶到才制止了更严重的混乱出现。再说，报社里的人满足了示威者的要求，拿掉了挑衅性的标记。[6]

同一天，在德国柏林，蔡元培给英国的吴稚晖写信说，武昌的消息在德国留学生中激起了热烈反响，他们兴奋地会集在留学生学会，其中一个重要举动就是“裂龙旗，制三色旗二，交叉于书记案之上”。驻德使臣梁诚听说，赶紧约几位留学生去谈话，问及改旗之举，学陆军的四川籍留学生刘庆恩直言：“裂龙旗者；我也；制三色旗者，我也，汝欲目我为革命党，我便是革命党，将奈何？”自然梁诚也无可奈何。[7]

10月27日早晨，当几个民军士兵发现汉口海关上空的龙旗还在飘扬，他们确实不无惊讶。整个武汉三镇，海关成了唯一挂龙旗的中国机构，位于租界的海关，名义上是清廷设立，实际上由外国人管理。他们不愿废弃龙旗，也不是因为效忠清朝，一是时局尚不明朗，二是要显示他们的特殊地位。[8]

清廷对拥有军舰大炮的海军寄予厚望，不少革命党人对海军的实力也存有畏惧之心。海军主力舰队降下龙旗，对王公显贵、各地封疆大吏内心的震撼是可以想见的。

海军将领张怿伯回忆龙旗最初在长江军舰降下的一幕，大约11月1日，“时适日落，将龙旗落下掷于甲板上践踏之，旋弃之于江。”在此一刹那间，海军龙旗，便成历史陈迹。[9]

蔡金台给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写信，当他们12月中旬南下议和时：“自武汉到上海，所见长江水师及兵舰，无一挂龙旗者。”[10]

11月3日下午，上海光复前夕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商团公会5个体操会队员集合在沪军营南操场，听到钟声十三响，他们当场将场中旗杆上当空飘扬

的龙旗扯下，换上白旗，不料升白旗时用力过猛，将旗绳拉断了，团员、咸货行的伙计金炳生从前在沙船上当过水手，会爬桅杆，由他爬上去换了根新绳。[11]

昨日街头信步归，龙旗飘扬送斜晖。谁知半夜腾霄去，片刻苍龙换白衣。[12]

曾目睹上海易帜的朱文炳不久后写下了这样的竹枝词。

看惯了龙旗的人中，面对龙旗的降落，也有为此下泪、哭泣的。有人回忆，11 月 4 日早晨，策电炮舰与吴淞炮台按事先约定同挂白布义旗，“不意舰上有老水手头目高剑宝等数人，跪在龙旗边哭，劝我勿将龙旗拉下。”[13]

甚至在海关工作的外国人也有为龙旗的降落而黯然神伤的。

有关易帜的谣传和因为谣传而易帜的事时有发生。

10 月 25 日，清军克复汉口，陆军大臣荫昌的副官长丁士源进入汉口，在江汉关的办公室，税务司告诉他，有更可喜的消息，刚接到长沙税务司电报：“长沙扰乱五日，本日上午已由咨议局议长谭延闿，通令取消白旗，各衙署均已重挂龙旗。想系因得克复汉口之电也。”他返回孝感的司令部前，又从汉口的外商那里得到情报，“长沙谭延闿挂龙旗后，派船百只，在长沙之乱党三千余人，即谓将开赴京口，援助汉阳之乱党云。”[14]

长沙自 10 月 22 日独立，有过兵变，焦达峰、陈作新被杀，都督易人，但没有重新挂出龙旗，这只是一个谣传。

10 月 29 日，广东各界绅商在文澜书院集会谋求独立，梁鼎芬、江孔殷等演讲之后，人们商议捐款制旗，“一时倾囊者争先恐后，互相争掷，以至满地金钱，不一刻已逾额数。”当即在车衣店定制独立大旗，很快做好，竖在书院门口，直到夜晚，高呼万岁，前来瞻仰的人山人海，鞭炮声不绝，烟雾弥漫，行人止步。喜悦之情，妇孺皆然。长堤鹿角酒店和广洋货店的龙旗都被行人扯下。[15]

11 月 5 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给外交大臣格雷写信，汇报广东的旗帜变幻：

考虑到国内其他地区情况的发展变幻莫测，所以决定宣布广东

为一个自治单位，否认同革命军有任何联系。总督的处境显然是很为难的，他似乎没有采取任何明确的态度。10月29日悬挂独立旗帜一事，引起了一些零星的骚乱，传闻有一支革命军在一个曾经做过土匪的人率领下，向广州进发。

30日晚上，英王陛下总领事报告说：曾经从船舶上降下的清朝旗帜，都重新悬挂起来；城内平安无事，而且他认为将继续保持平静。[16]

胡适在美国收到二哥胡绍之11月3日的家书，也提到，“广东已宣告独立，惟人心不一，次日闻官军战胜之电，即改悬龙旗，贻笑外人，真可叹也”。[17]

11月6日，镇江、江阴等地纷纷独立后，南京谣传革命军要攻城，城内秩序大乱。地方治安会不明真相，误以为革命军已攻进城来，匆忙将预先准备好的一面大白旗高悬在大门外，知道是误会，又赶忙地把白旗收起，换上龙旗，所幸未被江防军看见。此时缺少子弹的新军已退到城外，石头城还在张勋的军队掌握中。[18]

11月13日，无锡的锡金军政分府因为从报纸上看到江阴炮台又挂出龙旗，赶紧致电江阴军政府，询问消息是否确切。很快得到江阴回电：“敝处并无更换龙旗之事，地方安靖如常。”[19]

英文《汉口日报》逐日刊载的《革命日记》报道：

11月28日　昨夜的情况

目前据我们所知，昨天晚上整个汉阳城均被清军占领，龟山上升起了黄龙旗。[20]

那是一个灰暗的时刻，汉阳、汉口易手，龙旗再度飘扬，黄兴几乎自杀。如果不是龙旗在南京落地，战事上扳回一局，清廷几乎要弹冠相庆了。南京易帜，江南半壁失色，黄龙旗的命运大致决定。早在10月15日，宋教仁就在《民立报》发表《湖北形势地理说》，指出：“今日之形势，以天下言之，则重在武昌；以东南言之，则重在金陵。”

12月23日，澳洲华侨黄来旺受当地的同盟会支部委托，写信给清廷驻墨

尔本领事黄荣良：

> 我们发现每当这里的日报报道有利于满族政权或帝国军队取得任何胜利时，你就在大使馆升起龙旗。
>
> 为显示对那个专制腐败的政府的同情，你完全不尊重澳大利亚的中国居民热爱共和的感情。我们认为你们一伙想举起那杆讨厌的旗子是非常令人作呕的。在那旗子之下，我们民族被遭受屈辱，我们的人民享受不到任何自由。这种景象令每个真正的中国人热血沸腾。[21]

1912年元旦，清朝还是合法政府，澳大利亚当地报纸以“墨尔本的中国人——一个喜气洋洋的集会”为题报道墨尔本华侨自发的集会决议，在黄来旺寄给孙中山的剪报中有这样一段：

> 鼓掌顿足和欢呼声中得出决议：旧的龙旗（帝国的）在墨尔本将不再会被承认。在每个场合共和国旗将被升起。市里许多中国人的房子的桅杆上已看得到国旗。[22]

北京收起龙旗要等到退位诏书颁布，袁世凯身边的唐在礼记得，“第二天，北京城各家报纸就把诏书的全文发表出来。当天把龙旗也收起来了，……但是新的旗帜还没有。”[23]

对忠于王室和君主制的赵尔巽来说，降下龙旗肯定是非常痛苦的，但是辞职和逃离更不容易。[24]

对满人松毓而言，黄龙旗的降落恰恰是他家的新生。他奔走自治、立宪运动，在民国初年出版的《革命文牍》中有他与孙中山的通信，其中有“专制流毒，思之真寒人心也”之句。他于1907年发起支持立宪的吉林自治会，当选为会长。当东北三省举棋不定之际，他的处境十分危险，张穆安记得，“我家距离自治会会所甚近，能看见该会旗杆，当时悬挂的还是龙旗。听说松氏举家哭泣，因有将他逮捕治罪的风声。正在此时，南北和议成立，清帝退位，该会改悬五色国旗，松氏全家如庆更生。”[25]

二、十八星旗

很多年后，在汉口开照相馆的革命党人李白贞仍记得那一幕：1911 年 9 月 25 日，孙武叫他按图制旗，红底黑心、轮角、外加十八黄星。[26]

早在 1907 年，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就规定了革命军旗的式样，用大红色为底布，由中间辐射出来九个黑色锐角，每个锐角内外两端，各有一黄色圆星，内外各九个共十八个，表示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军校出身的新军队官、以后成了将军的胡宗铎则说，十八星旗“原是张之洞发行湖北钞票中的水印，经无意中发现采用”。[27])

李白贞先把国旗图样放大画好，购买了红、黄、黑三种色布，照图裁剪粘贴，交给他的夫人陈氏缝就。在蛇山和黄鹤楼前升起的就是这面十八星旗。[28]

杨玉如记得，十八星军旗取各省铁血联合之意，曾是同盟会讨论过的国旗方案之一，“首先飞扬于黄鹤楼钟塔尖顶的就是此旗。”[29]

陆军中学学生刘莘园向中和门楚望台急进，“距城楼约二三里，远远望见城楼上树立着一面十八个星的红底黑星大旗，在红日初升的晴空中迎风招展，我们心头真是兴奋极了。”[30]

10 月 11 日黎明，蛇山满驻革命军，“星旗招展，……咨议局前亦悬新旗。”[31]

成致和《辛亥武昌首义见闻录》说：

> 二十日曙，十八星旗首见于阅马场后之蛇山……、汉阳守兵工厂之四十二标一营见武昌已举义旗，亦于是日占领汉阳，悬十八星旗于龟山以应之。[32]

蛇山下的咨议局成为都督府所在地，大门口竖着两面十八星大旗。[33]

清廷最初连十八星旗的颜色、图案也搞得不太清楚。盛宣怀档案中有一份 10 月 11 日以后汉口《关于起义情况的报告》（抄件）：

> [楚豫] 该兵舰是旗人统带，尽属旗兵，余外中国兵舰、炮船，通换新政府旗帜，闻系白边红心，内中花纹十八个圈圈，取代表汉人十八行省之意。如龟山、蛇山、汉阳等处，一时通已拔满旗、易汉帜。[34]

倒是外国人很清楚。

10 月 9 日，武昌山雨欲来之际，日本三菱商事株式会社汉口支店职员内田顾一的日记提到了这面旗，还手绘了十八星旗的图案：

> [宝善里出事] 一看那些党则，实是很文明的。……又订制下图式样的旗印。[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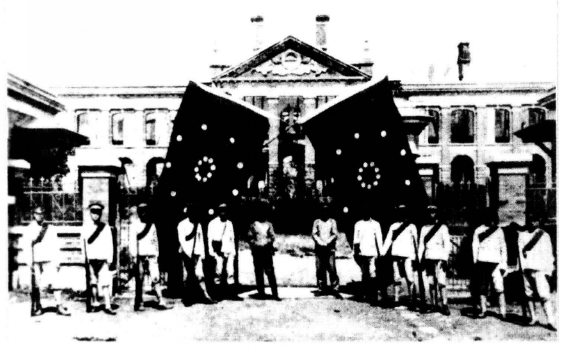
10 月 17 日，收集情报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武汉目睹：

> 革党左腕缠白布，旗为红地十曜花纹，在市内竖立"兴汉招兵"之旗，应募者甚多。[36]

10 月 20 日，英国传教士计约翰日记：

> 看来，正式的共和旗子是白星红旗。星有九个尖角，每个尖角上都有一个黑色小圆圈，各尖角的基底衬一个黑点，总共形成十八个黑色标志，其含义是"共和要遍及天下十八省"。[37]

在鄂军政府外交部任过要职的杨霆垣说，10 月 14 日，"我到府时，见楼梯下耳房内有人缝制十九星旗。我问这是何意。"他们答道："我们兴汉灭



十八星旗

满，本是拟定旗帜上只有十八星的，因为中国本部是十八省。现在还要打算收回台湾，所以改为十九星。”[38]

但外界只知十八星旗，11月5日上海《民立报》发表《中华学生军之先声》：

一声黄鹤惊醒群愚，三色旌旗飞扬于大江南北。……[39]

11月7日，《民立报》发表《学生北伐队宣告文》也称：

……三楚健儿，倾其心血、颈血、脑血，以组织庄严优美之中华民国于方域、汉水之间……同人当厉吾兵秣马，以与我学界青年相见于三色旗下。[40]

这里的“三色旗”都是指红、黑、黄三色的十八星旗。11月18日，《民立报》公布“中华民国国旗名铁血十八团旗”，在图案旁注明“团中均黄色中青外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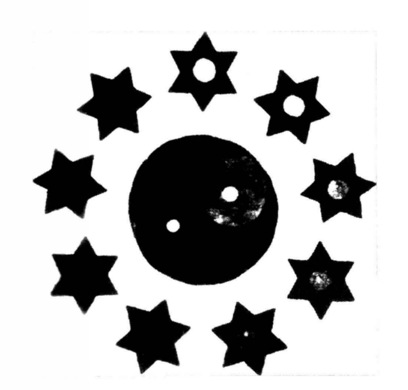
有些地方对武昌的十八星旗不了解，10月26日《绍兴白话报》的报道说：“革命党从前用的是太阳图旗，现在都改用红白旗，旗当中一颗太阳。”[41]

最早响应武昌的长沙虽出现了十八星旗，但没有取得主导地位，主要是白旗。当地海关10月28日向北京总税务司的汇报对旗帜的描述也有点乱，起义者先是在海关强行挂上白旗，经抗议，卸下，然后：

他们再次要我换新旗 [上星期日起，我们已不挂旗]。今天决定在所有政府机关的房屋上悬挂带星的红旗。……此地的一些小火轮上今天第一次挂了红旗。

我正写到这里，听差进来说，张汝楫在挂新旗，……新旗是三条垂直等分的红、橙、红颜色的长条组成的。[42]

11月2日，英国驻长沙领事翟比南给朱尔典写信汇报10月22日的情况：



共进会设计的另一种旗帜

上海独立后南京路上悬挂的旗帜五花八门

到下午二时，全城已落入革命军手中，未费一枪一弹；到处飘扬着白旗，袖子上带有白色徽章的卫队在街道上巡逻，以维持秩序。[43]

11月14日，在湖南平江办学的同盟会员凌盛仪日记："中国国旗，现定众星拱日式，星分十八，指十八省。"[44]

10月24日岳州光复，几乎是传檄而定。岳州城头高悬的是十八星旗。[45]

12月29日，时在长沙军政府任职的凌盛仪日记："全省悬众星拱日旗及红黄二色旗，因举民国总统也。"[46]

10月31日，南昌独立，吴介璋正式宣布就都督职，次日以铁血十八星旗代替龙旗。[47]

11月10日福州城内到处都是白旗，也有人说福建成立都督府，确立黄帝纪元，挂十八星旗。[48]

1910年5月就参加了同盟会的杨琦记得，11月11日福建军政府成立，两天后举行于山阵亡将士追悼会，中堂高悬十八星、五色国旗一对。[49]此时五色旗尚无，有之只有十八星旗。不过多数人关于福建各地光复的回忆都说挂白旗。

四川各地只有广安一处采用十八星旗，"和武昌起义时采用的旗帜形式一样（只在图样方面还有一些差别），都是根据共进会在东京成立时主张采用的旗帜形式制定的。"绍兴光复打的是白旗，但是11月6日周作人在当地《绍兴公报》发表《庆贺独立》文中有这样一句："美哉！洋洋星旗飘扬，今日何日，非我绍兴之新纪元耶"。十八星旗的影响还是遍于国中。[50]

同一天，法国驻北京使馆武官高拉尔德向陆军部长报告10月31日至11月5日的中国形势："到明天，其它南方省府失陷的消息又会传来，暴动军将在他们的红旗上增加几颗五角但这些地方上的胜利不会持续很久。"[51]

不光法国人，其实，中国人对十八星军旗也不是很熟悉。佚名留下的日记《常昭光复纪事》：

10月19日，各处拾得匿名揭帖，各学校都有投函，10月25日大兵过境秋毫无犯，军旗用黄日黄星红地。[52]



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在海外发行的军用债券上的旗帜



辛亥漫画中与十八星旗并存的八卦星旗



闸北招兵的旗帜

所谓“黄日黄星红地”的军旗就是十八星旗，但记错了一种颜色。

12月29日，邻近常熟的苏州少年叶圣陶日记：“先锋队适在上操……仰见营中旗杆上高挂军旗，红地黑纹黄星，若至庄严而勇武焉。”[53]

红地黑纹黄星，正是标准的十八星旗。

如果不留心，乍一看很容易把十八星旗看作九星旗。亲历武昌首义的杨玉如说，从武汉逃出的商民到处宣传，武汉已被民军光复，“各处插的是九星旗”。[54]

以报纸为革命摇旗呐喊的胡石庵也称为九星旗，他在汉口路遇某洋行翻译查某（粤人，忘其名），告诉他：“武昌已别成一世界，满城兵士皆袖缠白巾，……蛇山之上驻兵殆遍，山上树有四方之大旗，花样系九星围月之状。”他说自己此前见过九星旗，“其式为尖角，与近日之正方者异状”。[55]

有人回忆东北辛亥革命时，“有同志携带革命九星红旗。……武汉军政府就挂此旗。”[56]

1911年12月初，官军范少臣投降民军，独自一人，手持九星旗，闯入瓦房店复州之区公所，兵不血刃就占领了瓦房店。[57]

他们都把十八星旗误作九星旗。起事之前确实设计过一种九星旗，九颗星围绕着阴阳太极圈。

在十八星旗之外，武昌最初就有其他的旗帜。10月14日，宗方小太郎日记说：

> 武昌城内每户悬挂“欢迎得胜”、“汉军百战百胜”等红旗。

英国传教士计约翰日记：

> 10月11日
>
> 叛军有各种口令。星期二晚上，他们的口令是“协力（shiaeli），意为“团结就是力量”。他们把这二个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星期三上午，他们所持的旗子上画有双圈，意为“同心”。

10月16日

革命党人还派出招募队到处巡视，招收苦力入伍，这些人持红色旗帜并有武装人员保护。

10月20日

革命军悬的旗子有种种图案，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红色底子。[58]

也不仅红色旗，白色旗从武昌就开始挂了。

10月12日，瑞澂致电内阁军咨府、邮传部："刻由匪党与湖北咨议局公推原派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首，并由议员为之主谋，安民告示即用鄂省大都督称，并悬白旗，上书'举汉灭满，悬赏拿官'字样。"[59]

胡石庵记录，汉阳兵工厂为民军所占，汉阳全城被民军占领后，"龟山之麓，扎有四十二标步兵二营，其代表为宋锡全，已高竖白帜，势甚威武。"[60]

湖北各地也多挂白旗。10月13日晚，当宜昌独立时，就是宋春廷在城隍庙楼上写了三板白洋布的"汉"字旗，于黑夜中挨门插旗。[61]12月2日葛云森给安格联的信中提及："11月28日星期二，我听说沙市城里到处都挂了白旗。"[62]

"武昌光复，人民欢喜若狂，张白布作帜，大书'不图今日'"。黄州光复，当地军民一千多人到码头欢迎湖北军政府招抚人员，"各手执白旗一面，上书'光复汉室，还我河山'字样，欢呼之声震人耳鼓。"[63]

白旗之外，白布缠左臂作为记号也自武昌始。10月11日，两湖师范总学堂学生朱峙三日记中记道：

杨万、朱春俱来；说起义军队左臂缠白布为记号，纪律文明，只杀旗人云云[64]

三、青天白日旗

孙中山对青天白日旗情有独钟，海外华侨也多熟悉此旗，论历史，以此旗最为悠久。

1911年10月19日蔡元培给留英的吴稚晖信里说，德国柏林留学生取代龙旗的“三色旗”，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65]

11月11日，孙中山到伦敦，登门造访吴稚晖不遇，留下一信说第二天晚上再来。他与吴见面时说，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制成50面，遍悬伦敦城东的唐人街。吴稚晖遗物中尚保存着当年在伦敦使用的一面青天白日旗，现由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收藏。[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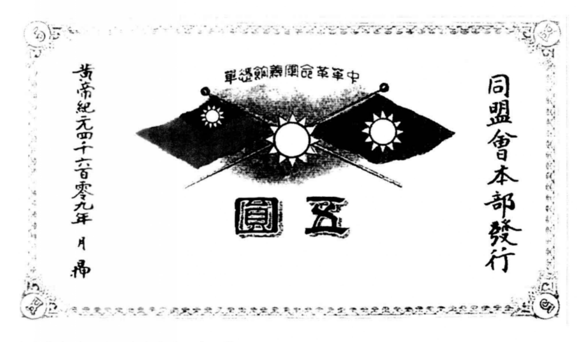
此前孙中山在美洲发行的洪门债券，就是以“中华革命党本部总理”名义印的“中华民国金币”，上面的图案或是青天白日旗，或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法国报纸报道，11月13日，美国旧金山的华侨选孙中山为临时政府元首，新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象征自由、平等、博爱。[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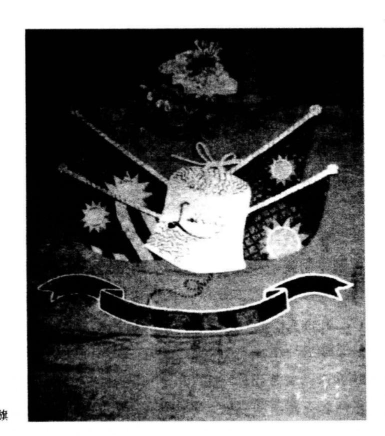
12月31日，孙逸仙当选大总统的消息传到美国檀香山，“此间中国侨民几至欢欣若狂，家家户户都悬起革命旗帜，或鸣鞭炮，或奏鼓乐，高举孙氏肖像在市内游行。据闻，美国人士中之过去曾为孙氏师者，亦均纷纷致电表示祝贺。”[68]这里没有明白点出革命旗帜就是指青天白日旗，孙中山的同乡、旅居檀香山的翠亨村人杨桐给他的贺信中则写得清楚：“自革命爆发后，在这个国家的华侨有了很大变化。过去许多是支持无能的满族皇帝的，现在成了积极的共和主义者……红—白—蓝旗被升起来表达我们的共鸣……”[69]

在泰国曼谷的中国人，“他们把革命政府的三色旗升起来”，显然也是红—白—蓝三色旗，海外没有人知道黄、黑、红三色的十八星旗。[70]

10月26日，《绍兴白话报》报道武昌起义：



中华革命军义饷证单上的青天白日旗



张永福夫人绣的青天白日旗

革命党从前用的是太阳图旗。[71]

然而在本土，这面旗只有在广东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没有在全国升起来，孙中山对此耿耿于怀。

即使在广东，独立之初打的也是白旗。10月30日，广州海关税务司梅乐和给安格联写信说，前一天，“在江边的新堤和西关一带到处悬挂独立的白旗，旗上写着‘广东民团独立’的字样。”到了晚上11点钟，总督派人“逮捕并囚禁了一个带着独立的白旗进城的人”[72]这次地方士绅主导的独立计划流产。到11月9日，“乘全省各界绅商团体在文澜书院开会，革命党人进去宣布广东独立，与北京脱离关系，群情激昂，无法阻遏。旋有人袖出白旗一面，书就‘广东独立’四字，工人温车在院内取竹竿挑起，高举招展，攘臂大呼‘广东独立万岁’，和者声震瓦壁，众绅士狼狈遁去。[温车扛着旗]沿途商店民居，咸拍掌欢呼，燃放串炮，深夜始息。当民众到达督署时，已聚集至二万余人，要求张鸣歧立即宣布独立。”张匿而不敢见，江孔殷取出青天白日旗，叫人树于屋顶，这面旗是他清乡时捡来的。这是广州升起的第一面青天白日旗。此时，已与胡汉民等暗中达成协议的水师提督李准派人送来通告全省水陆部队一律改树白旗，不得与革命军抵抗的电文，上面盖有水师提督的大印。[73]

“居民知大局已定，沿途欢呼，城厢内外都高举三色国旗，有书‘中华民国万岁’的，有书‘新汉万岁’的，爆竹如雷，欢声响动……五羊城中焕然一新世界矣。”[74]

广东各地除了陈炯明领导的惠州，其他地方都打出了这面旗。

在石歧西门大街，一个热心革命的振兴商店店主，“早就把青天白日旗帜预先制就了一大批，因此在起义之日，革命军旗帜就高竖在城楼和通衢大道，随风招展了。”[75]

在汕头，11月21日潮海关税务司克立基给安格联的信中说：

本月10日全市忽然涌现蓝白色或者蓝红白三色旗帜，到处飘扬，说明共和运动像瘟疫一样，已经传播到本地区了。

江门关税务司烈悌 11 月 11 日写给安格烈信中对旗帜做了详细说明：

> 今天上午九点钟，一大队革命军在海关前面列队，旌旗招展，鸣放鞭炮，不过一切都极有秩序，没有对任何人进行干扰。新旗是蓝色、长方形，中间有一个白星。
>
> ……中国炮舰全部悬挂革命党旗帜。[76]

当时既有青天白日旗，也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在梅州，11 月 11 日巡防营管带放弃抵抗，到 12 日正午民军到达时，城头已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宣告和平光复。[77]

民军队伍到石龙镇时，"商户照常营业，到处飘扬着同盟会的青天白日旗帜，墙上张贴'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军万岁'的欢迎标语。"[78]

11 月 9 日广州独立的正式旗帜是青天白日旗，是胡汉民与李准反正前达成的几个条件之一。胡汉民自述，11 月 6 日，李准派电报职员黎凤墀到港接洽，他提出的三条件，第一个即："李须亲书降表来，同时去满清旗帜，用青天白日旗帜，通电反正。"[79]

青天白日旗本是 1895 年兴中会发动未遂的广州起义前夕，由孙中山最初的同志、"四大寇"之一陆皓东设计。兴中会重要成员谢缵泰日记 1895 年 3 月 16 日："我们采用青天白日旗作为标帜"。[80]

陆为此殉难。孙中山对此旗深怀感情。1901 年冬天，也是"四大寇"之一的尢列在吉隆坡成立兴中会下属的"中和堂"分部，在会所高挂青天白日旗，"这是海外最早飘扬的一面青天白日旗。"[81]

孙、黄合作成立同盟会后，曾开会讨论未来的国旗，孙中山主张用青天白日旗，黄兴不同意，认为构图欠美观，且接近日本的太阳旗。孙又增加红色，改为红蓝白三色旗，以符合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82]

《章太炎自定年谱》说，当时孙中山甚至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 1907 年 2 月 28 日，接近黄兴的宋教仁日记说，因孙中山在国旗方案上"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黄兴要怒而退出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83]这是孙、黄首次发生正面冲突。接近孙的胡汉民

自传说："先生力主青天白日之徽帜；克强欲用井字徽帜，谓以井田为社会主义之象征。先生谓既不美术，又嫌有复古思想。"[84]

华侨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书记述孙中山旅居新加坡"晚晴园"时设计国旗的构想，并保存了彩色图片。按孙中山的嘱咐，买来许多红、蓝、白纸，孙就动手设计"元始国旗"：

他顿时就剪裁起来做了大小数面，用浆糊贴在客厅四周围的墙壁上，又加一种，是补角的是红白相间为旗地，上角补青天白日的。及到晚餐会后在许多人当中，他老人家很高兴的解释这国旗制裁合理的功绩及美观；同志中只有林中兄尚有批评说话；孙先生又再作一篇申说万不能变更的道理。这些是那晚在晚晴园能够把决定的国旗代表全国、代表四万万民族，整天飘扬在海陆天空上的大权决定下去；万想不到小小晚晴园，比较什么国会、议院的权力还厉害。过了几天，先生又命我的内人陈淑字君照样刺绣，我那陈君顿时亦就尽她的所能，抽线添丝绣出一幅送上孙先生；先生看了眉开色笑的欢喜，实时命我配上镜架，挂在厅室当中，作朝朝暮暮的瞻仰。(此旗现尚存在，有精卫兄题字附图)。

黄兴与张永福也有过一次关于国旗的交谈，井字旗、星旗之外，他最赞成另外一种：

他说是用七色凑成的，他再说要用七色的理由，是因为东方的日本，他所用的红色圆心旗，是代表太阳的意思。我们用七色造旗，是取日光七色的精华。照这样他日本是取太阳的形式，我们的旗是取太阳的精神。一以精神，一以形式，两相比较起来，不是我党的旗帜胜过日本多多么？[85]

只是张永福所记的时间为"民前七年"，与"同盟会成立了以后，有许多个月"矛盾。此事发生在1907年孙、黄国旗之争后。同样长期追随孙中山的

冯自由说，黄兴批评青天白日旗的形式不美，“孙中山戊申年［1908年］在新加坡将此旗再三润饰，拟将旗上青、红二色增加小方格，且于红色上横添白线，以示美观，曾指导张永福夫人陈叔字绣制新旗式，以示同志，其图案由张保存。”[86]

辛亥革命前的历次武装起义都曾打出青天白日旗或青天白日满地红旗，1908年5月1日，云南蒙自关河口分关主任额尔德给裴式楷的信中讲道：

> 突然他用手指着房子前面的岗哨吃惊地说道：“那是他们的旗子！”……但是旗子是挂在那里了，颜色是深红的，上左方是蓝色长方形，相当于全旗的四分之一，蓝色长方形中间是一个大白星。[87]

对于旗帜中太阳的锯齿，美国青年史迪威辛亥革命期间在广州的中国老城看到，“在那里，红底上有十二个锯齿的黑太阳的革命者旗帜代替了清帝国的黄龙旗。”[88]这一印象来自史迪威日记，他记住了红底与12个锯齿的太阳，只是把白太阳错成了黑太阳。孙中山在新加坡亲自画的图样就是12个锯齿，也有8个锯齿的，1912年3月15日九列在广州接受党人祝寿时挂的就是“八针旗”，与庚子年惠州起义和吉隆坡分部挂的旗一致。[89]

法国人听说中国革命党的旗帜代表自由、平等、博爱，消息传来，法国人眉飞色舞，以为这是模仿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喜悦之至。[90]他们不清楚，这面青天白日旗没有在全国飘扬，广东之外几乎是应者寥寥。上海独立时，也曾出现过青天白日旗，中学生陆澹安11月3日的日记说，他出大东门时遇到一队袖缠白布的商团，为首的夏月润手持“红地蓝星小旗”。等他回家告诉家人民军起事的消息，再到大东门，“见红地蓝星之旗已高插城上，城门口贴有中华民国上海军政分府告示，观者如堵。”然而，第二天出门，他只看见商铺已悬白旗，“至法租界、英租界则白旗招展，有书光复大汉者，有书还我河山者，颇觉气象一新。”第三天，到里马路十六铺闲游，“则商铺均已悬白旗矣”。第四天下午，进大东门，到县署见门前已高张“中华民国上海军政分府办事处”的白旗。[91]

广西独立时，虽也有青天白日旗，只是民间自发的零星行为。11月7日

宣布独立时，当时官绅商民均不知中华民国的旗帜是怎样的，只是用白布写“独立”、“光复”等字而已，只有恒益、公益两商行挂起青天白日的旗帜。第二天全城各处才纷纷照样仿制，悬挂起来。而提督衙门只在照壁上贴出了一张红纸布告，并没有升起什么旗帜。[92]

杭州独立，几乎所有回忆都说挂的是白旗，唯有英国驻杭州领事 11 月 6 日写给朱尔典的信提及白色旗帜与共和旗帜，共和旗帜即指青天白日旗：“共和旗或‘光复’旗是红色的，右上角有一白色方块，其中嵌入一个用蓝色勾画的太阳。”[93]

11 月 11 日，福建漳州的明伦堂（府学宫）升起青天白日旗，揭开漳州革命的序幕，漳州镇总兵护理刘勋响应革命。[94]

1888 年生在广东中山，生长在江西九江的吴铁城，亲历九江独立，他在回忆录中说，九江光复后所用的是青天白日旗。[95]但外地有多人回忆九江独立是白旗，胡石庵在汉口，10 月 25 日午后胡鄂公来访，“且闻九江、上海亦树白旗，民国前途，决可建立。”[96]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所设商业中学毕业，正在该馆当练习生的王振民，10 月 29 日过九江，“已悬白旗。”[97]

在华美国传教士汤姆森《北洋之始》回忆，11 月 21 日徐绍桢在南京在升起红白蓝三色旗。12 月 2 日，南京获胜的革命军秩序井然，迎风招展的红白蓝三色旗，见证着这不平凡的一幕。“红白蓝三色旗和白色的旗帜插遍每个角落，告诉人们革命军取得了胜利。”但又说，“到处都飘着白色的旗帜，在中国曾经代表死亡的白色，现在也像世界其它地方一样代表着和平。”[98]在当时留下的黑白照片上，可以看到南京城头曾飘有深色旗帜。

12 月 5 日，法国驻上海领事喇伯第也致信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说：“南京百姓欢迎革命党人，蓝旗到处飘扬。”[99]

可见，南京在白旗之外，还有青天白日旗，但以白旗为主。

在孙中山心中，青天白日旗是不可替代的，哪怕没有成为国旗。在南京临时政府，他的总统办公室里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图案，冯自由等人都曾目睹。[100]

这面旗成为海军旗有点偶然。9 月 11 日，由萨镇冰带到武汉的海军三舰等决定起义。当离开阳逻前夕落旗时，海琛舰士官阳明取龙旗投入长江。第二天早晨即以管旗头目密制的巨幅白旗于离阳逻十里后悬于舰尾。[101]

时在汉口的英国传教士计约翰日记：

11月11日

萨水师提督的2艘巡洋舰2艘鱼雷艇及3艘炮艇今天……起锚，顺流而下。巡洋舰上升了白旗代替龙旗。炮艇和鱼雷艇直到下午才起锚，他们是否换了旗还不清楚。

11月14日星期日

悬挂白旗的三艘中国巡洋舰向下游驶去，星期一到达九江仍悬挂着革命军的旗子。[102]

九江海关穆厚达11月17日给安格联的信也说：

“本月14日早晨，三艘中国巡洋舰挂了白旗从上游驶来。……昨天它们约同新来的一艘炮舰和两艘鱼雷艇挂满了旗帜以示庆祝，并在主桅和船尾上悬挂了革命党旗”。[103]

舰队挂着白旗顺流而下，到了九江换上青天白日旗。吴铁城回忆：

“舰队到九江的第一日就把原来的‘龙旗’卸下了，我们星夜赶制了许多青天白日旗，第二天中午，由林子超、蒋君羊和我三人送到舰上去，我们先在海筹领队舰上升起这革命光荣的青天白日旗帜，领导其它各舰继续升起，旗帜随风招展，江山为之生色。”[104]

亲历海军起义的汤芗铭回忆虽略有不同，但挂青天白日旗则是相同的。他们在海容舰上开会，他被推为临时司令，“我还叫人画了青天白日的海军旗帜图样，命各舰自己用布制成。”[105]

当时，九江都督马毓宝先致电黎元洪称，军舰竖白旗向他们请领国旗。接着又电告黎元洪，三舰已换民国军旗，满籍人员护送往沪。[106]吴铁城的回忆更为可信，青天白日旗是九江军政府提供的。也许当时还没有想到，临时参议院会将此旗正式确立为海军旗。11月18日《民立报》公布过“拟中华共和民国海军旗式”，一个红色四角五星图案，中间黄色，四角蓝色，“中央黄色为汉族首部发祥中土，外附满蒙回藏合五大民族，而成为中华共和民国。”最终没有被接受。

四、“一夜城头旗尽白”

10月30日，日本谍报人员宗方小太郎的日记：

上午八时半自九江出发，九时四十分过湖口县。炮台、兵营尽悬革命军之白旗。九江地方舟子负贩之徒多以白布缠左臂，标榜为革命党员。[107]

简洁的白旗被大多数地方采用，成为更新换代的标志。少年叶圣陶当时写下一句诗：“一夜城头旗尽白”。编过《共和国唱歌集》的华航琛作词的《追悼先烈歌》中也有一句：

看白旗飞扬，到处人瞻仰。[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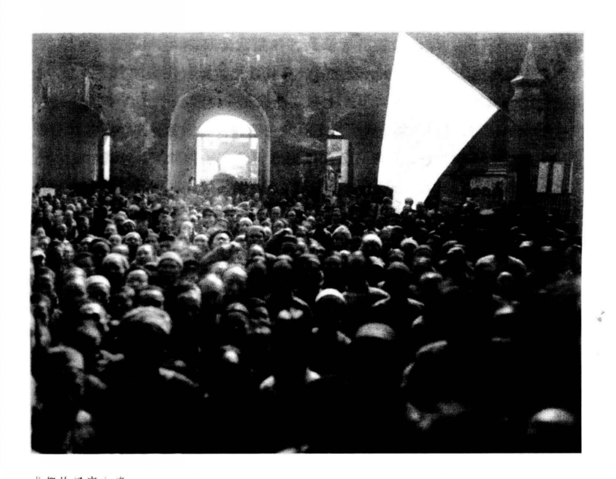
长沙独立，先是巡抚衙门挂出“汉”字大白旗，“家家户户均于门首高悬白旗，或于旗上书一，‘汉’字，以志欢庆。湘江以下一带，白旗林立”。[109]

目睹此变的曹孟其记述：“居民亦争裂白布或纸作小旗，书‘汉’字竖门前，虽人烟稀落之地，招展飘扬，俄顷已遍。”[110]在长沙参军的学生毛泽东亲见衙门上升起一面白色的旗帜，上面写着一个“汉”字。[111]有记日记习惯的瞿兑之也记着“城中衙署悬白旗，兵士以白缠臂”。[112]

10月25日，远在湖南平江的凌盛仪在日记中记着，长沙“全城均竖大革命白旗矣”。第二天，平江独立，“天曙开市，门皆白旗，人皆白袖……街巷甚平静也。”启明女学堂学生上课如常。[113]

11月3日，在长江口停泊的发策电炮舰与吴淞炮台相约次日一早同挂白布义旗为号，长江舰队策电大副林舜藩感到非常振奋。第二天清早，他就用大餐桌上的白布一幅，升上旗杆，远望炮台，也已升起白旗。[114]

做过鄂军都督府秘书的黄仲垲与汤化龙同行，11月27日乘日船“大福”



成都的汉字白旗

轮赴上海，途经九江、安庆、芜湖等处，都已高悬白旗，11 月 29 日过南京，见下游的二艘兵舰也悬着白旗。次日晨［11 月 30 日］九时，当他们进入吴淞口，一眼就看见了炮台上悬着的白旗。[115]

北上看秋操的欧阳武与李烈钧分路南下，李乘海船先到九江，欧阳乘火车只能先到济南，改坐民船沿运河到韩庄搭火车，再由南京下关搭洋船。“经过安庆这一天，正是安庆光复之日，在船头上看见安庆城楼悬挂白旗，始知光复了的城市都挂白旗，光复军上衣左袖都套一块白布。”[116]

李良庚记得，11 月 6 日镇江独立前夕，他们忙着做两件事，一是买白布做旗子，一是写布告。[117]高骞回忆，11 月 7 日上午，他除了带手枪、大洋五百元、军政府委任状之外，就是一匹白竹布、四面白旗，一顶小轿直入镇江要塞象山炮台，白旗四面撑起，白布一匹扯成五寸直条，分给炮兵。要塞就宣告起义了。[118]

原为陆军警察分队队长、光复后任镇江宪兵司令的张立瀛回忆，11 月 7 日，“旗兵缴械，全城高悬白旗，而镇江光复之讯遂喧腾于各报纸矣。”当策划镇江独立的林述庆与李竟成率兵入城，人心大安，喜见颜色，一律悬挂白旗欢迎，高呼光复万岁。[119]

11 月 6 日，日本驻南京领事铃木给内田电：

> 刚才镇江来电称自今晨起，当地革命党即与道台及八旗都统进行交涉，终于决定无抵抗交出镇江城，并立即宣布独立，城内悬起白旗。今明两日中虽难免有小冲突发生，但不久即可平安归于革命军之手。[120]

11 月 16 日，朱尔典给格雷的信也说：

> 在镇江，各炮台于 11 月 6 日悬挂起义军的白旗；……虽然发生了短暂的惊慌，但形势绝不是很危急的，因为满族人未经斗争便交出了他们的枪械。[121]

许多人的回忆都说白旗是临时用白布被单做的，布料不一样，大小尺寸更是五花八门。11 月 7 日，自称扬州都督的孙天生骑马进城，身缠白绸，前导士兵手执“还我河山”、“光复大汉”旗帜各一面，到处腾起春雷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插上象征“光复”的白旗。[122] 在扬州巨绅方尔咸家任教的张羽屏晚间出门一看，“看见大家小户都已悬挂白旗。第二天早上，看到辕门桥一带大街上的商店都在白旗上书写着‘大汉黄帝纪元元年’字样，说是奉了孙天生之命写的。至于小街小巷所悬的白旗，是不整齐的，有用毛巾代替，有用白纸糊成，大大小小，形形色色。”[123]

四川东乡（今宣汉县）确定起义日期后，“在客堂，即见廊边几个缝工在裁制白市布旗帜和标记等物”，11 月 30 日通知全城居民悬挂白旗。[124]

11 月 30 日，襄阳张玉衡日记说，入城的军队，“有以白布缠袖者，有以白布裹头者，有以白绫束腰者，……有拥至各布店索白竹布者，争以力裂为条，分散之，倏时一匹尽，而人散。”亲历那个时代的李劼人在小说《大波》中讲到成都光复前夜，民众赶紧准备白布做旗，有人犯难，有人回答：“啥子白布都行。军政府说过，土布也使得，洋布也使得，竹布也使得，只要是白的。”[125]

朱文炳的《海上光复竹枝词》说：

> 飘扬一色汉旌旗，大小参差任所为。匆促未遑先预备，手巾脚布暂权宜。[126]

张勋在南京戒严，因为当时谣传民军以白布缠左臂为识别，“丧服系素绞者多被逮锢。”[127]

许多地方白布因此突然走俏。沈亦云回忆：“武昌起义系每人用白布缠臂为号，凡准备响应者均预购白布，商店白布利市数倍。杭州光复之前，布店白布一夕而空。”[128]

张奚若回故乡陕西策动起义，路经蒲州城东南的韩阳镇，听见一批人敲一个染坊的门要白布，当时革命军以白色为标志，打的是白旗，兵士臂上也围白布条，才知道他们是去革命的。[129]

10月11日，武昌学生朱峙三知"起义军队左臂缠白布为记号"。[130]

为什么会选择白色？搭乘日本大元轮赶到武汉参加革命的万耀煌认为，因为武昌首义的晚上，"革命军都是臂缠白布为记号，所以二十日起全城都是悬白旗，汉口、汉阳光复也都如此。各省举义也一律是白旗，白旗简单纯洁，容易购制，可能是当时采用的原因之一。"[131]

孙天生宣布扬州独立，当晚把盐运使署的库银分给军队和贫民，大清银行也被打开，散银满地，招呼贫民随意取。全城白旗飘扬，街上到处是武装士兵，两人合乘一辆独轮小车，满载银两。扬州小调这样唱：

> 扬州城，新旧十二门。九月十七日，来了一个冒充孙天生。鼓三更，进衙门，库银元宝四下分，放走监牢众犯人，宣统江山坐不成。[132]

随即孙被徐宝山所杀，取而代之。

清江浦（也就是淮阴），11月6日城外部分新军发动兵变，用大炮轰城，暂护提督印的淮扬道奭良弃城逃跑。清河令邵承灏、商董刘寿祺、举人闻溥、唐治元等宣布街市居民悬白旗以迎，公推举人闻溥打着白旗开城迎接，派代表18人到东北城角悬挂白旗。不料士兵进城后大肆抢掠，街市为之一空，被抢的有裕宁、裕苏两官钱局还有多家典当行。[133]

不过像淮阴、扬州这样光复时出现混乱的地方很少。多数地方都是白旗一悬，鸡犬不惊。尤其在新军主动的城市，光复之际几乎兵不血刃，没有任何悬念。林述庆《江左用兵记》说，他为镇江独立奔走多日，一直担心满人抵抗，会有伤亡，最终也是有惊无险。许多地方挂出白旗，商店照常开门，生活一仍其旧。11月4日叶圣陶日记说："午后闻上海亦已于昨夜起事，今日安静如常，遍挂自由旗矣。"[134]

目睹上海光复全过程的中学生陆澹安日记说，除了江南制造局有战事，安静如常。那天"在南市新舞台观剧者甚多，似不知本城有变者"。11月3日起事前，上海道台逃入租界，城内各官都逃得无影无踪，城墙各处高悬白旗，商团巡警左手都缠白布。铁路车站及租界的华商，都有白旗飘扬。光复会领

袖李燮和已乘夜将白旗事先散发到各军营，还派敢死队兵士周德厚将白旗送到吴淞。[135]

当天，黄炎培日记十分简略：11月3日午后，“闸北起事。晚，沪城尽白旗。”[136]

攻下制造局时，“仅毁去厂屋数椽。传令升悬白旗，大书‘光复’，……至炮队营立即升悬白旗，以作军士造饭所。消息传开，满城白旗招飐，居民莫不额手称庆。”[137]

这天下午一时，“各城门上先后树白旗与革命军旗，树旗之时，群众鼓掌欢呼，声降如雷，维时商店照常开市，人们熙来攘往。”[138]

下午四时后，有人到闸北探视，见巡警总局已挂起白旗，上有“光复”二字。[八时后]“各城门仍大开，各店亦如常开市，并不闭门，店伙相顾而嘻，似甚乐者。各城上均高悬白旗，城中遍贴中华民国军政府告示。万人攒首，相聚而观，每阅至痛快处，鼓掌声大作。”[139]

吴淞口炮台及防营水师、盐捕营、警察局、商会各绅董议定吴淞为共和独立地，当夜扯起白旗，警兵弁勇左臂都缠上白布。吴淞口的策电兵轮，只扯白旗，臂上未缠白布。[140]

沪军营及沪杭车站，都已悬挂白旗。11月6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注意到，江南制造局附近的三艘鱼雷艇也挂起了白旗。[141]

11月5日，《民立报》刊登军政府通令商界悬旗欢迎光复：“三日以内，凡商家铺户上悬白旗者，即为吾民欢迎光复之证据。所有该店生命财产，本军政府历任保护，不使扰及分毫。”传单也贴到了租界：“上海城厢内外，俱已归顺民国，租界内吾族各铺户速挂白旗，以表同情，是为至要。大汉民国启。”[142]

此时，通令、传单也许都有点多余，11月4日，上海海关税务司墨贤理给安格联写信：“今天所有中国商店都悬挂了白旗，租界内像放假的样子。”[143]

上海街头各商号、银行、招商局到处悬挂白旗，迎风挥舞招展，居民扶老携幼前来瞻仰。[144]

举目盈街白似霜，几款世界大开丧。……两宫晏驾忆当时，店

铺家家挂白旗。今日沪城同一色，敢云庆吊两相宜。白帜聊当汉帜张，大书光复亦何妨。[145]

凡是银楼、酒馆、茶食的招牌有“满”、“汉”字样者，则将“满”字一律改为“新”字，谓之“新汉”，气象为之一新。[146]吴淞口的大清邮政分局，马上涂去了“大清”二字。炮台蕴藻浜车站也都挂出了白旗。只有吴淞常关及捐局还在听候上海新关税司的指示。[147]

邮政招牌号大清，改名上海亦聪明。……各项招牌满汉称，一闻光复怕生憎。忙将满字糊黄纸，汉上齐更大与兴。[148]

《海上光复竹枝词》一点没有夸张。

11月9日中午十二时，翰林徐兆玮从北京返回故乡常熟经过这里，只见吴淞营白旗招展，车站也是。[149]

最激动的要数万耀煌，他南下参加革命，“船抵黄浦江，满江白旗飘扬，这是当时各地起义的旗号，我一时高兴得竟要流出泪来。抵岸，驱车往望平街找民立报馆，车行在满街白旗间，我几乎要叫出来：革命终于实现了！”[150]

11月22日，盛宣怀后妻庄畹玉在上海给盛宣怀写信，有点凄凉而无奈：

沪城已为革党占据，租界各店一律全换白旗。[151]

上海、吴淞附近的青浦、松江、嘉定、川沙、奉贤、南汇等地相继成为白旗的世界。11月6日下午崇明光复，城内外暨水陆各营都高悬白旗，“阖邑安静”，市面照常交易。[152]

因为上海光复是白旗，所以11月10日胡恒望、胡祖烈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今议和之说已破，我军当指日陈师北讨满廷，以图根本改革之计，会见燕京高悬白旗之日不远矣！……”[153]

苏州中学生顾颉刚记得，11月5日早晨，“纷纷传说昨天晚上革命党已经派人前来，先到枫桥新军营房接洽好了，再见巡抚；请他做江苏都督，奉

上新印，他已接受了。到正午十二时，我的叔叔急忙跑回家来报告：'苏州城失掉了！'我的祖母，因为我天天读报给她听，她也早料到有这一着，就命我在门口挂起白旗，表示拥护。我把旗挂起后，兴匆匆地跑到抚台衙门，一眼瞧去，只见大门前吹鼓楼上挂起了一面长方形的大旗，上写着'兴汉安民'四尺见方的四个墨渍的大字，正在临风飞舞。"[154]

他的同班同学叶圣陶当天日记写得很细致：

> 叔父适自街头归，谓吾苏已于昨夜起事，今则中华民国军政府之示遍贴路侧矣。闻之喜极，即驰至校中，则校门上高悬白旗，诸同学方在门首欣跃也。相见后各致慰贺。
>
> ……巡防营中亦已高悬白旗。
>
> 饭后与顾颉刚等到都督府，至则兵士束装整列，殊异平日；竿上悬"兴汉安民"四字白旗，随风荡扬。路上遇到袁先生、胡先生，同行，从三元坊到沧浪亭。各学堂皆不悬白旗，袁先生一一令之悬挂，而道旁居民亦多悬之矣。归校坐少时，与顾颉刚到观前，则各商店无一不挂悬。一白如练，气象顿新，盛矣。[155]

抚署大门前，"悬红字白旗一面，上书中华民国军、江苏都督府，旁有'兴汉安民'四字。"[156]江苏巡抚文案夏敬观的记录有点简单。"一面旗杆上即将新旗高悬，文曰'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兴汉安民'。至是时，则各门城墙，均已高悬白旗。……如观前街阊门街以及道前街一带商店，类皆白旗招展，有书'新汉'、'大汉'字样，或书'光复'。至午后则住户人家，比比皆是矣。"[157]

当日，苏州海关税务司师范西即给安格联写信汇报：

"军队今天天亮时进城，没有遇到抵抗，抚台衙门以及住宅商店都挂了白旗。一切都是悄然进行，没有发生乱子，我们在这里简直不知道。……这里的首长还是原来的抚台。在他的辕门上，官衔已经改为：'中华民国江苏都督府兴汉安民'。"[158]

吴江县议会议长费璞安 11 月 5 日黎明到苏州，"斯时城垣上白旗招展，

旭日照耀。”[159]

黄炎培本来受命到苏州策动起义，等他到达已是满街白旗。11月6日午前，他见到程都督，确知已宣布独立，嘱他留在民政司办事。[160]

顾颉刚感叹：“呵，这个新境界的到来，自从戊戌变失败后，人民足足盼望了十三年了。”

当然也有人对此痛苦，饱读诗书的藏书家叶昌炽将他的心理写在了日记中，11月4日，他先是听说程德全要宣布独立，又听说当晚6点，“枫桥新军营有马队入城，宜家制白旗以待，严扃门户，毋早睡。益疑骇”，他感叹：“呜呼！人纪绝，天理灭矣！我生不辰，逢天惮怒，室人先我而去，何幸如之！”

11月5日，他看到“大街小巷，遍插白旗，密如栉比……今日抚辕接新印，大旗高挂，一曰‘中华民国’，一曰‘都督帅府’。”他称之为“重云黯黮，气象愁惨”。[161]

其实，苏州易帜的完成十分平静。苏州商务总会档案的公函簿中保存着11月9日复王赓伯、顾颂平、王兰芳的信：

> 苏城已于本月十五日午刻城内外一律悬挂白旗，市面照常贸易，安静如常。贵乡亦应悬挂白旗，照常开市，切勿惊惶。[162]

贡生出身的苏州工业专门学校教师卢彬士也说：

> 是日，高悬白旗，督辕有人出巡，余与相遇于饮马桥南，有妇人哭于家，即入询问，盖以示关心民瘼焉。敢死队亦整齐过市，苏城安堵如故。我家有一佣妇回乡，是日来城，通行无阻，而不知已拔帜易旗矣。[163]

苏州各县都是传檄而定。11月6日，常州由市公所传知各户门口一律悬挂白旗，响应光复。[164]

11月12日，担心故乡常州动乱的恽毓鼎在北京连接两信一电，“常郡于

十六日［11月6日］宣告独立（独立即自保，所以杜党侵犯，镇压土匪也），闾阎安谧，鸡犬不惊，闻之大慰。”[165]

同一天，程德全致电无锡独立，孙友萼不听，人民互相观望，虽制白旗，未敢悬挂。无锡钱业商团的蔡容等首先挂出白旗，不多时全市都是白旗招展。他们带了44人，挥舞白旗，首先冲入衙署。[166]

沪宁铁路的管事人说：11月7日下午五时三十分抵沪之火车，一路平安，沿途自镇江以下，都已白旗飘扬。[167]

11月8日，江阴天气多云无雨，“自街市以至僻巷，到处一片白旗，迎风招展，大小不等，小者仅尺，大者盈丈。”路上行人稀少，同盟会人、曾秘密发行过《江阴杂志》的江阴小学教师章砚春回想明末清初屠城之事，“转觉悲痛凄凉”。[168]

也是这天一早，常熟独立，“县署各局所，各城门，各店铺，大街小巷，白旗招飐，兴高采烈。”县长挨家逐户劝挂白旗，人们“欣欣然有喜色，以为此后岁月均得长享平等自由之幸福矣”。[169]

徐翰青见证了常熟和平易帜的一幕：“昨晚士绅议决，以翁令为县长，……今日各商家高揭白旗，有书‘光复’，有书‘兴汉’，有书‘民国万岁’，惟无‘灭满’字样，可以见邑人之心理矣。”[170]

11月11日回到家乡常熟的翰林徐兆玮十几日后写信给朋友，“知城中已树白帜，巨室迁徙一空……”[171]

11月8日，与常熟隔江相望的南通宣告光复，只有五个革命军由西门进城，沿途商店居户纷纷在门口悬挂白旗，“光复大汉”、“还我河山”等标语张贴通衢，地方秩序如常，毫无惊扰。

家家列炬明，户户悬旗庆，如霆如雷如日星。
愿我新国民，祝我新学生，亿万万年流芳馨。

这是南通学生传唱的歌谣。[172]

“吴江光复时没有什么变动，只劈去了清朝知县的一颗印信，算是革命。”[173]

11月15日，在城隍庙开大会，号鼓齐鸣，排枪并发，高升白旗，民众

欢呼。[174]

华彦云奉命自南京带150人到上海取子弹，火车路经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昆山各站，见到站上、月台上都挂着白旗，沪宁沿线各城都已光复，只剩下南京，他的心中是又喜又急。[175]

江阴军政府成立后，有一批人来到靖江，并无军队，市面商店照常开门，他们聚集城中文庙前广场演说一番，传令大小店户统挂白旗，靖江就这样光复了。[176]

11月18日晚，徐宝山率百余人，乘三板炮船数只抵达苏北兴化南门大码头。次日清晨，全城悬挂白旗，绅、农、商、学各界，城中各学堂堂长，亲至码头欢迎。[177]

此时，白旗仿佛具有摧枯拉朽的神奇魔力，许多地方光复并无革命党人，或有人冒充革命党人，也没什么军队，但白旗一打出，就有人起而呼应。

参与杭州光复的葛敬恩记得，11月4日，除了新军已经完成准备，上海赶来的敢死队也到达城站，其中有女队员尹氏姊妹。街上已多处飘扬白旗，许多人左臂上缠上了白布，这是事先所规定的。[178]

黄元秀回忆，11月5日拂晓，除旗营外，杭城内外，商店都挂白布为旗。[179]“杭州全城商店旧历十六日均议悬挂白旗，照常开市。”[180]“但见城内平静如常，家家户户，遍悬白旗，大街小巷，张贴浙江临时都督童保喧的安民告示。”[181]

马叙伦记得，被推举为浙江都督的汤寿潜从上海来的火车也是打着白旗进站的。[182]

蒋复璁认为，“白旗是形式，清朝到了末年，人心已去，大家都想革命了”。[183]

少年郁达夫目睹一个阴寒的下午，有几只张着白旗的船在富春江边靠岸，来了几十个穿灰色制服，荷枪带弹的兵士，商会、绅士、残留的官吏出告示欢迎，家家户户挂白旗，此前洋货铺里的白布无形中销出了大半，富阳小城也就光复了。[184]

宁波易帜差不多与杭州同步。11月5日早晨，西装革履的卢成章手持小白旗在宁波上岸，到民团总局对魏炯说：“我从上海来，上海已独立……宁波也赶快独立，速扯白旗。但商店误会，竟把店门关起来，请你出去劝告他

们开门营业，迟恐发生其它事情。”[185]

另有人回忆，卢成章领着多人骑白马、臂缠白布，手执“保商安民”旗子，一路高呼光复军到甬。于是东门街各店纷纷竖白旗欢迎（白旗系他预先做就，沿途发给）。旋至电报局伪造“杭州光复”来电一件。[186]

11月6日，目睹宁波独立的海关税务司柯必达向安格联汇报：

> ［昨天］发动政变的顶多只有六个革命党人，他们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地方秩序始终很好。我往城里走了一趟，看见所有的商店都开门营业，街上挂满了白旗。人们显然是同情和支持革命党的。我不认为那些革命党人对我们有什么危险。但是，钱倒很成问题，我不很相信革命党人不动用税款的诺言。[187]

亲历宁波光复的当地人有记事诗云：

> 九月望日好音传，街衢遍处白旗悬；鸡犬不惊大事定，人人始得高枕眠。[188]

鲁迅在《范爱农》文中说，绍兴光复次日，他们到街上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随即王金发带兵到了绍兴，[189]那一天［11月10日］，原绍兴知府程赞清也挤在人群中欢迎王金发。城内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门上插着白旗。[190]

温州接到省城光复通电之后，拥巡防营统领梅占魁挂白旗独立，所属各县跟着竖旗换印而已。从留日归来的平阳士绅黄光日记可见，光复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挂白旗，其他没有变动。11月9日晚餐后，他听说民军已到温州，只有数人，“郡中悬挂白旗欢迎，顷出发，过瑞安布置一切，明早当可来平。”次日，有人从温州回来，他问平阳如何布置？回答是：“已面奉梅谕，仿瑞安式，悬挂白旗，改换印信，分科办事而已，无甚烦难也。”他说：“旗印自制，其余一切须遵省电‘官吏照常办事’一句，不必骤行更张，致触乡愚乱机，破坏秩序。”他主张：“最好止挂一白旗。诸事皆仍旧做去，勿事铺

张，较为妥稳。”11月11日，他邀七乡绅士挂旗换印。[191]

11月12日，嘉兴光复，“军民镇定，一律悬挂白旗，照常开市，鸡犬无惊。”[192]

硖石商团赶到海宁准备参与光复时，“遥见城上已升白旗”。[193]

湖州光复，除了悬白旗、剪辫子，市面也无别的变化。[194]

11月10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濑川给内田汇报前一天广州独立情况：

> 市民对此非常欢迎，自当日正午起，市内到处悬起独立旗帜及各色彩旗，贴出标语，庆祝新政府之成立。民心欢悦，秩序井然，市面商贾如常。[195]

11月14日，寿县独立前夕，革命党人通知各商店照常营业，公买公卖，门前悬灯，百姓不要乱跑，城内一时混乱情况也就归于平息。第二天全城悬挂白旗，市民臂缠白布，寿县宣告光复。[196]

11月14日，在福建永定县，民军沿途经过的市集村镇的商店、学校、机关和大户人家的屋顶均已挂满白旗，悬好爆竹。[197]

11月19日晚上宣布独立的上杭，党人以剪辫、穿卫生衣为号，“县衙门首树白旗，上书‘恭祝中华民国独立’八个大字，各行店铺，亦树‘新汉万年’四字白旗，全城店铺住户燃放爆竹，以示庆祝。”[198]

11月6日，传来山东全省都飘着白旗的消息。[199]

11月14，英国驻威海卫专员骆任廷致信英国殖民部大臣哈考特：

> 今天，我收到威海卫城署理知县的一封来信，……根据烟台民国军政分府的电令，威海城已与革命党联合。现在，该城知县衙门外面悬挂着一面白旗，上面写着“烟台民国军政分府委任知县”等字样。

11月20日，骆任廷致哈考特的信说：

目前，此地及附近地区一切都很平静和安宁。威海卫城内大部分店铺前面都已悬挂白旗，这是已经与革命党联合的一个象征。[200]

12月1日，河南巡抚上奏清廷，王天纵在洛阳一带竖起白旗举事。[201]

12月2日，血战多日，民军终于击败张勋，拿下南京，上午林述庆率部由太平门入城，另一队由仪凤门入城，全城悬起白旗。此前，11月26日有人劝张勋投降时，张勋提出了4个条款，民军若能照行，他愿意息兵议和，其中第二条即“彼所治下各地之白旗一律收去”。[202]可见白旗已是一种象征。破城前夕，林述庆即令多作白旗备用。他的《江左用兵记》记录：

……派数兵携白旗上太平门张挂。时美领事、马林和西人数辈有摄影器具，请留影纪念毕。借西人望远镜。仰见天保城如在云际，山炮犹放列，各兵沿山站立，若画图。少数步队陆续向余处来，孝陵处步队整队鱼贯，高扬白旗徐徐至。太平门城上一片幽寂，城楼兀立，女墙错落，红日辉映，青草随风摇漾；城外长堤，排列枪架、弹盒，军服堆积满地。旋见王管带志刚兵由堤上架枪处整队快跑入太平门，未几，分登城上，遍树白旗，大呼，不辨何语。……

当天，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致信朱尔典：

“我立即从我乘坐的汽艇上登岸，穿过城门前往领事馆，城门虽有重兵防守，却是开放着的。到处是许多白旗，人们笑容满面，使人很明显地了解南京的陷落已经是既成事实。[203]

12月2日上午十点半钟光复南京全城，“城内各处皆悬白旗”，“狮子山及各险要炮台均竖白旗。……由镇江至南京，沿路均见白旗招飐空中。”[204]

12月2日、3日，远在汉口的英国传教士计约翰日记也说：

南京的失陷抵销了汉阳的陷落。双方的相对阵地与两周前差不多。

港内的英国和日本军舰收到革命军占领南京的无线电广播消息。南京陷落的标志是升起白旗。[205]

12月3日英国驻南京领事向上司汇报："市内一般平稳。"

《申报》报道："各国兵船，现均悬椗下关三英里之上。中国兵船则在三英里之下游弋，白旗飘扬，气象极佳。"[206]

12月7日，湖南凌盛仪日记："得确信：南京已于十二日〔12月2日〕悬挂白旗，一律效顺。"[207]

溯三峡而上、计划深入四川做调查的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学生今井美代吉、小岛利一郎一行，1911年11月13日经过长江三峡时发现，"滟滪堆上有官兵据守炮台，以防止革命军上航。"15日，"到达背石的时候，在满山参差的青叶和红叶中，看到白旗翻飞，便知革命军的势力已扩及此地。……"[208]此时重庆尚未独立，白旗树满全川则要更晚。[209]

11月22日，重庆率先反正，街上的白旗都插出来了，饭馆也把白旗插到栏杆上。[210]

这天一早，满街插了白旗，朝天观大会盛况空前。[211]居民门前都悬挂一白布小旗，上书"汉"字，游行队伍一到，群众夹道欢呼，人人兴奋万分，个个眉飞色舞，热烈地庆祝重庆光复。[212]

次日军政府成立，各商店都把铺门打开，并在门前插一"汉"字小白旗。[213]

重庆关税务司斯泰老致信安格联汇报：

11月22日　重庆正准备悬挂革命党的旗帜。道台今天上午十一点来看我，告诉我说十二点以后他即将印信移交给当地绅士而不再负责了。他很匆忙，要我代为往访各领事并通知他们。我已经照办了。城门均已关闭，街上充塞着兴奋的人群，但是我预料不会有什么暴动。

下午两点二十分，街上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骚动，我看见远处走过一队武装人员，持有两面白旗。立刻许多房屋上都挂了白旗，中间写一"汉"字。人们跑来告诉我说，官员已向革命党投诚了。这样重庆就不经战争而反正了。

本月20日，有一队伍约150人来到重庆，这批士兵携有两面旗，分别写着"中华民国"及"复汉灭满保教安民"字样。

现在全城的绅士，特别是学生，都欢天喜地，每一所房屋都挂了白旗。只有商人还处于慌张不安的状态中。[214]

此前，11月24日，四川自井的巡防军牛统领见大势已去，扯起“汉”字旗，声称“都是自己人，不打了，推翻满清，不打汉人。”[215]

1907年，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就为光复军设计了“汉”字白旗，旗用白色，中大书黑色“汉”字，可惜未及举旗，即遭杀戮，没有亲眼看到汉字白旗飘扬的这一天。

11月26日，在吴玉章主持下，内江的会场上升起了一面早就准备好的旗子，这面旗子是用白色被盖包单做成的，上面写了一个大的“汉”字。[216]

11月27日，成都民众皆树白旗，中署“汉”字，围以圆规十八，盖起义十八行省也。[217]李劼人的小说《大波》对十八个圆圈有细致的描述：

一幅白布当中，用墨画个大圆圈，圈内用红写一个汉字，大圈周围，又用墨画十八个圆圈。

当时所拍的照片更可以清晰地看到。

只有十来岁的少女胡兰畦记住了旗的图案，却记错了颜色：

代表大汉民族的红旗中间写着一个大汉字，周围围着十八个圆圈，表示全中国的十八个省份，这杆鲜红的大旗在都督府的旗杆上迎风飘扬。[218]

川西大县彭县一个学生目睹“四川军政府”成立时，打出的旗帜是白底十八个圆圈，围着一个“汉”字。[219]

11月29日，英国驻成都总领事务谨顺写信给格雷：

宣布成立军政府之后，接着升起了新的旗帜。那面旗帜（我想目前中国其它地方也是如此）是白色的，上面有红字（汉），周围有

十八颗星绕成的一个黑圈，形状象是太阳，但颜色是黑的。

……旗帜上星的数目是十八颗，而不是二十一颗或二十三颗，这个情况表明把东三省、蒙古和新疆（喀什噶尔）排斥在联邦之外。[220]

在成都之外，几乎都和重庆那一样，白旗上写一“汉”或“大汉”字样，没有十八个圆圈。忠县革命党人吴恩洪登台后，即通令全州，“凡军政人员，每人必须以白巾缠头或缠左臂，旗帜亦仍用白色，上书一个很大的‘汉’字。”[221]

11月29日深夜，奉节反正时的口令为“人和”，反正人员都在左臂上佩戴一条白布带子以为标志。次日早晨，全城各户遍插白旗，旗上写着“大汉”二字。[222]

綦江县光复时，哥老会首领决议，当即传锣通知各家铺户，打开铺门照常营业，各家各户已自动用白布写着“汉”字旗插在门上。[223]

比四川更早独立的贵州，打出的也是“汉”字白旗。

11月3日晚贵阳革命突然爆发，等到天明，“汉”字大白旗飘扬于民军临时司令部咨议局上空。民军人员，臂系白条，笑逐颜开，各奔自己预定的工作岗位。[224]

冯程南记得，那天晚间，留日出身的蔡恒泰绸布庄经理蔡岳来他家对他伯父（后来做过总商会会长）和父亲说：“贵州决定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你们明晨可用白布或纸写‘汉’字，做成旗帜插在商店门首，以表示拥护。”他家及时准备了旗帜，次日一早就悬挂门前。[225]

还有人回忆11月4日那天，天方破晓，没有听见炮声，只听见街上的人声。他当时只敢从门缝儿张了一下，看见许多兵士持枪在巡逻。“又见许多手持白旗，臂缠白布的学生，在喊口号，大胆开门一看，看见白旗上写着军政府令四个大字。……龙旗换了一面白旗，当中写了一个汉字，表示是汉人的胜利。”[226]

等到天大亮，年轻的阮俊斋到街市上看看情况，满街许多来往的人，手执上面写了个“汉”字的白色旗子，身上挂着白布条的标志，高声大呼“贵州反正了”、“贵州独立了”等口号。[227]

姚崧龄走到咨议局大门口发现，“咨议局”三个大字的木匾，已临时用白纸糊上，写了“军政府”三个字。再向会议厅屋脊上一瞧，原来悬挂在左右旗杆上的龙旗，已换成两幅白布，中间写着一个斗大的“汉”字。[228]

11月中旬，宁夏府城光复后，刘华堂等首先于四鼓楼最高处竖立大白旗一面，上书“支那革命大元帅孙”，同时令城乡各户大门悬挂红色三角旗一面，上写“顺南”二字，表示响应武昌起义。[229]

11月23日，在“人多菜色，地尽不毛，一片荒寒，万家困苦”的陕北榆林，巡防队举旗反正，除了一死一伤外，可以说，鸡犬不惊。次日早晨，他们派人“传谕每户门前插杆白旗，上书秦陇复汉军洪汉军，中间写一大西字，并传唤各铺开门，不得高抬货价。市面安堵如常……”所属神木、府谷、米脂等大部分县也都传檄而定。[230]

各地独立的时间有早晚，旗帜各不相同，10月30日午后，苏州尚未光复，佚名留下的常熟光复日记称：“有自南京挈眷归者，云各学校全体解散……火车过镇江换白旗，近苏州仍用龙旗。”[231]

青天白日旗、十八星旗是革命先驱或组织事先设计的，没有被广泛接受，从一个侧面证明这场革命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各方合力造成的。许多地方白旗一挂便宣布光复，未经流血，就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交接。从一方面说，这样的胜利得来太易，未免脆弱。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反复。

商务印书馆编辑蒋维乔的住处离闸北很近，去看动静时，“突见警察局屋顶，举起白旗。而报章乃用大号字，特载闸北光复消息。……晚间，谣传清兵东下，则即去其白旗；及数日，清兵不来，则又举起白旗。”[232]

上海光复策划者李燮和也说，光复当夜，“讹传苏州兵大至，居民恐慌甚于日间，城内外白旗半皆偃息。”[233]

在浙江嘉兴，11月7日上午成立军政分府，下午二点许南门外丝行街一带，商店纷纷将白旗收起来，原来有个地主夏老四在丝行街上大放谣言，说清廷派大将张勋率三路兵马来攻嘉兴，挂白旗的人家都要杀头。人心惶惶，白旗顿时收尽。军政分府一经查实，就将夏老四押到角里街枪决。[234]

翰林徐兆玮11月11日回到故乡常熟，“忽传言清军已至城外，寺前白旗均收尽矣，众惶惧。少顷，由钱老三等鸣锣令铺户复挂。……见白旗又临

风招展矣。”[25]

在安徽宿州，11月2日，撤职还乡的原江北提督雷震春宣布独立，组织保安军，自任总司令。一个多月后，张勋北逃路过，雷到车上相见，两人相抱大哭。12月14日晚，他悄然北行。不久，山东陆军方营和泰安巡防营李统领所部，开到宿城，声称要堵御南军，独立时悬挂四门的白旗悄悄收起，独立也就无形中取消。[26]

法国驻成都领事馆的年轻外交官儒勒·乐和甘目睹12月8日成都兵变，许多人逃进法国领事馆，有平民，有军人，他在写给父母的家书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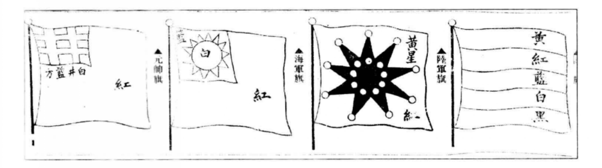
> 他们［哗变的士兵］一边跑，一边要沿途的人拔掉“汉”旗，那些旗子迅速魔法般地消失了。[27]

五、五色旗

11月7日清早，桂林的广东旅桂学堂教员李任仁走到街上，只见满街都是“广西独立万岁”、“民国万岁”、“同盟会万岁”、“欢迎沈都督王陆副都督”的旗子。他走到优级师范，才知这些旗子是在王芝祥的藩台衙门里写的。第二班同学，刘人熙的儿子，王的外甥刘瑞融、刘瑞潞昨晚在藩台衙门连夜动员多人赶写的，“今早跑到学堂倒在同学床上就睡，问他怎的，他说昨晚写独立旗子，一夜没睡。”[28]

太原法政专门学校肄业的薛笃弼回忆，太原民军举义之初，“纪律很好，市面未受惊扰。我们同学清晨即于学堂外高悬白旗，对民军表示欢迎。”[29]张国淦的《辛亥革命史料》记录，山西军政府门前悬挂的是八卦太极图国旗。[30]

云南的旗帜是红旗，中间是一个白色的“中”字。蔡锷11月发出的《布告全省同胞文》：“定国旗为赤帜，心用白色中字。”[31]11月28日，云南思茅海关的罗范西给安格联信里说：



1911 年 12 月 9 日《民立报》公布的旗帜

1912 年元旦，上海火车站士兵枪上都是五色旗

本月22日，思茅投向革命党一边，情况很安静。同一天，南门和商务局悬挂了新的共和国旗，旗是红色的，中间有一个白色大“中”字。挂旗时也很安静，没有照例吹号放鞭炮，只看见人们欢乐地跑来跑去。[242]

当时，北京《浅说画报》上的图画涉及南方的革命、民军时，所画旗帜基本上都是“井”字旗，有人称这是北方人士对革命旗帜的一种惯常想象。[243]

实际上，真正打出“井”字旗的只有广东惠州。陈炯明的老友莫纪彭回忆，惠州古称循州，所以他的所部叫循军，他用“井”字旗号，取古代井田之意，“于此可见其酸秀才性格与社会主义思想之一斑。”[244]“井”字旗与黄兴当年的主张一致，也与北方人对革命旗帜的想象吻合。

1912年3月被刺死的韩衍在安徽组织青年军，设计了“人”字形的军旗，表示奉行人道主义。[245]

11月4日，上海《申报》刊登军政府安民告示前有一番话，前一天晚八点钟，“又有民国军一队，约十余人，荷枪列队入城，持红色、白色民国军旗各一面，纷向四处要道粘贴安民示文。”[246]

没有独立的省份，黄龙旗之外也打出了不无暧昧的旗帜，比如奉天保安会的黄色旗。自11月8晚接到京师警电，奉天人心惶惧异常，市面震动，忽有4个剪发的人来咨议局，要求议长吴景濂竖立白旗，吴以事关重大，婉言拒绝。[247]

11月10日，奉天海关税务司穆厚敦给安格联写信：

[约有三十多人来到奉天]……他们同省咨议局和某些大商人开过秘密会议商谈宣布共和政体。他们昨天又离开奉天了。咨议局不赞成挂白旗，但提议建立和平会。

11月12日，会场门前悬挂黄色的旗子，旗上写着“国民保安公会”六字。[248]

各般旗帜不同形，八卦旁边绕列星。究竟临时无定制，商人描绘费调停。[249]



1912 年元旦上海南京路上的五色旗

在白旗、十八星旗、青天白日旗之外，还包括八卦太极图旗等旗帜，五花八门，确实令人眼花缭乱。《申报》连续刊载多篇表示批评的议论。11月11日，《申报》在头版发表评论《敬告民军政府》：

"……盖旗式划一，则心志有所附丽，而无益之分歧自少。若今日旗式未定之时，甲用甲式，乙用乙式，或且用亡国朝鲜之八卦旗等五花八门，各式其式。是不但对内无以一心志，亦对外使人启不统一之心也。此军政府所急宜注意者也。"

11月14日，《海上闲谈》栏目有评论："……最多者为白旗，其次为星旗，又次为书颂词如民国军万岁、大汉光复、还我河山等旗，其次为太极图旗，飞扬招展，触目皆是。而巧思牟利之徒又从而仿造小纸旗，以为娱悦儿童之品。于是，黄浦江滨旗帜更多，不但屋顶有旗，小儿手中亦有旗，车中妇女亦有旗，西人手中亦有旗。而南洋大学堂学生别出心裁，且使李鸿章铜像为之敬谨执旗。"

11月15日，《清谈》栏目发表东吴的《敬告各省军政府（五）》：

旗帜所以表示一国之光荣，故必有一定之式样，而白旗者不过显其降顺而已，只宜于初收复时暂一用之，非可炫耀耳目者也。

今民军光复之省渐多，记者早有颁示旗式之议，乃十余日来，光复各地依然白旗飞扬，参差不一，日日悬之，夜夜悬之，岂非无谓之事欤？

或兴汉、或光复、或九星、或太极，外人见之，几将疑我华人以悬旗为儿戏矣。是宜一律去之，由军政府颁一旗式，悬之国门，则庶几我东方民国之光荣也。[29]

五色旗的出现，与这些舆论也是不可分的。

11月27日从日本回到上海的留学生黄尊三日记称：

午前十时至上海。余与季六、北翔等下榻高升栈，……至栈后，知南京已为革命军占领，市上五色旗高悬，到处开会庆祝，景象焕

然一新。12月1日七时从沪起程，乘沪宁车，天微明至南京，下交通旅馆。12月2日，……访宋遁初，并云今晚拟回上海欢迎中山。余先辞出，至街上游行一周，见满街五色旗，飘荡空中，煞是好看。

所记时间明显有误，11月27日，南京还在苦战中，12月2日，离孙中山到上海还有二十多天，这本日记很可能是日后补记，并不可信。[251]

12月4日，黄炎培日记记着："各省代表在江苏教育总会举定黄兴为大元帅"。[252]多年后他回忆，正是这一天定国名为中华民国。"黄兴等建议，规定国旗式样。经过反复研讨，取五族共和的意义，决以五色为国旗。"[253]各省代表即驻沪各省都督府代表，浙江都督汤寿潜、江苏都督程德全、沪军都督陈英士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次日，《申报》、《时报》等大报都在要闻版报道了这次重要会议。

11月24日动身南下的奉天咨议局议长吴景濂，列席了12月4日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他自述选择五色旗的原因：

中华民国五色国旗红、黄、蓝、白、黑，系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发动在沪会议选举大元帅及副元帅之时，既由多数代表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蛰仙及黄克强先生等，商谈以用五色旗为相宜，且表明革命行为，系为政治改造而起，非专为种族革命，且可缓和满、蒙、回、藏心理，与汉人共同努力赞助共和。此意发出，群以为是，公决于组织临时政府后由政府提出此案，交临时参议院议决，定五色旗红、黄、蓝、白、黑，代表五族共和，为中华民国国旗，由政府公布之。[254]

曾任黄兴秘书的黄仲岂回忆，12月4日之前，大约12月2日在哈同花园的会议上，不仅讨论了以五色旗为国旗，还讨论了陆军旗、海军旗，12月4日的会上只是通过哈同花园的讨论方案。

黄仲岂与汤化龙等从武昌来到上海，知道黄兴已于前一天乘日本兵舰到达，住在公共租界百老汇路徐桂亭家中，他们即去拜访，黄兴邀他们同住。

没多久，陈其美来了，约他们一起到哈同花园会议国旗事。到会的人不多，他所识的有江苏庄蕴宽、赵竹君，其他都是上海商学界的人，不认识。“开会后，经提议民军起义，各国颇表示好感，惟以无政府组织、无旗帜标识，形式上未能成交战团体，故对外交涉殊感不便。今者南京指日可下，政府之组织已有人奔走各方，从事预备。惟国旗一物关系极大，应早为筹备。随即提出三种图案，一武昌现行之铁血军旗，为此次起义同人所主张；一青天白日式，为海外革命同志所主张；一五色式，为日本发起斯会者所提出，请众讨论公决。结果众意以为青天白日式明白简单，铁血旗虽亦灿烂美观，且可为革命永久纪念，然其命意缀十八星者所以表示十八行省，其范围似稍嫌狭隘。吾国版图包括西藏、青海、满洲、蒙古等地，范围本属博大，此次革命之目的在收回满洲之政权，于版图无丝毫之影响。今若以五色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共存共荣，则对内对外皆足以示吾国人宽厚博爱之怀，请以青天白日为海军旗，武昌铁血旗为陆军旗，如此则三者可以并行不悖。”大家同意，遂定议而散。[255]

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记录，12 月 5 日，有人在老闸地区向许多店铺散发传单，内容是关于建都南京的主张，确定这一天起连续三日为上海各商家悬旗的日子。悬白旗，在所附传单中说得很明白：

> 南京、浦口现已一律肃清。大都督已举定程德全，大元帅已举定黄兴。临时政府暂设南京。我沪上各商家应于十五日（即 12 月 5 日）起，一例悬白旗三天申贺。南北市众商公启[256]

冯自由说，五色旗是宋教仁、陈其美提出的，也有人说是江苏代表提出，胡宗铎则说，“使用五色旗则始于程德全”。刘成禺《洪宪纪事诗》记载，参加那次会议的包括汤寿潜、程德全、陈其美、赵竹君等人，确定国旗为五色旗，代表五族共和，得到各省赞同。赵竹君的外孙杨小佛记得，赵晚年五色旗已被青天白日满地红代替，但惜阴堂厅里，仍有五色旗插在花瓶里，可见老人对这面亲身参与制定的国旗的眷念。[257]

五色旗是海军一、二品大员的官旗，以此为民国国旗，并对它的含义进

行重新解释，程德全、赵竹君、汤寿潜、陈其美等都表示赞同。在选出黄兴为临时政府大元帅，定五色旗为国旗之后，程德全即动身去了南京。

居正的《梅川日记》说：

> 上海　各省临时代表，集议组织中央政府，在江苏省教育总会开会，选元帅后，续议各种旗帜，以五色旗为国旗［江苏代表提］……拟议后，由余交由新选大元帅黄兴核阅。黄慎重考虑到孙中山在同盟会时期曾想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迟疑不敢圈定。而上海各报，次日即全部揭载。黄先生召余，出示各报，愕然久之。说既经露布，用不着我核定。况国旗应由法律定之，只好待诸异日。[258]

五色旗图案在上海公开出现的时间在12月6日，这一天，《申报》在第四版显要位置刊登了《中华民国新旗式两种》：国旗图案，标明颜色自上而下为黄、红、蓝、黑、白；商旗图案则在五色旗的右上角加六星。[259]

次日，避居上海的郑孝胥日记："革党自定国旗为黄红蓝黑白五色，商旗则于右角加星六枚。……"[260]显然他看到了《申报》。

12月9日，《时报》不仅公布了国旗［五色旗］的图样，还有陆军旗［十八星旗］、海军旗［青天白日旗］，并附有颜色。同一天，《民立报》公布的旗帜图样共5种，除了五色旗为国旗，陆军、海军旗，还有元帅、副元帅旗。[261]

> 五族应符五色旗，共和名义恰相宜。似他海陆军中帜，铁血青天尚费思。[262]

曾为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的任鸿隽在《前尘琐记》中说："定五色旗为国旗，也是以为它大方美观的原故。"[263]

12月19日，北洋军代表廖少游秘密来上海寻求南北和平时，"见上海街市改悬五色国旗，红黄蓝白黑横道五，闻系由军政府制定颁发，以示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组织共和之意。"[264]

此前两天，12月17、18日，《民立报》接连刊登沪军都督划一国旗式样的通告《国旗命意》：

> 国旗者，为国家之标式、国民之目的，其关系至为重大，若稍有参差，何以光我民国……从前各地所制国旗，皆出自由，奢者用绸纱，俭者用布帛，或大或小，未能一致……本都督先行用五色布制就二万方，长英尺九尺，广英尺六尺，合价大洋一元。如有多给价目者，请即向原出售处找还可也。凡我同胞，皆可向下列各商家备价领取，或照式样自制亦可。[265]

18日，《民立报》还刊出一篇报道《五色旗下国殇》。

12月28日，上海《新闻报》消息："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业已发出通知。略谓：1911年12月29日上午九时将召开特别会议以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在此特别之日公众将悬挂半旗。"

此时要悬挂的已是五色旗。

12月29日，苏州中学生叶圣陶在日记中激动地写下：

> 晴光普照，气象宏崇。选举总统一事，为历史所未有，亦民国之光荣。街头巷角，高竖五色之国旗以庆盛典，而各学校亦停课一日焉。[266]

1912年1月1日，随孙中山专车到南京的任鸿隽记得，"那一天早晨大约八九点钟的时候，我到上海车站，看见车站中人行道两面排列了沪军士兵，军队的每一支枪上均插上一张五色小国旗（五色旗是当时江、浙一带所采用的旗帜），大有目迷五色之感。孙中山先生的青天白日旗，竟一面也没有看见，不免感觉意外。"[267]

第二天，《民立报》报道"欢送大总统志盛"：

> 于昨日上午离开上海，车马纷纭，道为之塞，脱帽拍掌，声震

耳鼓，五色旗飘扬飞舞，各茶肆莫不利市三倍云。[268]

陆澹安元旦的日记说校中停课一天，途中见商店都挂出了五色旗，游人往来，“欣欣然有喜色”。[269]

从上海到南京，一路都是五色旗。躬逢其盛的24岁参议会代表吴铁城回忆，孙中山一行下午4时到达无锡时，各女学生数百人，整列欢呼万岁。沿铁路遍悬五色旗，密布军队。[270]

原来使用十八星旗的武汉这一天也飘起了五色旗。日本三菱商事株式会社汉口支店职员内田顾一当天日记记道：

“我近日去一码头观游时，见中国商店都高悬五色旗帜。这是新政府的新国旗。”[271]

美国北方长老会传教团的查尔斯·里曼写信给孙中山说：“恭贺你们有了漂亮的新国旗。至于新国旗的五色条纹，我看它们比例似乎不当。我是说一条红色条纹并不能充分代表18个省份，将来省份数目增多，就更无法反映了。”[272]

任鸿隽为没有看到青天白日旗而意外，他还不知孙中山对五色旗定为国旗的不满，因为在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之前，参议会就已议决，无法更改。居正《梅川日记》说：临时政府成立，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孙中山不以为然，致函参议院，还附了青天白日旗样式。参议院最后议而不决。[273]

1月12日，孙中山《复参议会论国旗函》表达他的不满：

（一）清国旧例，海军以五色旗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

（二）用意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之类。

（三）既言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

他说，国旗的颁用所重有三，旗之历史，旗之取义，旗之美观。比较武汉的十八星旗、苏浙的五色旗，他列举十几年来志士为青天白日旗流血的历

史，南洋、美洲同情共和的华侨已升用多年，在外人眼里早已是民国之旗。"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国为远东大国，日出东方为恒星之最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着于赤帜，亦为三色，其主张之理由尚多。"信后还附粘了天日旗样式两纸。他知道，他的主张不会被接受，所以他只是说，等到民选国会成立后，再行议决，实际上暂时承认了五色旗。在新生的民国，无须遮掩总统与参议会之间的这一分歧，此信正式刊登在2月3日出版的《临时政府公报》上。[24]

一些外国人也给孙中山写信，建议国旗样式，还附有设计的图案、说明。1月6日，佛莱德自美国来信，讲述了自己1月3日晚上的梦，有个小女孩到他的办公室，要他画一张中国国旗的设计图，她接着说出样子，并告诉他太阳代表东方，火焰代表自由，太阳的光芒代表各省，红色代表中国人民为自由所抛洒的热血。1月10日，鲁道夫·都德从英国伦敦写信给孙中山，称几个星期前给孙中山上海的地址寄了挂号信，附有他设计的民国国旗图案，鲜红色的底，五星可按比例扩大，以便其中星点数与中国的省份相同。许多国家的国旗远看相似，多是相互抄袭的。[25]

五色旗已定，这些建议都只能成为建议，孙中山对青天白日旗的心不变："在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办公室里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新图。红色之上横添白线若干，每一线代表一行省，总统府职员和宾客多见之，不过始终没有正式提出这个新旗式。"[26]在南京传教38年的查尔斯·里曼3月20日给孙中山写信，"目前，阁下似乎采纳了两种旗帜，甚至在总统府和首都并行使用。"可见外界知道这面青天白日旗的存在。信中建议将五色旗与青天白日旗合二为一，并提出了具体的设计方案，天蓝为底色，缀22颗星，用星代表22个行政省份，将来可以随行政省增多而增多，以五色条纹［蓝色用浅蓝］代表五大自然区域和民族划分。[27]

无论孙中山有多不满，从1911年12月起，五色旗就已被商家作为生意。等到正式确立为国旗后更是铺天盖地，到处出现。不仅逢节庆街头遍插此旗，流行歌曲也以此旗入词；图书广告以此旗为背景；商家以此旗嵌字作为招徕。1912年1月15日，《民立报》发表更生的《中华民国新歌》："愿我中华国旗，遍树东亚大地，中华国旗，我今托赖上帝，共和建立万年，五色高出云

际，中华国旗。”[278]

沈恩孚作词的《国歌拟稿》：“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山河照嘿，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279]

当时传唱的歌曲或改旧词，或创新词，都把五色旗写进去了。《从军乐》第一句就是“汉旗五色飘飘扬”。《欢迎》歌中起首即是“国旗招展五色新，欢迎我嘉宾”。《祝我国》歌中最后一句歌词：“国旗荡漾五色光。祝民国万岁永无疆。”[280]

> 光复教成纪念牌，国旗描绘样诚佳。衣襟帽侧咸纫佩，付与孩童亦壮怀。……
>
> 倌人衣服太新奇，衫裤咸教绣国旗。五色商标须记取，正符民国卖淫时。[281]

不少自认为“新国民”者帽边用五色，连妓女［倌人］都以在衣领、衫裤、车垫上绣五色旗为时髦。[282]

1月26日，外国传教士丁义华在《民立报》发表《五彩旗》一文，为五色旗大声叫好，“其最触我眼帘，而动我幻想者即翻转天空霞彩之五色新国旗。……五彩旗飘扬天空，式如雨霁之虹，为万众所共仰……中华民国之五彩旗不独为亚东大陆永庆升平之佳兆，亦可为环球列邦登寿域之共识。……”[283]

孙中山就职后，通告1月15日补祝元旦，苏州叶圣陶日记说：

> 晨起已晚，即至校中，则诸同学方在预备灯彩。运动场之中高竖旗杆，悬五色国旗及校旗焉，更悬小灯十，其色一如国旗。校门以内则遍经五色灯及万国旗……[284]

上海陆澹安日记说，商店都是张灯悬旗，都督府前有电灯彩牌楼，中间扎了“总统万岁”四个字，光耀夺目。市政厅门前牌楼上以电灯扎成“民国万岁”四字，观者如堵。[285]

湖北黄陂少女陈碧兰回忆：

> 辛亥革命后，最使我感到兴趣和新鲜的，便是到了这年元旦(西历)，陈姓氏族好些维新人物的大地主家庭的门前，飘扬着大幅的五色国旗，用柏树和五彩缤纷的纸做成的花朵，沿着大门的边缘，扎着彩，表现一种新式的除旧更新。[286]

退位诏书下达之后，北京一时找不到五色旗来取代龙旗。[287]但袁世凯给各地、军队和驻外使馆下达了挂五色旗的命令。

2月13日，袁世凯幕僚许宝蘅日记："又令前敌各军队改用五色旗，以免与南军冲突。"[288]

这一天，中国驻日临时外交代表汪大燮致函日本外交大臣内田：

"国旗暂用红黄青白黑五色横道，横长方式。"[289]

三天后［2月16日］，袁世凯电告忠于皇室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一律改悬五色旗，以示划一。

当天，原驻东北的新军将领蓝天蔚电告分巡锦新营口兵备道袁祚廙，施加压力："共和民国现已统一，各处应属民国，改悬五色国旗，否则即认为土匪，日内派兵轮游弋，如仍未改悬国旗，当即炮击。"

赵尔巽给营口的袁道台回电："五色国旗，政府有电，自可制用，于蓝无关。可向宣告，共和已定，无革命可言，如再煽惑暴动者，即是扰害治安之匪徒。"[290]

两天后，英国传教士克里斯蒂目睹了五色旗在东北的升起，"赵尔巽在2月那个特定的日子，他忠于满洲的和平就像忠于从前的皇帝一样。民国的五色旗在政府大楼的上空高高飘扬。"[291]

2月17日，汪荣宝在天津，"早起到旭街，一路见五色旗飘扬空际，气象一新。"[292]

2月23日奉天海关税务司穆厚敦写信给安格联：

> 那时满洲的整个前途确实还没有定局，……事实上直到旧历元

旦［2月18日］那天挂新国旗以前，不安定的心情始终没有消除。

奉天每家商店都悬挂共和国旗。大概是民政司指示它们这样做的，有些人还想找机会进行挑拨离间，民政司这样做，正是为了团结人民，摧毁这些人的阴谋。[293]

那些日子，东北局势有点紧张，直到3月份，有关五色旗的波澜还未平息，3月9日袁世凯给赵尔巽一电：

“南人听信浮言，谓奉省并未承认共和，亦未换五色国旗，仍拿诛党人不已，由南方派人往奉调查。”

12日，赵尔巽复电：

“昨夜忽有蓝天蔚通电南省，言东省因京津兵变，又有宗社党运动，闻已撤共和国旗……东省何曾有此，阅其词直同梦呓，……东省全境遍换五色国旗，兵民相安，人所共知，岂蓝所能诬指。”[294]

是否挂五色旗已成为是否承认共和的标志。远在新疆伊犁，1912年1月8日，广福就职临时都督，改悬五色国旗。[295]

3月18日，甘肃全省悬挂五色旗，与陕西民军的战事终于平息。[296]

英国柏来乐少校自喀什噶尔旅行到兰州，2月9日他离开乌鲁木齐的时候，人们都以为甘肃即将陷入混乱状态，4月15日，等他抵达兰州，却发现十分平静。“关于政府改变所产生的仅有的明显迹象是：废除总督的职位；名义上采用公历，以及悬挂新的五色旗，上面的红色代表汉族，黄色代表满族；蓝色代表蒙族，白色代表回族，黑色代表藏族。”[297]

南京临时政府的迎袁专使到达北京，见到的是满街的五色旗。2月29日恽毓鼎在日记中对此深表不满，认为这是向南方谄媚：“一般浮动喜事之徒，思有以媚之，勒令商户遍悬五色旗，创提灯会，大书‘革命党之功’五字……”当夜，兵变发生，乱兵攻入时也是“先拔五色旗”。[298]

3月9日，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前夕：

五色旗又招飐于街衢，因项城明日受任也。……夫内外总厅欲媚其主，但于各厅区悬旗足矣。各店肆伤夷未复，创痛方深，怨咨

之不暇，庆贺云乎哉！[299]

"黄龙既折满清倒，五色旗飘民国兴"、"五色旗，没有边，袁世凯，坐几天？"这些民谣陆续传开。[300]

在海峡对岸，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岛上不能挂五色旗，一些中文私塾，小学生们很喜欢念上海新出版的《新三字经》，"我中华，民主国；黄龙旗，变五色。"却不知道五色旗到底是什么样子？人们悄悄地口耳相传这样一个游戏——"中国的新国旗已经上天啦！……"有许多儿童包括9岁的王文德在内——

就依照他们指点的方法去观看上了天的祖国的新国旗。其方法是在中午的时候，把一盆清水放在露天地上，盆里放一块玻璃，让阳光照射而形成虹采，孩子们都相信："这就是祖国的新国旗，祖国的新国旗确实升上了天。"孩子们成群地站在盆的周围，拍手欢呼。[301]

【注释】

① 转引自李贤哲：《清政府国旗黄龙旗诞生的曲折与血泪》，2010年12月11日《联谊报》。

② 陈一萍编：《先行者之歌——辛亥革命时期歌曲200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54、41、96、109页。

③ 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界参加革命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306、307页。

④《辛壬日记·1912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第38页。

⑤［日］内田顾一，周树嘉译：《湖北革命战见闻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三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2页。

⑥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216页。

⑦《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105页。

⑧ 苏古敦给安格联函，《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1页。

⑨ 张怿伯：《海军辛亥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115页

⑩《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358页。

⑪《辛亥上海光复前后——座谈会记录一鳞半爪》，《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551、541页。

⑫《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07页。

⑬《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65页。

⑭ 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一辑，第467、469页。

⑮《广东独立记》，《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441、442页。

⑯《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75页。

⑰ 胡绍之等致胡适信，《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216页。

⑱ 徐森、谌秉直：《第九镇秣陵起义和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239页。

⑲《锡金军政分府总理处日记》，《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第20页。

⑳ 万小南译，张富强校：《革命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九辑，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4页。

㉑ 转引自邓丽兰著：《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

㉒《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第169页。

㉓ 唐在礼：《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340页。

㉔《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第221页。

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576、577页。

㉖《我所参加的辛亥革命工作》，《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7页。

㉗《口述历史》第七期，第57页。

㉘ 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502、521页。

㉙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8页。杨玉如：《辛亥革命先着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70页。

㉚《回忆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23页。

㉛《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632页。

㉜《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第95页。

㉝《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50页。

㉞《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91页。

㉟［日］内田顾一，周树嘉译：《湖北革命战见闻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三辑，第164页。

㊱《辛壬日记·1912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第31页。

㊲［英］计约翰：《辛亥武昌战守闻见录》，《近代史资料》总72号，第134页。

㊳《记鄂军政府的初期外交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44—45页。

㊴《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554页。

㊵《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556—557页。

㊶《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第65页。

㊷《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97页。

㊸《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119页。

㊹《湖南反正追记》，第243页。

㊺《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120页。

㊻《湖南反正追记》，第255页。

㊼龚师曾：《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331页。

㊽徐继潮：《辛亥福州起事闻见拾零》，《福建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第88页。

㊾《福州于山战役》，《福建文史资料》第六辑［辛亥革命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

㊿《蜀北军政府成立始末调查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291页。《周作人年谱》，第91页。

51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368—369页。

52《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143页。

53《叶圣陶集》第十九卷，第74页。

54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着记》，第98页。

55 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第193、197页。

56 宁武：《东北辛亥革命简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553页。

57 张乐民：《参加辛亥革命的片断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279页。

58［英］计约翰：《辛亥武昌战守闻见录》，《近代史资料》总72号，第115、122、134页。

59《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92页。

60《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第200页。

61 宋子然、宋子哲、吴宝秋：《巫山县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198页。

62《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83页。

63 李长庚：《黄州光复》，《辛亥首义回忆录》第3辑，第176页。转引刘望龄《湖北的舆论导向与武昌起义的成败》，《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

学术讨论会文集》下册，第1000页。

64《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2辑，第254页。

65《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105页。

66《吴稚晖先生年谱简编》，罗家伦、黄季陆主编：《吴稚晖先生全集》卷18，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版，第38页。另一说，1911年11月12日，孙中山经伦敦回国，当地华侨问他国旗是什么样式？他回答是青天白日旗，并手绘了国旗样式，附有尺寸。华侨社团立即照样赶做了50幅国旗，悬挂在城东的唐人街。见王晓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国旗之争及青天白日旗的命运》，《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纪念南京临时政府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民国档案杂志社2002年版，第176页。

67 张馥蕊著，何珍蕙摘译：《辛亥革命时的法国舆论》，《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三册，第54页。

68 上野驻檀香山总领事给内田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95页。

69《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第37页。

70［美］汤姆森：《北洋之始》，第49页。

71《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第65页。

72《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05页。

73 邓警亚：《辛亥广东独立传信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335、337页。

74《广东独立记》，《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451页。

75 郑彼岸：《香山起义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342页。

76《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30、233页。

77《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388页。

78 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界参加革命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316页。

79《党人三督传》，第43页。

80《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160页。

81 习贤德：《孙中山与美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8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28—29页。

83《宋教仁集》下册，第718页。

84《党人三督传》，第21页。

85《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第108、109页。

86 冯自由：《中华民国旗之历史》，《革命逸史》初集，第22页。

87《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53页。

88《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第27页。

⑧⑨ 尢嘉博：《尢列传》，自印本。转引习贤德《美国与中国革命》，119 页。
⑨⓪《辛亥革命时的法国舆论》，《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三册，第 67 页。
⑨①《澹安日记》上册，第 40、41、42、43 页。
⑨② 梁烈亚：《同盟会在南宁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 499 页。
⑨③《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 125 页。
⑨④ 郑之翰：《漳州光复前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 140 页。
⑨⑤《吴铁城回忆录》，三民书局 1971 年版，第 26 页。
⑨⑥ 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第 203 页
⑨⑦ 王振民：《参加独立将校团决死团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 63 页。
⑨⑧《北洋之始》，第 29、39 页。
⑨⑨ 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 237 页。
⑩⓪《革命逸史》初集，第 22 页。
⑩①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 189、190 页。
⑩②《近代史资料》总 72 号，第 157、159 页。
⑩③《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17 页。
⑩④《吴铁城回忆录》，第 26 页。
⑩⑤《辛亥海军起义的前前后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93 页。
⑩⑥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 190 页。
⑩⑦《辛壬日记·1912 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第 43—44 页。
⑩⑧《先行者之歌——辛亥革命时期歌曲 200 首》，第 79 页。
⑩⑨《湖南反正追记》，第 18 页。
⑪⓪《湖南反正追记》，第 26 页。
⑪①《斯诺文集》（2），第 120 页。
⑪② 瞿兑之：《长沙城内》，《越风》第二十期，第 57 页。
⑪③《湖南反正追记》，第 235、236 页。
⑪④《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 65 页。
⑪⑤ 逸民：《辛壬闻见录》，《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第 29 页。
⑪⑥ 欧阳武：《江西光复和二次革命的亲身经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310 页。
⑪⑦ 李良庚：《李竟成的一生》，《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285 页。
⑪⑧ 高骞：《智取象山炮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278 页。
⑪⑨ 吴次藩：《镇江光复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267 页。
⑫⓪《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 16 页。
⑫①《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113 页。

⑫ 吴佩江：《扬州光复事略》，《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316—317、297页。

⑬《孙天生起事见闻录》，《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302页。

⑭ 石体元：《东乡光复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321、322页。

⑮《辛亥革命襄阳见闻录》，《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号，第11页。《大波》第三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26页。

⑯《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07页。

⑰ 茅乃登、茅乃封：《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386—387页。

⑱《亦云回忆》，第59页。

⑲ 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152页。

⑳《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2辑，第254页。

㉑《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第61页。

㉒ 祁龙威：《孙天生起义调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315页。

㉓ 许桀臣：《清江浦失陷始末》，《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332、334、335页。

㉔《叶圣陶集》第19卷，第48页。

㉕《澹安日记》上册，第40页。《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41页。1911年11月4日上海光复第二天创刊的《光复报》，不久出版《上海光复记》，《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34—135页。

㉖《黄炎培日记》第一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㉗《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52页。

㉘ 伍特公：《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50页。

㉙《中华民国军光复上海记》二集，1911年11月6日出版，光汉学社有光纸石印本，《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40页。

㉚ 1911年11月5日《光复报》，《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35页。

㉛《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51页。

㉜《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89、141页。

㉝《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154页。

㉞《民立报》，1911年11月5日。

㉟《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07页。

㊱《民立报》1911年11月6日，参考陈三井：《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

㊲ 1911年11月5日《光复报》，《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35页。

㊳《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07页。

㊴《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73页。

⑩《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第 31—32 页。

⑪《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 219 页。

⑫ 详见《申报》、《时报》、《民立报》，参考《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

⑬《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 217 页。

⑭《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观感》，《中国哲学》第九辑，第 518、519 页。

⑮《叶圣陶集》第 19 卷，第 49—50 页。

⑯《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229 页。

⑰ 郭孝成：《江苏光复纪事》，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七），第 6 页。

⑱《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69 页。

⑲《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278 页。

⑳《黄炎培日记》第一卷，第 24 页。

⑪《缘督庐日记钞》，第 226、227 页。

⑫《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105—106 页。

⑬《回忆苏州光复》，《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123—124 页。

⑭ 徐敬安：《常州光复概念》，《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157 页。

⑮《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59 页。

⑯《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167 页。

⑰《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 137 页。

⑱《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180 页。

⑲ 佚名：《常昭光复纪事》，《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145、146 页。

⑳ 徐翰青：《辛亥年杂录》稿本，常熟图书馆藏，《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200 页。

⑪《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73 页。

⑫ 费范九：《南通光复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218、222 页。

⑬ 费璞安：《吴江光复的回忆》，《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149 页。

⑭ 费璞安：《吴江光复前后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278 页。

⑮ 华彦云：《辛亥前后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 59 页。

⑯ 黄印侯：《靖江光复的片段》，《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182 页。

⑰ 任洽丞：《兴化县光复记略》，《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328 页。

⑱《辛亥革命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 102 页。

⑲《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18 页。

⑳《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 6 页。

⑪ 来伟良：《浙军光复杭州和驰援南京亲历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154 页。

⑱《我在辛亥这一年》，《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 175 页。

⑱ 黄克武编撰：《蒋复璁口述回忆录》，第 23 页。

⑱《郁达夫散文选集》，第 284 页。他误记成五色旗、五色布匹。

⑱ 魏伯桢：《宁波光复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 25 页。

⑱ 林端辅：《宁波光复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179 页。

⑱《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175 页。

⑱《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440 页。

⑱《鲁迅全集》第二卷，第 313 页。

⑲ 陈言：《辛亥革命在绍兴》，《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第 5 页。

⑲《黄光集》，第 361、362 页。

⑲《嘉兴光复史详志》，《辛亥革命》（七），第 158 页。

⑲ 吴欣木：《辛亥革命时期硖石商团和工兵铁道大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172 页。

⑲ 邱寿铭：《湖州光复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168 页。

⑲《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 18 页。

⑲《淮上军革命实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420 页。

⑲《大埔、永定、上杭的光复和革命军在长汀的失败》，萧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 377 页。

⑲ 吴默林：《辛亥革命上杭民军被陷记》，《福建文史资料》第六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142 页。

⑲ [英] 丁格尔：《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第 78 页。

⑳《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 141、170 页。

⑳《许宝蘅日记》第一册，第 380 页。

⑳《申报》“石头城下恶闻”，《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531 页。

⑳《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 192 页。

⑳ 王孝煃《秋梦录》，《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558 页。

⑳ [英] 计约翰：《辛亥武昌战守闻见录》，《近代史资料》总 72 号，第 176 页。

⑳《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 558 页。

⑳《湖南反正追记》，第 249 页。

⑳ [日] 沪友会编，杨华等译：《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79—80 页。

⑳ 石体元：《忆成都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 66 页。

⑳ 陈攸序：《袍哥唐廉江与辛亥重庆“反正”》，《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 357 页。

㉑1 但懋辛：《四川辛亥革命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27页。

㉑2 向楚遗稿：《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83页。

㉑3《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84页。

㉑4《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63、64页。

㉑5 杨西舟：《自井辛亥反正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239、240页。

㉑6 吴树韩：《内江独立前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182页。

㉑7 熊克武等撰：《蜀党史稿》，《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8页。

㉑8 李劼人：《大波》下册，第326页。《胡兰畦回忆录1901—1936》，第13页。

㉑9 肖华清：《一个县城学生看到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383页。

㉒0《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247—249页。

㉒1 陈德甫：《忠县辛亥革命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194页。

㉒2《奉节反正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205、206页。

㉒3《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281页。

㉒4 吴雪俦：《贵州辛亥革命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436页。

㉒5 冯程南：《辛亥革命时贵州工商界的动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第502页。

㉒6 忍庐：《辛亥革命在贵阳》，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页。

㉒7 阮俊斋：《贵州辛亥革命前后的几点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505页。

㉒8《辛亥革命贵阳光复目睹记》，《传记文学》10卷1期，第96页。

㉒9 黄光赞、陈金铭：《宁夏民军起义》，《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99、500页。

㉓0《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75页。

㉓1《常昭光复纪事》，《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144页。

㉓2《辛亥革命闻见记》，《辛亥革命》（八），第57页。

㉓3 1913年6月7日《李燮和陈述光复军成立并先后光复上海、南京等地咨呈》附节略，《历史档案》1981第3期。

㉓4 董巽观：《辛亥嘉兴光复记》，《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26页。马济生口述，董巽观记录《嘉兴光复记略》，《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科学出版社，第68页。

㉓5《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73页。

㉓6 张从五、丁洁尘：《辛亥宿州光复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428页。

㉓7 [法] 博里斯·马尔坦，张宇凌译：《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儒勒·乐和甘——中华帝国混乱年代期间法国驻华领事》，第84页。

㉓8《同盟会在桂林、平乐的活动和广西宣布独立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

集，第465页。

㉓9《太原和河东光复的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170页。

240《辛亥革命史料》，第217页。

241《民立报》1911年12月8日，《蔡松坡集》，第97页。

242《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72页。

243《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续编》第四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参考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曾为共进会秘书长的谢石钦［樗公］说："光复会旗式为井字，黄字蓝底，表示井田之意义。"《樗公随笔》，《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489页。

244 王聿均访问，谢文孙记录：《莫纪彭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第9页。

245《记韩衍》，《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449页。

246《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87页。

247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第262页。

248《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95、297页。

249《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07页

250《申报》影印本，参考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第106、142页。

251 黄尊三《留学、归国日记》，《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卷，第259、260页。

252《黄炎培日记》第一卷，第26页。

253 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66页。黄炎培：《八十年来》，第57页。

254 吴叔班记录，张树勇整理：《吴景濂自述年谱》（上），《近代史资料》总10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吴景濂口述，吴叔班记：《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的亲身经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412页。

255 逸民：《辛壬闻见录》，《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第29—30页。

256《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79页。

257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21页。《胡宗铎先生访问记录》，《口述历史》第七期，第57页。刘成禺、张伯驹著：《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4页。杨小佛：《往事沧桑惜阴堂》手稿，马铭德：《辛亥革命与赵凤昌》，《近代中国》第13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105页。

258 居正著，罗福惠、萧怡编：《居正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

259《申报》1911年12月6日。

260《郑孝胥日记》（三），第1366页。

㉖《时报》、《民立报》1911年12月9日。
㉖《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19页。
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10页。
㉖《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360页。
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22页。
㉖《叶圣陶集》第19卷，第74页。
㉖《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它》，《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410、411页。
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33页。
㉖《澹安日记》上册，第51页。
㉗《吴铁城回忆录》，第42页。
㉗［日］内田顾一：《湖北革命战见闻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三辑，第189页。
㉗《海外友人致孙中山信札选》，《民国档案》2003年第4期。
㉗《居正文集》，第86页。
㉗《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18页。
㉗ 胡伯洲等译：《海外友人致孙中山信札选》，《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
㉗《中华民国旗之历史》，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22页。
㉗《海外友人致孙中山信札选》，《民国档案》2003年第4期。
㉗ 转引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第142页。
㉗ 1912年2月25日《南京临时政府报》第二十二号，转引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第142页。
㉘ 陈一萍编：《先行者之歌——辛亥革命时期歌曲200首》，第30、117、163页。
㉘《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18、230页。
㉘《申报》1912年3月3日。《清代报刊图画集成》十一册，第403、555页，转引自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第130页。
㉘ 转引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第142、143页。
㉘《叶圣陶集》第19卷，第81、82页。
㉘《澹安日记》上册，第55页。
㉘ 陈碧兰：《早期中共与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忆》，第7页。
㉘ 唐在礼：《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340页。
㉘《许宝蘅日记》，第394—395页。
㉘《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95页。
㉙《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190页。
㉙《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第221页。

㉒《汪荣宝日记》第三集，第 1148 页。

㉓《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312 页。

㉔《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 228 页。

㉕ 通宝、韩希良：《辛亥革命在伊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第 258 页。

㉖ 马培清：《长庚升允进攻陕西民军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416 页。

㉗《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 583 页。

㉘《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79 页。

㉙《恽毓鼎澄斋日记》（2），第 581 页。

㉚《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下册，第 276、277 页。

㉛ 王文德：《辛亥革命前后台湾的一鳞半爪》，《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 512、511 页。

主要参考书目

一、日记、书信、档案史料汇编

1. 许宝蘅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

2.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 《徐志摩未刊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4. 《绍英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5.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影印本。

6. 凌盛仪：《辛亥日记》，同明等编：《湖南反正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 《黄炎培日记》第一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

8. 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9. 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0. 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1. 宁海县政协教科文卫体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童保喧日记》，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

12. 徐兆玮：《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

13.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14. 《左绍佐日记摘录》，《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

15. 温世霖著，高成鸢编：《昆仑旅行日记》，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

16. 佚名日记《常昭光复纪事》，《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

17. [日] 宗方小太郎：《辛壬日记》，冯正宝译：《辛壬日记·1912年中国之政党结社》，中华书局2007年版。

18. [英] 计约翰日记，余绳龄、杜志圭、杨红译，李雪云校：《辛亥武昌战守闻见录》，《近代史资料》总72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9.《严复日记》（1911年）网络版。

20.《吴虞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1. 溥伟：《逊国御前会议日记》，《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22.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23. 潘联凡：《余之辛亥革命日记》，《湖南反正追记》。

24.《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5. 黄尊三：《留学、归国日记》，收入1933年湖南印书馆代印之《三十年日记》，《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二卷。

26. 郑孝胥著，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三，中华书局1993年版。

27.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28. 汪家熔选注：《蒋维乔日记选》，《出版史料》1992年第2期。

29.《朱峙三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1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2005年版。

30.《汪荣宝日记》第三集，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

31. 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六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2. 瞿兑之：《长沙城内》，根据日记所写，《越风》第二十期，1936年10月。

33.《辛亥革命襄阳见闻录》，《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号，中华书局。

34. 黄光：《辛亥光复日记》，马允伦编《黄光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35. 佚名：《常昭水灾闹荒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

36. 周钟岳：《惺庵日记》，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7. 吴稚晖日记，《吴稚晖先生全集》第十三卷，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69年版。

38. [日] 内田顺一、周树嘉译：《湖北革命战见闻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3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39.《大来日记——1910年美国太平洋沿岸联合商会代表团访华记》（选译），《辛亥革命史丛刊》第9辑，中华书局1997年版。

40. 根据日记编写，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1. 刘绍宽：《厚庄日记》1911—1912，温州图书馆藏手稿，卢礼阳先生提供电子文本。

42. 叶圣陶日记，《叶圣陶集》第1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43. 陆澹安：《澹安日记》上册，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

44.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

45. 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46. 蔡元培日记，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7. 张继：《张溥泉［继］先生回忆录　日记》，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

48. 柳州市图书馆藏：《锡金军政分府总理处日记》，《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

49. 李鍌：《光复上海组织军队日记》，《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0.《柳亚子文集　自传　年谱　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1. 万小南译，张富强校：《革命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九辑，中华书局1997年版。

52. 宋教仁日记，《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

5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张伯英日记零稿》，《历史档案》1983年第4期、1984年第1期。

54.《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5月。

55.《平刚日记选辑》，《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3期。

56. 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7.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网络版。

58. 李维格日记，《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9.《20世纪初的中国印象——一位美国摄影师的纪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60. 胡伯洲等译：《海外友人致孙中山信札选》，《民国档案》2003年第1、4期。

61.［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1895—1912），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62.《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63. 邱权政、杜春和整理：《蓉城家书》、《胡适家书》，《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64. 蔡元培书信，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

65. ［法］博里斯·马尔坦编著，张宇凌译：《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儒勒·乐和甘——中华帝国混乱年代期间法国驻华领事》，岳麓书社2005年版。

66. 杨杏佛书信，《杨杏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67.《赵凤昌藏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68.《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69. 上海市档案馆：《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历史档案》1981年第3、4期。

70. 黄彦、李伯新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

71. 张雪筠等译编，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上海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72.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

73.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

74. 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75. 丘政权、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6. 上海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7.《东三省辛亥革命史料》，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78. 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79. 严复致陈宝琛书，《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80. 湖北省图书馆辑：《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

81. 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82. 陈一萍编：《先行者之歌——辛亥革命时期歌曲200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3. 卞孝萱辑：《山东假独立资料》，《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1号，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84. 法国外交部、陆军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23页。

85.《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86.［英］A.苏古敦著，郦玉明译，韩森、一之校：《辛亥革命在汉口》，《民国档案》1989 年第 2 期。

8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1912 年南北议和电报选》，《历史档案》1986 年第 4期。

88.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1—14 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1988 年版。

89. 林述庆：《江左用兵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

90.《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91.《长沙抢米风潮》，《近代史资料》1955 年第 4 号，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

92.《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近代史资料》1961 年第 1 号。

93. 陈梅龙等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温州、杭州海关贸易报告译编》，宁波出版社 2003 年版。

94.［日］沪友会编，杨华等译：《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95.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大东图书公司 1980 年版。

96.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八），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97.《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1—8 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98. 尚秉和：《辛壬春秋》，1924 年影印本。

99. 吴庆坻修，金梁增订：《辛亥殉难录》，文海出版社 1968 年版

100. 林能士编：《辛亥时期北方的革命活动》，正中书局 1993 年版

101. 周开庆编著：《四川与辛亥革命》，台湾学生书局 1964 年版。

102. 大汉热心人辑录：《广东独立记》，《近代史资料》1961 年第 1 号。

103.《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104.《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105.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106. 武昌起义纪念馆编：《辛亥革命大写真》，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1 年版。

107. 马传德、徐渊编著，孙戈翻译：《辛亥革命时期的货币》，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108.《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 1997 年印版。

109.《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二、口述资料、回忆录、年谱

110.《张謇——故里征稿专辑》，《海门县文史资料》第八辑，1989年版。

111. 北一辉著，董炯明译：《支那革命外史》，未刊书稿。

112.《广禄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

113. 颜惠庆著，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14.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115. 黄药眠口述，蔡彻撰写：《黄药眠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6. 吴叔班记录，张树勇整理：《吴景濂自述年谱》（上），《近代史资料》总10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7. 张群口述，陈香梅笔记：《张岳公闲话往事》，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118. 赵恒惕等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一期，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

119. 贺国光、余汉谋等访问记录，《口述历史》第七期，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

120. 刘士毅等访问记录，《口述历史》第八期，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

121. 蒋鼎文等访问记录，《口述历史》第九期，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版。

122. 贾廷诗等：《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

123.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24. 郭廷以等：《邓家彦先生访问纪录》，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

125. 郭廷以等：《钟伯毅先生访问记录》，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版。

126. 沈云龙等：《刘航琛先生访问记录》，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

127. 沈云龙等：《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

128. 王聿均访问，谢文孙记录：《莫纪彭先生访问记录》，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

129. 沈云龙、林忠胜等：《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

130. 沈云龙、谢文孙等：《张知本先生访问纪录》，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

131. 贾廷诗等：《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

132. 沈云龙、陈三井等访问记录：《周雍能先生访问纪录》，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

133. 郭廷以等：《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

134. 李毓澍等：《戢翼翘先生访问记录》，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

135. 郭廷以口述，张朋园等整理：《郭廷以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136. 黄克武编撰：《蒋复璁口述回忆录》，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

137. 许奇松口述：《争夺沪军都督现场目击记》，《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138. [美] 舒衡哲著，[美] 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139. 陈文斌：《生平记》（手抄件），武昌起义纪念馆藏，王启涛先生抄录。

140. 黄绍竑：《五十自述》，岳麓书社1999年。

141.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142.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12页。

143. 萨孟武：《学生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44. 郁达夫自传，杨世伟编：《郁达夫散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

145. 顾颉刚：《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观感》，《中国哲学》第九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146.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

147. ［英］丁格尔著，陈红民等译：《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年。

148. [日] 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149. [美] 德龄著，荷莎、苏森译：《德龄公主回忆录》，团结出版社 2007 年。

150. 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百家出版社 2003 年。

151. 吴铁城：《吴铁城回忆录》，三民书局 1971 年。

152. 沈亦云：《亦云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8 年。

153. 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2009 年。

154. 柳亚子：《辛亥光复忆语》，《越风》半月刊 1936 年第 30 期。

155.《从家乡到美国：赵元任早年回忆》，学林出版社 1997 年。

156.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157.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 2003 年。

158. 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 2000 年。

159. 许德珩：《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7 年。

160.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 2007 年。

161. 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 1901—1936》，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62. 阎锡山：《阎锡山早年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8 年。

163. 蒋作宾：《蒋作宾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5 年。

164. 吴经熊著，周伟驰译，雷立柏注：《超越东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165. 左舜生：《我的少年时期》，陈正茂主编《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论集》下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6 年。

166. 左舜生：《近卅年见闻杂记》，中国青年党中央党部 1984 年印。

167.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年，421 页。

168. 吴国桢著，吴修垣译，马军校订、注释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169.《未能忘却的忆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170. 陈碧兰：《早期中共与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10 年。

171. 刘峙：《我的回忆》，文海出版社 1982 年。

172. 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9 年，101 页。

173. 程沧波：《沧波文选》，台湾文星书店 1964 年。

174. 陈衡哲著，冯进译：《陈衡哲早年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175. 曾宝荪：《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 1986 年。

176. ［英］苏路熙著，吴慧译：《乐往中国》，自印本。

177.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7 年版。

178.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

179.《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

180. 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2，新华出版社 1984 年。

181.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六集，中华书局 1981 年。

182.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

183. 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84. ［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张士尊、信丹娜译：《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185. ［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186. ［美］丁韪良著，沈弘译：《中国觉醒》，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 年版。

187. ［美］芮恩施著：李抱宏等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188. ［美］汤姆森著，朱艳辉译：《北洋之始》，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 年版。

189.《胡汉民自传》、《李烈钧自传》、《柏文蔚自传》、《党人三督传》，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

190. 罗久芳、罗久蓉编辑校注：《罗家伦先生文存补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9 年版。

191. 谭人凤：《石叟牌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

192. 张伍：《我的父亲张恨水》，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193. 喻血轮：《绮情楼杂记》，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1 年，51—52 页版。

194.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195. 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196. 张道藩：《酸甜苦辣的回味》，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8 年版。

197. 顾维钧口述，唐德刚等整理：《顾维钧回忆录》一，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198. 袁克文：《辛丙秘苑》，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

199.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着记》，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201.《辛亥革命回忆录》1—8，文史资料出版社、中华书局 1961—1984 年版。

202.《福建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纪念辛亥福建光复八十周年”，1991 年版。

203.《福建文史资料》第六辑［辛亥革命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204.《福建文史资料》第六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205.《内蒙古辛亥革命史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206.《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207.《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208.《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209.《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210.《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 11 辑，1991 年版。

211. 林逸撰：《民国蔡松坡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212. 刁抱石编：《民国吴礼卿先生忠信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

213. 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214. 陈正茂编著：《左舜生年谱》，国史馆 1998 年版。

215. 陈正茂编著：《曾琦先生年谱》，国史馆 1996 年版。

216.《张季鸾先生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217. 俞振基编：《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21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219.《吴稚晖先生年谱简编》，罗家伦、黄季陆主编：《吴稚晖先生全集》卷 18，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1969 年版。

220.《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221. 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一卷，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222. 于凭远、罗冷梅等编纂：《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223. 凤冈及门弟子谨编：《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

三、报刊、文集

224.《申报》影印本 1911—1912 年

225.《民立报》影印本 1911—1912 年

226.《时报》影印本 1911—1912 年

227. 天津《大公报》1911—1912 年

228.《东方杂志》1911—1912 年

229.《教育杂志》1911—1912 年

230.《越风》1934—1936 年

231. 郑曦原编，李方惠、胡书源、郑曦原译：《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232.《辛亥革命史丛刊》第 1—14 辑，1980—2009 年

233.《历史档案》

234.《民国档案》

235.《近代史资料》

236.《文史资料选辑》

237.《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238.《熊希龄先生遗稿》（1），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年版。

239. 周秋光编：《熊希龄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240. 陈步编：《陈石遗集》，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241.《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242.《于右任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

243.《陈布雷先生文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4 年版。

244. 杨度：《旷代逸才：杨度卷》，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

245.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246. 居正著，罗福惠、萧怡编：《居正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247.《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248.《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249. 黄远生：《远生遗著》影印本，上海书店 1990 年版。

250. 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251.《梅冷生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

252.《黄群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

253.《黄光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年版。

254. 陈正卿、徐家阜编校：《徐绍桢集》，四川师大出版社 1991 年版。

255.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255. 丁贤俊、喻作风编：《伍廷芳集》，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256. 陈旭麓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257. 周元高、孟彭兴、舒颖云编：《李烈钧集》，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258. 唐文权编：《雷铁崖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259.《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260.《陈英士先生文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77 年版。

四、著作

261.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262. 周秋光：《熊希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
263. [美] 巴巴拉·W. 塔奇曼著，万里新译：《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新星出版社 2007 年版。
264. [澳] 西里尔·珀尔著，檀东鍟、窦坤译：《北京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265. [澳] 西里尔·帕尔：《辛亥革命中的莫里森)，《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八辑，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266. [澳] 彼得·汤普森、罗伯特·麦克林著，檀东鍟译：《中国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267. 窦坤：《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268. 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1840—1949)》，新华出版社出版 1999 年版。
269. 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台湾联经出版社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版。
270. 邓丽兰著：《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271. 瞿骏著：《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年版。
272. 张馥蕊著、何珍蕙摘译：《辛亥革命时的法国舆论》，《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三册。
273.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55 级学生集体编写：《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274.《烧饼歌与推背图》，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4 年版。

275.［美］史景迁著、温洽溢译：《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版。

276.［美］史景迁著，温洽溢译：《寻找现代中国——最后的王朝》，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版。

277.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278.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 年版。

279.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5 年版。

280.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281. 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282. 白吉庵：《章士钊传》，作家出版社 2004 年版。

283. 李日：《大时代的旁观者》，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84. 丁玲：《母亲》，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0 年版。

285. 李劼人：《大波》第三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286. 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94 年版。

287. 朱志骞：《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之研究》，台北知音出版社 1992 年版。

288. 胡应汉：《伍宪子先生传记》，香港四强印刷公司 1953 年印。

289.［英］苏慧廉著，关志远等译：《李提摩太在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290. 李时岳：《李提摩太》，中华书局 1964 年版。

291. 胡素萍：《李佳白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92. 黄自进：《北一辉的革命情结：在中日两国从事革命的历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1 年版。

293. 习贤德：《孙中山与美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294. 陈三井：《中山先生与美国》，学生书局 1983 年版。

295. 高宗鲁译注：《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296. 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五、论文

297.《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纪念南京临时政府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民国档案杂志社2002年版。

298. 黄峻岭：《谣言与革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11月。

299. 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版。

300. 刘望龄：《湖北的舆论导向与武昌起义的成败》，《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301. 李喜所：《"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302. 张鸣：《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303. 陈三井：《故宫档案所见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304. 陈三井：《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辛亥革命研讨会论文集》，1982年版。

305. 菊池贵晴：《清末经济恐慌与辛亥革命之联系》，《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306. 陈生玺：《清末民初的剪辫运动》，《渤海学刊》1995年第三、四期。

307. 李贤哲：《清政府国旗黄龙旗诞生的曲折与血泪》，浙江省政协《联谊报》2010年12月11日。